

20世纪
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

下册

A Chronicle of Historiography in
20th Century China

王学典 主编





http://www.cp.com.cn



定价：248.00元（全二册）

山东大学985工程二期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团队项目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

（1950～2000）

下册

王学典 主编
郭震旦 编撰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王学典主编;郭震旦编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ISBN 978-7-100-10507-1

Ⅰ.①2… Ⅱ.①王… ②郭… Ⅲ.①史学史-中国-20世纪 Ⅳ.①K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4790号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

王学典 主编

郭震旦 编撰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507-1

2014年11月第1版 开本710×1000 1/16

201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61

定价:248.00元

1981年

※ 英国著名史家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出版。
※ 亚细亚生产方式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
※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出版。
※ 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说”。
※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
※ 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
※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开始出版。
※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

1 月

23 日　悼念顾颉刚学术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主持报告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友渔在会上赞扬了顾颉刚对中国学术发展的功绩。指出顾颉刚大胆怀疑长期形成的我国传统古代的历史系统，在史学领域里展开了一场“古史辨”的大争论。顾颉刚对古籍年代的考辨、民间文学的倡导、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都起着相当的作用。白寿彝在会上作了长篇学术报告，评述了顾颉刚走过的学术道路和他的贡献。报告着重介绍了他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以及为了打破这“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在驱散《尚书》蒙着的迷雾方面的贡献。同时也介绍了顾颉刚在历史地理学、边疆地理学、民俗学以及校点“二十四史”等古籍校勘整理方面的贡献。报告说，顾颉刚先生对史学的见解，几十年来在国内外史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出席报告会的有叶圣陶、邓广铭、尹达、夏鼐、翁独健、胡厚宣、张政烺、孙毓棠、罗尔纲、吴世昌、侯仁之、贾芝、徐伯昕、雷洁琼、梅益、梁寒冰等学术界及有关方面的人士共三百多人。

是月　郑异凡在《世界历史》第 1 期发表《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

作者在文中就布哈林被扣在头上的几顶大帽子，包括“国家问题上的‘半无政府主义’”、“‘发财吧’的口号”、“阶级斗争熄灭论”、“‘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及“布哈林的某些错误及其根源”作了分析。其时，布哈林被扣上的“间谍、恐怖分子、人民公敌”的政治帽子虽然已在苏联被取掉，但是这位曾被列宁誉为“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却依然遭到冷遇，还没有被学者们认真地重新研究。郑异凡在论文中提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尺度来衡量，布哈林的理论主张中仍然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以期分清是非给这位国际共运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以应有的公正的评价。布哈林的理论观点是一份宝贵的遗产，是必须批判地继承的。”这比起苏联学界给布哈林的平反要早出很多年。

白寿彝在《史学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

作者认为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包括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等方面。

《外国史知识》（月刊）创刊。

本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1986年停刊。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1949—1978）》（上下册）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太平天国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具体编选工作由王庆成、马汝珩、林言椒、郭毅生、龚书铎等负责。编者从1949—1978年间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所发表的近2000篇论文中选录了82篇。内容大致可分为综论、军事、政治、经济、宗教及思想、对外关系、人物考评、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太平天国史学研究史等十类。后附“1949—1978年太平天国报刊文章索引”。

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由地图出版社出版。

该图集是世界上第一部范围最广、年代最长的旱涝气候图集，基本上反映了我国自1470年以来，逐年大范围旱涝的分布特征，为超长期气候预报提供了依据。

李桂海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发表《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独立政权问题》。

董楚平在《学术月刊》第1期发表《论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与封建特权主义》。

文章意在揭露农民起义的平均主义与封建特权主义之间的深层次关系。作者认为，从陈胜到洪秀全，一切旧式农民战争的平均主义一开始就与封建特权主义结有不解之缘。哪里有平均主义，那里就有封建特权主义。沿着平均主义的踪迹，总可以嗅到封建特权主义的气味。

平均主义是农民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它对旧的封建特权曾发挥过相当大的冲击作用。但在革命队伍内部，平均主义往往一开始就与特权主义胶合在一起。平均主义的战旗是缚在特权主义的旗杆上的，否则它就“揭”不起来。平均主义冲击着旧的封建特权，却掩护着新的封建特权的成长。

迷信与专制，是一对孪生兄弟。迷信产生专制，专制需要迷信。宗教迷信必然会产生专制特权，专制特权必然会利用宗教迷信。农民把自己隶属于神，不敢真正作自己命运的主人，必然会把领袖神格化，对领袖顶礼膜拜，这就为领袖的专制特权提供了自然土壤。

中华书局主办《文史知识》创刊。

初为双月刊，次年改为月刊。该刊以普及中国古代文史知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宗旨，坚持“大专家写小文章”，突出知识性、趣味性和学术性的统一，内容涵盖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和各界读者的喜爱，是全国颇具影响力的文史类名牌刊物之一。

商务印书馆开始分辑刊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为庆祝商务印书馆建馆 85 周年，在陈原的策划和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在已出版的众多汉译学术著作中精选出 50 种名著，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并陆续推出新的译著。其后，大批西方史学名著通过该丛书得以与国内读者见面。

黎澍在《戏剧论丛》第 1 期发表《旧剧中的封建意识问题》。

文章目的在于批判意识形态里的封建残余。作者指出：“我们在解放以来就忽视了封建残余的继续存在的事实。我们一贯深信我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已经彻底胜利……可是我们忘记了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在旧制度改革以后还会长期存在，忽视了反封建的宣传。而且由于我国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武装斗争，在政治上的主要敌人是外国侵略者和本国政府中坚持反共内战政策的反动派，所以在整个革命发展过程中都忽视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斗争。现在回顾过去，可以说，从五四运动以后就没有对封建主义进行过系统的批判。带封建色彩的事物，在 1949 年后不是受到批判，往往由于我们的忽视在无意中受到保护，认为有那么一点点旧东西不足为怪。”旧戏“都好像或多或少地同封建主义牵连着……从整体说来，就是属于封建文化这个范围”，精华与糟粕共存，“那种有反封建或民主思想内

容的，恐怕很少”，“因此，我们在学习它的时候不加分析，久受熏陶，就不能不受影响”。“我觉得戏剧改革在解放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强调抢救、发掘，好像没有真正做到推陈出新。”如何进行戏剧改革，黎澍指出：“提倡上演各种题材的戏……但必须有共同的东西，就是思想内容有利于现代化。”黎澍以史家的眼光，指出戏剧改革的方向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观点，引起戏剧界人士的关注和讨论。

为纪念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文史哲》第 1 期刊登一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文。

包括李侃的《关于研究义和团运动方法的几点意见——在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丁名楠的《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程歗的《义和团思想述评》，（美）周锡瑞的《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李德征、丁凤麟的《论义和团时期的围攻使馆事件》。

张维华在《文史哲》第 1 期发表《我对于研究史学的一些看法》。

文章对“文革”后史学界出现的推崇史料轻视理论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史学工作者不能不注重史料，但不能说只是在史料上下功夫，就算是完成研究历史的目的了。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借以探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目前中外史学界有一个偏向，好研究小题目，忽视大问题，不求融会贯通的去对待历史知识。这样达到成名成家的目的，比较容易，却是达不到研究历史的真正目的。

中国珍宝展览在联邦德国科隆、希尔德海姆开展。

至 1982 年 1 月结束，观众达 28 万人次。

2 月

4 日　邓初民逝世，终年 92 岁。

17 日　刘大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

该文提出应该从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内容方面来寻找突破的关键，即狠抓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作者认为：“克服薄弱环节、表面体系等等，做好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工作，不斤斤于这样那样的框架，全面提高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大立新说，使我们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截然有异于一切旧的、没有排除掉唯心主义的历史书，面貌焕然一新。”作者用盖房子来说明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据说

从前中国人建造房屋同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人把上梁看得最要紧，西方人把筑础看得最要紧。上梁要紧，就是看重最高层的部分，筑础要紧，就是看重最基础的部分。上梁、筑础都很重要。但筑础的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它是讲社会历史的物质基础部分的。”

是月　葛懋春、李兴芝编辑《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下）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系“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编”之一种，内部发行，编辑委员会成员有张岱年、石峻、楼宇烈、葛懋春、丁宝兰、杨凤麟等。

上册选录论文29篇，主要是谈哲学问题的，部分也涉及了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问题。多写于五四前后和30年代，有7篇系作者晚年的言论，有的属第一次为大陆的出版物选录。对于所选论文，除了改正原版文字上的明显误植外，“均保持原文面貌未动”。这些文章基本上反映出胡适的哲学思想（包括中外哲学史观、思想方法论等）以及相关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该书下册收录《胡适的自传》（即《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编校译注）。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版胡适口述自传，书前保留了唐德刚的《写在书前的译后感》和《“胡适的自传”编译说明》两文，并保留了唐氏的全部注释性文字。

80年代初，国内胡适研究刚刚起步，在研究资料十分缺乏或难以寻找的情况下，该书的出版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录了1900年至1978年国内发表的有关明代历史的论文和著作目录，包括近30年来台港所发表的有关明代历史的中文论文和著作目录，以及我国学者在外国中文刊物上发表的部分论文目录，约1万条。分论文和著作两部分，论文约9400篇，著作约600种，列分12大类：总论、元末农民起义和明朝的建立、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法律、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民族、中外关系、思想文化、历史地理、科学技术、人物、其他。论文目录按篇名、著译者、报刊名称、出版时间、卷数和期数著录；著作目录按书名、著译者、出版时间和出版者名称著录。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该书汇集了13篇由文物考古专家撰写的长城遗址调查报告，内容涉及东北、内蒙古、河北、山西、宁夏、陕西、甘肃等地区的战国、秦汉、金、明等时期的长城遗址情况，对研究长城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书后附

有长城文献资料辑略。

田居俭在《史学月刊》第2期发表《应当对中国封建主义加强研究》。

米文平在《文物》第2期发表《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作者考证了嘎仙洞即北魏拓跋鲜卑祖先居住的旧墟石室，结束了史学界关于鲜卑发源地的争论。

英国著名史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部发行。

该书是作者1961年1—3月在剑桥大学“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讲座”所做的系列讲演，1963年出版后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译本出版后，也被历史学界争相传诵，影响了国内学者对历史认识论问题的理解。作者的一些观点，如“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连续不断的过程”、“历史是现在和过去的对话”、历史“是过去的事件跟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的谈话”等，更为各类史学文章竞相征引，大大拓展和深化了国内史学界对于“历史是什么”这一历史学根本问题的认识。史学界历史认识论的研究由此发端。

林剑鸣《秦史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1949年后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秦史的著作，从纵横两方面来论述秦朝历史，一是从纵的方面叙述了秦“由氏族部落到诸侯国、至一个朝代的建立和灭亡”的历史全过程，二是从横的方面剖析了秦各个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军事、民族关系、思想文化、秦与其他诸侯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者着重研究秦史自身的特点，认为秦史作为中国古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不能脱离整个中国古代史的一般规律去研究秦史，另一方面也不能用中国古代史的一般规律去代替秦史”。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董楚平在《史学月刊》第2期发表《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平均主义究竟包含哪些内容》。

《历史档案》创刊。

该刊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办的学术季刊，是全国首家刊布历史档案的刊物。以公布明清时期档案史料为主，适当公布1949年以前其他历史时期的档案，同时刊载利用档案、资料撰写的学术论文。

3 月

8 日 “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广州、桂平、桂林分段召开。

10 日 第一次“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在四川珙县召开。

11 日 湖南省历史学会年会讨论封建专制主义。

12 日 李时岳、胡滨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洋务运动》。

该文从正面肯定了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认为洋务运动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杀。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作者认为，主张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成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不能因为它是地主阶级学习西方的运动而抹杀它的历史意义。

该文观点与长期流行的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形成对立，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争议。

18 日 《光明日报》发表《历史研究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本文是《光明日报》记者对郑天挺、熊德基、吴廷璆、杨生茂等人的访问记，诸人所言皆针对当时考证之风渐盛的史学现象，批评现在有人“不愿意再依靠马克思主义，而是想用西方实证主义的烦琐考据和史料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从此篇访问记开始，此后一段时间对“回到乾嘉去”思潮的批评声音甚盛。

20 日 贵州省历史学会召开纪念巴黎公社一百一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24 日 周谷城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积极倡导比较史学研究。

文章指出：“不久以前，比较研究不大有人提，因为有一种顾虑，恐怕有人认为‘生搬硬套’。其实比较研究并不发生‘生搬硬套’的问题；恰恰相反，它只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研究工作，获得更好的研究成果。”作者在文中通过具体事例说明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发“比较史学”之先声。

26日　河南省中共党史学会举行专题学术讨论会讨论对陈独秀的评价问题。

是月　《洪业论学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选收作者平生所著论文37篇，包括久负盛名的《春秋经传引得序》、《杜诗引得序》、《礼记引得序》、《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破斧》、《再论臣瓒》、《再说西京杂记》等，皆为鸿篇巨制，体大思精。另外还包括《读清宗室敬徵日记稿本》、《蔚秀园小史》、《跋汪又村藏书簿记抄》，无一不推考正确，可订补前人或史文之阙之失。

董楚平在《求是学刊》第2期发表《农民战争的特殊规律浅探——兼答周良霄、张德信同志》，提出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修理工”观点。

文中认为：无论从总体上看，或从全过程看，农民战争都未曾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相反，它是封建制度的“修理工”。从陈胜到洪秀全，“千百次农民起义都不是由于封建制度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是由于封建制度正常机能未能发挥而爆发，就是说，封建制度这部机器还未到使用期限，只是由于发生某些故障而无法运转，或由于时代水平的提高使它的某些部件需要换新。农民战争的任务不是把这部机器拿去报废，而是加以修理或改装，不管农民当时是如何想法，客观规律性的作用使农民战争只能起封建制度修理工的作用”。作者提出，农民的“反封建”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反封建。因为：第一，农民的反封建的平均主义只是革命本能的简单表现，而不是对整个封建制度的彻底批判。从来没有一次农民起义要消灭整个地主阶级，消灭整个封建制度。旧式农民战争只反对个别的封建统治者和具体的封建剥削，从未向封建制度宣过战。第二，农民起义的这种局部的反封建性质也是不可能持久的。农民战争初期，反封建色彩多些，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农民起义军社会地位的提高，反封建色彩就相应地削弱，以至全部消失。总之，农民战争的反封建有两个特点：一是局部性；二是短暂性。不论从整体还是从全过程来看，农民战争都未曾反对过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

作者这一观点遭到广泛批评。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期间，

作者的一系列农民战争观点受到批判。据作者自述："从此我的农战史论文发不了，申请这方面的课题批不准了。甚至我的其他方面的研究文章与成果也因为'董楚平'的署名而得不到发表和承认。"

周谷城在《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发表《封建长期，似乎不长》。

文章提出"中国封建时代的开始在东汉后期"。

孟森《明清史讲义》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作者于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明清史的讲稿，由其门人商鸿逵整理，编成上下两册，上册讲明史，下册讲清史。每册又分两编，第一编为"总论"，论述明史、清史在史学上的位置，并结合明清历史的特点论述明清两代官修书的体例，使读者对明清的基本史料有一个概括的认识。第二编为"分论"，按时间先后，论述明清两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偏重于政治史。书中将史实的考证与评议糅合在一起，极为精辟深到，鲜明体现了作者治学的特点，素为学界推崇。

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简要回顾了1949年前五十年的甲骨文研究，着重介绍了1949年后甲骨文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和一些著名甲骨学家的重要贡献和研究特点，概述了世界甲骨学研究的进展。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建国前五十年来甲骨文发现和研究的回顾"，第二章"建国以来的甲骨文发现和著录"，第三章"建国以来的甲骨文研究"，第四章"建国以来的甲骨文研究和考古学"，第五章"建国以来的甲骨文研究和历史学"，第六章"建国以来的甲骨文研究和古代科学技术"，第七章"郭沫若对甲骨文研究的卓越贡献"，第八章"三十年来甲骨学的进展和我国甲骨文研究的展望"。书后还有附录，包括"八十年来甲骨著录目"及"建国以来甲骨文论著简目"。

陈梧桐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关于处理我国民族关系史若干原则的商榷》。

4月

2日　戴逸在《人民日报》发表《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对学术界"回归乾嘉、轻视理论"的学术倾向进行批评。

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充分承认历史资料对于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但不能片面地夸大史料的作用，认为历史研究仅仅是对史料的整理、考订，

用史料学代替和取消历史科学。搜集和排比事实材料，考证某个记载的真伪虚实，是为进一步认识历史作准备，但不能把这一工作取代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历史的研究，一旦从收集和考订史料、排比史事进入到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之间确立相互联系，透过纷纭的现象深入本质、揭明规律的时候，研究者的历史观、方法论将起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观点和深湛的理论素养，研究工作必将举步维艰。一些人认为历史科学只凭史料说话，不需要任何理论，理论的指导必然会带来主观武断的弊病，反而会损害科学性。“只凭史料说话”，仅仅在某些陈述简单事实的很有限的领域中可以做到，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范围，当试图对历史过程作某种分析判断时，对一条史料也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会束缚研究工作，妨碍人们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这至少也是严重的误解。

21日　亚细亚生产方式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

这是我国学术界第一次举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专题讨论会。主要议题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含义和性质，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各国的历史实际，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等。

会议的代表性论文刊发在《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

是月　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对明清至1949年前彝族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彝族社会的奴隶制性质及其变化进行了阐述，并对彝族奴隶制社会中的“冤家械斗”、明清王朝与彝族奴隶主之间围绕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的矛盾与斗争等问题进行了独到的探讨。

张晋藩等编《中国法制史》第1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简明中国法制史，对我国不同时代法制的实质、内容、特点及其沿革和发展规律作了探讨。有学者认为，该书在使中国法制史成为独立的科学体系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对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初创与奠基起了重要作用。

齐思和《中国史探研》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汇集了作者中国史研究方面所发表的重要文章，共收录论文28篇，包括中国古代史论文20篇，中国近代史论文2篇，中外关系史论文6篇，集中体现了作者历史研究的成就。其中，《西周地理考》是研究周民族起源的名篇，《商鞅变法考》推翻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将商鞅视为中国第一个法家的论断，《魏源与晚清学风》、《晚清史学的发展》则对那一时段学术源流做了梳理。

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收九篇论文，论述了《尚书》有关篇章的内容，创作时代及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价值。刘起釪为该书所写序言全面介绍了《尚书》的源流。书中还特别收入了顾颉刚 1972 年写给作者的一封“关于夏史与太学”的信，指出“河、洛之间是夏代的政治中心。”

杨国桢《林则徐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庞卓恒在《历史研究》第 2 期发表《中西封建专制制度比较研究》。

文章说：为什么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比西欧早得多而延存的时间又长得多呢？这是由于两者之间在形成的历史背景方面，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阶级结构和政体形式、意识形态方面，以及专制政权的历史作用方面，都有一系列互不相同的特点的缘故。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小农自然经济基础同专制的上层建筑相结合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存力和再生力。

汪征鲁在《福建师大学报》第 2 期发表《小农经济、封建化及其他——与刘昶同志商榷》。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叙述鸦片战争到 1949 年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著作。其中对传教士作用的肯定引人注目。书中以传教士依托和推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主线，对其参与中国军事、外交、政治及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的活动进行了梳理，并对较有代表性的传教士、教案、教会学校和出版机构作了介绍和分析。该书材料大部分来自外国传教士或外国人写的传教史，包括各种档案、日记、传记、回忆录、教会史、差会和修会的报告、年会及其他会议的记录、书信集等第一手资料。

5 月

4 日　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大学召开，会上成立中国人类学学会。

学会理事会主席团成员由林耀华、钟敬文、贾兰坡、裴文中等人组成。

5 日　上海史志研究会成立。

7日　中国历史学会第2届理事会第2次会议召开。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张友渔在会上作了《历史研究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报告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历史研究和现实的关系、历史研究和四项基本原则、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问题。张友渔指出：“现在在一些青年史学工作者中间，存在一种轻视理论的倾向，他们认为理论不重要，只有史料才重要，有了史料就有了一切。个别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唯物主义不行了，只要能掌握史料，进行分类排比就行了，无须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

15日　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大学召开，选举宦乡为名誉理事长，孙毓棠为理事长。

25日　苏双碧、肖黎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文章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如果不进行认真的阶级分析，就无法揭示历史的真实，也就不可能对历史人物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但是，阶级分析是对各个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历史作用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历史上的非劳动阶级及其代表人物。阶级标签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无论是用今人的思想去改铸古人，还是用今人的标准去苛求古人，或者是用“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来替历史人物的消极方面护短，都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要求的。

作者认为，气节观应该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之一，如果不把气节当作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之一，那么，历史上的秦桧和岳飞，吴三桂和史可法还有什么区别呢？

是月　俞伟超在《文物》第5期发表《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

第6期连载。

针对学术界对中国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的质疑，文章汇集了大量的古籍记载和地下实物资料来说明中国类型劳动奴隶制形成的过程及其特点。作者认为，中国奴隶制存在两个阶段，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说，青铜时代的商代和西周，只能产生农村公社普遍存在的家内奴隶制，春秋晚期以后逐渐普遍使用的铁器则可以产生劳动奴隶制；汉末魏晋以后普遍实施的轮作制和施肥，则是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生产力条件。

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的姊妹篇，辑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基本论述。1961 年，编者曾出版过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但过于简略。在此基础上，编者对原书进行了重新编选，内容更加完备，编排体例也作了很大改变。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第二部分是对若干历史人物的评论。书末附录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作者毕生从事西北史地研究成果专集，收论文 31 篇。作者在 1927 至 1958 年间曾四次去西北地区考察，本书所收各篇多系其依据实地调查所取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的成果，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内容涉及罗布泊、楼兰、西域交通路线、西域职官、吐鲁番等，是研究西北史地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苏秉琦、殷玮璋在《文物》第 5 期上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根据文化渊源、特征与发展道路的差异，作者将古代中国划分为六个文化区：陕豫晋邻近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该文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考古学“区系类型”这一概念。作者认为：人们活动地域的自然条件不同，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不同，因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就各有特色，不同的人们共同体所遗留的物质文化遗存有其独有的特征，今天恰可根据这些物质文化面貌的特征去区分不同的文化类型，通过文化类型的划分和文化内涵的深入了解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探索，达到恢复历史原貌的目的。

该文所提出的“区系类型”概念对早期中国文明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胡绳在《学术研究》第 3 期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对“史学就是史料学”观点进行批评。

该文是作者本年 3 月 12 日在纪念太平天国起义 130 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关于究竟怎样才算是对历史做出了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作者认为，单纯积累起一大堆材料，不能算是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即使材料摆得很充分。有这样的历史学派，他们认为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就是把史料考证清楚。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历史事实有几种不同的记载，那就要考证出哪一

个记载最为可信，这就是历史研究。如果一个历史事实没有不同的记载，那就没有什么研究工作可做。按照这种学派的说法，历史研究就会陷入烦琐的考证，而且止于罗列一堆历史材料。我们是重视史料的收集、考证工作的。研究历史要从事实出发。不掌握大量的可靠的史料，不辨明有关史料的真伪，当然谈不到科学的历史研究。某些历史事实的细节，如果对了解全局有关，花气力进行考证、辨明，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不分轻重，不管它对全局的了解有无意义，凡是发生过的事情都要一一弄清楚，那就势必陷入烦琐的考订工作中，那是不可取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史料学的工作，不过是史学研究的开始，绝不是它的完成，决不像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那一派的看法一样。

唐兰《殷墟文字记》由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由中华书局出版。

第二辑1983年出版，第三辑1985年出版。

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著选》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录论文79篇，包括其一生主要专著（节选）、已刊未刊主要论文及论学书信，全面反映了作者在宗教史、民族史、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史讳学等方面的巨大成就。

6月

8日　国际共运史对象和体系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12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学科评议组的有关问题。

会议决定设立历史学等10个学科评议组，学科评议组成员由学位委员会委员和本门学科中学术水平较高、能够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学者、专家组成。历史学学科组成员有夏鼐、白寿彝、郑天挺、刘大年、邓广铭、苏秉琦、杨向奎、李学勤、吴于廑、吴泽、徐中舒、黎澍、韩儒林、谭其骧、王仲荦、章开沅，共16人，吴泽任组长，王仲荦任副组长。

15日　全国太平洋战争学术讨论会在牡丹江召开。

27日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起草过程中，邓小平的意见成为“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 30 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人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使人们的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是月　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第 3 期发表《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

朱寰主编《世界中古史》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廖一中、李德征、张璇如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研究了义和团的起源、在北方的迸发和发展的原因、口号、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及其演变、帝国主义在侵华问题上的矛盾等问题。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选《辛亥革命史论文选》（1949—1979）由三联书店出版。

《农业考古》创刊。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是书写作开始于 1973 年，历经 6 年时间才告完成。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是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代表著作。全书共分五编：“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形成”，“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近代中国 80 年的历史进行了归纳和分析。

该书销行甚广，曾多次重印，加上不同出版社的不同版本，总印数约 300 万册，成为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必读入门书，在学界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冯蒸主编《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介绍了国外学者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各类工具书如词典、字典、事典、诸种课题研究目录、索引、引得、百科全书、类书，以及有关少数

民族的工具书等。第一章“绪论”对国外编纂中国学工具书情况进行了概述，并建议注意使用国外编纂的中国学工具书。

陈平在《学习与探索》第3期发表《社会演化的发展观和经济结构的方法论》。

该文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是“超稳定的经济结构”，与金观涛、刘青峰提出的“超稳定系统”说相近。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超稳定的经济结构，在其内部不可能产生新的结构，不会自动产生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文中写道：“是否任何国家，任何文明系统都能自动产生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的人显然这样认为，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给这种必然的信念以致命的打击。”

此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争议。

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成立，贺麟任名誉会长，朱德生、汪子嵩、汝信任执行会长。

《中国古代史论丛》在福州创刊。

编委会由郑天挺、傅衣凌、谢国桢等组成。

《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都来重视造就史学新人》。

文章说，崇名抑实是学术发展的大敌，是扼制人才的桎梏，其表现之一就是对“无名”青年冷漠无情，对他们的作品求全责备。“无名”青年有其幼稚之处，他们的作品也并非尽善尽美，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肯于钻研，勤于思考，不迷信权威，不拘泥成说，敢于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具有新意的见解，只要这些见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当允许并鼓励它们作为一家之言进入学林，使他们在老一代学者的提携和有关方面的奖掖下，迅速而健康地成长。名家都是从非名家发展而来的，成熟和深湛又都脱胎于幼稚和浅薄，应主张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唯理是从，一定要打破论资排辈、崇名抑实之风。

7月

15日　周予同逝世，终年83岁。

17日　邓小平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思想战线方面问题。

在肯定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有显著成绩的同时，邓小平指出，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存在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错误倾向，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邓小平指

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8 月 3 日至 8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传达讨论邓小平的谈话，胡耀邦在会上指出，邓小平谈话的基本点和核心是一句话：我们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处于软弱的状态，必须改变这种状态。

25 日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在太原举行。

谭其骧、史念海、朱士嘉、傅振伦等在大会上作了学术性发言，梁寒冰当选为会长。

27 日　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

选举产生了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会，白寿彝被选为理事长。大会通过了《关于改进中小学历史课的建议书》。

是月　苏双碧《太平天国人物论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对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洪仁玕等八人的历史功过进行了评价。著者强调，评价太平天国历史人物，必须认真地把他们放在特定的历史时代进行考察。书中着重阐述了那些太平天国人物评价中争议最多的问题，通过分析各个人物的出身、经历、文化程度、思想构成、地位作用等来把握人物评价的尺度。

罗尔纲为该书作序。

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创刊。

金景芳《古史论集》由齐鲁书社出版。

是作者自 1955 年至 1980 年发表的有关古史分期、两周文化、宗法制度以及先秦诸子理论及哲学思想等方面的论文合集。

赵俪生《寄陇居论文集》由齐鲁书社出版。

共收论文 22 篇，分 5 类。内容包括土地所有制研究、顾炎武研究、西域史研究、思维和哲学研究、农民战争史研究。作者在自序中写道：我在五十年代原是搞农民战争史的，为什么开了小差呢？这中间有缘故。就是由于个人一贯认为既有反攻倒算又有统治者们的“调整”或“调节”，但突然“只有反攻倒算”成了不可违反的时代信条，我立刻敏感到不妙，就离开了这块园地，转移到土地制度史方面，从阶级斗争转移到阶级关系的检查方面去了。其实这二者是相成的，并不抵牾。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刘大年《赤门谈史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9年，作者受任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特聘教授，讲授中国近代史，着重讲辛亥革命。该书即在此次讲学的基础上写就。东京大学的校门称为“赤门”，故本书以此为名。

全书的主干是八万多字的《论辛亥革命的性质》。作者不同意国外流行的所谓“反满论”和革命否定论的说法，通过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区别、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提出的纲领以及它与农民的关系等，论证了辛亥革命是一次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收入此书的文章还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与指导思想问题》、《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等文章。

蒋大椿在《近代史研究》第4期发表《历史的内容及其前进的动力》。

文章提出社会发展动力来源于客观的社会需要。“凡是直接地或归根结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人的实践活动乃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有：生产活动；自然科学实践；进步的剥削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践活动；革命的阶级斗争；进步的剥削阶级、集团为建立适应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新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按照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改革、调整原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活动；意识形态。究竟哪一种是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是由当时具体的客观社会存在决定的。

8月

1日　中国现代史学会学术与教学讨论会在大连召开。

3日　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在银川举行。

10日　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17日　陈梧桐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当前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一些看法》。

文章主要针对董楚平的相关观点进行商榷。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个账，不能算在农民战争头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是与西欧比较而言的，主要是指在封建社会后期，即十五、十六世纪以后的明清时代，中国的封建生产方式迟迟未能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迟迟未能发展。中国由先进转化为落后，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个时期的农民战

争既不阻碍封建生产方式的瓦解，也不抑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因而不是阻碍历史进步，造成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因素。相反，这个时期的农民战争继续冲击日趋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发展开辟着道路，起着促进封建生产方式瓦解的作用。明末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摧毁了明朝的黑暗统治，第一次提出了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均田”主张和保护工商业的“公平交易”、“平买平卖”的政策，这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22 日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

美国学者费维恺教授、柯文应邀参加了讨论会。

25 日　丁伟志在《人民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与宏观历史研究》。

文章主要针对此一时期考据之学的抬头，强调宏观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文中指出，历史事实是治史的基础。一部历史著作，即使是汇通古今中外的世界通史巨著，也只有在具体的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构筑成功。一切以忠于历史事实为原则的历史研究工作，都离不开微观的历史研究方法，都必须从小的角度去观察与考索历史的局部、细部。但是把它当作研究历史的不二法门，就会铸成错误。这是因为：由于只把个别的具体历史事件和情节作为研究对象，确定研究课题，往往就难以考辨其轻重缓急，重大历史问题就会被置诸研究者脑后；对于个别对象的考察，如果只是孤立进行，而不从更大范围里观察，不从它自身的发展以及和周围世界的联系上考察，那么对个别对象也无法取得真正科学的认识；历史全局不等于它所包含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总和，即使对个别历史现象无一遗漏地做了全面考察，也不等于认识了历史全局。因此，想要认识历史的内在联系，就必须从大角度对历史进行全局的整体的宏观考察。只有立足于丰富可靠的史实基础上，又自觉地舍弃一切无关紧要的历史细节，才可能从宏观角度观察历史，透过繁复的历史现象认识历史的本质，揭示历史的固有规律。一切关于历史规律的理性判断，无一不是宏观历史研究的结果。

26 日　黑龙江古代民族起源和早期鲜卑文化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哈尔滨召开。

是月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作者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北京大学开设选修课的基础上写成的，是第一部中国语言学史，居首创之功。书中将汉语研究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四个时期。四个时期是：训诂为主的时期；韵书为主的时期；文

字、声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西学东渐的时期。两个阶段是：第一阶段从汉代到清代末年；第二阶段从1899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899年甲骨文首次在河南安阳发现的时间，是新学与旧学的分水岭。作者认为，第一时期的特点是以疏解儒家经义为目的，其代表作《尔雅》和《说文》就是羽翼六经的。第二时期，经义虽然仍很重要，但主要不在字义辨析，而在于章句阐述，于是语言学的重点转移到音韵学上。第三时期是经学复兴时期。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儒们，在研究方法上超越前人，把“小学”推向了一个高峰；特别是清末甲骨文的出土，大量有铭文的青铜器的被发掘，使后来的研究有了更可靠的实证基础。第四时期吸收了西方的语言学成果，扩大了汉学的研究领域，改进了方法，从而产生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和《比较文法》、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和《词诠》、王力的《中国文法学初探》等，都代表着这一时期语言学的最高成就。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内容分为四辑，第一辑是8篇有关韦昌辉、洪宣娇、“铁公鸡”、张秀眉、石达开、杜文秀、张宗禹的考释文章，其中《太平天国政体再稿》一文，对太平天国虚君制的产生条件、两重性和历史意义作了深入探索。第二辑是6篇有关太平天国建国、天历、土客问题和捻军史分期、蓝大顺、张禹爵等人物的考据文章。第三辑是6篇对太平天国印书、文书、资料汇编、档案资料、《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文译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的成就评价文章。第四辑收录3篇考证太平天国宝剑以及有关杨柳青年画、万云龙令旗等珍贵文物的文章。

王守稼在《中国史研究》第3期发表《评〈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的若干观点》。

文章批评刘昶把农民起义当成历史进步的阻力，应当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负责的观点。作者认为，每当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动乱时，农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也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在封建社会正常发展时期，个体农民总是分散的，农民力量的积聚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等到封建危机成熟时，才会像火山那样迸发出来。同封建生产方式出现周期性危机相适应，农民起义也表现为周期性的爆发。每一次农民大起义，都冲击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最腐朽部分，使封建生产关系出现适应生产力的调整。于是，封建的生产力便显出螺旋式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就在这螺旋式的发展中前进。

吴筑星、林建曾在《贵阳师院学报》第4期发表《让什么光照进

历史科学领域?》，对金观涛、刘青峰“超稳定结构”说提出强烈质疑。

文章指出：金观涛二人在运用艾什比的“超稳定系统”概念、维纳的信息交流的理论以及熵增加原理来分析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问题时，存在着自然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方面的严重问题。企图用控制论的理论“来摆脱”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方法”，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和自然科学对立起来。是公然树起一面别的什么旗帜来否定、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这种做法“在我国，不要说近年来，就是三十多年来，也是很突出、很罕见的”。

该期还刊登了康健文的《历史研究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简析〈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指出以数学、控制论和系统论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摆脱资产阶级史学危机而兴起的结构主义史学流行的方法。金观涛二人的文章，无论在方法论还是在结果上，均属于结构主义史学的范畴。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许多结构主义者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竭力论证用结构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一文，是结构主义史学的“中国版”，“所谓的‘独到之处’不过是反映了我国历史研究中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白寿彝《〈史记〉新论》由求实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作者一九六三年五六月间给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学员讲课记录稿整理而成，对司马迁编著《史记》的宗旨、历史背景、写作方法以及《史记》在我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贡献，作了较系统地论述，并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见解。

程洪在《复旦学报》第4期发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作者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延续，不是因为始终没有完成封建化，相反倒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高度发展阻碍了向新的社会形态过渡。由于春秋中期铁器的使用，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突破性发展，因此出现了一个西欧未出现的高度封建化阶段。铁器的使用，使生产技术空前改观，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因而使人们增添了独立生产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终于又发生了大变革，形成了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国社会达到了高度封建化。中国的高度封建化是向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前进了一步，比起封建领主制来，它明显地具有进步色彩，直接或间接地为过渡到资本主义提供了物质前提。但是社会变

革的实现，不仅取决于是否具备物质前提，也取决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当一种生产关系或一种社会形态，还未真正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变革这种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的要求便暂时不会产生。中国的高度封建化，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比封建领主制更广阔的前景，从而推迟了封建社会总危机的爆发。高度封建化使中国社会具有自发调节、不断运动的活力，从而使社会基本矛盾缓和下来，化毁灭性的“大震”为无数次“小震”，从而大大延续了封建社会形态的寿命。

同期还刊登了朱孝远所撰《发展的充分化是社会形态长期延续的原因——兼谈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这样长》。

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发掘随县擂鼓墩2号战国墓，出土铜编钟32件、石编磬12件、大件铜器50多件。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由中华书局出版。

全书共12卷，至1986年出齐。包括正文11卷，附录1卷，收集了包括孙中山从1890年至1925年3月21日的论著、函电、公牍、谈话、杂著，共8000篇，500多万字，比台湾的《国父全集》多100多万字。

9月

8日　世界中世纪史学术讨论会在北戴河举行。

14日　许言在《文汇报》发表《中国的封建经济结构与所谓“超稳定系统”》。

文章不同意陈平将中国封建经济结构解释为“超稳定”，认为不单在封建社会前期，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结构内部的变动也十分激烈，从未达到“超稳定”的程度。

17日　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古籍整理事业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文件说：“最近，中央书记处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讨论了整理我国古籍的问题。”指示：（一）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二）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三）整理古籍，需要有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连续的核心力量。根据陈云的提议，中央决定，由

李一氓主持这件事，并由中华书局、文化部、教育部、社会科学院、国家出版局等单位的负责人参加，组成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直属国务院。（四）要由规划小组提出一个为期3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五）现在有些古籍的孤本、善本，要采取保护和抢救的措施。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六）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于高等院校。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七）为办好整理古籍这件事，尽管国家现在有困难，也要花点钱，并编造一个经费概算，以支持这项事业。

该文为整理出版古籍提供了政策依据。当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正式恢复工作。次年3月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并拨专款用作古籍出版补贴。根据中共中央“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高校”的指示精神，1983年9月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负责组织协调高校古籍整理的科研人才培养工作。这样，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就有了两套系统。

是月　李时岳、赵矢元《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学勤在《文物》第9期发表《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

作者后又在《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发表《续论西周甲骨》。

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美国中国学手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江明、桂遵义选编《吕振羽史论选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入吕氏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等方面的部分论文，大致反映了作者自1930年以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历程。所收文章大多已公开发表。篇目由作者亲自审定。

江地《捻军史论丛》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系统论述了晚清时期农民起义军捻军起义的产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

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新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集体编

写《中华民国史》开始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史学界系统研究中华民国史的奠基之作，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

1956年，中国科学院制定科学规划时，即将中华民国史列入重点项目，后因“反右”等政治运动未能施行。1971年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周恩来再次指示要编纂、出版《中华民国史》。1972年，经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报请国务院批准，将此项任务下达给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随即成立专门机构——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后改为室），由李新主持中华民国史的编纂。全书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按“中华民国的创立和南京临时政府统治时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时段编写，分为十二卷，约760万字，详尽论述了民国时期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情况。每卷后附本卷人名索引、征引文献。全书以反映民国时期统治阶级的历史为主，以政治史为主，对社会、文化甚至经济的研究则基本没有涉及，未能充分反映民国社会发展的全貌。

该书编纂过程进展缓慢，历时近40年，直到2011年7月方才出齐。各卷也不是按时间顺序出版：1987年，第2卷（1912—1916）、第3卷（1916—1920）出版；1994年，第6卷（1926—1928）出版；2000年，第11卷（1945—1947）、第12卷（1947—1949）出版；2002年，第8卷（1932—1937）出版。2011年，第4卷（1920—1924）、第5卷（1924—1926）、第7卷（1926—1928）、第9卷（1937—1941）、第10卷（1941—1945）一次性完成出版，又将过去出版的7卷略事修订后重印，终成完璧。

由于编撰过程绵长，作者队伍变化甚大，早期担任写作者，多为“文革”以前参加工作的研究人员，而后期的写作者基本上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从各大学毕业的研究人员。因此，这套书中对于许多历史事件的看法及其表述有不少的差别，不同卷之间时代差异明显。

该书第一卷出版后，台湾史学界一片哗然，与大陆展开编纂中华民国史的竞赛。台湾“教育部”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华民国建国史》，以此彰显台湾方面的历史立场。

2011年7月，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中华书局将修订后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与《中华民国史》合在一起，出版了皇皇36册《中华民国史》，其中包括《中华民国史》（12卷，16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2卷，12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8卷，8册）三部分，总字数达2000万字，这一耗费了

几代人心血的浩大的学术工程终告完成。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谢天佑、简修炜主编《中国农民战争简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吴承明在《文史哲》第5期发表《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

文章认为，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规模、结构和发展速度，过去有些夸大了。总的看，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直到鸦片战争前仍十分微弱，农业、棉纺织业中缺乏资本主义萌芽，尤为致命伤。但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未中断，清代前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手工业，鸦片战争后有的向机器生产过渡，代表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主流。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佛教通史，计划出八卷，已出三卷。

由主编所写的序言扼要介绍了佛教传入中国的社会原因和发展历史，指出佛教在发展过程中除了受中国封建经济基础和政治生活的制约外，还要与传统的宗教、哲学和其他文化思想进行交流和融合，其中受儒家的影响最大。宋以后，三教会同，佛教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没落而日益衰微。作者强调，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通过考察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滋长、兴盛衰微的全部过程，才能揭示佛教史真相，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全国秦汉史研究会在西安成立，林甘泉被推举为会长，副会长为安作璋、林剑鸣。

该会编辑出版有《中国秦汉史研究通讯》、《秦汉史论丛》和《秦汉史研究译文集》等书刊。

10月

9日　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次会议，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等高层悉数出席。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在主题报告中呼吁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并以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和其他各界人士来大陆看一看。

12日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

会议由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举办，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史学工作者一百二十多人。香港和澳大利亚、加拿大、朝鲜、印度、法国、日本、罗马尼亚、泰国、英国、美国的四十多名专家学者也应邀出席了讨论会。共收到论文近二百篇。刘大年致开幕词，郑天挺在开幕式上讲话。与会学者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对辛亥革命进行了讨论。

15 日　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在杭州召开。

这是 1949 年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宋明理学讨论会，重点探讨了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特点与派别，宋明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对宋明理学的各派哲学观点的历史评价与再评价，以及研究宋明理学的方法论等等。

是月　黎澍在《中国社会科学》第 5 期发表《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该文是研究辛亥革命的名作之一，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变化和发展，由于是在外国资本已经侵入的情况下被迫开始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与一般情况相反，资产阶级代言人、活动家和他们领导的政治运动的出现，先于民族资本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号召'反满'，起了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巨大作用。""辛亥革命从胜利到失败，可以最好地证明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没有哪一个阶级是真正支持这个政权的，这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

王存才在《学术月刊》第 10 期发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

该文认为农民战争保护了小农经济，从长远的历史发展眼光来看，就是保护了封建统治，也就是说，农民战争使小土地占有增多，剥削关系和土地关系缓和，小农经济得到恢复，从而帮助封建经济从周期性的危机中解脱出来，重新走上复苏之路。作为封建社会统治基础的小农经济相对稳定，封建统治就能得以相对稳定。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就是这样保护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形成发展缓慢，延续时间长的特点。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成立，选举夏鼐为名誉会长，冯先铭为会长。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为中国第一部对古代服饰史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也是作者后半生唯一作品，编撰过程长达 17 年。书中精选了从殷周至明清三千多年间出土和传世的文物图像 700 幅（其中 100 幅为彩色图版）。并有文章 174 篇，对我国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阶层服饰制度的发展、沿革，以及和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意识形态的种种关联，作了深入探讨。本书被认为是研究中国古代衣俗的奠基之作，用丰富博杂的内容和细致清晰的排比梳理，构筑起了较为庞大完整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体系，在研究方法上也为中国衣俗研究提供了典范。

1997 年 6 月增订本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由求实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刘乃和校订并作序，包含作者三篇学术报告记录稿——《资治通鉴介绍》、《陈垣先生的史学思想》、《中国古代历史纪年问题》。1963 年，作者应北京大学翦伯赞邀请，到北大讲学一年。在此期间，曾给中共中央党校历史专业的学员讲课，《资治通鉴介绍》就是根据当时的讲课记录稿整理而成。该文对《通鉴》这部巨著的写作集体、编纂方法、采用史料、胡三省注以及主要优缺点等，作了较全面详尽地介绍、阐述，对阅读《通鉴》有指导作用。尤其是该稿的最后一部分，作者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了应当怎样读《通鉴》，更可作为阅读借鉴。

《陈垣先生的史学思想》是作者于 1962 年应华东师范大学吴泽之请为该校历史系师生作的报告。文章介绍了陈垣学术研究的特点、刻苦治学的精神和方法、抗战期间著作中反映的爱国思想，内容真切丰富，深入浅出。特别是该稿以较大篇幅谈到陈垣所撰《通鉴胡注表微》，可作《资治通鉴介绍》一文参考。

《中国古代历史纪年问题》是作者在苏州时的一次报告记录稿。该稿是 1979 年 5 月江苏师范学院为柴氏昭雪平反时，于其遗书遗稿中发现的。曾载江苏师院历史系编《中国历史教学》1979 年第 1 期。这篇文章对初学历史的人有参考价值，还可作为《资治通鉴介绍》有关问题的补充。

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近代部分上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联合出版。

该书是一部兼有工具书性质的世界史知识性读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稿编辑，共 8 个分册：古代部分 2 个分册（1982 年至 1983 年出版），近代部分 3 个分册（1981 年至 1982 年出版），现代部分 2 个分册（1984 年出版），补遗本 1 册（1985 年出版）。全书共收录了世界历史各个时代近 700 位著名人物的传略，每一人物皆介绍其生平事迹、主

要社会活动以及思想政治、科学文化观点和代表性著述。所收人物主要是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有少数科学家及军事家，着重阐述了他们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11月

11日　全国唐史研究会首届年会在扬州召开。

是月　苑书义、胡思庸等编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册1986年出版，下册1988年出版。

全书以“三次革命高潮”为基本线索，以“八大事件”为主要内容，加强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些薄弱环节的分析和探讨。

童书业编著《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由齐鲁书社出版。

金观涛在《读书》第11期发表《系统论、控制论可以成为历史研究者的工具》。

该文为作者在1981年9月《自然辩证法通讯》与《读书》杂志联合召开的“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相互结合”座谈会上的发言，指出：在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长期停滞原因的研究中，把控制论、系统论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来，是很有意义的。过去历史研究的方法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运用“单纯因果分析”和“归纳法”的阶段。这种方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在进行整体研究，特别是剖析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互为因果的历史现象时，就会发生困难。把控制论、系统论研究方法引用到历史研究中来有助于克服上述困难。系统论、控制论是二十世纪以通讯、自动化和计算机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它们一反长期以来把事物看作孤立的因果系列和分离开来处理的机械模式，为研究互为因果的复杂过程提供了理论方法。它不会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冲突，相反可以使历史唯物主义更丰富、更细密、更精确。

《历史地理》集刊创刊。

该刊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辑，创刊号发表了侯仁之撰写的发刊词，并刊载一组“纪念《禹贡》笔谈”。

夏东元《郑观应传》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郑观应的生平和思想作了深入研究。作者不同意郑观应的“商战”是仅着眼于流通领域的近似重商主义的说法，认为郑的“商战”是要把自强的基础置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上。

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由中华书局出版。

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发表《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

12月

5日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全国青年研究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长沙举行。

8日 邓广铭、张希清在《人民日报》发表《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

文章对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评价原则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只有一个，这不仅适用于今天，也适用于我国的昨天和前天。我国历史上同时并存的几个国家，全都是各自建立一个特定的国号，而不是以“中国”为其国号的。它们都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却都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把其中一个国家的某个或某些人物称为爱国主义者，把另外的某个或某些人物称为卖国主义者，这并不意味着把其他国家排斥在中国之外。

作者认为，承认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每一个割据政权为一个“国家”，在并峙诸国相互争战时，把属于正义一方而又矢忠矢勇维护其本国主权和利益的人称为“爱国主义者”，这完全是符合我国的历史实际，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的。对于发生于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战争，凡是站在正义战争一面，在反抗民族压迫和军事掠夺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就都应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在杭州举行，中心议题是“中国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和“中国古代的青瓷和青瓷窑址”。

20日 郑天挺逝世，终年82岁。

是月 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该书系作者根据我国商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汇集写成的，由邹衡、徐自强整理。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试图通过商周青铜礼乐器的分期断代研究，来说明我国奴隶制时代青铜文化的发展规律；二、研究范围是青铜礼乐器群的组合、形制、花纹、铭刻，尤其着重铸造，而很少涉及铭文内容；三、取材主要是发掘品，其次是有记录可查的采集品，传世铜器一般不在研究之列。四、采用的方法是分群界标法。

全书根据出土地点，将1966年以前全国所发掘出土的和有可靠依据的青铜礼乐器2000余件划分为175个分群，并从中选出6个地点可靠、时代明确的分群作为断代界标，通过综合考察，将中国青铜文化划分为6个历史阶段。所用分群界标法在青铜器研究方法上属首创，为更深入地认识和研究商周青铜器提供了借鉴。

刘修明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性与长期延续原因》。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

“全国华侨历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庄希泉当选为会长。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1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分5卷，1981年12月至1989年6月出版，206万余字。

该书是一部系统论述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全貌的经典著作，规模宏大，资料翔实，对于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以朝代的更迭为线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分门别类地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和论证。作者系统论述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各个朝代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关系、城市经济和劳动制度的状况，介绍了我国历史上几次大的经济波动，探讨了历代重要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书中关于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于战国时期的观点以及此后我国进入变态封建社会的说法独树一帜，引人关注。

该书原计划撰写7卷，后两卷即元明清部分因作者病逝未及完稿。

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试论从周初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迟滞的原因》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旨在于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迟滞的原因，提出了“变态封建制度”说。作者考察了西周农奴制的形成和适应农奴制剥削的井田制度，把它称为“典型封建制度”。并认为东周后期，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变化，典型封建制度走向崩溃，代之以“变态封建制度”。本书着重讨论了“变态封建制度”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连锁结果。

胡寄窗在《经济研究》第6期发表《论中国封建经济成熟甚久瓦解特慢的原因》，提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战国说。

是年

谭其骧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邀请，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史华慈教授访问中国。

《考古学集刊》创刊。

此为不定期刊物，主要刊登长篇田野考古报告、考古研究论文，以及有关科技考古的实验报告、论文等与考古学相关的长篇学术性、资料性论著。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湖南考古辑刊》（年刊）创刊。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内蒙古考古博物馆学会主办《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主办《中国地方史志通讯》（月刊）创刊。

1982 年改名《中国地方史志》，1983 年改为《中国地方志通讯》，1986 年改名《中国地方志》。

敦煌文物研究所主办《敦煌研究》创刊。

该刊是敦煌学和相关专业的重要期刊。1981 年和 1982 年出版了试刊第一期和第二期，1983 年正式创刊。1986 年作为季刊定期公开发行，2002 年以后改为双月刊发行。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主办、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出版。

该丛书以编译西文资料为主，不定期由中华书局出版，共出三辑。

1982年

※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京举行。
※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出版。
※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出版。
※ 李学勤发表《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 第1卷出版。
※ 中国史学会加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
※ 教育部发出《关于开展古籍整理研究，培养整理人才的意见》。
※“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在上海召开。

1月

6日　尚钺逝世，终年80岁。

18日　黄现璠逝世，终年83岁。

是月　白寿彝在《史学月刊》发表《60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该文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而作。

文章把1921年中共建党后60年间的中国史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回顾了自1921年以来“中国史学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的发展历程。对1949年以前中国史学的发展，主要回顾了李大钊、郭沫若、侯外庐、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人的史学成就。作者认为，1921年到1949年的28年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的时期。这是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动向。对这一时期“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或不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旧史学家，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吕思勉、冯承钧等人的成就仅一笔带过。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分册，主要论述我国气候、植

被、主要河流、海岸、沙漠等自然地理要素在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变迁过程，探讨了我国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发展变迁的规律。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历史自然地理专著，反映了我国当代历史自然地理各领域中的主要研究成果。各章节的资料来源，除了大量历史文献外，还包括了考古学研究和野外实地考察等成果，并且运用了孢粉分析、沉积物分析、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航空照片和卫星照片判读等方法。

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由中华书局出版。

1951 年作者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其后一再增补，又印三版。到 1957 年经过进一步增订，又出版过增订本。以后作者进行新注工作，并不断根据新发现的史料进行增补，本书即是在这些工作上形成。本书训诂与考证兼备，不仅对太平天国制度、特殊称谓、人地名、专门名词等加以注释，也对原文的错误予以订正，并补充了原文的缺略。

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厦门大学主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季刊）创刊。

童书业《先秦七子思想研究》由齐鲁书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讲授《先秦思想史》的讲义，后以单篇论文形式陆续写出。书中对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的哲学思想多有发明。

杨向奎为该书作序。序云：有些撰写思想史、哲学史的同志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同时对社会经济作认真的研究，丕绳教授则不然，他首先是一位研究先秦史有年的老专家。抗战前在禹贡学会从事古史传说、古代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更担任过颉刚师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两校讲授春秋战国史的助教，深受熏陶。1949 年后，他应邀到山东大学历史系和我共事，正值史学界开展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他又积极参加，撰写了不少探讨西周以至春秋战国社会性质的文章。因此他对孔、孟、荀、墨、老、庄、韩非这七家思想，都能真正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和这七子所处的阶级地位来探讨分析。这是这部著作比一般思想史、哲学史高明的地方。

又云：丕绳教授童年就熟读古代经籍，对《论语》、《孟子》等可以背诵如流。二十多岁时有志撰述《七子学案》，又把其他诸子逐一系统地认真研读。以后在顾颉刚师的熏陶下，对史料真伪的鉴别更经受过严格的训练。因此这部《先秦七子思想研究》在史料运用上是无懈可击的，决非浅尝者稗贩几条人所共知的史料随意附会之比。

《自然科学史研究》创刊。

该刊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主办，是我国唯一的综合性的科学技术史学报。其前身是1958年创刊的《科学史集刊》。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5卷，1983年出齐，广泛而系统地辑录了自1919到1949三十年间中国社会思潮的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作品，共180人、520篇（种），250余万言。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等思潮方面的代表作皆网罗齐备。作为史料性著作，该书特别注重反映这一时期各个流派之间激烈论战的情况，诸如民主和专制、科学与迷信之争，新道德与旧道德、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反对戴季陶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斗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性质问题论战，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论战，关于反对托陈取消主义的论争，关于冯友兰、贺麟的论争，关于蒋廷黻、钱穆文学的论争，批判《中国之命运》的论争，关于"战国策派"，关于乡村建设运动，关于中国路线等，全面体现了这一时期各种思潮的演变历程。所选文章，均据原刊。

夏超雄在《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宋代金石学的主要贡献及其兴起的原因》。

2月

5日　中国史学会、南开大学、天津市社科联联合在北京召开"郑天挺同志学术纪念会"。

8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等部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并公布了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24个。

23日　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共62处。

是月　《章太炎全集》开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共六卷，收录章氏主要学术作品，包括《膏兰室札记》、《诂经札记》、《七略别录佚文征》、《春秋左传读》、《春秋左传读叙录》、《驳箴膏肓评》、《訄书初刻本》、《訄书重订本》、《检论》、《太炎文录初编》、《太炎文录续编》、《齐物论释》、《齐物论释定本》、《庄子解故》、《管子余

义》、《广论语骈枝》、《体撰录》、《春秋左氏疑义答问》等。标校工作不设编委会或主编名义，仅于每册出版说明提及点校人姓名，采取分工负责的办法，每人担负 10 万字左右。点校人多为章门弟子、再传弟子，包括王仲荦、汤志钧、沈延国、姜亮夫、陈行素、朱季海、徐复、祁龙威、朱维铮、姜义华、崔富章、钱玄、张芷、程敦复、王子慧、汤炳正、黄耀先、饶钦农、贺庸等。王仲荦对编辑工作起了重要作用，确立了编校原则，并联络众多章门弟子共襄盛举。

漆侠在《中国史研究》第 1 期发表《论“等贵贱、均贫富”——宋代农民的政治经济思想》。

李显荣《巴枯宁评传》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研究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专著，对巴枯宁一生的活动和思想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和评论，尤其对巴枯宁研究中重视不够或被忽略的问题作了新探讨。对巴枯宁的评价也比较客观和公允。不足之处在于，作为评传，本书“评”的部分过多而“传”的色彩不浓。

何兹全在《中国史研究》第 1 期发表《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

苏双碧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 1 期发表《关于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文章对刘昶关于农民战争“对社会生产的破坏是严重的”、“每一次大的农民起义都严重地打断了封建化的进程，断送了封建化所已经取得的成果”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绝不会是农民战争造成的。文章指出，认为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前进的人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是由于腐朽的封建王朝使社会生产力处于停滞状态，才诱发了农民战争。正是因为农民战争，才解开这个生产力停滞的纽扣。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基本上都达到了如下两个结果：其一，推翻和打击了极端腐朽的旧王朝，推动了封建社会历史的前进，其二，改造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手段，促使封建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封建化的进程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是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的，其间虽然屡次遭到地主阶级中最腐朽的势力的破坏，使封建社会发展有所缓慢，但它的历史进程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每次农民战争之后，社会都或多或少有些进步。因此，根本不可能会存在什么农民战争“打断了封建化进程”的事实，认为社会“重新退回到封建化的起点”的说法实际上是把社会的发展退回到进化论以前一种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上去。

陈高华《元大都》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宋杰在《北京师院学报》第1期发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几点认识》。

安作璋编《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研究秦汉农民战争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共分3编，分别收录了秦朝末年、西汉末至东汉初、东汉末年的农民战争材料。选材以《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为主，也收录了部分汉碑、汉简与金石考古资料，分类纂集，对秦汉农民战争的起因、经过以及影响皆通过具体的资料加以说明。除农民战争资料外，对与农民战争有密切关系的资料，如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以及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等也选择吸收。

罗哲文《长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30年长城研究之结晶，为写作此书，作者实地考察了长城大部，并收集了有关长城的大量历史文献、考古发掘材料和民间传说资料。该书系统、全面介绍了长城的历史沿革、修建过程、构造、用途以及山海关、古北口、居庸关、八达岭、雁门关、宁武关、偏关、嘉峪关、玉门关等重要关隘遗址，是学术界研究长城较为全面的一部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书中附有五十余幅插图和图片。

岑仲勉《金石论丛》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收文21篇，通过对金石铭刻内容的考证，来补充和校证史书记载中的衍误之处。

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综合研究百越史的论文集，共收文22篇，内容涉及百越民族的来源、分布和历史发展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百越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和文化特征，百越民族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等。书末附《百越民族史研究论文目录》。

其中梁钊韬在《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濮、莱的关系及其流传》中提出华夏族起源于多元说，认为华夏族是以羌族的黄、炎为基础，又融合了南方的苗族和东南的一部分东夷、越族混血形成的。

3月

17日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京举行。

会议讨论制订了1982年—1990年的古籍整理规划，计划整理出版各

类古籍 3100 多种。这次会议后，教育部和许多省市也相继成立了古籍整理规划小组，一些高校也成立了古籍研究所。一些省市开始整理出版地方文献。

26 日　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30 日　山东东部古国及东夷文化历史讨论会在山东淄博举行。

是月　赵俪生在《文史哲》第 2 期发表《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

文章认为，自清乾嘉以来，人们对归纳法的崇拜的确有些过分了。演绎法无形中被排斥。统观下来，史学界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思维受到了损减。归纳法是好的，谁都在天天使用，但不能把它绝对化。它会拘束人们的思维。文章说，假如我只有一分证据，难道我就不能在“一分”之外，开拓更广阔一点的思维领域吗？假如我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站在这个“一分”上不动，又有什么价值呢？在捕鱼的时候，我们主观上自然要求“一网打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客观上，遗漏又总是不可避免的。第一，鱼太多，大鱼之外还有眼睛看不见的鱼崽子，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一网打尽”呢？第二，列宁说过，当我们进行逻辑概括的时候，我们要丢掉很多很多东西。这意思是说，带本质性的东西对理性概括是必要的，不带本质性的东西就不一定必要。第三，必待感性资料达到绝对饱和才能做结论、才能发议论的话，那科学就中止了。自门德列叶夫发明《周期表》以来，到今天不是又补充了很多新元素进去吗？可是门氏的表因此就会被宣布为无价值了吗？他当年的劳动，就是无意义的了吗？历史科学是一条长河，大家都在里面游泳，不是考据派和归纳法所绝对控制的禁区。

作者指出，必须允许理性在史学中有一席之地。不能让经验在史学园地中唯我独尊。1949 年前独尊了数十年，成果从总体上看是贫乏的。考据对比起宋、明思辨哲学和清初的经世济用之学来，是一种思维能力的堕落，一种理性上的严重衰退。

葛懋春在《文史哲》第 2 期发表《论史论结合中的几个问题》。

该文是作者主编《历史科学概论》书稿的第八章，发表出来意在为“回到乾嘉去”史学思潮“纠偏”。编者按中说：比停止“回到乾嘉去”的私议更为重要的，是切切实实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真正做到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指导历史学的研究。

文章主要论述了史料和理论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怎样、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作者认为，有了史料，还必须掌握科学的历史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南。把历史科学归结为史料学，用史料学来代替历

史学是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在纠正理论脱离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学风，加强史料工作的时候，有人提出史学应回到乾嘉考据学派的路上去。笼统地认为历史学应走回头路，回到乾嘉学派去，其结果只能是回到史料即史学的老路，把历史科学研究引入歧途。使历史学变为史料学，抹杀研究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任务，实际上必然使史料的考订、搜集、整理失去了正确的工作方向，把史料学引入死胡同。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应当提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历史实际相结合，即理论和史料的统一。

吴承明在《晋阳学刊》第2期发表《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

文章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一要实事求是，力求按照某种经济规律，而不是按照政治观点，去解释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二要注意生产力的研究；三要加强数量观念，提倡数量概念，第一步就是要搞定量分析。凡能定量者，必须定量，这就可以破许多假说，立论才有根据。对一些看来不能定量的，也要力求定量分析；四要有人有事，没有人，就抽象干巴。

梁作杆在《暨南学报》第2期发表《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作者通过中外历史比较的方法，提出东晋封建论。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写于文革"批林批孔"期间，是作者世界史研究总计划中的一部分，手稿为读书笔记形式，共六章，最后一章尚余三节未及写完便与世长辞。稿残但并不影响内容的完整性。遗稿后由其弟陈敏之整理重抄。作者对希腊城邦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揭示，并与古代中国进行了比较，其意实在于对中国经济和政治作更深层次的探索。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发人深思。如："我国古代的小国林立，和希腊城邦究竟还有某些相同之点，可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另一个特点，亦即使得这些蕞尔小邦顽强坚持其独立的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制度，则是我国古代从来不知道的东西了。""希腊城邦政制，不许有单个政府首脑统一领导下的无所不能的行政权力"，"全部行政官员并不组成为某个行政首脑统一领导之下的'政府'。各种行政官员任期不一，全部由公民大会或其他相应机构直接选出，各自独立对公民大会或其相应机构直接负责"。"城邦公民集团'轮番为治'的原则，也使得它必须发展出一套国家法和私法来。""城邦既然是自给和闭关的，它也必须有各种法律来保障这种自给的和闭关的生活。这就是，城邦

要有关于公民资格、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要有行政机构、议事机构和法庭的选任、组织、权限、责任的法律，这些是国家法，即宪法。”“还要有关于财产、继承、契约等等的私法，以及把血族复仇的古代惯例，转化为国家负责惩处犯罪行为的刑法。”

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顾颉刚主编《古史辨》。

重印本附录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

《史学情报》季刊创刊。

该刊由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作为《中国历史学年鉴》附册出版的史学信息类刊物，主要从全国报纸刊物摘编有一定代表性的和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章；也反映国内史学界的重要动态及考古、文物的新发现，介绍国内史学界对重大史学问题讨论的情况和国外史学界的动态。

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太平天国史新探》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文28篇，以内容大致可分为史论、史实考释、史料介绍、译文选载，披露了一些新发现的资料。

4月

谢天佑、王家范在《学术月刊》第4期发表《中国封建社会的再生产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

作者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理论运用于农民战争史研究，认为农民战争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个体经济的租佃农民是封建社会再生产的承担者，再生产、扩大再生产都取决于这种个体经济的兴衰。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与生产过程的个体性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封建社会再生产中断的总根源。只能是再生产的中断引起农民战争，绝不是农民战争造成再生产的中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和私人地主的剥削造成再生产全国性、周期性的中断，因而导致大规模农民战争周期性地爆发。农民战争能够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最腐朽的环节，重新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使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从而使已经瘫痪了的社会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因此能够起到恢复再生产的作用。

胡守为在《学林漫录》第五集发表《略谈陈寅恪先生的诗文证史》。

该文以陈寅恪《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这篇考据文章为

例，详细分析了陈氏以诗文证史的方法和治学态度。作者认为，陈氏的考证之法主要不依靠版本的校勘或章句的训诂，而着眼于事物的相互关系，找出事物的发展过程，使考证立于更为可靠的基础。他综观私家著述的小说和官修史书的长短处，采取科学的态度，去伪存真，把私家小说与官修史书提高到同等地位，应是我国史料学上的新创。

该文是改革开放后较早赞扬陈寅恪考证之学的论文。

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二战史专著，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大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以及战争的序幕、起点、性质等问题，对于欧、亚、非以及太平洋地区各个战场的战争进程作了全面展示，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论述。出版后产生较大影响。

齐鲁书社编辑部编《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由齐鲁书社出版。

中国史学会与北京历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联合召开尚钺学术纪念会。

李侃《中国近代史散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共收12篇文章，包括《鸦片战争前后“士林风气”的变化》、《农民战争的高峰和天京的悲剧》等。

何兹全《读史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选编了作者的16篇论文，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社会分期、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历史人物评价、中国古代兵制等。其中《汉魏之际说封建》一文比较全面地说明了作者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看法。

漆侠《求实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胡钟达在《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

该文是作者发表于1981年《历史研究》第3期的《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的增订稿，文章对“五种生产方式说”提出质疑，否认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奴隶制社会。作者认为，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究竟是存在着亚细亚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三种社会经济形态，还是只存在着奴隶制的、封建制的两种社会经济形态，或者只有封建制（广义的）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假如存在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经

济形态，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如何，这些都是学术问题，是可以进行探讨，是可以容许有不同意见的。不能认为只有坚持五种生产方式说才算是"正统"，而对此稍持异议就必然是"异端"。

为了继续论证自己的观点，作者又在1986年第1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坚持认为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有前后高低之分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从生产力看，两者之间找不出可以同农业革命、城市革命、产业革命相类似的显示生产力向一个新阶段发展的标志。从生产关系看，由于在所谓奴隶社会中奴隶并不多，封建社会中奴隶也不少，奴隶制曾与农奴制长期并存，除了典型的奴隶与典型的农奴外，奴隶与农奴之间往往划不清界限。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长期开花而不结果者，其故盖在于此。

5月

8日　船山学社重建大会在长沙举行。

船山学社创建于1914年6月14日，其前身是郭嵩焘开办的思贤讲舍。辛亥革命后，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倡议在讲舍的基础上创办船山学社，作为专门研究王夫之学说的学术团体。1914至1915年间学社曾每周讲演船山学术。

11日　苏联现代史学术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24日　先秦史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在成都举行，徐中舒被选为理事长。

是月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以公元1587年，即明神宗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若干素不为历史学家所重视的一些小事件为中心，来揭示明朝中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状况，借以说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等宏观历史，并进而指出这些封建社会的固有弊病对后代乃至现代的影响。该书充分体现了作者书写"大历史"、从宏观上把握历史的治史理念，虽然从一人一事入手，从一个年份说起，所指却是一个时代，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从历史的细微处着手，又不拘泥于具体的历史事件，找寻更为准确的历史时代特征，是作者孜孜以求的"大历史"观念。作者通过选取最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来表现一个朝代的主要特征，特别强调将人物与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且聚焦于人物的个性特征，从而使这些已被标签化了历史人物能够以崭新面孔再现于读者面前。该书在"文革"史学彻底破产、史学界百废待兴之际出版，极大的拓新了国内史学家看待历史、观察社会

的眼光，给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既有范式之外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新途径，给史学界带来了强烈冲击和巨大影响。

该书可读性强，20多年来该书畅销不衰，其读者面也早已不限于史学界，是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最大的历史著作之一。

台湾学者江政宽在《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评价说："他以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的历史书写主流之外，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而这也是当前中文历史书写里最为欠缺的。""这部著作的主要特色之一在于，通过书中这类惟妙惟肖的勾勒，黄氏为读者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历史现场'，让读者好似直接目击事情发生的过程，且又得以窥见这些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乐趣通常是阅读小说时才会获得的。英文版《万历十五年》的两则封底书评，颇值玩味。一是David Lattimore的看法，他认为该书'不凡而又富有思想。……怀着诗人或小说家的喜悦，将寻常的末端小节转变为揭示其意义闪现的观点喜悦，将寻常的末端小节转变为揭示其意义闪现的观点'。另一则是美国著名小说家John Updike的评论，他指出：'尽管深富历史学识，然而《万历十五年》却也具备着卡夫卡（Kafka）的优美而又令人顿挫之故事《中国万里长城筑成之时》（*The Great Wall of China*）的超现实的虚构特质。""黄氏是把分析的工作放在一个叙事的架构里，而且在个人见解与文字表述、叙事与分析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断裂。遗憾的是，在大部分的职业史家的作品里（中文世界犹然），这类断裂的现象极其明显，因为多数的历史学者已不再'说故事'了。"

吕思勉《读史札记》（上、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作者治史是从有计划地撰写读史札记入手的，所作或订正文献，或考证史实，更多则是对史事的分析研究。本书是作者读二十四史的心得札记，共有五百多篇，内容涉及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科技和少数民族问题等许多方面，并在综合较多史料的情况下，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出版后享誉学林。其后又陆续刊布有20余万字。2005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上、中、下三册，不仅汇总了作者全部的已刊札记，还恢复了当年整理时删改的文字，并搜集了未刊稿约2万言。

谢维扬在《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发表《论华夏族的形成》。

该文认为，夏民族是由夏代之前的部落联盟转化而形成的，这个民族就是最初的华夏族。他们不仅创造了夏代国家及其文明，而且也是后来商代和周代国家及其文明的创造者。"华夏"一词，是汉族的古称。

李学勤在《人文杂志》专刊《先秦史论文集》发表《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

该文为作者 1980 年在一次先秦史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作者提出，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文明迟到商代才形成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考古发现说明青铜器、城市、文字等因素在商代以前都已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从早商再上溯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是有可能的。而且，以往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高度的估计在一些方面也显著地偏低了。之所以会把中国古代文明估计得比较迟、比较低，有其深刻的学术史上的原因。一是不适当地套用了外国历史的观点，忽视了中国固有的特殊性，更重要的原因是清代经学今文学派的影响。今文学派提倡辨伪，但有时过了头。古书的形成流传要经过复杂的过程，研究古代文献，既不能一味信古，也不能一味疑古。

作者认为："现在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估价是不够的，应该把考古学的成果和文献的科学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文明做出实事求是的重新估价。"

此文是后来作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先声。这一观点又在陆续出版的一系列著述中被作者反复申述，成为 90 年代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指导思想。

范达人在《北京大学学报》第 3 期发表《略论历史的比较研究》。

作者提出了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历史的问题，并就历史比较研究的意义和作用、如何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作了论述。

荣孟源、庄建平、孙彩霞编《义和团史料》（上下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含《义和团文献》、《史籍汇录》、《四川红灯教》和《方志辑录》四种文献。

王雷在《中国社会科学》第 3 期发表《民族定义与汉民族的形成》。

作者认为，夏、商、周三个朝代是汉民族的前身——诸夏部落的时代，秦的统一使华夏各部族开始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从秦开始到汉代是汉族形成的时期。

华岗《中国大革命史（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由文史资料出版社重版。

廖盖隆为重版本写了序言，称这本书是详细论述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唯一著作，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占了全书将近一半篇幅的第四章《中国大革命的经过》。序言也指出了该书的不足之处。

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是作者1957年出版的《中印文化关系论丛》的增补版，收论文21篇，36万字。所收论文从不同侧面探讨总结了中印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历史及其规律。

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在四川灌县成立。

殷孟伦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训诂学的回顾与前瞻》。

文章探讨了训诂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在其绵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中国文化所做的贡献，重点对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等不同时期训诂学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训诂并非小事，训诂学对所有学术的关系是非常重大的。训诂学研究，要在批判继承传统训诂学遗产的基础上，对训诂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有步骤地整理、正确注释我国的古代文献，对我国历代的训诂著作，有计划地进行一次全面的整理、研究。

陈梧桐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发表《论我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

中国长城砖和秦代兵马俑展览在美国田纳西州举行。

22件展品参展，至10月结束，观众达500万人次。

6月

2日　辽金史研究会在沈阳成立，推举陈述为理事长。

7日　《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山西社会科学研究所《晋阳学刊》编辑部在太原联合举办中国史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

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问题是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受到重视。

17日　上海市历史学会讨论如何看待近代史上的传教士问题。

29日　中国钱币学会在北京成立。

是月　俞旦初在《史学史研究》第2期发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

第 3 期及 1983 年第 2 期连载。

文章共分七部分：一、“史学革命”的提出和史学求“新”的热潮；二、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输入和影响；三、西方文明史学思想的输入和影响；四、“民史”思想发展的历史和新高潮；五、新史方案的提出和中国历史的重新编写；六、对封建史学的进一步批判；七、简短的结论。文章对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新史学思潮作了一个较为全面详尽的勾勒，在中国近代新史学的研究上具有开拓之功，素为学术史研究所重。

该文后收入作者著《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易名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

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论文集，包括《明末清初的学风》、《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及其迟缓发展的原因》、《明清野史笔记概述》、《清初东北流人考》、《记明万历四十八年的平价米票》等 12 篇文章。《明末清初的学风》一文是在 1963 年顾炎武诞生 350 年学术讨论会发表的论文，借商讨顾炎武学术的特点之际，详尽地勾勒了明末清初社会上研究学术思想的风气及学术的演变过程。《明清野史笔记概述》一文以时代为经、各种野史笔记为纬，考述了著述与时代学风之间的关系。《清初东北流人考》一文，对清初得罪清廷遭文字狱充军谪戍到东北去的地主文人、知识分子在开发东北学术文化事业中所起的作用考述尤详。

傅筑夫、王毓瑚编《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系统研究了孔子的政治、经济、哲学、文艺、史学、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并对这些思想对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社会和学术思想所起的重要影响作了阐述。

尹达在《中州学刊》第 3 期发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科学研究》。

文章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搞历史，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然走到错路上去。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能够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与现实、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者说，古往今来，有成就的史学家或史学著作，哪一个不是着眼于现实服务于政治呢？理论

工作在政治上应该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尤其要同党中央一致。

尹达在《郑州大学学报》第 3 期发表《关于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文章强调在历史研究中贯彻阶级斗争理论。

作者指出，有一种倾向，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只讲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一条，不讲阶级斗争，只谈生产力、物质生产是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不谈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反而说起破坏作用，造成中国封建社会缓慢发展，乃至停滞不前等等。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够在迷离混沌、错综纷纭的社会现象中发现规律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史学研究应该牢牢把握住这一条指导性的线索，用它去解开社会历史研究中的关键性疑难问题。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由三联书店出版。

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论丛》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收作者参加农民战争史论战的论文 16 篇，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阐发有关农民战争的理论问题，重点探讨了“农民政权”的性质。作者认为，农民战争虽然推动了历史前进，推翻了一些封建王朝，但只能建立新的封建统治，不可能建立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农民政权”。作者还肯定了让步政策，认为这体现了农民战争推动社会发展的间接作用。下编主要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李自成、张献忠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等。

苏双碧《阶级斗争与历史科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阶级斗争与历史科学》、《“四人帮”的影射史学对历史科学的破坏》、《论研究历史和现实政治的关系》、《论史料和理论的关系》、《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历史遗产批判继承新探》、《阶级斗争与清官》等 7 篇文章，内容多涉及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讨论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历史发展动力、历史与现实、史与论、人物评价、历史遗产等。

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1 年底，为贯彻高教部关于编写文科教材的精神，在上海召开了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出席的有北京大学的张芝联、武汉大学的吴于廑、南京大学的蒋孟引和王绳祖、中山大学的蒋相泽、杭州大学的沈炼

之、华东师大的王养冲和郭圣铭，以及复旦大学的耿淡如、田汝康和金重远等人。与会学者对当代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讨论，并委托田汝康负责编译西方史学流派的资料。至1964年文稿已基本完成。后“文革”爆发，未能出版。“文革”结束后，由金重远对译文重新进行了全面校订，并补译了新的文章多篇。所选文章的作者多系现代德、法、英、美、意等国著名历史学家或哲学家、社会学家，按国别排列以及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基本涵盖了现代西方著名的史学流派。文前均有对作者及其文章内容的简要说明，介绍作者生平与著述情况，分析作者代表作的核心精神，评判其历史观点在学术流派中的地位及其在史学发展中影响。

该书的出版，对于改革开放之初史学界了解外国史学起到重要作用。

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录作者1979年前近30年间所写论文31篇。内容涉及古代城市地理、水陆交通、黄河河源及古遗址考证、历史地理学理论方法等，多有前人未发之论，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同月，齐鲁书社出版了作者《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为该书姊妹篇，收入历史地理与考古论文19篇。

柴德赓《史学丛考》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由刘乃和编订，收入作者1931年至1965年期间写作的代表性学术论文27篇，包括《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宋宦官参与军事考》、《〈鲒埼亭集〉谢三宾考》，以及《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及其有关的几部书》等。既有考证文章，也有史学史文章，基本反映了作者的治史成就。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录了作者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论文29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农民战争评价问题等方面的创见称誉学界，是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主要奠基人之一，本书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将社会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进行历史考察的治学风格。

7月

5日　李学勤等在英国参加第二十八届欧洲汉学家大会。

陈梧桐在《光明日报》发表《正确对待我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

及其与汉族王朝的战争》。

是月　汤明檖《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由中州书画社出版。

作者五十年代曾任梁方仲助手，参加了《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编写工作，其间曾检阅大量历史文献资料，为撰写该书打下坚实基础。该书力图从生产力的变革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发展变化出发来探讨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为说明封建经济形态的演变，对商周以后土地赋役制度发展变化也作了分析说明。对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在全面介绍各家不同观点之后，提出已见。且精炼扼要，不过多罗列史料，使人易读易懂。

有评论认为，该书“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综合贯通、精炼缜密的封建社会经济史”。

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对古代宗教特别是中国民间宗教进行了系统研究。

第一次孟子学术讨论会在孟子故乡山东省邹县举行。

60多名代表出席，主要讨论了孟子的大一统思想、道德遗产、教育思想、王道仁政学说、性善论等问题。

杨国勇在《山西大学学报》第4期上发表《炎黄华夏考》，认为华夏族起源于黄帝和炎帝二元。

该文依据先秦典籍论证了颛顼、鲧、禹属黄帝系统，祝融、共工属炎帝系统。“华夏”一词的由来与黄炎二帝的发源地河南新郑有关。

8月

8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17日　全国历史教学法讨论会在太原举行。

25日　辽宁大学历史系主办全国第一次世界近代史学术讨论会在沈阳举行。

26日　《人民日报》“答读者问”栏刊登庞朴《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最早倡导文化史研究，开八十年代“文化热”之先河。

文章说：“解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除去1979年湖南出了一本《中国文化史要论》（蔡尚思著）外，竟无任何其他文化学与文化史的著作出版。全国数以百计的文史性大小研究机构中，挂有文化史字样的，据说只

有两个。这种贫乏荒芜的现象，同我们这个拥有优秀文化传统而又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大国的状况，怎么说也是不够相称的。”

文章认为，发生这种现象，可能带有某种必然性。因为，1949 年前的种种文化学、文化史著作，许多是以文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1949 年后，唯物史观成为历史学者的指导思想，人们很自然地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到社会物质生活和阶级斗争方面，努力发掘构成历史本质而恰恰为前人忽视了的东西。于是乎，各个时代的文化部分，在历史著作中往往被挤到最后而草草一笔，或者连一笔的地位也得不到了。

文章号召拿出足够的注意和力量来，为宣扬中华文化，为继承中华文化，为发展中华文化，来关心一下中华文化史的研究工作。

以此文的发表为标志，此后，“文化热”席卷全国，成为笼罩整个八十年代的知识潮流。

该文发表后，作者又连续发表数十篇文章及讲演鼓吹传统文化研究，成为“文化热”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些文章主要有：《需要注意文化史的研究》（《文史哲》1984 年第 1 期）、《中国文化的再发现——答〈北京晚报〉记者问》（《文汇读书周报》1985 年 6 月 8 日）、《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断想》（《未定稿》1985 年 11 期）、《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论纲）》（《光明日报》1986 年 1 月 6 日）、《传统与现代化》（《北京日报》1986 年 2 月 10 日）、《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北京社会科学》1986 年 2 期）、《举世瞩目中国传统文化》（《瞭望》海外版 1986 年第 6—7 合期，1986 年 2 月 10 日）、《文化研究的热潮在回荡》（《理论信息报》1986 年 3 月 24 日）、《文化研究热潮的起因》（1986 年 5 月在杭州的讲演）、《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1986 年 5 月在杭州的讲演）、《人文主义与中国文化》（《文史知识》1987 年 1 期）、《民族性的再认识——关于“文化”问题的问答》（《电影艺术》1987 年 2 期）、《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识历程——兼论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教学与研究》1988 年 1 期）、《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历史研究》1989 年 2 期）等等。

是月　马非百《秦集史》（全二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作者历五十年时间编撰而成的一部秦史资料总集。略仿纪传体史书成例，分纪、传、志、表四个部分，收录材料甚为广泛，时间横跨秦立国时的先代传说至二世而亡，与有秦一代相始终。凡秦史材料，从一个人名、一件小事到军国大事，一一收集抄录，分类缀辑，原文照抄，注明出处，被视为“集秦史资料之大成”。书中收录史料，十分注意材料的比勘考订。卷末常用“编者按”的形式发表作者对史实考订和一些问题的看法。

学界认为，相对而言，该书志和表部分的史料价值稍高。这是因为纪、传部分的材料往往采自《史记》、《国策》等书的相应部分，收录较易，而志、表部分的材料则较为分散。同时，某些志、表注意吸收近人研究成果，科学价值较高。志与表部分大致沿《秦会要订补》纲目增删而成，其踪迹略略可寻，但收录的材料更为丰富和完备，特别是增加了新出土的材料。

作者在《自序》中说，编写此书的一个动机，是打算写一部《秦书》，补二十四史无《秦史》之缺。但该书亦有缺憾，书中引用前人成果，未能一一注明。有些材料，纯属后世传说，收录难免失之于滥。

乔幼梅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

有关宋金对峙时期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中外学者虽多有关注，但对它的演变过程皆未能详加推究。本文作者围绕这一问题，对宋金贸易中南宋初年铜币北流，金亡前夕铜币南流这一现象，其间宋金之间争夺铜币的措施都做了邃密的考辨和论析。

作者认为，宋金贸易过程中争夺铜币的斗争，是我国古代经济领域中并不多见的一幕。虽然宋金对峙使统一的中国被人为地分割开来，但政治上的对立，并不能削弱早已形成的南北之间共同的经济生活，也不能割断这种经济联系。宋元以后，我国之形成为越来越巩固的统一大国，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之日益发展，边疆和内地联系之越来越不可分割，就是由于包括商品货币在内的各种经济关系和力量所固有的冲击力，打破人为的障碍而推动起来的。

徐绪典主编《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由山东大学历史系刊行。

陈恭禄著、陈良栋整理《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为作者生前在南京大学任课讲义，共分8章，主要介绍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各类史料，包括公文档案、书札、日记、回忆录、笔记、诗歌、传记、报刊等，兼及纪传史、方志和典章，并对这些史料的研究价值进行了评述。

梁寒冰编《历史学理论辑要》由中华书局出版。

全书约80万字，辑录了马、恩、列、斯、毛著作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全书分为13章：总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及其形式；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中国社会

与中国民主革命；革命与战争；民族与民族运动；原始氏族公社和农业公社；奴隶制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章节前配有“提要”。

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将1929—1979五十年间的古史分期讨论划为3个阶段，分别是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年，全面介绍了各家各派在古代史分期这一重大历史问题上的纷争，对各个时期各个问题的讨论情况都加以概括及评论。该书是迄今对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回顾、总结最全面的著作，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开近30年现代学术史研究之先河。

书末附录论著目录。

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第4期发表《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

作者反对将戊戌变法看作一场革命，认为康有为等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动中，有先进的东西，也有不少丑恶难堪的东西。他们屈从封建阶级、帝国主义，坚决反对农民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行动，更有力地说明了他们全部活动的性质。他们的政策，并不触及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根基，而只是要求让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分享政治权力，改革某些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层建筑，他们不但行动极其温和，而且要求改良的范围、程度是很有限的。那场运动中，以前被认为具有光泽的部分，现在看来，也未免黯然失色。

杜石然等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综合性中国科学技术史。

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由中华书局出版。

分上、下两编，共五册。内容起于1850年6月金田团营，迄于1866年3月太平军余部覆灭。该书依据清朝官方档案以及遗留下来的太平天国文献和大量私家记述、地方志等记载，用纪事本末体详细叙述了太平天国与清政府战事的全部经过，对太平军与清军及外国侵略者的历次战役、双方的兵力部署、统兵将领、交战经过和后果等多有考实和参证，内容较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远为详赡。全书字数达100多万言，是研究太平天国军事史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牟安世《鸦片战争》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30余万字，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鸦片战争进行了较为

深入、细致的论述和分析，是研究鸦片战争的第一部专著。

蒋大椿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论与史的关系考察》。

该文对纠缠整个史学界数十年的史论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作者认为，史与论的关系，应当放在三个不同的范围内，分别弄清"史"与"论"本身的含义，分别予以解决。而后再来考察它们的总体联系。第一个范围，是将史与论作为整个社会结构中意识形态范围的两种社会现象来考察。这里"史"指历史科学，"论"指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指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当代，唯物史观（论）与历史科学（史）的关系是：唯物史观乃是历史科学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作用表现在，唯物史观为历史科学提供了研究工作的指南。所谓"指南"，就是唯物史观给历史科学提供了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途径和根本方法。第二个范围，是把史与论放在历史科学的研究过程来考察。这里"史"指具体的历史过程及构成这个过程的一系列历史事实，"论"则是对具体历史过程和历史事实的看法、认识，即史识。第三个范围，是在说明历史的过程中来考察史论关系。在这里，"史"指历史著作中所用的材料，"论"就是著作中的观点、论点。

文章指出，历史科学由于其本身的专业特点，以及在写作时所选择的体裁不同，在著作中史（材料）和论（观点）大致会出现如下几种处理情况：一是以论带史。这种处理方式的特点，是先对被研究的历史对象提出作者的看法，然后用材料来说明自己的论点。再是先史后论。这种处理方式的特点，是作者先摆出有关历史对象的事实材料，然后表明自己的看法。三是夹叙夹议。其特点是作者在记述历史事实的过程中，顺便交代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以揭出要点之所在。四是寓论于史。其特点是作者不另发议论，而在叙述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历史家已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了。由上述可见，历史家在说明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对史论关系究竟如何具体处理，当按本人著作的性质和体裁来决定。

作者认为，所有成功的历史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处理史论关系时，必须论从史出。而研究历史过程中的论从史出，要能获得科学的结论，又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历史家在进入具体研究过程前，务须正确处理历史科学和唯物史观的关系，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南，即按唯物史观所指出的基本途径和根本方法去从事研究，方能少走弯路，而多出成果。

9月

1日　中国地理学会和复旦大学在上海举办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历史地理学术会议，100 多人与会，收到论文 121 篇。会议围绕“城市与自然环境变迁”这一中心议题，分“环境变迁”、“历史城市”、“地区开发”、“历史水文”四个专题进行交流。

4 日　谢国桢逝世，终年 82 岁。

9 日　全国革命根据地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

17 日　全国首次清史学术讨论会在河北省北戴河举行。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四个单位联合发起。

18 日　裴文中逝世，终年 79 岁。

是月　柴德赓《史籍举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根据作者在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讲授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课程的手稿和部分讲义，由其学生许春在、邱敏、胡天法等进行整理，并经北京大学历史系许大龄教授精心审校而成的一部史学入门书。全书分上、下编，按史籍性质，分类介绍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政书、会要、传记、地理等方面的要籍。该书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评论精辟，有独到见解。作者写作该书的目的是为了使青年学生“了解中国历史方面有哪些是重要书籍，哪些应该精读，哪些应该参考，哪些仅备检阅；更进一步了解这些书籍是什么人做的，什么时候做的，站在什么立场说话的，什么时候印行的，它里面记载些什么重要史料，它是用什么方法记载的，这些记载和见解对不对？这些书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我们对这些书应该怎样批判和利用？”

该书出版后广受欢迎和推崇。吕叔湘在《书柴德赓〈史籍举要〉》一文中说：“此书优点甚多，最值得指出的有两点。第一，所举书籍虽多，但不是全然孤立论述，而是常常指点彼此之间的异同因革，因而全书脉络贯通。第二，评论一书的优劣得失都有根有据，恰中肯綮，决非笼统一说，或人云亦云。”他认为《史籍举要》“确实是在同类书中允称上选”。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 1 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郭沫若全集》由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编，历史编共 8 卷，1985 年出齐，收编了郭沫若从 1923 年至 1972 年近 50 年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的一系列专著、论文、考释、随笔、序跋和整理中国文献古籍的著述。

同月，《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 1 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共 10

卷，收录了作者关于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学、考古学方面的著作。具体为：1. 甲骨文字研究；2. 卜辞通纂；3. 殷契粹编；4.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5. 6. 金文丛考；7. 8.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9. 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10. 考古论集。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全书共分二编，第一编讲述史学理论，着重阐明历史与编年史、自然史与历史的不同，指出历史学家理解和研究历史必须有感情、经验和理智，认为真正的历史是我们思想中想到或可能想到的历史，因而，“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作者还专门论述了“假历史”、“历史哲学”、“历史的人性”、“历史的选材与分期”以及“专门史的差别与划分”等。第二编叙述史学史，分别论述了希腊罗马史学、中世纪的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启蒙运动的史学、浪漫主义的史学、实证主义的史学等，指出了它们的缺陷和不足，进而归纳出史学发展的方向必然是向“真历史”迈进。克罗齐继承了思辨哲学的传统，一反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风气，提出“精神本身就是历史”的观点，强调历史研究要立足于当前生活。

该书出版后对中国史学界影响巨大。

10 月

6 日 “稷下学”讨论会在山东淄博举行。

会议由山东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主办，与会代表分别就稷下学宫的历史演变、稷下学宫的性质、稷下学术流派、稷下哲学发展变化的基本特点、稷下之学盛衰的基本原因、稷下学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16 日 “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讨论会在成都召开。

此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主办。与会学者通过中外科学技术发展史的对比研究分析我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并从明清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冲突、融合来考察当时科学技术衰落的趋势，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明清两代又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推行“重农抑商”、“重文轻技”、“闭关锁国”、“八股取士”等政策，这些国策，扼杀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使近代科学技术丧失了一个强有力的社会生产及其经济的推动力，以致我国古代科学大树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里枯萎下去。

这些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共鸣，影响巨大。

18日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举行。

会议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讨论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含义，小农经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封建专制主义对封建经济的影响等问题。

20日　白钢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探讨》。

文章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讨论中的多种观点进行驳正，认为从方法论来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经济史范畴里的问题，即为什么封建生产方式迟迟不能解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始终不能取而代之的问题。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对中国封建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进行科学的考察。有人却认为这是陷入"因果分析"和"归纳法"的窠臼，力图有所突破。于是放弃对历史采取唯物主义的分析，不是运用历史的、逻辑的、辩证的方法来进行探索，而是异想天开，标新立异。例如，用控制论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对各种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结构分析，不是把社会看作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是把各种社会要素当作随便搭配起来或机械地结合起来的东西。这种做法不可能正确地揭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找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正确答案。作者尤其对系统论方法移植到历史学领域进行了抵制，认为"超稳定系统"等术语，不能概括历史事件的内部联系，不具有客观意义，经不起推敲。当研究者运用这些术语来概括历史现象的时候，明显地反映出对某些历史现象的综合很不准确。作者认为，在移植其他学科的认识手段时，必须把握所要研究的对象的全部内容，绝不能"舍本逐末"，放弃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是月　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由齐鲁书社出版。

本书共分八章，第一章概述了古典文献的积聚、散失，其余几章分别介绍了古典文献的源流与分类，类别与体式，四部书的构成及其演变，类书、丛书与辑佚书，文献目录与解题，版本、校勘与辨伪，以及古典文献的收藏与阅读等内容。作者认为古典文献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文献都属于这个范畴。本书以文史文献为主，兼顾其他方面。内容侧重史料，引经据典，意在向读者介绍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目录、版本、校勘、流通、收藏、阅读等基本知识。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成立，邓广铭担任中心主任。

1999年12月，改名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在作者两部旧著——《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与《中国古代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全书约25万字，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探讨了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起源以及封建社会冶铁技术的发展轨迹；下编主要阐述中国古代冶炼技术对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社会变革所起的巨大作用，从而说明了中国古代所以能够比欧洲早一千年出现封建社会的重要原因。该书出版后引起国内外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的高度重视，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专门就灌钢冶炼等问题与作者讨论，并在其科技史著作中多处采纳其研究成果。

（英）赫·乔·韦尔斯著、吴文藻译《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8编38章，叙述了从地球的形成、生物和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的世界历史，第1编至第3编写人类以前的古生物世界，人类的形成史和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等最初的文明；第4编至第6编铺叙犹太民族的兴起，希腊、印度文明的兴衰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的发展；第7编勾勒大陆文明（蒙古帝国）的崛起与西方文明的复兴及其冲突交汇；第8编描绘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发展图景。作者侧重从民族的形成和社会的发展来编写世界历史，平等地对待长期以来被欧洲历史学者贬低的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世界发展史上的地位，从而突破了欧洲世界史著作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与局限。书中综合使用地质学、古生物学、胚胎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方面的资料与方法，从多个层次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变迁。

陈同燮编著《希腊罗马简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该书选收1840—1919年间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社团组织、典章制度，报刊论著、工矿企业等方面词目共3046条。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下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共收论文72篇，按内容分为七类：一、综合类；二、疆域与民族；三、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四、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五、民族间的“和亲”；六、民族战争与民族英雄；七、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所选论文均发表于1951年至1981年间，基本上反映了中国民族关

系史研究的各个侧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关系史研究成果的初步总结。

11月

10日　中国史学会在北京举行报告会，纪念郭沫若诞辰九十周年。

1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

20日　谭其骧在《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

该文对当时研究历史地理只重视野外调查，不重视文献资料的弊病提出批评，指出用研究地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地理是不妥的。

是月　湖南省博物馆主办《湖南考古辑刊》（年刊）创刊。

韩儒林《穹庐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晚年亲自编订的论文选集，收录蒙元史、北方民族史、藏学、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论文34余篇，半数以上是作者于抗日战争期间在后方的刊物上发表的，不常见于世，因而该书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内中所收蒙古史、元史文章23篇，足见作者在这一领域的卓越贡献。

乔伟《中国法律制度史》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我国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制度（包括刑法中的犯罪种类、刑罚制度、判刑原则），以及民事、婚姻、继承、诉讼等各项法律规定进行了系统地探讨。

12月

2日　教育部发出《关于开展古籍整理研究，培养整理人才的意见》。

《意见》根据中央“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于高等院校”的指示提出：一、加强大学的文科教育，并从小学开始，让学生读点古文。各有关学校要做相应安排。二、高等院校的现有研究机构，要根据精干的原则和实际需要，适当扩大并新建一些。三、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为他们配备助手。抓紧培养新生力量，争取在十年内培养研究生一千五百人，本科生六百人。四、教育部成立古籍整理研究领导小组，各有关高校要建立相

应的领导班子。五、中小学语文课要把课本中的古文教好。六、教育部设立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补助基金。

15日　刘修明在《光明日报》发表《史学方法论的“引进”要慎重》。

该文意在维护历史唯物论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对吸纳西方史学理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进入历史研究的热风提出质疑。文章认为，不能不加鉴别、不加选择地将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全盘引进历史研究领域，甚至以此取代历史唯物论。西方史学方法论共同的出发点是历史唯心论，它们从来不可能在整体上解释历史，反而制造了历史的混乱。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有质的差别，不可能代替对人的作用、阶级斗争和偶然因素的分析。

16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与文化进步》中国编委会与《中国文化》编委会联合在复旦大学召开“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

这是1949年后举行的第一次文化史学术讨论会，周谷城、蔡尚思、庞朴、王元化、唐振常、胡道静、刘泽华、朱杰勤、李学勤、周一良、马雍、刘家和、宁可、杨宽、陈旭麓、罗竹风、顾廷龙、丁守和、方行、朱维铮、姜义华、刘志琴等来自全国30多个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呼吁大力开展中国文化史研究，认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会议讨论了文化与文明、文化史的对象和范围、文化形态、中国文化传统的估计、中外文化交流、文化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并就中国文化史研究提出了建议和设想。

此次会议对“文化热”的兴起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庞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与文化进步》唯一来自中国的编委。

是月　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从战国封建论出发，从多角度论述了中国奴隶制的形成、发展及其高度发达的形态，并探讨分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经济变动、政治变动和思想变动等问题，指出：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准应是战国时期的七国变法，特别是商鞅变法。并把分期的绝对时间定在公元前350年。作者从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生产关系、剥削关系、阶级关系、行政建制和制度、政治体制、社会思想的变化、阶级斗争等八个方面

对比了战国变法前后的社会制度，并通过对古希腊、罗马劳动奴隶制、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农奴制与中国古代宗族奴隶制的区别，总结说明了自己主张战国变法封建说所运用的理论及方法。

本书对作者前一部著作《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一些看法进行了修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王庆成、庄建平负责整理，共收太平天国史料 215 件。其中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的 152 件、英国柯文南博士提供的 26 件、日本小岛晋治提供 2 件；柯文南提供的来自伦敦公共档案局，全部是新发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小岛晋治从日本发现的两件新史料，属太平天国时期的中国商人向日本有关方面报告太平天国起义和太平军在苏州的情况，也提供了新的研究动向。书中还包括“金田起义前后清政府档案史料”、“金田起义前后广西桂平碑刻资料选录”、“太平军攻克武昌探报”等个人所提供的诗札、笔记等有关资料。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由中州书画社出版。

书中独创性地把中国史学的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一、先秦为奠基期；二、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刘知几的《史通》是创建期；三、刘知几以后到《明史》为充实期；四、清代鸦片战争以前为发展期；五、鸦片战争以降为更新期。并重点对作者所认为的中国史学的三个高潮时期即魏晋南北朝、两宋、清代史学的发展和特征进行了系统阐述。作者尤重考察社会发展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在对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进行阐述时，除对众多史籍进行考评外，还注重探索各史学家的史学观点、学术源流，评述各史学家的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书中以阐述历史编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旁及其他学科与史学的关系。其中对历史地理学、年历学、古器物学、古铭志学所做的总结性评述尤具权威性。

孙思白在《历史研究》第 6 期发表《试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

文章意在批评流行的“历史研究应为现实政治服务”观念的偏弊。作者认为，历史研究不但要阐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还应分清历史与现实的区别。承认二者之间的区别，才能堵塞惯于“上纲上线”者强把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的渠道。历史学的功用体现在发现规律，提供知识和借鉴，增强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性，不是一句“为当前现实政治服务”可以概括得

了的。

吕思勉《先秦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吕氏所著4部断代史的第一部，初版于1941年，是研究上古先秦史的最基本参考书之一，已成为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前半部为政治史，按历史事件的顺序编排；后半部为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别类的办法叙述。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由中州书画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对40年代《广校雠略》一书展开扩写的又一部文献学理论专著，将我国古典文献学的范围推至极致，为作者晚年代表性作品之一。全书分12编，60章，全面论述文献学的范围、任务，古代文献的流传、类别等重要问题，对版本、校勘、目录等有关整理文献的基本知识，也详加说明，对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历代校雠学家和清代考证学家整理文献的学术贡献作了总结，并提出了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该书着力于建构历史文献学的学科理论体系，被称为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

安志敏《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收集作者自1947年至1981年发表的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论文20篇。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全国或地域性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综述，另一部分是对一些典型和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迹、遗物的分析讨论。作者以考古实践为基础，对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分布情况、面貌特征、发展规律、年代序列及相互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入地分析研究，提出一些创见。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朱庭光主编《巴黎公社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长城砖和秦代兵马俑展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

23件展品参展，至1983年6月结束，观众达1000万人次。

中国秦代兵马俑展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等城市举行。

展出兵马俑44尊，至1983年9月结束，观众达80万人次。

是年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刘广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等学术机构访问并作学术报告。

漆侠创立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

1990 年扩建为历史研究所，2000 年组建为宋史研究中心，为国内宋史研究的重镇。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扩建为研究所，谭其骧任所长。

胡绳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办《人类学学报》创刊。

本刊是我国唯一报道人类学研究的专业期刊，主要发表人类学和相关学科的原始研究报告和综合性学术论文，在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理论方面，在中国旧石器文化的综合研究方面多有建树，在国内外人类学界有较大影响。

1983 年

※ 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出版。
※“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
※ 首届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
※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出版。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全国展开。
※ 辽宁牛河梁村发现红山文化时代“女神庙”遗址。

1 月

《史前研究》杂志创刊。

吴于廑在《云南社会科学》第 1 期发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该文提出“要使世界史这门学科真正是以世界全局为历史考察对象”。作者以广阔的视角探讨了亚欧大陆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形成与并立，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以及三次大冲击对于历史成为世界史的作用及其历史限度等问题。该文与作者所撰写的《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 1978 年第 5 期）、《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1984 年第 1 期）、《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 年第 2 期）、《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映》（《世界历史》1993 年第 1 期）等文章皆是作者所提出的“整体化的世界史说”的代表性作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吴氏又全面阐述了他的世界历史观。

贾兰坡主编《人类的黎明》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合作出版。

该书是阐述人类起源和演变的科普读物。全书配有 400 多幅彩色和黑白照片。

陈高华、陈智超《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张维华、于化民在《文史哲》第 1 期发表《略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

2 月

28 日　国家文物委员会成立，由文化部聘请 16 位专家组成，夏鼐为主任委员。

是月　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缙绅地主势力的强大、商业资本的发达、宗法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宗法势力的顽固、封建文化的发达、理学和礼学的盛行以及佃仆制的顽固残存等问题进行逐一考察，尤其对佃仆制的阐述颇为详尽，以图揭剖明清徽州社会结构。作者采用文献资料和社会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大量使用了最新发现的明清徽州契约、地主账簿等历史资料，并广泛借鉴了社会学、地志学、人类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从全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来把握徽州地区的历史演进历程。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敦煌研究所在巴黎自然史博物馆举办“中国敦煌壁画展”。

3 月

6 日　容庚逝世，终年 89 岁。

7 日　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报告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召开，全国各地 1500 多名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参加会议。周扬宣读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长篇论文，其中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的论述引起轩然大波，成为“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的缘起之一。

15 日　“纪念太平天国建都天京 130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

是月　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史学概论专著，是山东大学、云南大学受教育部委托编写的高校史学概论教材，在诸多史学概论教材中发行量最大。参加编写人员有谢本书、项观奇、庞朴、张知寒、郭圣铭等。编拟提纲时，参考了1965年山东大学历史系史学概论小组编写的《史学概论教学大纲》。1985年出修订版时，约请范达人撰写了“当代国外几种史学方法述评”部分。

该书侧重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但对史学方法论的论述较为薄弱，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概论学科的形成。

徐绪典在《文史哲》第2期发表《教会、教民和民教冲突——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初探》。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学刊》第1辑由中华书局出版。

第2辑和第3、4、5辑分别于1985年、1987年出版。

蒙文通《越史丛考》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代技术史第一届学术讨论会在昆明召开。

张传玺主编《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1900—1980）》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录了1900年至1980年国内1240种中文报刊上战国秦汉史论文1万余篇目（包括港台报刊上的论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中外关系、历史地理及考古、文物等各领域。收录范围较广，注意兼收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论文。

《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续编》（论文，1981—1990；专著，1900—1990）及《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三编》（1991—2000）分别于1992年、2002年出版。本书收录论著均以“战国秦汉史”为主，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考古等方面。由于学术界对战国的上限和东汉的下限颇有争议，因之本书对某些论著收录的时限适当放宽。三本索引为一个完整的世纪索引系列，各本所收的内容，首尾相接，其时间与二十世纪的年代同步，并相始终。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第1卷《伟大的开端：1919—1923》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12卷，600余万字。从1978年底开始编撰，到1996年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完毕。该书材料丰富，内容充实，考订扎实，史实准确，受到读者和专家好评，被称为迄今为止国内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最浩大、最有影响的一部巨著。

经过两年修订，2001年该书又推出修订版，“考虑到这部书的体裁和内容基本上采取纪事本末体，即以历史事件为纲，真实地记述了从191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因此它又是一部通史类的史书。由于中国革命有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革命之分”，所以被易名为《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

白寿彝、瞿林东在《史学史研究》第1期发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一辑出版。

该刊系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胡厚宣等一批学者创办的以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为主旨的学术刊物，共出版了3辑（1983年、1986年、1996年），时隔12年之后，中国社科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用以书代刊（新一辑）的形式复刊，每年一期，为先秦史、甲骨学、古文字领域内重要的学术刊物。

（美）阿尔温·托夫勒著、朱志焱等译《第三次浪潮》由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是著名的未来学家。在书中，他认为人类迄今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变革浪潮的冲击。第一次浪潮结束渔猎时代迎来了农业时代，第二次浪潮结束农业时代迎来了工业时代。现在，人类又面临第三次文明浪潮的冲击，它将使人类从工业社会步入信息社会。

该书出版后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造成强烈冲击，书中所使用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更对人文社会科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方法遂成为一股强劲潮流。

4月

7日　韩儒林逝世，终年81岁。

11日　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大会的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和“历史遗产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20人出席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在开幕式上作了《一个呼吁，一个请求》的讲话，希望史学界承担起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的责任。刘大年作了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的长篇发言。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史学会章程》，选举丁名楠等82人为理事。理事会选举邓广铭等18人为常务理事，选举刘大年、吴于廑、林甘泉、胡绳、戴逸等5人组成主席团，李侃为秘书长。

20日　全国孔子学术讨论会在曲阜举行。

该会由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史研究会和曲阜师范学院联合发起，集中讨论了孔子的时代和阶层属性，孔子思想的影响和评价，孔子思想的批判与继承，以及如何把孔子研究引向深入等问题。

22日　中国地方志规划会在洛阳市召开。

会议讨论了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1983—1990年），确定了新修地方志在“六五”期间完成首批成果和保证完成的项目。

28日　中国考古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在山西大学举行。

会议由教育部、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主办，主要讨论了考古专业的体制、教学质量、教材编写和实习基地的建设等问题。

是月　中国民族史研究会在成都成立，翁独健担任会长。

黎澍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

作者认为：历史学界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方向。文章在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成就后，特别对这一阶段的问题和教训进行了反思。文章认为，历史学家如果脱离马克思主义指导，一步紧似一步地追随“为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现实政治”等等急功近利的要求，势必一时因为要适应这个要求而说历史是这个样子，一时又因要适应那个要求而说是那个样子，其结果只能造成一个又一个的混乱。这是对历史学的破坏。历史学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科学性。历史学坚持科学性就是它的政治任务。坚持党的领导的具体表现应是贯彻党的学术政策，坚持用科学态度对待科学。不仅要排除前人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曲解，而且要力求避免今人在现实斗争中的倾向和需要影响对历史事实的观察从而加上新的曲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还要有允许人们提出新认识的器量，而不是故步自封，以抱残守缺为能事。因此，划分学术问题和

政治问题，避免混淆，是必要的。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就在学术是非往往不是可以立即分辨清楚的。它需要时间，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和实践的检验，才能判定是不足道或者谬误而为人所不取。

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继《隋唐五代史纲》之后又一部断代史专著，是作者在《魏晋南北朝讲义》（1960 年）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共分 4 篇 7 章，以唯物主义观点，简明扼要地阐述了魏晋南北朝历史演变的全过程，系统论述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和中外交往等方面的基本状况和主要问题，希图从这段复杂多变的混乱时代中，探讨其发展演变背后的原因和规律，阐明它的主要发展趋势和特点。作者尤重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以大量篇幅介绍了当时的土地制度，并对赋役、户籍、人口动态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钟肇鹏《孔子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此为作者 20 年间有关孔子研究的论文结集，论述了孔子思想的阶级性、孔子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伦理思想、文艺和美学思想，否定了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的观点，认为“孔子是封建思想的代表，在当时是进步的”。

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参阅三百年人物年谱 800 余种而撰著的一种提要性著述。所收人物包括生于明卒于清者、生于清卒于清者及生于清卒于辛亥革命以后者。除将谱主的自谱、子孙友生编谱、后人著谱一律收入外，其校书谱、诗谱、图谱、纪年诗、年表、合谱、专业谱之类亦加收录。全书均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叙述方法是一谱一篇，一人多谱则多篇。每篇叙录内容除谱名、撰者、刊本、谱主传略、著录情况、编纂缘起和藏者外，还增著了谱内有无可供采择的史料和涉及到哪些史料。

荣孟源《历史笔记》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收录作者旧作 39 篇，反映其对历法、太平天国史、义和团运动史、辛亥革命史、孙中山著作等所做的研究。

吴恂《汉书注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作者对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作了全面考订，从训诂、音韵、史事考证诸方面对旧注提出不少精当的意见。

王正平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

该文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从正面肯定地理环境作用的文章。作者认为，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必要条件，它在自然规律和人类活动作用下，不断变化。地理环境诸因素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有它的多样性：或促进，或延缓，或某些因素起促进作用，另一些因素起延缓作用，或两种作用轮换发生等等。这些作用都是与人们对自然斗争能力的高低，即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由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地理环境可以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更大的促进作用；人们也可利用自然特性，改善自然环境。但无论怎样，人类只能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使之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至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掌握程度，又取决于生产力水平。人类对自然斗争能力的高低是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起作用的基本前提，也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既要批判人类在自然力量面前无所作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也必须避免陷入无视地理环境、随心所欲的“地理环境不变论”和“地理环境虚无论”。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才有利于科学地阐明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丁伟志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

文章认为，人类历史是具体的多样的，多样性、具体性，是历史的普遍性格。不体现客观历史的多样性、具体性，就不成其为历史学。体现历史的多样性、具体性，是历史学自古以来必备的、永远不会消逝的特征，是历史学区别于那些以事物的抽象共性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从多样性的历史中探讨其内在的统一性，是历史学得以成为科学的前提，历史科学最基本的任务是在于探讨人类历史的多样性的内容中所包含的本质与规律。历史共同规律的普遍性，证实着历史的统一性，并以历史的统一性为其存在的前提。无论就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程，还是就人类社会组成的全部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一个统一体，它存在着统一的本质，因而它具有统一的运动规律。关于历史认识的过程，文章认为，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具体分析具体历史的特殊性。在历史学的研究中，“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科学方法只是走了科学研究全程的一半，历史科学还有一层更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回过头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运用科学的抽象去重新观察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内容的具体历史，这个时候，人们对于这个再现的具体历史的多样性内容，才能够

达到科学的认识。人类对于自然，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都是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认识过程的辩证发展。

5 月

9 日　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在郑州举行，中心议题是“商文化的研究和夏文化的探索”和“中国各地的青铜文化”。

会上选举了第二届理事会。夏鼐任理事长，尹达、苏秉琦、贾兰坡任副理事长，王仲殊任秘书长。

21 日　中国民俗学会在北京成立，选举钟敬文任理事长。

“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

会议审议了“六五”期间历史学科全国重点研究项目 33 项。

中国古代史重点研究项目有：《中国通史》（14 卷本）、《清代通史》、《清代人物传》、《明清档案整理》、《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明清时期广东地区经济研究、明清时期福建地区经济研究、《宋明理学史》、《敦煌文书（汉文部分）整理研究》、《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1972—1974 年出土居延汉简整理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重点研究项目有：《中国近代史稿》、《中国大革命史稿》、《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近代中日关系史资料丛刊》、《孙中山全集》。

世界史重点研究项目有：《欧洲史前史》、《中外古代城邦制研究》、《欧亚封建社会形态比较研究》、《印度尼西亚史（古代）》、《美国史》（6 卷本）、《苏联现代史纲（1917—1937）》（2 卷本）、《菲律宾史》、《中国古籍中有关东南亚各国史料汇编》（6 卷本）、《外国历史大事集》（8 卷本）。

此外，还有《中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大辞典》和中国地方史、地方志的编纂和研究。

23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历史所、文学所、考古所和中国文联联合召开郭沫若学术研究座谈会。

27 日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成立，周扬任会长，成仿吾、李一氓、夏衍、阳翰笙、冯乃超、李初梨为名誉会长。

是月　《世界历史》第 3 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

文章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

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同期还刊登了1983年2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召开的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座谈会发言摘要“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白寿彝、何兆武、刘家和、齐世荣、瞿林东、沈仁安、张文杰、王瓘、陈启能等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文史哲》第3期发表一组“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笔谈。

胡滨认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存在所谓“三次革命高潮”，将革命高潮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重要标志，也大有商榷的余地，因为它完全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不足以显示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我国出版的一些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基本上大同小异，陈陈相因，其原因就在于作者们在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上，始终没有摆脱“两个过程”、“三次高潮”论的束缚。因此必须克服中国近代史内容陈旧、知识老化的现象，开创近代史研究新局面。

孔令仁主张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反帝反封建“双线说”，认为中国近代史上主要有两种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种是农民的革命运动，另一种是资产阶级的革新、改良和革命运动，二者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流。

戚其章初步提出了“三个阶梯说”，把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划分为三段：第一段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段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第三段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谭其骧在《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对今后历史研究工作的四点意见》。

本文系作者根据自己在上海历史学会1982年年会上的讲话修改补充而成，主要针砭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极“左”倾向等弊端。作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人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当成僵死的教条和固定的公式，往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上套而不作具体分析，用教条公式尽量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这种做法在“文革”结束以后并没有消失。那种把历史生硬地与现实联系起来，为了现实需要，不惜宰割剪裁历史事实的反历史观点方法在“文革”后仍然在流行。作者指出，五六十年代各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都把过多的力量放在编写通史上，搞专门史、专题研究的都喜欢搞上层建筑，搞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评价一类课题，搞思想史、哲学史的似

乎更多。整个史学界肯花力气去研究经济基础的人少得可怜，肯去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的更是绝无仅有。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利于史学研究的。中国史里许多重要问题长期以来讨论来讨论去得不到解决，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另外，国内史学界三十多年来研究国史所取得的成就所以还不够理想，在有些领域里恐怕还赶不上国外汉学家的成就，在资料搜集和研究上花的功夫还不够深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重视资料工作，应是今后大力发展历史研究所必须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该文以其鲜明的倾向性为当时的学界所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共13册，600万字，至1994年全部出齐。

顾维钧，字少川，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退休后定居美国，以17年时间完成口述回忆录，记述了从事外交工作55年的经历。该回忆录的英文打字稿计11000页，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近代中外关系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刘大年推动了该书的翻译和出版，提出“顾老先生的回忆录，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珍贵的历史资料，要全文翻译，全文出版，我们一字不删，一字不改。”

天津政协翻译中心的翻译家袁东衣具体组织了翻译。该翻译中心的外文专家是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天津海关、洋行里工作过的老人，懂英文、法文、日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语种。

蒋大椿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上发表《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

文章意在阐明究竟如何在历史研究中贯彻唯物史观。作者指出，唯物史观的发现，并不能使历史学自然而然地变成科学，而只是给历史学发展成为科学提供了实际的可能性。必须在实际历史研究中，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作为指南和引线来应用，历史学才能真正地发展成为科学。在实际历史研究过程中，不仅要依据唯物史观指示的基本途径，还需结合其他各种行之有效的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唯物史观依然是当代唯一真正科学的历史观，只有它，才为历史学发展成为科学提供了实际的可能。

该文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两

个命题公开提出质疑，从而把七十年代末最早在哲学领域展开的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引入历史学领域。

刘大年在《世界历史》第 4 期发表《关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本文从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列举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的政治、经济材料，试图从理论上实践上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作者认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失败”了，被“取消”了，“过时”了，没有指导作用了，是视界等于零。马克思主义集人类思想精华之大成，在人类智慧发展史上将永远放射光辉。文章认为，中国历史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处在主导的地位，但却并非没有模糊的观念，主要表现在：历史刊物中翻案性的文章相当流行。拿中国近代史来说，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存在意见分歧，都在讨论和争论。有的研究者只注重在史料上打主意，议论是否应该“回到乾嘉”；或者说，走王国维的路，可以存在几百年。不少关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文章，主张应用自然科学中的控制论、信息论等新的科学技术来研究历史。

作者认为，阶级对立，阶级分析，是私有制存在的历史的“形式”，因此阶级分析，就始终是唯一正确的、基本的方法。全世界阶级消灭之前，马克思主义将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因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研究历史，必须以这个科学思想为指导。

《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兵器》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中国军事史》是在叶剑英的支持下从 1964 年开始编纂的。共分七卷：第一卷《兵器》，第二卷《兵略》，第三卷《兵制》，第四卷《兵法》，第五卷《兵家》，第六卷《兵垒》，另有附卷《历代战争年表》。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内容比较广泛、比较系统的军事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史料价值。

白寿彝《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 23 篇论文，主要论述了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史学遗产的整理、史书的编撰、中国史学的发展、历史学科的基本训练、史学传统、历史文献学、历史文学以及整理古籍等方面问题。

吴怀祺在《史学史研究》第 2 期发表《郑樵的史学思想》。

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入作者 1935 至 1979 年间所撰 30 篇代表性论文，按照内容分为四组：第一组是有关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及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第二组是有

关中国古代哲学与经学的研究；第三组论述了墨子的思想及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第四组是小学和训诂方面的文章。

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霍俊江在《学习与探索》第 3 期发表《数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

作者提出用数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以使历史研究严格化、科学化和精确化。

徐立亭、熊炜编《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由中华书局出版。

张金光在《中国史研究》第 2 期发表《试论秦代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

该文提出秦自商鞅变法后实行的是“普遍的真正的土地国有制”，此一见解，推翻了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开中国土地私有制之先河的成说，堪称石破天惊，在学界产生巨大影响。论者认为，此一发现改写了先秦秦汉土地制度史。

6 月

7 日　李一氓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表讲话《谈民族古籍整理和有关的几个问题》。

讲话说：讲爱国主义的时候，从历史上来讲，应该有选择，有避讳。不选择，不避讳，就会变成挑拨民族关系，使民族之间互相不和睦，这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关系，都没有好处。现在好像避讳就不行，非得讲岳飞、文天祥，一避讳好像就把这些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忠臣义士都给抹杀了。他还认为，今天我们讲爱国主义，就要讲我们曾经遭受过什么外来的军事干涉，是谁侵略了我们、奴役了我们。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美，加上沙俄、日本等国都侵略过我们。讲爱国主义，应该少利用一点宋元之间、元明之间、明清之间以及辛亥革命时期关于民族问题方面的历史题材，能够不写的就不写。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应该大写特写。

这篇讲话引起有关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问题的争论，邓广铭、李桂海、陈梧桐、翁独健等纷纷发表文章，表达了不同意见。

讲话稿刊登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 年第 4 期。

29 日　降大任在《光明日报》发表《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

文章指出，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只注意历史人物在某一事件中活动的性质，而忽略该人物一生活动的具体发展变化、矛盾及差异。否则不足以反映历史人物的全貌。要用“阶段论”来评价历史人物，即避免笼统地谈论历史人物有几分好，几分坏，而是就历史人物一生大节，根据其历史活动的不同性质，分为不同阶段，结合该人物所处的历史大势及具体时间、地点、条件，逐段去评论其功过是非。

该文发表后引起争论。邓传淳发表《评价历史人物的“阶段论”及其他》（《光明日报》1983 年 8 月 3 日）、陈其泰发表《“阶段论”不能取代从总体评价历史人物》（《光明日报》1983 年 8 月 17 日）表示不同意见，降大任发表《再谈“阶段论”》（《光明日报》1983 年 8 月 17 日）进行答辩。黄椿则发表《评价历史人物亦宜用“方面论”》（《光明日报》1983 年 8 月 24 日），提出用“方面论”来补充“阶段论”，即从纵的关系上，历史人物可能有时间阶段上的变化，需采用“阶段论”；但从横的关系上，历史人物往往具有多重性，就需要采取“方面论”，把人物各方面分解开评价。二者并用，纵横交叉，就可以把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完整地反映出来。郭卿友则发表《评价历史人物要恪守“历史条件论”》（《光明日报》1983 年 9 月 7 日），提出把人物置于历史条件下考察，将“历史条件论”与“阶段论”、“方面论”结合在一起使用。

是月　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第 3 期发表《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史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发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中的一部分。文章说：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部客观规律性，阐述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仍然是中国历史科学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当前的时代使命，也是我们在相当长时间里的根本使命。

作者提出，要重视理论思维，克服烦琐学风。认为是否重视理论思维和注意克服烦琐学风，是历史学能否实现自己时代使命的决定性关键。

仓修良、魏得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把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划分 4 个时期，即先秦至秦汉、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等，叙述史体的发展、史著的产生、史家的文学思想等，并对其社会背景如政治、经济状况、阶级、社会根源等作了一定的介绍。

广东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

论文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蒙培元在《哲学研究》第 6 期发表《论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的演变》。

7 月

1 日　尹达逝世，终年 77 岁。

7 日　契丹考古学术会议在内蒙古赤峰召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契丹考古的首次专题学术会议。

11 日　北京大学成立考古系，宿白为考古系主任，严文明、吕遵谔为副主任。

是月　南开大学历史系主办《南开史学》（半年刊）创刊。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书的编写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中国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论述了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的编著、史书的体例、历史文学、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近代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当前的任务等与史学理论有关的问题。

与葛懋春所编《历史科学概论》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该书更加重视中国传统史学。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继承的基础之上，作者对郭沫若有关中国奴隶社会的论断进行了突破和发展，在对中国奴隶社会的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书中把中国奴隶社会分为几个阶段，并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特点等判断夏是中国由氏族社会向奴隶制国家转变的过渡时期，商是中国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西周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春秋是中国奴隶社会的衰落时期，战国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至秦始皇统一中国，这种转变完成。该书出版后在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顾颉刚口述、何启君整理《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65 年冬到 1966 年春顾颉刚在北京香山疗养院疗养期间，曾为同住在疗养院的教育家何启君讲授中国历史，何氏作了详细的记录。1982 年何氏发现了历经"文革"劫难而幸存的笔记，遂据此整理成书。1992 年 7

月，何启君在整理陈年笔记时，又发现了另一个笔记本，内中有记录着1965年顾颉刚讲史的另一部分内容。后将这一部分合并到书内，于199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

本书共分12个专题，以简单明了的方式为初学者讲说了治史门径。

杨向奎《中国古代史论》由齐鲁书社出版。

收入了中国历史分期、中国土地制度等方面论文8篇。

萧艾《王国维评传》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邓广铭在《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关于开创中国历史研究和教学新局面的几个问题》。

文章对学术界出现的“回到乾嘉”的学术倾向提出批评，认为对“四人帮”的拨乱反正不能“扶得东来西又倒”，不要再发生复古守旧的右的偏向。所谓“回到乾嘉”的主张是一种很错误的主张。对待乾嘉学派，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自然更不能谈什么“回到乾嘉”，亦即倒退到二百多年以前的旧时代去。

8月

15日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在兰州举行，季羡林被选为会长，唐长孺等任副会长。

18日　首届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

会议讨论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及其代表人物评价、中国近代化进程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启蒙运动中的作用等敏感问题，肯定了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在一些观点上取得突破。

首次在我国举行的世界地区性考古会议——亚洲地区（中国）考古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23日　首届“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代表们就世界史学科建设中应抓哪些重大课题，以及怎样扶持和培养青年一代世界史工作者等问题展开讨论。代表们强调指出，加强史学理论、国外史学流派和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对推进世界史研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是月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作者最具代表性作品，被称为中国古籍善本目录的集大成之作，历经十年才编撰而成。作者早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陈垣，为陈氏弟子“河北三雄”之一。1929 年毕业后，任职于北京图书馆。1934 年受命前往德、法、英、美等各国大图书馆，访求外流中国古典文献。1939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请王氏鉴定整理该馆所藏之中国善本书籍。王氏每阅一书，即写提要一篇，共撰写 1600 余篇。同时，又将抗战之时北京图书馆存放于美国的善本书籍摄制成缩微胶卷，并同样将这部分善本书逐一撰写了提要。其成果汇集成《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二册，1957 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华盛顿出版。1947 年王氏归国，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及教授，代理北平图书馆馆长，继续撰写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提要。1975 年王氏含冤逝世后，夫人刘修业及其友人傅振伦、杨殿珣等人于 1982 年对这些提要遗稿进行编辑整理，次年以《中国善本书提要》为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书规模宏大，学术价值较高。全书共收录善本书 4200 余部，另补遗 100 种。按经、史、子、集进行分类编排，记述了各书的版刻特征、版本源流、作者情况介绍和各书研究价值等，同时对书之真伪进行考辨。因此，本书在帮助读者考查图书刊刻源流，本之原本、翻刻本、钞本、影钞本，判定精劣、决定取舍，考查作者、刻印者、校勘者之事迹等诸方面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中国善本书提要》付印后，刘修业又在家中发现王重民史部书提要手稿 7 册。所收均为北京图书馆以前寄存美国的善本书，共 770 余篇，涉及记传、编年、纪事本末、杂史、传记、政书、地理、金石、目录等 9 类。另有子部提要近 10 篇，为类书类（谱牒姓氏录）。经整理后于 1991 年 12 月以《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为名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体例与《中国善本书提要》一致，除提要外，还记述各书版刻特征、考证版本源流、介绍作者情况及各书研究价值等。

“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成立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翰笙当选为理事长。

胡绳武《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 11 篇文章，写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方面具有开拓之功。

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方志学的基本知识。

耿云志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评胡适的历史学成就及其理论和方法》。

文章在肯定了胡适在“整理国故”与“疑古”、提倡传记文学、研究禅宗史、重勘“水经注案”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后，指出其治学方法的“严重缺点”。其一，胡适的治学方法，忽视了提出假设的前提条件；其二，把“小心的求证”简单地归结为寻求例证；其三，最重要的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决不能概括整个的治学方法。胡适的治学方法只是从总结清代学者和他自己从事考据学的经验中得出的，完全没有超出形式逻辑的范围。在研究和揭示稍许复杂的历史问题时，这一方法是绝对不够用的。作者认为，正因为胡适的方法存在简单化、片面和狭隘的严重弱点，所以他在历史学领域里，只可以弄点考据之类的小玩意儿，一旦拿它去解决某种稍为重大的历史课题，就会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

孙达人在《中国史研究》第3期发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对农民史的研究》。

针对当时史学界贬低、责难农民和农民战争的观点正在取代以往对其一味拔高、颂扬的倾向，作者认为应继续坚持加强对农民史研究，反对不顾我国历史特点而鄙薄和削弱农民史研究的做法。作者认为，占我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迄今仍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必将对今后的历史进程继续打上自己的印记，发生巨大的影响。不管人们对农民持有何种观点和态度，谁想了解我国的过去和现状，谁就必须认真地研究农民的历史。

1994年，作者又在《中国史研究》第1期发表《论宏观与微观的衔接——再论加强对中国农民史的研究》。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由中华书局出版。

宋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书中主要介绍了宋朝禁兵、厢兵、乡兵、蕃兵、土兵、弓手、屯驻大兵等军种。共分十章，前五章主要介绍正规军，即北宋禁兵和南宋屯驻大兵的演变情况，以及编制、指挥系统等问题。后五章，介绍了募兵制、装备、通信、后勤、军费、军法、军政等方面。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吐蕃文献选》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首创“年谱长编”这一体裁，编纂过程历时50余年。书中除汇集谱主本人的著述和未曾公开的信札等材料外，还收集了与谱主有关的报刊及与谱主交往密切的人物的日记、年谱、来往书信等，其最具特色者为积聚了谱主与师友来往信函700余件，因此面世后受到学界特别的重视，被视为经典之作。该书采用白话文撰写，按事情发生的先后，分节叙述，每年开首载有当年发生大事和对谱生本年事迹的综述。

1936年，该书曾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为名油印50部征求意见，并被纳入中华书局出版计划。后因抗战爆发而搁置。

9月

18日　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19日　中国古都学会成立暨首次古都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举行，谭其骧、侯仁之、罗哲文当选为名誉会长，史念海当选为会长，阎崇年为秘书长。

28日　刘志琴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

这是1949年后首篇见诸报端的从宏观方面讨论文化史的文章。

作者认为，怎样看待中国文化形态是探索我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和民族文化中心内容的问题。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什么是吸收外来文化的最佳状态，这是文化史需要总结的经验。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上，尚有许多可以深究的具体法则，需要精剖细析。文化还具有阶级性、时代性、稳固性、延续性、涵摄性、类化性等独特的个性，都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命题。文化史的对象，不能局限优秀的文化遗产，良莠都有研究的价值。

黎澍在《羊城晚报》发表《共同创造一种讨论学术问题的高尚风格——在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该文主要为学术界积极评价戊戌变法及其代表人物的新探索进行辩护。针对戊戌变法以及康、梁等评价中出现的争议，作者认为，在研究工作中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新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是他山之石，当然可以起很好的作用。即使是不正确的意见，一经提出，引起注意，人们为了坚持真理，做出进

一步的更有力的论证，使它更显出它的正确，也可以起很好的作用。在人类认识的历史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正确的认识极少是一次完成的。在我们这样发展缓慢的国家，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往往经过好几代，还是停留在非常落后的情况中。有时真理和谬误互相易位，真理被认为谬误，谬误被认为真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大的原因是人们的认识为时代所限制，在条件没有改变以前，不会承认错误，接受真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一样。往往由于难以摆脱时代的局限，不能有进一步的认识。

是月　张正明在《民族研究》第5期上发表《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

作者认为，无论从血统上还是在文化上，华夏都是蛮夷戎狄共同创造的。因此从华夏族源来说，蛮夷戎狄都是构成因素。

吴泽主编《李平心史论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入李平心有关古代史、甲骨金文研究以及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论著。

吴泽主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一）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二、三集分别于1987年、1990年出版。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为李济的学生，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原书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包括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先后发表的十三篇论文，由作者自己编定。所论涉及三代考古与国家的形成、聚落形态、中国青铜时代、殷商文明起源与殷周文化关系、商周神话和青铜器饰纹、古代贸易、饮食及饮器等13个专题，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与社会，及其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和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以期达到对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的若干特征作整体性认识。其中《商王庙号新考》等是重头文章。作者在《前言》中论及治学方法时，也对中国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和美术史学各科的学者提出了率直的批评，说："有人专搞古文字，有人专搞历史，有人专搞美术，有人专搞考古。搞古文字的人还分甲骨文、金文。这样一来，中国古史搞得四分五裂……实际上，要搞通业。"

续编《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由三联书店于1990年10月出版，共收论文9篇，重点对中国青铜时代的一项重要特征，即作为巫术法器的中国古代艺术品（以青铜器为中心）对政权集中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研

究，详尽考释了中国城市的起源、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同异、巫和巫术的起源及发展等问题，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动力与因果关系方面具有开创之功。

红旗杂志社哲学历史编辑室编《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由红旗出版社出版。

收录1978年12月至1982年6月有关史学理论研究的论文32篇，对史学理论与方法中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回顾与再认识。所选文章对历史发展动力、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与让步政策、封建专制主义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及通史专史中的焦点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批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史学理论的研究水平，但受制于编选者的“正统”立场，一批探索性文章未能收录。

中国唐史研究会编《唐史研究会论文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来新夏《中国近代史述丛》由齐鲁书社出版。

辑录了作者五十年代以来研究近代史的23篇论文和11篇读书札记。

10 月

5 日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

7 日　西周史学术讨论会在陕西宝鸡和河南洛阳召开。

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西周史专题学术讨论会，着重探讨了先周文化和民族的渊源、西周政治制度、西周社会经济等问题。

12 日　我国首次回族史讨论会在银川举行。

14 日　《历史研究》杂志社、南开大学、云南大学合办的“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在昆明召开。

本次会议是1949年后史学界第一次专门研究中国封建地主阶级问题的学术会议，由《历史研究》编辑部、云南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系联合发起，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出版单位的百余名专家、教授和史学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地主阶级的产生、再生和更新，中国地主阶级的作用，中国地主阶级的结构和构成等问题。

庞朴在会上提出要将地主阶级从历来的批判对象改称为研究对象，对此一提法后有种种非议。

17日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四届年会在开封举行。

与会者认为，古籍整理不可仅仅局限于校勘、注释，新的通史、专著的撰述皆刻不容缓。

18日　都江堰兴建史学术会在四川省灌县举行。

19日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生葛剑雄、周振鹤被授予历史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历史学博士。

25日　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在桂林召开，讨论了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及今后如何深入研究农民战争史等问题。

29日　《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理论工作者要站在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列》。

31日　新华社发表题为《向精神污染作斗争》的评论员文章。

文章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就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的不信任情绪。"全国开始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运动。

是月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由齐鲁书社出版。

该书是当代学术史研究方面代表性成果。收入12篇文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多年史学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发展动力等重大理论论战进行了综述，但独缺关于历史主义问题的论战。

王毓铨《莱芜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全书共28万字，收入作者1954至1980年间所写论文十二篇，其中先秦史一篇，秦汉史四篇，明史七篇，多数都已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少数几篇是首次刊布。内容包括考证、笔记及专题研究等，多涉及我国历史上的土地、人户、等级、阶级以及封建家长制政权等问题，堪称一部自成系统的中国经济史专著。

张舜徽主编《中国人民通史》上册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三册，中册、下册1989年5月出版。

中华书局出版《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丛书开始陆

续出版。

早在1954年，中华书局就重印再版了原世界书局版《诸子集成》，这套书汇集了清代学者校勘、注释子书的重要成果，包括了从先秦到汉魏六朝诸子著作26家的28部注本或校本，广受学界欢迎。但由于所收的子书种类不够多，断句、排印方面也有不少错误，整理的深度不够，且不能反映近代以来学界整理子书的新成果，中华书局遂有志于对子书进行重新整理出版。迄80年代初，先后出版了《墨子城守各篇简注》（1958）、《庄子集释》（1961）、《晏子春秋集释》（1962）、《老子校释》（1963）、《公孙龙子形名发微》（1963）、《墨辩发微》（1964）、《列子集释》（1979）、《管子轻重篇新诠》（1979）、《潜夫论笺校正》（1979）、《抱朴子内篇校释》（1980）等。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订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新编诸子集成"被写入规划，编选工作正式启动。"新编"主要收入先秦到唐五代与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密切相关的子书，分两辑出版，首批拟目最终确定为40种。1983年10月，丛书设立后的第一种新书《四书章句集注》出版。2009年9月，第40种《吕氏春秋集释》出版。经过几代学人和出版人的共同努力，"新编诸子集成"终于全部出齐。与旧版《诸子集成》比较起来，《新编诸子集成》选目更全面更精当更丰富，校勘更周密审慎，标点更周到细致。参加点校的都是各领域中的佼佼者，如《墨子城守各篇简注》由岑仲勉整理，《列子集释》由杨伯峻整理，《老子校释》由朱谦之整理，《商君书锥指》由蒋礼鸿整理，《盐铁论校注》、《新语校注》、《颜氏家训集解》（增订本）、《文子疏义》由王利器整理，从而使该丛书代表了当代古籍整理的新水平。

郭圣铭编著《西方史学史概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在西方史学史研究上具有开拓之功，是大陆学界第一部贯通古今的西方史学通史。全书简明扼要，对上起古希腊，下迄20世纪上半期的欧美史学的发展做了比较全面的回顾，梳理了西方史学发展和演变的大致历程。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出中、下两册。

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描绘了中国古代哲学合乎逻辑的发展轨迹。作者摈弃哲学史研究中僵化的"唯物唯心"二分模式，把重点放在了考察哲学基本问题在不同时期的特殊表现上，着力透过历史上哲学体系

的嬗递来揭示哲学发展的规律性。书中把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看作两个大圆圈（螺旋向上发展的过程）：先秦为第一个大圆圈，由荀子作了总结；秦汉至鸦片战争以前为第二个大圆圈，由王夫之作了总结。每一个大圆圈中又有许多小圆圈。作者化用逻辑和历史两种方法，深刻阐述了中国古代每一哲学体系的兴衰沉浮，对它们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进行了细致的解剖。在对哲学家的研究上，作者没有采取列传写法，而是把笔墨放在每个哲学家的理论主张上，突出其不同特色。

该书在一些观点上形成了突破，如重新提出了哲学史的定义，对在我国影响深久的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片面性进行了匡正。

《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辑论文45篇。包括总论、方法论、世界史、中国史等。

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分上下两册，较为全面地涵盖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的基本史料。

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通俗读物，论述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中国近代前八十年的历史。全书改变了千篇一律的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十大事件各自分立的叙事格局，而是采用“纪事本末体”，依历史发展的顺序将全书内容分列为33个专题，较为系统地叙述了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程，并突出了中国人民为了挽救祖国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每题可独立成篇，又互相衔接，浑然一体。尤其对上海地区发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都做了重点评述和反映。

韩荫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编第1、2册）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受战火累及，虽宋、辽、金、元四朝都保存了一部分党项与西夏史料，但颇为分散。该书在国内首次对党项西夏史料进行汇集整理，对于历史研究和民族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所收资料主要来自二十四史，旁及同时代人史学著作、文集和金石史料等。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云南禄丰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颌骨6件，牙齿近百枚。

11 月

3 日　中国西北史地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

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单位联合发起组织的，着重对西北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进行了讨论，并分别探讨了汉、唐、元、明、清各代民族关系的发展和演变。

5 日　刘大年在《光明日报》发表《坚持史学领域批判历史唯心论的斗争》。

文章号召史学界积极响应“清除精神污染”。文章指出，传播糟粕和唯心观点，都可以造成精神污染。历史研究中解决这个问题，要靠高举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旗帜，坚持反对历史唯心主义。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和历史观点输进中国，它的破坏性影响绝不可以低估。在历史研究中，1949 年后多次批评过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如胡适、蒋廷黻等人的某些观点，又被作为新的东西，改头换面来加以宣传，说明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缺少批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是长期的，对外开放政策是长期的，批评西方的历史唯心论，批评资产阶级思想的任务也必然是长期的，历史研究者应当勇于负起自己的责任，以党中央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号召为新的起点，把历史学领域批评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不懈地、长期地进行下去。

7 日　纪念明代科学家徐光启逝世三百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

16 日　明代经济史讨论会在无锡市举行。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南开大学历史系、南京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着重讨论了明代江南经济中的市镇问题和官田的性质问题。

19 日　“中国思想史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

20 日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长沙举行学术讨论会。

讨论如何编写党史人物传记，如何调查研究、考证核实史料，以及如何写好党史人物形象等问题。

是月　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根据 1957 年版《北洋军阀史略》重新改写扩充而成，书末附有《大事年表》和《北洋军阀人物小志》。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两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收编从马克思主义产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余年的文献史料二千四百多件。

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由齐鲁书社出版。

该书由陈梦家校订编次，收录论著四篇。作者从研究铜器铭文出发，充分利用金石资料，广泛征引文献古籍，考察了商周时代山东的姜姓国族莱国、纪国、淳于国和姒姓国族杞国、娄国、诸国，以及与薛同祖的邳国，对这些古国的兴起、变迁、衰亡，以及它们的历史地理、社会制度，进行了考证。

黎澍因心脏病突发住院抢救。

据丁守和《科学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事业——忆黎澍的学术生涯》回忆："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开始后，黎澍关于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等观点被指为'精神污染'，遭到某些人的指责和非难。身体不适便与此有关。"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经学史研究名著，辑录了周氏半个多世纪发表的研究中国经学史的主要论著，收专著和论文33篇，主要有《经今古文学》、《纬书与经今古文学》、《朱熹》、《群经概论》、《孔子》、《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等，所论多在学术界产生过重大影响。

增订本199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胡绳武、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黄韦《方志论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2月

24日　方国瑜逝世，终年80岁。

是月　包遵信、金观涛主编《走向未来》丛书开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原计划出版100部，至1988年共出版五批74部。所选书目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含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与历史学有关的包括金观涛著《在历史的表象背后》，金观涛、唐若昕著《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萧功秦著《儒家文化的困境》，约瑟夫·阿·勒文森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科瓦尔琴科主编《计量历史学》，刘昶著《人心中的

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等。

该丛书定位为启蒙性、思想性的丛书，推出后因思想新锐对社会形成了巨大冲击，在青年中、特别是在各大学受到热烈欢迎，第一批共印 160 万册很快售罄。众多报纸、电台、电视台对该丛书作了介绍，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

《走向未来》丛书的作者集中了 80 年代一大批富有新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成为整个 80 年代影响最大的一套丛书。金观涛 2010 年 7 月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说：《走向未来》丛书"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把一代青年学子从过去对世界和历史的单线条的公式化说教中解放了出来。改革开放以来，这套丛书可以说在文化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事件"。

金观涛、刘青峰《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对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作者所著《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的缩写本，被列入"走向未来丛书"先期出版。10 余万字，共分六章，所列论题包括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调节功能丧失：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大动乱与社会崩溃；奇特的修复机制；周期性动乱与停滞性：超稳定系统；干扰、冲击与亚稳结构。

该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广泛流传于知识阶层。

武新立编著《明清稀见史籍叙录》由金陵书画社出版。

共收明清稀见史籍 137 种。其中有明人著作 71 种，明末清初人著作 17 种，清人著作 49 种，内有刻本书 61 种，抄本书 43 种，稿本书 26 种，其他版本书 7 种。有些著作是孤本。辑入本书的史籍均注明藏书单位，未注的均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书中对所收书籍的版本、作者情况、篇目内容和史料都有介绍，并摘录一些重要的资料，间有评论和考证。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1 辑上册）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之巨著，完整地展示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脉络。共四辑七册，五百余万字，至 1992 年底出齐。所收史料上起 1862 年京师同文馆的成立，下迄壬戌学制公布止。第 1 辑（上下册）收录近代学制建立前的学制资料；第 2 辑（上下册）收录清末学制资料；第 3 辑（上下册）收录民国初年学制资料；第 4 辑收录近代教会学校资料。凡外国语

学堂、军事技术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洋务派兴办的学校资料，改革科举、改书院为新式学堂的资料、新旧两派之间围绕科举与学校、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之争的资料，清末大、中、小学堂学制沿革以及实业学堂、医学、体育、美术等专门学堂、师范学堂、女子学堂的沿革史料，民国初年的学制变革及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演变资料，外国教会兴办教育以及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的资料，皆悉数网罗。所选资料以原始资料为主，主要来源于正史、奏折、法令、规章等档案、地方志等，还有少量具参考价值的当事人的传述、杂记和后人的专著、论文等。依内容分编、分节，依年代先后、文体异同排列。该书发掘出相当多首次得以发表的资料，如上海格致学院、湖南实务学堂、北京通艺学堂等，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发表后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

刘茂林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毛泽东与中国历史学》。

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由中州书画社出版。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江应樑《傣族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作者是国内傣族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书中在全面运用汉文、傣文文献资料以及作者本人及20世纪50年代全国民族大调查的调查成果基础上，跨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傣族的族属渊源、分布地域、历史发展、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如民族史研究的理论指导，族别史研究的框架体系等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在研究中结合人类学和民族学、借用人类学以弥补汉文文献不足的方法开辟了民族史研究的新范式。

温少峰、袁庭栋编著《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本书对殷墟卜辞中所反映的殷代科学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内容涉及天文学、历法、气象学、农学、畜牧业、交通运输、医学、手工业等多个方面。

是年

全国整理出版古籍280多种，重版古籍161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古籍最多的一年。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主办、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学刊》创刊。

该刊不定期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权威性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专业刊物。因经费问题，出版5辑后停刊。

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

该中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开放性研究机构，翁独健担任第一任主任。

辽宁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牛河梁村发现红山文化时代的“女神庙”遗址、祭坛和积石冢群。

出土了大量距今约五六千年的泥塑女性人像残块和彩绘墙壁构件，以及泥塑禽兽残块和祭祀器具残块。其中一尊较为完整的彩塑女性头像与人体比例接近。

1984 年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创刊。
※ 周谷城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开始编选并陆续出版。
※《历史研究》编辑部颁授第一届优秀论文奖。
※“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
※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开始出版。
※ 黎澍发表《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引发巨大争议。
※ 第一届史学理论讨论会在武汉召开。

1 月

3 日　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在北京成立，周谷城为会长。

16 日　孙中山研究会成立。

胡绳任会长，刘大年任副会长，金冲及任秘书长。

是月　《文史哲》第 1 期发表一组“文化史研究笔谈”。

这组笔谈包括庞朴《需要注意文化史的研究》、蔡尚思《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胡道静《加强和推广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祝明《中国文化史与世界文化史》。参加笔谈的几位学者都要求改变新中国成立后把历史研究等同于经济史、政治史的做法，大力加强文化史研究。这组笔谈的发表，被认为是学术界“文化热”兴起的标志。

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罗尔纲《湘军兵制》由中华书局出版。

王承礼《渤海简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文物总店编《山东秦汉碑刻》由齐鲁书社出版。

王宏道、王承权、李近春编《纳西族简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纳西族历史发展的著作，是在五十年代对纳西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 由齐鲁书社出版。

下册 1985 年 6 月出版。

本书分为三编，分别是中央官制、地方官制以及官吏的选用、考课和其他各项制度。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秦汉职官制度及其演变脉络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对其中的重要问题做了深入分析，是一部比较详尽地论述秦汉官制的专著。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分三册，百余万字，共著录云南史料 800 余目，自汉代至清代记载云南史事之书数千种，有关云南的基本史料搜求殆尽，被誉为“云南史料搜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由齐鲁书社出版。

除农民战争史外，作者治学第二个重点是中国土地制度史，在这方面自成一家。该书仅十二万字，分《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和《中国土地制度史论稿》两部分，论述了从奴隶社会下迄明代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前者集中体现了作者在这一领域的创见，是作者用力最深的著作之一，也是整个土地制度史研究领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后者则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土地制度进行了分析，包括三代井田制度、两汉土地制度、曹魏屯田和西晋占田、北朝隋唐均田制度、两宋的土地关系和赋役制度等。该书对于土地制度史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认为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有一个从浅化到深化的历程，超越种种历史表象和重重成说，结合中国实际和具体史料，对这个从浅化到深化的迢迢历程，用简明、清晰、明白、扼要而又逻辑严密的语言揭示出来。

作者在自序中交代了本书的逻辑思路：理论就是围绕着马克思的启示，从人们财产私有制不断深化、纯粹化，而人们古老共同体和国家权力又不断阻止这种深化、纯粹化的矛盾角度，去一层层认识问题，一层层分析问题。

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 1918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非洲史专著。作者于 1958 年开始写作

《非洲史纲要》一书，1964 年初稿脱稿。征求意见后，于 1965 年开始修改，1966 年夏因“文革”而停止，原稿散失。1971—1973 年，作者在幸存下来的几包抄稿的基础上抱病继续增补和修改，直到 1973 年逝世为止。1978 年后，北京大学历史系组织力量对书稿进行补订和修改，更书名为《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一九一八年》，使这部专著终于问世。共分三编：一、非洲古代史；二、西方殖民列强对非洲的侵略与掠夺；三、非洲各国近代史。全书扼要叙述了非洲自古代到 1918 年的历史发展，探讨了非洲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

白钢编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对 20 世纪 30 年代至 80 年代初期史学界围绕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问题展开的论战进行了系统的学术史回顾，作者按历史顺序将这一持续长达五十年的争论划分为四个时段，并对每一时段的特点进行了评述，对有代表性的各家意见作了具体介绍，使读者对这一争论的由来与发展的脉络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书后附有关于这一问题论著的索引。

张继平、胡德坤等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较为系统、全面地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发展到结束的历史全程，尤其是突出反映了中国抗日战争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2 月

1 日　邓广铭、张希清在《光明日报》发表《论历史唯物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

该文对李一氓在 1983 年 6 月 7 日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了商榷，文章指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对所有重大历史事实，只应在给予如实阐述的同时，做出正确的分析，却决不应当割断历史，对于重大史实，特别是对于历史上的一些应予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东西，决不应加以删除或“避讳”。

是月　蔡尚思《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文化人立身治学经验》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林耀华、庄孔韶《父系家族公社形态研究》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舜徽主编《中国史学名著题解》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该书介绍了中国史学名著200余种。按古史类、编年类、纪传类、纪事本末类、实录类、制度史类、学术史类、纪传类（传记）、地理方志类、杂史类、史评史论类、史考类、金石甲骨考证类、历史研究法类、笔记类、类书丛书类、文编类、书目类、表谱类、索引辞典类等20类。各类下史籍按年代先后顺序编排，对史籍内容的介绍较为客观、详尽。

陈守实《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借鉴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具体实际，对“秦以前”、“秦汉间”、“汉中期以后”、“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明清”等六个时期的土地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

徐中舒主编《殷周金文集录》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了1949至1980年底国内出版的书刊中已著录的殷周有铭铜器及部分未著录的有铭铜器共973件，其中绝大多数为新出土的文物。铭文与已收录的相同，或拓本影印不清、无法描摹的不录。在描摹时尽量选用原拓或清晰的影印件。凡有可疑之处均经慎重讨论研究，多次校勘，力求忠于原件。

杨生茂编《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收美国边疆学派创始人特纳原著7篇和6篇外国历史学家论特纳及其学说的文章。其中包括著名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编者在代前言《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和区域说》中对美国历史编纂学不同时期的方法、观念、理论及发展趋势进行了论述。

此书的出版对于国内史学界研究美国现代史学潮流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由中华书局出版。

黎澍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要求》。

文章指出，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实践，很少人做过研究，给人以清楚的概念。作者在这方面做了探讨。此文首次提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不是发现规律，而是探求历史真实，认为对历史真实的考求，“是历史科学的基础工作。不做好这个工作，对历史的考察将不可能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

文章对占有资料给予特殊强调，指出历史研究不能按照预先设想的公式剪裁历史资料，以适应某种主观需要，而是要充分占有资料，完全从事

实出发。此文的发表被认为是为“为历史而历史”、“回到乾嘉去”的思潮进行辩护。

吴于廑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

本文的基本观点与《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相衔接，主要论述十五、十六世纪发轫于亚欧大陆农耕世界西端由农本而重商的变化，且这一变化导致世界各民族、各地区之间闭塞状态的空前突破，“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的历史”。作者认为这一历史变化是农耕世界转向工业世界的开始，重商主义是工业世界出现于历史的前奏。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亚欧大陆东西方封建农本经济作了带全局意义的考察，着重分析了西方封建农本经济的特点；第二部分分析了商业和城市在西方封建农本经济中的地位，并由此说明西欧之所以发生由农本而重商的变化，起因在于封建农本经济的内部；第三部分说明重商主义在突破封建农本经济闭塞状态中的历史作用及其与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主义之间的历史连续性，肯定了重商主义有利于工业的发展，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在历史上的出现。

3月

28日　李桂海在《光明日报》发表《讲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不应有“避讳”》。

该文不同意李一氓有关历史研究中爱国主义的观点，认为我国历史上，凡是几个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且处于互相对抗的时期，一般说来对立的双方都可以产生爱国主义的英雄。岳飞和文天祥是汉族的爱国主义英雄，与之对立的金和元也可以产生女真族和蒙古族的爱国主义英雄。不管是哪一个民族的爱国主义英雄，现在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族遗产，成为鼓舞我们反对外来侵略、保卫国家和民族独立的共同精神财富，所以根本没有必要进行“避讳”了。

是月　陈高华编《宋辽金画家史料》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由中华书局出版。

吴怀祺在《史学史研究》第1期发表《陈垣先生在历史文献学上的贡献》。

田昌五、居建文《历史学概论》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 7 章、16 节。各章的题目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学的过去与现状》、《研究历史必备的资料和工具》。

该书尤重阐述宏观的理论和方法，如历史唯物主义一些基本原理等，但对微观的理论与方法重视不够，如对史料的论述稍显薄弱。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创刊。

该刊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和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共同主办，是全国第一家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专门刊物，主要由朱维铮负责编辑工作。该刊只出版五期，但影响巨大，是“文化热”中最具声望的刊物。

第一辑发表的文章有周谷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意见和希望》、楼宇烈《开展对中国文化总体上的综合研究》、杨宽《如何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蔡尚思《论中国文化的几个重大问题》、冯友兰《对于中国文化前途的展望》等。

岑家梧《中国原始社会史稿》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作者综合利用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史料来阐明中国原始社会的发生、发展和解体过程。共六章，第一章总括论述了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其余各章叙述了从原始人群到氏族制、母系氏族制的发展、父系氏族制及原始公社的解体、原始社会的文化等问题。作者仅写出四章，后两章《原始社会文化》和《小结》由冯来仪撰写。

梁友尧、谢宝耿编写《中国史问题讨论及其观点》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书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作者将 1976 年10 月粉碎“四人帮”至1980 年 12 月期间全国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史研究的论文、综述和报道，按史学理论的若干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的若干问题、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古代史的若干问题、中国近代史的若干问题、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6 大类 75 个专题予以整理，介绍了这些讨论中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

刘祚昌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上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下册 1984 年 10 月出版。

本书是教育部委托山东大学、山东师大等高等院校历史系编写的大专院校教材。上册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至美国内战，下册从日本明治维新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全书按内容分大致包括七个方面：（一）17 世纪英国革

命、北美独立战争、18世纪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欧洲革命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二）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进行；（三）近代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四）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五）近代国际关系；（六）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七）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全书以较丰富的史料论述了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主要历史人物。

舒焚《辽史稿》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宏钧、刘如仲《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由中华书局出版。

20世纪70年代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吴泽即开始主持收集整理王国维的文献资料，为编纂《王国维全集》做准备。该书即是这一工作的一部分。共收王氏1916年到1927年间的书信500余封。这些书信是其学术活动最为活跃的10年间写下的，反映了其在甲骨文、敦煌学等当时最前沿学科的探索轨迹，为王国维研究提供了极为难能可贵的资料。

该书出版后，《王国维全集》整理工作即陷于停滞。1996年，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重启这一编纂工作，并且得到了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长王元化的大力支持。2010年6月，《王国维全集》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和广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共20卷、844万字，收录了目前所见的王国维的全部著作、译作、书信日记、诗文题跋和古籍校注等，内容比字数最多的《王国维先生全集》约多一倍。不但收录了很多未刊稿，还根据新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对已刊著述作了订补。傅璇琮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编者在慎选底本、剔除其他人著述、点校准确等方面都做得较好；而每种著作前的题解类似我国古代提要目录，介绍版本源流和价值所在，对读者帮助很大。

4月

25日 《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北京举行茶话会，庆祝创刊三十周年，并向第一届优秀论文作者授奖。

获奖论文从《历史研究》1980至1983年发表的360篇论文中选出，共有15篇论文获得了这一荣誉，获奖论文的作者分别是（按姓氏笔画为

序）马克垚、方行、叶晓青（女）、乔幼梅（女）、刘祚昌、许凌云、汪敬虞、张国刚、陈旭麓、陈兼、罗荣渠、高敏、唐宝林、章开沅、程涛平。此次论文评选是对改革开放最初几年间历史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阅，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是月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在书中更加系统地论述了“超稳定系统”的观点。全书约 25 万字，分为十章，包括：一个古老的难题；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无组织力量及社会结构的老化；变法与动乱；中国封建王朝的修复机制；历史的奇观：超稳定系统；魏晋南北朝亚稳态结构及其他；意识形态结构的系统分析；社会结构与文明演化；数学模型和王朝寿命研究。书前有包遵信所写序言《史学领域的新探索》。在金、刘两位作者看来，用控制论关于稳态结构的理论来剖析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除了在其结构形态上有长期停滞的特点外，恰好还有另一种不能忽略的重大历史现象——封建王朝的周期性更替。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和周期性改朝换代两个重大历史现象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部具有特殊的调节机制，使它每隔两三百年就发生一次周期性的崩溃（即振荡），消灭或压抑不稳定因素并恢复旧结构。正是这种特殊的调节机制，保持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延续状态，使之呈现出社会结构的巨大稳定性。换句话说，中国封建制度是不能仅仅靠每个封建王朝长期延续而静态的继承下来，而必须通过周期性的动乱和复苏一代一代地保存下来的。

贾兰坡、黄慰文《周口店发掘记》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继裴文中 1934 年发表的《周口店洞穴采掘记》之后又一部全面介绍北京人遗址周口店发掘史的著作。作者贾兰坡是周口店发掘的亲历者和主持者，在书中透露了许多为人所未知的周口店发掘工作的细节。书中使用了大量未曾发表过的档案资料，还发表了大批珍贵历史照片，因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书日文版由外文出版社和日本经济新闻社在日本合作出版，书名为《北京原人匆匆来去》。

该书对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研究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周国兴、张兴永主编《元谋人——云南元谋古人类古文化图文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汇集了有关元谋人化石、元谋人文化、元谋盆地的地层与第四纪冰期、元谋早更新世哺乳动物群及元谋盆地的细石器和新石器遗址研究等

方面的论文十六篇。有图版81幅，彩色图版16页，黑白图版16页。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华南师范大学在广州召开纪念列宁逝世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主要讨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下卷1987年5月出版。

该书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全面、系统阐述“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历史的专著，1980年开始编纂，历时6载，1985年底始得完成。全书共130万余字，始于北宋，迄于清初，详细论述了主要的理学思潮、重要理学派别、理学家及其理学思想，着重探讨了理学产生的历史原因，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理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等问题，揭示了理学与其他学术思想的不同的特色，总结了宋明理学史的发展方向及其规律，也揭示了思想史与社会史之间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出版后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

刘大年在《哲学研究》第4期发表《异化与历史动力问题》。

该文旨在清除史学研究领域的“精神污染”。文章说：用人性、人的异化解释历史，就像神学史观中用善和恶解释历史，儒家学说中用君子小人解释历史一样，没有、也不可能说明任何问题。

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记述原始社会史的专著。书中综合运用了汉族、各少数民族资料以及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系统阐述了原始社会发展的规律，勾画出原始时代各个阶段的社会面貌。

谢本书等著《护国运动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彭明《五四运动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以生动的笔触对五四运动的爆发及其全过程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描绘，书中将五四前后的启蒙运动、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与五四综合起来考量，从而有机地把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结合起来进行论述，有力地说明了五四运动既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又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书中不仅采用了大量报刊、档案、文献资料和回忆录以为论据，还使用了五四运动参加者的口述史料，以及国外及港台出版的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资料，

如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等。

朱维铮在《复旦学报》第 4 期发表《中国文化史研究散论》。

作者认为，以整体为考察对象的中国文化史，至少有这样几点要求：一是要发现各种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的规律。二是一经发现支配性的规律，就必须详密研究它在历史过程中的诸般表现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三是要在论证过程中，决不能从观念到观念，使文化史变成观念形态的自我发展史。四是对于文化史的一般规律，也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去看待。在历史上，每个时期每个地域的文化都有其特有的规律，它们决定了不同的文化形态的面貌，也决定了不同的文化阶段的特性。这就需要从整体上研究中国文化史的时候，决不可以偏离实事求是的原则。

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利用甲骨文、金文和古文献资料，对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井田制的形成、形式、土地分配关系、有关制度的变化和解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考察。书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通过对中国国家的形式、商周奴隶制的特征、商周公社问题、商周井田制度、“籍田”即“国”中“公田”、商周阶级关系、西周的国野问题、贡助彻赋税问题、宗法礼乐制度、库序制度以及周代外朝制度和诸子思想等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论析了中国奴隶制的发生、发展对古代社会结构及其性质变化所起的作用。

该书被称为我国断代土地制度史和具体田制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分七篇，全面总结了三十多年来西周甲骨的发现和研究，对人们所关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论述。作者为已发现的全部有字西周甲骨和前人考释作了文字索引和目录，大大方便了研究和检索。

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作者研究敦煌文献的主要成果，辑录了作者 1935—1963 年间所撰有关敦煌遗书的论文二十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通论和序、跋等文章，下编是专题或单篇作品研究论文。所收论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多系敦煌学研究传世之作。周一良为本书作序，指出作者的敦煌研究工作是高水平的，“在今后若干年里，他的研究成果将始终是可信赖的”。

姜亮夫《古文字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四章，对汉字字形源流、汉字结构的基本精神、汉字结构分析、古代字书及检字法进行了论述。

薛虹编《中国方志学概论》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兴亚《李自成起义史事研究》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5月

5日 “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

这是1949年以后大陆地区召开的第一次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

6日 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沈阳召开。

15日 当代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学术讨论会暨中国拉丁美洲学会成立大会在烟台召开。

是月 夏鼐主编《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考古学经典著作。书中综合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多年间全国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成果，分别对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商代、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至明代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能够使读者对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有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编《尚钺史学论文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录作者在史学理论、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方面的代表性论文。

张舜徽主编《中国史学家传》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介绍了中国古代直到现代的历史学家如司马迁、班固、刘知几、司马光、李焘、钱大昕、章学诚、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范文澜、顾颉刚等91名著名史家的生平、学术贡献及治学方法。

姜秉正编《研究太平天国史著述综目》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1853—1981年128年间国内外有关太平天国的报道、资料、论文、著作共5000多篇（本），著作者2262人。分中文（包括港台）西文（英、法、德等）、俄文、日文四部分。中、外文均分下列类目：甲、全史；乙、人物评传；丙、文物；丁、史料；戊、学术思想及书志学；己、附录（收有关太平天国史之文艺作品）。每目著录编号、篇名或书名、作者、出版处、出版时间，并对其中相当数量的专著、论文和部分资料作了提要或注释。该书资料收录丰富，是研究太平天国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北洋政府时期政治机构的专著。

杜廼松编著《中国古代青铜器简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纹饰》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书中共收夏代至战国1006幅青铜器纹饰墨拓本，所收纹饰以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为主，间收其他有断代价值的纹饰。按纹饰的基本特征分为十类，以器物的时代先后为序，每类纹饰均有简要说明，说明各类纹饰的结构特征。书前有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一文，论述了商周青铜器纹饰在学术上的重要价值，并对纹饰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分类标准、演变过程、艺术功能，以及纹饰的社会学和宗教学的意义进行了深入阐述。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6 月

10 日　纪念清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赵翼逝世一百七十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常州举行。

是月　庞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阴阳五行探源》。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由中华书局出版。

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录作者1936—1983年间发表的中外关系史论文24篇，主要论述了海外交通史、中外友好交流的发生及发展、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13世纪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关系、16世纪到19世纪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中国沿海居民和东南亚华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英外交关系与贸易关系等，是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著作。

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未走从伦理、政治、哲学角度来研究儒学之老路，而是独辟蹊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研究儒学，从辩证法角度来研究和清理儒家思想。书中提出了“儒家辩证法”这一命题，并着重阐述了从孔子到荀子的儒家学说里的辩证法思想。作者认为，儒家的政治学和伦理学范畴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求和谐于对立是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仁义、礼乐、忠恕、圣智这些儒学主要范畴中渗透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儒家在运用上述

范畴以确定自己对待事物的态度时，还有一个更一般的原则，即中庸。既承认对立且又尚中，这样儒家就有了自己的辩证逻辑，即三分法。作者认为中庸和三分法也是儒家辩证法的重要内容，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收入作者从20世纪40年代到1983年的论著23篇，内容包括“调查和发掘报告”、“考古类型学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和“考古事业建设”三部分。关于从田野考古实践中总结出的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自孕育到形成过程的论述是本书重点。

该书是第一本研究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论文集，为海内外所广泛引用，在考古界影响巨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编《清史论文索引》由中华书局出版。

梁寒冰、魏宏运编《中国现代史大事记》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综述东周（包括春秋、战国）和秦代考古研究成果的专著，作者将这一时期的大量文物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提出了不少新见解。

该书英文版由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审译，列入耶鲁大学出版社《中国早期文明丛书》。日文版于1987年由研文出版社出版。

钱剑夫《秦代赋役制度考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系统考述了秦汉两代的赋役种类，诸如土地税（田租）、人头税（田钱、算赋）、商业税（市租、缗算）、其他赋税和更卒徭役等的起源、演变及实施情况。

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上）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收录了吴泽、桂遵义、李润苍、汤志钧、袁英光、夏东元、胡逢祥、盛邦和等所撰写的近代史学史论文20篇。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理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考察了上至远古下到鸦片战争中国古代自然地理知识的发展过

程，论述了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特点，对中国古代地形、气候、陆地水文、生物地理、土壤地理、海洋地理、测量与制图、方志的发展概况与地理价值、边疆与域外地理的考察研究等作了详细介绍。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由作者在美国三所大学的讲演稿整理而成，包括九篇文章，内容涉及对汉代都城长安和雒阳的研究，以及对汉代农业、手工业和墓葬的研究，反映了作者对汉代考古学的一些发现。

章开沅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该文提出中国近代史线索"民族运动说"。在作者看来，"四个阶梯"说"片面强调或不适当地夸大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很难纳入"洋务——维新——革命"这样简单的框架之中，而"三次革命高潮"说也不妥帖，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能算作革命，而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的重要组部分"。他提出按"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三次民族运动的高峰来构筑中国近代史的体系。

马长寿《氐与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周伟洲整理，分别考察了氐、羌两族的起源、分布、迁徙，以及他们所建立的地方政权同汉族的关系等情况，并对两族在中国历史上所居的地位予以评述。同时对一些旧说予以纠谬。

王思治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1卷）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为大型人物传记系列著作，分上下两编，上编记鸦片战争以前清代人物，下编记鸦片战争以后清代人物，两编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负责组织撰写，采用分卷主编负责制，邀请专家撰稿。上编各卷主编有王思治、何龄修、张捷夫等，下编有戴逸、林言椒、林增平等。计划各编出15卷，全书30卷，共收录人物传记2000个，上下编分别由中华书局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刊行。上编至2001年出版10卷，下编至1994年出版10卷。是书立传对象，比清代官修传记和《清史稿》编写传记范围要大，除选录王室、大臣、名人、学者之外，对民族、宗教、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科学技术、中外关系、金融工商、女性各个领域人士也多加关注。行文以叙事为主，铺陈大量原始资料，甚少议论。每篇文字有划一的规范，依所录取的人物重要性区分为五类，定出篇幅限制：特长类，万字左右；甲类，7000字左右；乙类，5000字左右；丙类，3000字左右；丁类，一般500字左右。主要事迹表现在同

一事件中的各个历史人物，以合传处理。

祁龙威在《扬州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唯物主义的动力论是鉴定近代史研究中两种“翻案”的准则》。

文章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些“翻案”观点，例如“农民战争破坏论”，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翻案”观点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理论上的倒退！有人主张以抽象的“学西方”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脉络，不从两个基本矛盾看问题，要求突破毛泽东同志所启示的“两个过程”而另建中国近代经济、文化史的体系；有的还贬低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运动，要求把对外卖国、对内镇压人民的李鸿章挤进救中国先进人物的行列。这一切都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动力问题原理的，所以也都是不正确的。

罗尔纲《绿营兵志》由中华书局出版。

洪焕椿编著《浙江方志考》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博泉《金史简编》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朱活《古钱新探》由齐鲁书社出版。

7月

17日　于省吾逝世，终年89岁。

是月　张海鹏编著《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由长城出版社出版。

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羌族的形成及其文化”，下编为“从羌族派分的民族”。该书创见迭出，立论新颖，如认为青藏高原顶部是古人类诞生地和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盐与族群兴起有密切关系等看法，多为学界所重视。作者综合利用历史、地理、民族学及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将羌族的发展演变置于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形成、演化的大背景下来分析考察，对羌族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及其繁衍进化的进程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首次对历史上的和现代的羌系民族（族群）的源流全面地进行了梳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考古大事记》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本书记录了楚文化主要的发现和发掘过程，所列条目，仅限于考古学

上已确立的属于楚文化系统的重要遗址、墓葬、文物和有关的重要事件。记事时间起自所见最早的历史记载，止于1982年底，兼有内容提要的作用。为便于检索，书末附有索引，分城址和遗址、墓葬、重要文物三部分。

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选录34篇文章，大都是对近代社会变迁和人才消长的思辨之作。其中有涉及全局的综论，有个别事件的考索，有人物思想的分析，也有文献书刊的论序，不拘一体，不专一方。

汪熙在《读〈近代史思辨录〉》中认为，本书最大的特点，是驳陈说、立己见，勇于探颐索隐，敢于触及“禁区”。其中对诸如爱国与卖国、革命与改良、洋务与崇洋等问题的剖析，不落窠臼，读起来别具新意，发人深思。作者在进行历史思辨时采“事实第一，立论第二”之态度，这构成本书的第二个特色。即不是由概念推论存在，而是从存在去思辨事变的由来及其递嬗的轨迹。作者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论述和对著名历史人物的评价，都能在严格考订史实的基础上，根据事实立论。在这本集子里，有不少驳论与反驳论的记录。这些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思想演化与发展的轨迹，显示了作者在茫茫史海中探索与思辨的甘辛，也从一个侧面映照出近代史学坛上的若干思想交锋。这是本书的特点之三。文字峭拔、笔墨酣畅，是本书的又一特点。全书各篇文章在写作时间上跨度很大，但文风一贯，读来有引人入胜之乐，而无艰涩木僵之感。

邓广铭、郦家驹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缪文远《战国策考辨》由中华书局出版。

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制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对太平天国经济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圣库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土地政策、田赋与税收、资政新篇、商业政策与货币等进行了系统论述。并结合史学界对相关问题讨论的进展，进一步阐发了对《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的评价意见，所作论究较为翔实。

郝瑶甫《东北地方志考略》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8月

1日　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

会议由南开大学主办，是我国首次举办的研究抗日根据地历史的国际

性学术交流活动。

2日　首届金史及女真史学术讨论会在哈尔滨举行。

6日　魏建猷在《文汇报》发表《要重视“会党”史的研究》。

文章认为，会党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部分，研究会党的历史，有助于总结近代历史特别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与教训，有助于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本文的发表，推动了大陆史学界对会党史的研究。

世界中世纪史学术讨论会在哈尔滨举行。

会议重点讨论了编写世界通史的指导原则和打破“西欧中心论”问题，如何将中国史写进世界通史以及世界史分期等也是本次会议所关心的问题。

8日　首届孔子法律思想讨论会在山东济南举行。

与会专家学者讨论了“孔子法律思想的核心”、“孔子法律思想的特征”、“孔子法律思想对后世有何影响”等问题。

12日　《资治通鉴》学术讨论会在长春召开。

为纪念司马光《资治通鉴》成书九百周年（1084—1984），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吉林省史学会、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等联合举办了这次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就《资治通鉴》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主要贡献，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哲学思想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22日　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光直应邀到北京大学考古系作考古专题讲学。

所讲内容包括：1. 中国考古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2. 从世界古代史常用模式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3. 泛论考古学；4. 谈考古分类；5. 谈聚落形态考古；6. 中国三代社会的几个特征；7. 台湾考古。

31日　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在北京成立，赵朴初任会长。

是月　张守常主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由齐鲁书社出版。

本书材料是编者从100余种史籍、170余种方志中摘引的，以太平天国北伐军和北伐援军所经地区为线索，编为综记概况篇，苏北和皖北篇，河南篇，湖北篇，山西篇，直隶和北京篇，山东篇。内容包括北伐军与清军战事，北方各地人民起义，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等。

秦佩珩《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明清社会性质，明清时期的土地、农业、水利、手工业、商业、货币、物价、市镇、户口、赋役，以及建筑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论述。书中综核经济史料，征引丰富，考证精详，论证详明，时有见地。尤其是有关五台山显通寺铜殿建置、武当紫霄宫及所领道观建筑的论述，更是道他人所未道，为学界所称誉。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开始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

该书是考古学界和古文字学界酝酿已久的大型编纂项目，共 18 册，至 1994 年出全，约 100 万字。内容包括铭文、图像、释文和索引，以铭文为主体，是殷周时代有铭铜器资料的集成性汇编。年代下限断至秦统一以前，共收有铭铜器一万余件。本书以器类为纲，按照我国考古学界通常采用的殷周铜器类别编次，按照乐器、炊器、盛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其他依次排列。

是书的出版，为殷周青铜器的研究，尤其是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2006 年，中华书局又出版该书的修订增补本。

2001 年 10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黄卫文、卫奇编《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作者有代表性论文和专著节选 23 篇，主要论述了“北京人”文化的性质和时代、“北京人”的生活习惯以及华北诸旧石器文化的特点，对中国细石器文化起源和分布也有卓越的发现，是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的重要参考资料。书后附有作者部分著作目录。

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成立。

该院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中最著名的学术团体之一，由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朱伯崑等共同发起，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及台、港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一道创建的一个民间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梁漱溟任学术委员会主席，冯友兰担任名誉院长，首任院长是汤一介。该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阐扬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通过对海外文化的介绍、研究以及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1985 至 1989 年间，该院围绕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主题，开展过多种研讨和

教学活动。举办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外文化比较”、“文化与科学”、“文化与未来”等短期讲习班、进修班共20多期；1987至1989年还举办了两年制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学员达一万二千余名，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声势浩大，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书院还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化书院文库》。

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按照列传方式对先秦时期著名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及代表作进行了论述，对这一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概念、流派和社会政治思潮作了详尽的评价，所论涉及先秦的政治哲学、社会模式理论、治国的方略和政策、伦理道德、政治实施理论和政治权术理论等，勾勒出先秦政治思想演变发展的全貌。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大会和首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汇编。共收翁独健、张公理、马雍、王尧、耿世民等专家学者论文31篇，涉及佉卢、于阗、古突厥、回鹘、察合台、西夏、藏、傣、彝、东巴、契丹、女真、蒙古、八思巴、朝鲜、满、壮等文字。

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作者怀着对传主的敬重之情和对历史强烈的责任感，在大量采访调查的基础上，以客观的笔触记录下了吴晗的一生。是书甫一出版便成为畅销书，首印22000册很快一售而空，又加印了两次。是我国出版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的一部吴晗传记。

修订版增加10万字，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宁可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

该文对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以及它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将“历史科学概论”的内涵概括为六个方面，并将其区分为两个大类：以客观历史为对象的研究中的理论问题，以历史学本身为对象的研究中的理论问题。文章认为，历史科学的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并强调：“从严格意义上说，历史科学理论学科的对象，应当是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简言之，它不是直接研究历史的规律，而是研究如何探寻历史的规律，也就是研究历史认识的规律和方法。”将史学理论作为一门以历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为对象的独立学科来看待，这在当代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王震中在《中国史研究》第 3 期发表《试论我国中原地区国家形成的道路》。

杨树森《辽史简编》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9 月

20 日　甲午战争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威海举行。

本次讨论会由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及《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东北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山东省历史学会联合举办，讨论了甲午战争的历史地位，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和清廷内部战和两派之争及其性质等问题。

23 日　孔子基金会在曲阜成立，匡亚明任会长。

我国自行编译的第一部《列宁全集》（1—4 卷）出版，收入列宁 1893 至 1901 年写的著作 54 篇。

28 日　孔子思想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张岱年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张岱年指出：孔子对中国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孔子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但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积极贡献是主要的。过去封建统治者把孔子当作偶像来崇拜，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起了阻碍思想发展的消极作用。十年动乱时期，“四人帮”搞评法批儒，对孔子全盘否定，表现了他们的狂妄和无知。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研究孔子，正确评价孔子。

把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积极贡献看作历史的主要方面，以这次会议的召开为开端。

是月　北京大学考古系发掘辽宁营口县金牛山遗址，发现较完整的猿人头骨，铀系测定的年代早于 20 万年，命名为“金牛山猿人”。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作者按照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服饰的形成和演变、发展。每章都以文献和图例分述男、女的官定服饰和日常服饰，兼述历代礼仪习俗，对研究中国古代服饰有重要参考价值。

韩一德、姚维斗编《李大钊史学论集》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第一本李大钊史学述作的全面结集。编者从当年的报纸、杂志、书籍和讲义中搜集整理了李大钊写于 1919—1926 年的主要史学论著，按

文章的内容分史论和论史两部分，各以年代为序进行编排。

北京历史学会编《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四卷，200余万字，1988年出齐。全书以选收明史论著为主，兼及其他。第一卷收1931—1936年间的主要论著，第二卷收1936年—1949年间论著，第三卷收录新中国成立以后发表的论著，第四卷汇集了著者代表作《朱元璋》传1944、1956、1964年发表的3个版本以及其他各版的自序，后附《明史简述》、著者传记、著作目录编年。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主要内容为新发现的简册的考释与探讨，对汉简的专题研究与综合研究，汉简资料的辑补以及居延、敦煌汉简的发掘简报等。

10月

7日　全国商史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安阳召开。

讨论了殷商考古学及商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问题。

15日　余志森在《文汇报》发表《研究历史人物不可忽视个人特点》。

19日　首届近代中国会党问题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中国会党史研究会成立。

20日　全国非洲史学术讨论会在贵阳举行。

是月　朱维铮在《复旦学报》第5期发表《中国文化史的过去和现在》。

文章回顾了二十世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情况，认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任务在于从头开始研究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整体过程。其最大问题在于如何进行综合性研究——将分类研究的一切成果综合起来，说明它的整体过程，不仅有掌握材料的巨大困难，还面临着理论上的巨大困难。

史式《太平天国词语汇释》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收词语1600余条，依内容分为5大类：1. 方言，主要是粤语方言与客家方言；2. 宗教用语，主要是被太平天国改造了的基督教用语；3. 会党隐语，主要是被太平天国袭用的天地会隐语；4. 太平天国时代出

现新义之旧词；5. 太平天国的造字和改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八十年来史学书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1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七十六年史学书目（1900—1975）》，受到广泛欢迎。《八十年来史学书目》既是在该书基础上加以订正，并新增了 3700 条条目。全书共收录 1900—1980 年中国人著译的史学著作 12400 余种，内容包罗万象，分两编。上编分为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法、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和物质文化史、综合参考；下编分为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农民战争史、民族史、宗教史、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学术思想史、地方史和历史地理、中外关系史、史学史、史料学。书后附著者索引。

该书可使读者对 20 世纪前 80 年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黎澍在《历史研究》第 5 期发表《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文章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流行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这一提法起源于苏联哲学家普·尤金、巴·伯纳丁对《联共（布）党史》一书的引申和附会，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这句话到我国后又变成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但是在历史上劳动人民作为被剥削和被压迫者，他们总是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因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不仅用于古代、甚至用于百数年前，都是不适当的。因此，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缺乏科学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创造者思想的原意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而不是别的。

文章发表后在历史学界乃至整个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从此走向高潮。

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 16 篇论文，文中使用现存徽州府租簿、置产簿、奴婢文约等文书账册，对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土地关系或租佃关系进行了细致研究。

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由中华书局出版。

收纳作者 1957 年以来研究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主要论文 23 篇。

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军事科学院编《中国近代战争史》(第1册)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3册，近百万字，第2、3册分别于1985年2月、7月出版。

全书详尽地记录了1840年至1919年在中国发生的五十余次反侵略战争以及农民革命战争，在系统论述各次战争的起因、过程和结局的同时，着力于探讨战争成败原因，总结用兵方略及经验教训，突出了爱国军民与起义民众的斗争精神和历史贡献。

《殷都学刊》创刊。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明末农民战争的背景、起义初期明政府的对策，以及起义过程和失败前后的情况作了详细阐述。

沙文汉《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本书完成于1963年，以7万字的篇幅论证了商周两代奴隶制发展和崩溃过程。作者认为，中国奴隶制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与西方古典世界相并行的另一种形式的奴隶制度，不是发达的程度上有所区别，而是发展的形态上多有不同。

朱建华、宋春主编《中国近现代政党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傅璇琮《李德裕年谱》由齐鲁书社出版。

11月

1日　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武汉召开。

会议是根据全国历史学规划小组建议，由《世界历史》、《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江汉论坛》编辑部等单位联合发起，重点讨论了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

这是1949年后我国召开的第一次史学理论研讨会。

3日　首次全国性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在郑州举行。

会议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省社联、河南省史学会和《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联合举办，与会人员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方法，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标志着全国性的“文化热”正在升温。

5日　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魏晋南北朝史首届学术

讨论会在成都召开。

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个单位共同发起筹办，讨论的重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会议选举黄烈任会长，郑佩欣任秘书长。

13 日　由苏州大学历史系和江苏省史学会发起召开的全国首届左宗棠历史评价学术讨论会在苏州举行。

14 日　中国民族史学会在北京召开首次工作会议。

会议选出了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翁独健任理事长，还聘请白寿彝、谭其骧等三十多位专家为顾问。

22 日　新中国成立后首次“魏晋玄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是月　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本书选编了狄克罗、克罗齐、罗素、科林伍德、波普、沃尔什、伯林等历史哲学家和思想家有关历史哲学史学的 20 篇文章，概括反映了 20 世纪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主要面貌以及西方历史学家的思想深度。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系统论述了甲午战争后至二十世纪初年的维新运动的历史，对这一运动的时代背景及其产生的原因、经过和特点，维新时期的政治派别，新旧势力的斗争，维新派的思想，新政的内容以及当时的报刊、学会的情况等，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并以大量的材料对一些史实进行详细的考订，澄清了以往研究中的若干疑误失实之处。书后附有大事年表和人名索引。

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关于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的专著，书中依据大量历史资料，尤其是使用了大量外文资料，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太平天国、清王朝与西方列强三方面错综复杂交往演变的主要过程及其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突破传统看法的新见解。罗尔纲为该书写了序言。

傅乐焕《辽史丛考》由中华书局出版。

12月

11日　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中山大学举行，主要讨论了我国南方古代文化的特点。

21日　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讨论会在上海召开。

此次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发起并主办，主要讨论了如何理解文化及东西方文化的概念，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重新提出的时代特点，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等问题。会上宣布成立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由周谷城任名誉主席，王元化任主席。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在广州召开。

是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纂的《非洲通史》中译本开始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收34篇论文，选自1981年5月中国民族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提交的50余篇论文。该书围绕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什么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等问题展开论述，反映了当时国内民族关系史研究工作的现状和成果。

仓修良《章学诚和〈文史通义〉》由中华书局出版。

《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录了作者四十多年来所著艺术考古论文二十五篇，内容包括石刻艺术、壁画、乐舞百戏、中外文化交流等。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介绍了秦汉时期王国、侯国的分封，封君和关内侯的食邑，以及二十级赐爵制；详细论述了封国、食邑、赐爵三者之间区别与联系，并把它们同当时的经济制度、官僚制度、徭役制度、法律制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探讨它们的内容和发展变化。本书对西汉诸侯王和列侯的经济特权、东汉时期的封国食邑制度、汉代封君和关内侯的食邑、汉代封国食邑的性质等问题的研究，具有开拓性质。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全书依据发掘出土资料，结合传世品，对中国古代铜镜作了概要的介绍，并分析了铜镜的使用、铸造技术、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演进和变化，阐明了铜镜从齐家文化迄于元代的产生、流行、鼎盛、中衰、繁荣、衰落等发展阶段的类型和特点，同时将国内外研究中国古代铜镜的成果加以综合介绍，使读者能够了解中国古代铜镜的全貌。

张海鹏编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由地图出版社出版。

本书按照郭沫若生前规定的统一体例，为配合阅读《中国近代史稿》而编绘。收绘地图一百一十余幅，附简略文字说明，扼要地反映了 1840 年至 1919 年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内容以政治事件为主，同时也涉及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基本情况，便于读者直观地了解中国近代史。书后附中国近代史大事记、地名索引等。

1987 年出版了缩小本。

是年

林增平任湖南师范大学校长。

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吕思勉史学论著汇成总集《吕思勉史学论著》出版。

任继愈主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开始陆续分册出版。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佛教文献就作为“文化遗产抢救”重大项目列入中国科学院的计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吕澂为此曾拟出了一个《新编中华大藏经目录》。由于“文革”爆发，这个计划未能付诸实施。1982 年，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委托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任继愈主持编纂此书。历经十三年，动员了约 160 人的参与，最终于 1994 年底编纂完成，1997 年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2004 年又出版了《总目》。

全藏共收经籍 1939 种，分 106 册，它以 1149—1173 年在山西刻印、20 世纪 30 年代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的稀世孤本《赵城金藏》为基础，以历代大藏经有千字文帙号的部分为范围，对勘了包括《房山石经》在内的其他 8 种大藏经，约一亿多字。为继承和创新佛教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更原始更优秀的版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学术界对浩繁的佛教文献进行集中整理出版的一个重大成果，曾获全国古籍整理成果一等奖。

由于已出的汉文《中华大藏经》所收经籍仅限于历代大藏经有“千

字文”帙号部分，而帙号以外，以及分散海内外的藏外佛教典籍数量更多，因此，200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决定将《续编》列为“特别委托项目”，继续委托任继愈主持编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续编》在形式上与《正编》最大的不同在于完全采用标点重排，总字数约在二亿六千万字左右，是《正编》的一倍多；将收入历代大藏经中未为《正编》所收录的部分和藏外佛教相关文献。

四川省文物局主办《四川文物》创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国经济史丛书》开始陆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考古学会编辑《中国考古学年鉴》开始出版。

1985年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出版。
※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出版。
※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出版。
※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版。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开始出版。

1月

11日　傅筑夫逝世，终年83岁。

是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上、下）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收录的胡适日记包括7个部分：（1）已酉十二月十四日至庚戌二月十三日（1910年1月24日至1910年3月23日）；（2）1921年4月27日至11月14日；（3）1922年2月4日至11月23日；（4）1937年1月1日至6月21日；（5）1937年7月20日至8月2日；（6）1937年9月7日至10月19日；（7）1944年1月3日至12月31日（但全年记事仅37天）。上述日记均据手稿整理排印，日记正文除个别地方略有删节外，一般均全文照录，并酌加必要的注释。日记内粘存的书信、手稿和剪报、图片等，分别作如下处理：书信、诗作、未刊文稿或不易查到的已刊稿均予照录，其余从略；剪报除为日记所引用的以外，其余从略；所附图片亦予略去。凡略去的附件均加注说明。

本书收录的这些日记，除部分外，均系第一次发表，所涉及的内容，对于了解胡适在几个相应阶段的行迹和真实思想情况，也都十分重要，因此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编选者对若干题解性的注释文字也甚见功力，对读者有很大帮助。

吴汝康等著《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一个集体合作成果，多名作者综合运用了地层、古人类、动物化石、孢粉、岩溶洞穴、沉积环境、古土壤、年代学等多学科工具，对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自然条件和古人类文化背景进行了深入研究。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在1958年出版的朱士嘉所编《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基础上编著而成，共收录1949年之前历代方志8200余种，是反映国内各图书馆所藏方志最为完整的目录。

陈梧桐在《江汉论坛》第1期发表《如何对待涉及民族关系的爱国主义》。

针对李一氓处理历史研究中爱国主义问题的观点，作者认为，实事求是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起码要求，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是客观历史事实，不必隐讳和回避。伤害民族感情、损害民族关系的问题出现，并不在于讲到涉及民族关系的爱国主义，触及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而在于讲述时严重歪曲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实际，把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对民族矛盾和斗争作了不正确的表述，从根本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它石在《世界历史》第1期发表《阶级分析不是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

文章说："阶级分析不是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这是因为，阶级分析方法有一定的适应范围，不能用它解决一切问题；在阶级分析的适应范围内，如果仅仅运用这一方法而不用其他方法，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错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是由多种方法组成的方法论系统，阶级分析是其中一种，不是全部。"作者还阐述了阶级分析方法的适应范围，以及片面强调阶级分析的危害。

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由中华书局出版。

为作者三十年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论文结集，凡33篇，内容多为史事新论、史料考释，以及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书中对太平天国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诸多新看法，尤其对太平天国的宗教问题的探讨，开辟出太平天国研究的新领域，共有11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0—1979.9）》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邹君孟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华夏族起源考论》。

本文认为，中原以炎黄为首的集团是华夏族形成的基础，部分东夷集团是华夏族组成的重要部分，部分南方苗蛮集团是华夏族组成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关于华夏族的形成和发展，本文认为，华夏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主义产生的时期，历经奴隶社会夏、商、周三代，到战国时代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及区域性统一的形成，华夏族融合进众多的少数民族，随之汉族开始出现。及至秦汉两代汉民族形成，华夏族的历史才告结束。

张维华、孙西在《文史哲》第1期发表《十六世纪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政策的演变》。

以往学界关于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活动的论述中，很少有人谈及其传教政策改变的背景和过程，而这种背景和过程对于认识传教士随后的活动又至关重要。本文作者试图通过剖析十六世纪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政策演变的过程，力求正确说明这种传教政策演变的实质，以期对于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做出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2月

6日　陈高华、李祖德在《光明日报》发表《加强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研究》。

文章认为："建国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理论完全等同起来，甚至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外别无其他史学理论。至于历史学本身发展规律的研究，那就更加贫乏了。在史学方法论方面，经常被提到的只有阶级分析法，并以此来分析历史问题与评价历史人物。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人类阶级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但不等于说这是唯一方法。同样的历史问题，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从各种角度进行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历史的手段和工具应该是越多越好，而不应该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那种把历史研究方法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立起来，或是把方法论与史学理论完全等同起来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12日　《历史研究》编辑部邀请北京部分史学工作者座谈，讨论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学术自由。

是月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由齐鲁书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晚年代表性著述，也是其一生卷帙最多、内容最富的重要著作。全书共八卷，历时10年才告完成。第二卷1988年6月出版，第三至第八卷1994年3月出版。

该书意在对清代学术思想、哲学思想作全面总结。作者在《叙例》中言，“徐世昌主持纂辑的《清儒学案》，作为一代学术思想史料长编，功不可没。但书成众手，别择未严，且名‘学案’而案主评传殊鲜学术内容，难免‘庞杂无类’之讥。《清儒学案新编》期有：一、清代学术思想史，二、清代学术思想史料选辑的双重作用，并因以窥见清代学术思想发展渊源及流派。于案主评传部分，重在学术思想内容的分析，学术思想史料选辑，则旨在反映案主之学术、思想风貌”。

全书共立学案92个，案主107人，另附学人13名。大体人自一案，师承、家学、交游等皆随案记录，不另立门户。书中所选皆为清儒，间有跨越明清两代者，则或因其成就所在，影响所及，或因约定俗成而然。所选学者始于明末清初之孙奇逢，终于清末民初之梁启超、王国维。

为体现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各卷编次大致以时代为纲，又兼顾学派或流派。在备举清初诸大家之后，继之以理学、朴学、经学等各家各派，选取当时学术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每部“学案”由评传和学术思想史料选辑两部分组成。

据时人总结，该书在以下两处与徐世昌《清儒学案》有别：其一，从学术史观上说，徐世昌作《清儒学案》，始终贯彻着“崇儒重道”的编修意图，对从祀孔庙的理学家以及在弘道、传道和卫道方面功绩卓著的理学家均予以大力表彰，表现出鲜明的道统史观和封建复古主义倾向。杨著《清儒学案新编》则以局外人的身份和学术家的眼光审视有清一代学术，目的是客观反映清代二百余年学术演递的历史面貌。其二，《清儒学案》在观点确立和材料取舍方面有诸多失当之处，《清儒学案新编》悉加更正补充，使人于清代学术有更准确地把握。

该书是研究清代学术史重要的参考资料，《杨向奎学述》谈及此书时说：“我的书虽无统一计划，体例也不完整，但典型训诂、考据那部分和今文经学那部分，源流分明，解释清楚，可无愧于前人。”

冒怀辛、王树民、陈其泰、陈祖武、吴宏元、史念海参与了部分内容的编撰。

（美）费正清、（美）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英国《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之一种。《剑桥中国史》来自英

国剑桥大学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历史丛书”，这一丛书由阿克顿勋爵于1902年创立。1966年推出《剑桥中国史》系列，由费正清、崔瑞德任主编。这套丛书被认为反映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最高水平，作者阵容强大，每卷的主编都由该领域世界著名的专家学者领衔，各个专题也都是邀请各自领域的专家来撰写。华裔学者黄仁宇、余英时都参与过该丛书的撰写工作。

《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预计出版15卷，目前剑桥大学出版社已陆续出版了其中的12卷。从20世纪80年代引进出版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陆续翻译出版了其中的11卷。最早的中文版引进的就是《剑桥中国晚清史》，90年代后又陆续翻译出版了10卷，计有《剑桥中国秦汉史》、《剑桥中国隋唐史》、《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剑桥中国明代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基本达到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同步出版。《剑桥中国清前中期史》等也将陆续引进出版。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我国学者研究西欧封建经济的第一部专著，约31万字。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托，在参阅吸收一些西方学者和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封建主义概念以及西欧封建经济形态，如封建土地所有制、庄园、农奴、农村公社、城市等问题做了细致考察，尤其是从其经济内容及法律形式的区别与结合上，以及发展变化上，作一些新的探索，得出了一些新的论断。

该书对当时日渐兴起的中西比较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研究我国陵寝制度的专著，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中国皇帝陵的起源与变迁”，详尽论述了陵墓的起源以及战国中期至明清陵寝制度的演变过程；中编“关于古代陵寝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介绍了先秦墓上建筑、封建时代坟墓的等级制、祠堂、石祠、阙、罘罳、华表、墓碑的起源及沿革；下编“古代陵寝和陵园布局的研究”则重点介绍了秦始皇陵园和秦汉陵墓的布局结构。

该书意在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宗庙、陵寝等重要礼制变革的关系，以期更加有针对性地对历代帝王陵墓进行考古调查与研究。

黎澍《再思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收录了1977至1984年间发表的24篇文章。黎澍在前言中特地说明：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一转折使人感到有重新认识许多问题的重大必要性。在这个过程中，我发

现了我过去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了解的肤浅和错误，纠正了其中比较显著和已经有所认识的部分。编入本书的各篇反映了我个人思想上的这个变化，故谓之“再思”云。当然，再思也只能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片断。经过实际生活的检验，势必又要发现种种不足，还要三思。

季羡林主持《大唐西域记校注》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为《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之一种。《大唐西域记》是唐代高僧玄奘游学印度归国后写成的有关中亚和南亚历史地理的名著，凡 12 卷，记述了玄奘沿途所经和得自传闻的 138 个以上的国家、城邦、地区的情况。举凡山川形势、交通道路、人口物产、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寺院、佛经故事和风俗习惯等悉数记载。由于它保存了 7 世纪中亚、南亚等地区的大量珍贵史料，至今仍是研究这些地区古代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长期以来，国内少有人对其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更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点校本和注释本。而西欧和日本等国学者，却早就出版了不同版本的译注本和大量研究著作。因此整理此书，是我国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由于工程浩大，此书的整理校注从开始策划到物色学者，历时 26 年方得最后完成。整理工作最初由向达首倡，季羡林主持校释，中华书局组织联系，集中了学界治中亚、南亚历史、语言的一流专家共同工作，在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原书进行了全面的校勘和注释，提出不少新见解。书前有季羡林所作长达数万言的《前言》，对原书的成书背景、内容和学术价值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评价。

本书的出版，是近数十年来我国西域史地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为研究唐代社会史和中外交通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并被南亚诸国广泛用来弥补本国历史的空白。

张光直在《文物》第 2 期发表《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

文章从中国初期城市的若干特征出发来讨论城市在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中应如何在概念上加以处理的问题，指出中国最早的城市与西方最早的城市在很多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权的工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选编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 483 件藏档，内容主要涉及 1901 年至 1911 年武昌起义前十年间各“民变”事件的经过和清政府镇压的情况。所选档案来自军机处、宫中朱批、外务部、刑部、法部、陆军部以及

端方、赵尔巽等藏档。书中按地区划分，包括直隶、东北、内蒙古等清朝18 个省区，每地区又以时间为顺序排列。该书是研究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史乃至会党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分三部分，内容包括：关于东西文化的异同优劣的争论；关于新旧文化能否调和的争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采用何种文化、是什么道路的争论。

张蓬舟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3 月

1 日　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办《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创刊。

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主要讨论中国古代都市问题。

6 日　谢本书在《光明日报》发表《“历史人物学”浅议》。

文章提出建立“历史人物学”的建议，以便建立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体系，深入探讨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原理、方法和主要标准。

是月　陈振江、程歗编《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分上下两编，所汇义和团自身文献最为齐全，考释精炼，并以文献为线索，结合有关史乘、口碑等资料，对义和团源流、性质、口号、作用、阶级结构、思想、信仰与习俗等等有争议的问题作了较深入的论述。此书是义和团研究中被征引次数最多的著作之一，基本上反映出 80 年代义和团研究的学术水平。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最鲜明的特点是从市场、流通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书中选录了作者 1949—1983 年间所发表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论文八篇，关于我国国内市场的论文四篇，对我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富有创见的系统考察。

匡亚明《孔子评传》由齐鲁书社出版。

本书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第一部全面、公正、严肃地评价子孔子的专著，也是“五四”以后截止到当时对孔子评价最充分的评传。作者将孔子思想归结为四大特征：二重性、多面性、略于“天道”而详于“人道”、“仁”为中心，因此提出要对孔子思想实行“三分法”——凡是孔子思想中直接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特殊利益服务的东西，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并彻底和它决裂；凡孔子思想中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远见的智慧或这种智慧的萌芽的东西，都必须加以认真的批判和清理，做到“古为今用”；凡孔子思想中至今仍保有生命力而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都应予以继承和发展。所以在研究中应把握三个区别：一是把真孔子和假孔子加以区别，二是把真孔子思想本身中所含有的封建性、保守性的消极因素和人民性、民主性的积极因素加以区别，三是在积极因素中，把那些对当前建设直接有利的东西和只能做参考借鉴的东西加以区别。

书中对孔子的生平及时代的社会背景作了交代和分析，刻画了布衣孔子艰难曲折而又灿烂辉煌的一生，并重点论述了孔子仁的哲学思想、仁的伦理思想及仁的政治思想。作者用“人本哲学”一词表述孔子仁的思想，认为仁的人本哲学思想是孔子博大庞杂思想体系的总纲。该书还全面展现了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在教育方面的成就以及在文献整理方面不朽的历史功绩。作者认为，应该承认孔子及其思想，曾经是长达二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基础，孔子身上虽然带有封建主义的污泥，但他又是一个在封建社会时期所能产生的人类许多优良品质的体现者，孔子作为一位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人物，而且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

葛懋春、项观奇在《文史哲》第2期发表《浅谈历史科学概论的对象和体系》。

针对学术界关于历史科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以及体系上的分歧，作者认为，历史科学概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的任务主要是概括地从逻辑上说明历史科学是什么、怎样研究以及如何写作，可以说是“历史科学学”。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为作者读魏晋南北朝隋朝正史读书札记。共收札记346条。内容涉及魏晋南北朝隋初的史实、制度、名物、语言、籍贯、故事、书籍、姓氏、年号、人物、地名等等。书中多细密考证，杂以议论，见解卓异，虽名为札记，看似琐屑，实为一部专题性论文集，对整个魏晋南北朝史若干

重大问题均有系统论述。

裴文中、张森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对几十年来在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出土的主要石器进行了综合研究，在石器分层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猿人石器的特点、中国猿人文化的发展阶段性及其在旧石器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林庚祥在《学术月刊》第3期发表《黄帝与夏、商、周》，认为华夏族起源于一元。

作者认为，夏、商、周三代同源于黄帝，并从传世铜器和图腾，巩固的部落联盟关系以及考古文化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佟柱臣在《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发表《从考古学物质文化上观察中华民族融合的痕迹》，认为华夏族形成于战国时期。

黄冕堂《明史管见》由齐鲁书社出版。

万绳楠《文天祥传》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清泉、苏双碧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书有上中下三册，包括对春秋时期至近现代中国82位著名史学家的评介。执笔者均为各领域专家，详细介绍了各史学家的生平事迹，并从史学思想、治史态度、历史编纂学等方面，对他们的史学、史才、史识、史德分别作了评述，着重阐明各史学家及其论著在我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地位和影响，梳理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和基本轮廓。

《非洲通史》编写组编《非洲通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含古代、近代和现代三部分，共二十五章，叙述了非洲从史前至绝大多数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历史，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非洲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状况，肯定了非洲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非洲人民在世界革命运动中所做的贡献。书中对中非交往的历史也作了论述。

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此书对秦汉时期的土地、赋税和户籍等制度和地主、农民、奴隶等各个阶级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依据大量历史资料和考古新成果，对名田制、辕田制、田庄经济等问题提出了新看法。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专论集，共包括九篇论文，概述了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的中国传统思想，重点在于揭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文章分析了孔孟的仁学结构、老韩的行动辩证法、“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阴阳五行的系统论、直观把握的思维方式，“内圣”、“外王”之道和伦理学本体论等等，独创性地提出了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审美而非宗教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等重要论点，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对当时“文化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风靡一代青年！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反封建”立场上与作者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有异。

夏东元《晚清洋务运动研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学术界第一部综合性洋务运动史论集，汇编了作者1958年至1982年间发表的15篇有代表性的洋务运动史研究论文。除前言外，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代表了作者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认识，反映了作者研究洋务运动的方法和体系。第二部分是论述洋务经济活动的文章，第三部分是关于人物思想的文章。作者对洋务运动的评价自成体系，其对洋务运动的看法，既不同于肯定论者，也不同于否定论者（包括所谓“两点论”者），而是把洋务运动放在历史长河中从发展上评定它。作者认为，笼统地说洋务运动是反动的运动或进步的运动，都是欠妥和不全面的。

蒋大椿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1期发表《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

作者提出应该将史学划分为“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凡是根据当前政治和社会的需要，以实现史学社会职能为任务之历史研究及其成果，便是应用历史学；凡是根据历史科学本身的必要，不带史学以外的现实目的，而以认识历史过程为任务之历史研究及其成果，便是基础历史学。这种划分有利于历史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解决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古为今用”、“史学为现实服务”还是“为历史而历史”等问题。文章还就基础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基础历史学对社会现实的作用、应用历史学与影射史学的区别、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的共同点与不同点等，作了较详细的阐述，并提出了富有价值的看法。这是“文革”结束之初少有的几篇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史学理论文章之一。

文章发表后引起争鸣。刘文端在《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发表《试论应用史学》一文，认为应提出应用史学这一概念，并建立和完善应用史学体系。葛承雍在《未来与发展》1985年第2期发表《2000年的

中国历史学》，认为到2000年，历史科学的应用将直接进入社会，有实用价值的应用历史学科的分支将向各个方向扩展。另外一部分人则反对这种划分。李新在《中学历史》1985年第6期发表《治史方法浅谈》，认为这类想法很新鲜，真是奇谈。李侃在《人民日报》1985年8月23日发表《从读〈龙的传人〉想到的》，认为历史学本身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它的基础是历史事实、历史知识和历史的科学理论。尽管史学工作者的素质有差异，但是历史学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基本的研究对象和服务对象，则应该是相同的。因此，基础和应用应该是统一的。

4 月

1 日　第二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

这次会议是在史学界出现走向系统论思潮的背景下召开的，主题是“历史研究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会议由《中国史研究》、《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与复旦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讨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关系、历史思维的特点与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在历史研究领域运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前途等问题。会议论文集《系统论与历史科学》1987年5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20 日　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在四川成都举行。

会议着重讨论了教案的起因，反洋教斗争的性质，反洋教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和来华传教的评价，“反洋教斗争”的提法，反洋教斗争史的上限、下限和分期等问题。

是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隋唐史研究室编《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收录中国大陆、港台和日本自1900年至1981年所发表的有关隋唐五代史的论文和著作目录。按类编排，分总论、经济、政治、阶级关系和农民起义、民族、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人物、中外关系、其他10大类。因日本学者的论著数量很多，仅收录一部分。

金观涛、唐若昕《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历史学习》（双月刊）创刊。

周宝珠、陈振主编《简明宋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将阶级斗争视为认识宋代历史的主线，是国内第一部新体断代宋史。

乔伟《唐律研究》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总论，对唐律的产生和形成，唐律中的五刑、十恶、八议及各项原则做了研究。下编是分论，分别探讨了每一项犯罪的种类、本质、特点及诉讼程序的规定。

5月

3日　黎澍在《人民日报》发表《革命、批判和科学性——耿云志著〈胡适研究论稿〉序言》。

本文出发点在于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高于革命性。作者指出：前辈历史学家大概都是怀着革命的激情来研究历史的。由于革命的正义性质，对历史研究工作的科学要求往往被看作次要的事情。在他们的眼睛里，正义的事业自然是合乎科学的。所以也往往相信正义即是科学。

文章指出，学术界有一种误解，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义所在，就是批判和革命。至于说马克思的理论把高度科学性和革命性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更使我们不知不觉产生一种自信，仿佛科学性和革命性二者皆备于我，有时还把革命性提在科学性前面，表示革命性更重于科学性，而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力量来源于它的科学性。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已经同马克思本人或列宁的思想都产生了距离，而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历史的研究，又以推动现实的中国革命为目的，历史成了鼓动现实斗争的手段，科学性就被摒在更次要的地位了。我们的历史著作也动辄陷入片面性：今古不分，以今例古；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只研究革命，不研究反革命；只知己，不知彼，视为理所当然。殊不知没有科学性，单纯革命义愤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5日《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和天津师范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专题讨论会”在天津举行。

14日　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在杭州联合召开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是月　巫宝三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先秦部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两汉部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部分”、“宋金元

部分”、“明清部分”、分别于1988、1992、1996、1990年出版。

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由中华书局出版。

陈春声在《学术研究》第3期发表《统计分析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

作者认为，中国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为我们进行统计分析提供了丰厚的资料基础。正史、政书、笔记、文集、档案、方志、簿记等文献资料中保存的有关人口、土地、赋税、地租、物价、仓储、货币金融等等问题的极其大量的数据，可以直接为我们的研究所利用，尤其是大量历史资料中没有用数字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数量关系，更值得发掘和研究。

胡庆钧《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胡新生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西周春秋时期的国野制与部族国家形态》。

作者通过细致的考辨，认为西周春秋时代的国野制，是在生产较不发达、原始共同体组织仍然存在的条件下，通过部族间的征服战争而形成的。国野制下基本的统治和奴役关系，表现为国中以周人为主体的统治部族对野鄙地区族外平民的压迫和剥削。与这种社会阶级结构相适应，当时的国家机器也是沿用了部落氏族的形式和外壳，表现为部族国家形态。这是一种早期的原始的国家，是处于一般政治国家之前的序幕。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生产的发展，原始共同体逐步瓦解，个体经济形成，居民的流动杂居及贫富分化日益加剧，于是国野制最后解体。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国家也逐渐甩掉了套在它身上的部落氏族的古老框架，转变成独立性更强的、以划分郡县、募辟官僚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性国家。

《文史哲》第3期刊登一组“魏晋玄学笔谈”。

第4期连载。

参加笔谈的包括张岱年、任继愈、辛冠洁、王明、孔繁、牟世金、郑欣、许抗生、王葆玹、王晓毅、胡绍军、方立天、余敦康、金春峰、王国轩、周立升、李传明、钟肇鹏、牟钟鉴、陈战国、李申等。

6月

10日　中华孔子研究所在北京成立。

该所是我国第一个研究孔子和儒学以及传统文化的民间学术团体。周

谷城任顾问，孔德懋、冯友兰、侯外庐、董一博任名誉所长，张岱年任所长。

19日　夏鼐逝世，终年76岁。

由于夏氏在考古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和贡献，曾先后获得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外籍院士、意大利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等荣誉称号。

是月　马非百编著《秦始皇帝传》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在作者旧作《秦始皇帝集传》的基础上经大幅修订增补而成，虽以《秦始皇帝传》为名，实可视为以秦始皇为叙述中心的秦王朝专史。本书辑录史料比较丰富，除引征《史记》、《战国策》等记载秦史较多的史籍外，凡后代正史政书、方志、类书、稗官野史等记有秦事者，虽一鳞一爪，亦采录无遗。对于1949年后新发现的秦代文物中的重要文字记载，也作了摭拾。凡引用的史料有存疑之处，作者都做了细心考订，并以注释形式附在章后。

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史部书籍的来源和形成”，第二章“目录学的发展及其流派”，第三章“周秦至魏晋南北朝史学源流和重要史籍的介绍”，第四章“隋、唐、宋、元重要史籍介绍”，第五章“明清重要史籍介绍”，第六章“史料学的邻近学科：金石学和地理方志学”，第七章“史部类书、丛书、校勘、辨伪和辑佚书”，第八章“史学研究方法和工具书的使用方法”。附明清时代版本目录学概述。

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创刊。

邓蜀生《罗斯福》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被称为我国关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生平最具权威的著作。作者长期从事美国历史研究，是我国较早对罗斯福其人和“新政”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该书并没有平铺直叙传主生平事迹，而是以其总统任内为主线，分别就其事业中的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实行“新政”、与孤立主义潮流做斗争、珍珠港事件及美国参加二次大战、雅尔塔会议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等展开论述。

孙孝恩《光绪评传》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吴泽主编《史学概论》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声誉较高的史学概论教材。副主编是曹伯言、桂遵义。全书包括“绪论”、“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伟大变革”、“历史科学的基础理论”、“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国内外近现代史学流派述评”等十章。该书对史学理论学科的贡献在于首倡将史学评论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史学理论当中，并对史学评论的性质、标准、作用进行了论述。

刘大年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论历史研究的对象》。

该文是作者参加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论文。

作者坚持阶级斗争史观，认为历史上的多种现象，处处都和阶级划分、阶级对抗这个基本特征息息相关，阶级、阶级之相互间的关系，统一表现出历史上各种现象、事件、人物等的关系和联系。私有制历史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阶级状况、势力怎样，历史的基本面貌就怎样。历史的前进最后决定于社会生产力，阶级斗争是它发展的直接动力。私有制时代历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阶级、阶级斗争，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消长变迁和以此为枢纽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客观体系及其运动。

高放、高敬增《普列汉诺夫评传》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7 月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参事室主办《文史杂志》（季刊）创刊。

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历史大观园》（月刊）创刊。

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由齐鲁书社出版。

本书是作者中国古史研究的力作。1932 年，山东滕县安上村出土一批春秋时郳国彝器。王氏就郳器铭文考证三郳氏族，认定郳族即炎族后裔被黄族征服后流徙东方的一支，亦即所谓东夷。进而推断“三代华夷之界，即炎黄二族之别。更知震旦文教，古分炎黄二支”，遂撰《炎黄氏族文化考》。作者从考古学、文字学、音韵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多个角度，广泛引用经书、纬书、神话传说和其他典籍文献，对炎黄氏族文化的发展变迁作了全面探讨。作者认为，世称炎、黄同为少典之子是荒诞不经的谬传。撇开年代学上的证据不说，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代，各民族极看重自己首领的称谓的神圣，炎族称皇，黄族称帝，足证炎黄不同族。

董守义《清代留学运动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本书汇集作者1983年应日本广播协会（NHK）的邀请在日本所做的三次公开讲演稿。内容包括中国考古学的回顾与展望、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中国文明的起源。后附中国考古、发掘简略年表。作者用通俗的语言、扼要介绍了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论述了中国丝织业的产生、发展，及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形成及其在中亚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中发挥的作用，并根据考古学的证据阐明了中国文明是在中国土地上独自发生与发展起来的，而并非外来的。对了解中国考古学成果有重要参考价值。

尤其重要的是，作者提出了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中国史前考古学和世界文化史上至关重要的课题，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指明方向。作者认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等，以及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主要是黄河中上游、长江下游和山东地区的晚期新石器文化。

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书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看作是整个中国史学发展的归宿，给予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整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正统地位，认为从1919至1949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是这三十年历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作者从阶级斗争角度对民国时期重要历史学家进行裁夺，顾颉刚及其领导的“古史辨”运动，因为“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新史学发展的集中反映”，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意义，得以保留一个专节。陈寅恪、陈垣、吕思勉等政治色彩不太明显的史家被挤在“资产阶级史学中的爱国和进步倾向”一节里，篇幅甚少。傅斯年的名字，只在论述抢救明清大库档案时出现了一次。而胡适、陶希圣、蒋廷黻、钱穆、林同济等人，则被斥为反动史家。

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强调和梳理是本书引人注目的特点。

朱祖延《北魏佚书考》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易、诗、礼、乐、春秋、五经总义、小学、编年、杂交、霸史、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医方、艺术、别集等十九类，共考录北魏佚书六十二部。作者除进行整理、雠校、辨析、订正工作外，还在每一佚书之下，首据史传，略述原书作者的家世爵里。为多年潜心研究之作。

张广达在《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

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

戴学稷主编《鸦片战争人物传》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徐鸿修在《文史哲》第 4 期发表《商周青铜器铭文概述》。

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学界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秦汉选举志。以往研究秦汉仕进制度，因资料所限，往往详汉略秦，本书则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出土秦简、铜器铭文，对秦的选官制度作了比较清晰地清理，使对秦选官制度的研究达到一个新水平。即使是前人研究比较多的两汉仕进制度，该书亦有诸多新发现。本书资料翔实，作者在撰述过程中，除大量引用“前四史”资料之外，还广泛参考了各种政书、类书、诸子的有关资料以及新出土的秦简、汉简、汉碑、汉画像石、铜器铭文、瓦当文字等考古文物资料。

8 月

16 日 《文物报》在河南省郑州市创刊。

初创时为双周刊，1987 年 10 月 1 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更名为《中国文物报》，改为周刊。1989 年 3 月，国家文物局决定将《中国文物报》改为局机关报，并决定将编辑部迁至北京，重新筹组报社。1990 年 1 月 1 日，《中国文物报》在北京首次出版发行至今。

19 日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全国 600 多名学者出席了这次讨论会。会议集中讨论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解放区战场的评价、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许多与会代表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评价。

25 日 刘大年率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参加在联邦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第 16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这是中国史学会第一次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团体会员身份派出代表团参加大会。季羡林、莫阳任代表团顾问，团员包括丁伟志、丁建弘、田汝康、齐世荣、华庆昭、刘明翰、张广达、张芝联、张椿年（兼秘书长）、陈之骅、李侃、余绳武、林甘泉、金应熙、高望之、曹大鹏（兼副秘书长）、黄其煦、鲍世修、潘人杰、蔡祖铭等 20 人。

是月 张海鹏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

文章对改革开放后近代史研究当中的诸多探索进行质疑。文章认为，“两个过程”论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素的正确概括，它正是毛泽东本人的原意，而不是对毛泽东本人原意的“误解”。如果“摆脱”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过程”，按另外的意见来撰写近代历史，就会脱离历史的主要内容，不能说明历史的基本的、本质的特点，就会与近代历史的客观进程大相径庭。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为中国近代史主线，拔高了资产阶级在近代史上的作用，轻视、贬低了农民的作用。把发展资本主义当作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的根本道路，有意无意抹杀或模糊了中国人民面临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根本任务。不加分析地以资本主义运动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笼统地说洋务运动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是难以令人首肯的。

作者强调，不能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作为“框框”来突破，作为教条主义来抛弃。更不能拿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来否定已经历史检验过的党的民主革命理论。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近代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吴江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关于〈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的信——致黎澍同志》。

信中对黎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文表示支持。说：你的争辩在我看来是很有分寸的，充其量不过是说“这一类的说明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而不涉及马克思主义本身。这还是中国古代经学家们释经的办法，不是于经本身有所驳难，不过于其义有所探赜索隐而已。不过这样有时也难免吃苦，异端邪说的棍帽中国古来就很多。马克思等人的著作我们有时也称“经典”，但这只是借用，含义是不同的。不记得是哪位（列宁?）这样说过，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求人们把它当科学看待。就是说，首先要拿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对别人的“说明”（不管出自哪位权威或哪本教科书）自然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就是对于该科学本身的某些内容、论断也可以商榷或提出新的见解。这是学者应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同时是共产党员，行动和思想自当受党章党规的约束，在政治上（路线、方针、政策）、行动上同党的决定保持一致，但若涉及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思想问题，即跨入科学的领域，那就另当别论，在这里必须允许讨论，允许各抒己见，允许提出不同的理解（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求同存异，政治所尚；立异求真，学术所贵。要把这两者恰当地协调起来。

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作者长期从事中国近代、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一项代表性成果。作者按照《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述的研究意识形态生产过程的科学方法，对章氏一生、特别是对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作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评论，力图透过这位历史人物，去透视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去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变革。本书以近200页篇幅专论章太炎在哲学思想与经学、语言文字学、文学、社会学以及文学等方面的贡献，多发前人之未见，在章太炎研究领域享有较高声誉。

全书分为九章，共46万余字。

张舜徽选编《文献学论著辑要》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中选录有关文献学之专著、论文、笔记、书札120目。所选文章有长篇，有短札；有全录，有节抄。着重在阐明学术渊源、书籍流别，以及有关目录、校勘、金石、甲骨、辨伪、辑佚、避讳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书后列各文作者简介。

唐振常《蔡元培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分十五节叙述蔡元培的一生，重点介绍了其在近代史上几个重要关头的活动及态度，并对其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对蔡氏生平有关史实也作了一些考订。书中附有照片和手迹多幅。

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第4期发表《论历史学理论研究》。

该文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中心来讨论历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作者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提供了整体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基础。因此，历史学理论建设的任务，是要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结合历史实际，解说原理细节，填补其中种种空缺，发展新的方面，新的内容，使历史学理论成为自己的整体科学，自己的系统工程。

梁守德、李景荫等著《民族解放运动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杨东梁《左宗棠评传》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由中华书局出版。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由黄山书社出版。

本书是迄今为止徽商研究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原始资料汇编，分七个专题对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徽商的资本来源与资本积累、徽商经营的

行业、徽商的活动范围和经营方式、徽商资本的出路、徽商的政治态度以及徽商与学术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资料进行广泛收罗，主要取材于史籍、方志、谱牒、笔记、小说、文集、契约、文书、碑刻、档案等资料。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陆续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分辑出版。

共出版了14辑，618万字。该资料为中国近代稗史丛录，选辑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多年间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稗官野史”、内容涉及宫廷秘闻、政坛内幕、军阀兴衰、贵族政客生活百态、社会民风民俗、名人逸闻逸事等，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重要的参考资料。编者表示，《稗海》“选材都经过鉴别，不收伪品；尽力在各篇资料之前说明其来源、版本、阶级性及可注意之处……至于考订记事，一因编辑能力有限，二因资料书中难容考订的文字，所以必须等待史学研究者和史料整理者另写文章，这里一般只提供资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办《民国档案》创刊。

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对彝族万物雌雄观与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彝族所继承的虎伏羲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之祖。

9月

5日　上海市档案馆主办《档案与历史》创刊。

是月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2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分别于1990年、1993年出版。

1960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应编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对其“作历史的总结”。此为该书编撰之缘起。第一卷重点考察明清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分析国内市场和会馆、公所、行帮的基础上，采取了分行业考察的办法，共考察了制茶、制烟、酿酒、榨油、制糖、丝织、染布、端布、造纸、印刷、木材、冶铁、铁器铸造、铜矿、煤矿、制瓷、井盐、池盐、海盐、沙船运输业等20个手工行业。该书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确认采取谨慎态度，逐案考定，并注意史料的时间、空间限制。对明清两代，都是先分析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探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

芽，再讨论商品流通和市场，最后才考察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作者认为，资本的形成以一定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基础，在封建社会农业更有决定作用。书中还探讨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原因，以及它的历史作用。

第二卷以鸦片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分期，对截至 1920 年在华的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的发展过程作了详细分析。书中以较大篇幅考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分解、农产品的商品化，特别是新兴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市场的发展演变，以补过去经济史重工轻商之不足。全书贯穿了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自然经济解体的进程、商品化程度和市场交易量，各种形态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的增长速度、利润和积累等，都重新做出计量分析。

第三卷对 1921—1949 年间外国在华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发展变化分别作了考察，书中重点讨论的问题有：30 年代的经济危机和国内市场；手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的评析上，仍大量采用了计量分析方法，书中共有各种统计图表 166 个。

该书出版后，即受到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重视。

冯天瑜《张之洞评传》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由岳麓书社出版。

收录梁氏所著《新史学》、《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几部著作。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收入梁氏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部著作。

杜任之、高树帜《孔子学说精华体系》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学勤、齐文心、（美）艾兰编纂《英国所藏甲骨集》（上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1992 年 4 月出版下编。

本书著录了英国收藏的全部殷墟甲骨共 2674 片。分两编排列，上编把拓片分为五期二十二类，下编附有各片甲骨的来源及全部拓片的索引。

李民《夏商史初探》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在广泛使用传世文献、金甲文字和考古发掘资料的基础上，对夏商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尧舜时代氏族制的解体，夏代国家的形成，商族的起源与迁徙路线，西亳与郑州的商代文化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

研究。

《蒙古史研究》集刊创刊。

该刊为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刊，不定期出版，是我国第一个蒙古史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

冯尔康《雍正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月

20日　陈旭麓在《学术月刊》第10期发表《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

该文从社会学角度阐述了秘密会党的性质。

23日　许俊达在《社会科学评论》第10期发表《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文质疑》，对黎澍在1984年《历史研究》第5期上发表的文章提出反驳。

作者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并不错，是应该坚持的正确命题，问题在于要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是月　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论述了瞿秋白的政治思想、理论观点、对各种敌对思想的斗争及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也阐述了其在哲学、文化、文学、语言等方面的思想和贡献。对其某些不正确的或错误的思想观点也不回避，力求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是一部较全面、较深入地研究瞿秋白思想的专著"。

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被普遍认为是第一部系统全面实事求是地研究胡适的专著。书中对胡适的生平活动有扼要而有系统地记述，对其政治态度、思想主张，以及学术与教育等方面的贡献，都做了全面地揭示和辩证地分析。本书出版后，由于课题本身的重大和敏感，立即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对推动胡适研究起了很大作用。应该在反封建的文化背景下更深入地研究胡适，这是该书给予读者最大的启发之处。

周清泉在《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发表《中国近代史应当提到近代世界历史范围内研究》。

文章认为，中国近代对外来的资本主义侵略的反抗，无论是清王朝的抵抗，还是封建农民自发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和义和团运动，"在形式上都

是民族自卫的斗争，而在实质上，都是站在维护本民族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对先进，保守对进步，封建闭关自守孤立的传统对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经济变革的抗拒”。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

该书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反映我国传世古籍善本面貌的一部大型目录工具书，是中国传世古籍善本的总汇，所收珍本之富，是历代所编古书目录所无法比拟的。该书是国家文物局根据周恩来1975年提出的“要尽快地把全国善本书总目编出来”的指示而编纂的。经数千名图书馆工作者和专家学者近20年的辛勤劳动，编纂工作方得于1995年初全部完成。共著录了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博物馆、文管会、大专院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等七百八十二个单位所藏的古籍善本约十三万部。按经、史、子、集、丛书分为五部，款目达六万余条。凡古籍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而又流传较少者，即予以收录。采摭浩博，体例完备。它的出版，标志着对全国存世古籍的普查基本完成。

1996年全部出齐。

姜亮夫《敦煌学概论》由中华书局出版。

朱东安《曾国藩传》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1949年以后第一部民国史专著，出版后曾引起美联社、台湾及大陆媒体的注意，被视为大陆中国现代史学界“打破传统史观、解放思想”的标志性成果。全书50余万字，全面反映了中华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变化，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1911至1949年给予科学公允的评价，在某些观点上形成了突破。

11月

1日　晋文化研究座谈会在山西侯马召开。

4日　中国海关学会和厦门大学合办的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在厦门大学正式成立。

仰韶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河南渑池举行。

11日　荣孟源逝世，终年72岁。

14日　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和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全国首次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举行。

会议着重讨论了美国的"门户开放"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美关系等问题。

22日　全国政治思想史学术讨论会在苏州召开。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天津师大、复旦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全国110多名代表参加。着重讨论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范围、内容及其方法。

是月　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为作者从事秦汉史研究三十余年的主要成果，共收论文26篇，其中五篇发表于"文化大革命"以前，其余21篇都发表或写成于1978年以后。按内容可分为六类：一、研究方法；二、土地制度；三、契约问题；四、社会经济；五、地理与交通；六、人物和事件。秦汉时期的经济问题研究，如土地制度、契约问题、社会经济等是全书重点。书中征引资料丰富，尤重文物考古资料的使用。

龚书铎、方攸翰主编《中国近代史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蒋大椿在《世界历史》第11期发表《关于历史创造者的理论考察》。

作者认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提法并没有反映出唯物史观考察问题的辩证法实质。这种排除人民群众以外的社会历史力量的历史创造作用，只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提法，是不全面的。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关于人类历史创造者的完整认识，应当具有如下的内容：人类历史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社会关系中活动的人们自己创造的；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是人民群众，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从不同角度参与了历史创造活动；人民的历史，革命的历史，是群众自己创造的，同时又充分肯定英雄人物和人民领袖的重大作用。

路遥编《义和团运动》由巴蜀书社出版。

杨伯峻、徐提编《春秋左传词典》由中华书局出版。

贾敬颜在《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发表《"汉人"考》。

12 月

12 日 《光明日报》理论部邀请在京的部分史学工作者就“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社会功能”进行座谈。

会议召开的背景是愈演愈烈的“史学危机”论成为历史学界的焦点问题。

与会学者认为，如何解决好学术价值与社会功能的关系，是历史研究领域一个十分重要、十分迫切的问题。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社会功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学术价值的高低往往决定着社会功能的大小，但二者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学术价值是就史学自身发展中的价值而言的，社会功能则是指历史研究成果作为上层建筑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与会者强调，历史研究作为总体如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历史科学便将失去生命力。史学工作者要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使命感，历史研究必须加强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总任务的联系。因此，历史研究的着眼点放在当前的问题上是非常必要的。

座谈发言陆续在该报《史学》专栏刊出。

1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华侨华人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举行。

是月 周谷城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该丛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套文化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由 18 人组成，庞朴、朱维铮为编委会常务联系人，担负大量组织工作。设想 10 年出书 100 种，从断代文化、区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考古学文化、科学工艺、生活起居、思想学说、语言文字、艺术文学、宗教神话、文化制度、文化事业、文化运动、文化交流等部类反映中国文化整体面貌，阐扬中国文化的特征。实际出版 30 余种后中辍。所出书目包括《士与中国文化》、《禅宗与中国文化》、《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彩陶艺术》、《中国甲骨学史》、《中国染织史》、《方言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楚文化史》、《中国饮食文化》、《中国岩画发现史》、《佛教与中国文学》、《园林与中国文化》、《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外比较教育史》、《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中国舞蹈发展史》、《中国杂技史》、《中国创世神话》、《中国历代官制与文化》、《中国古代火炮史》、《中国小学史》、《少数民族与中国文化》、《理学与中国文化》等，其中多部著作产生了广泛影响。

以该丛书的出版为标志，中国文化史研究步入高潮。

杨志玖《元史三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文章26篇，主要论述了元史研究中的探马赤军、马可·波罗来华和回回人三个问题。作者关于探马赤军这一元代的重要兵制的看法引起国内外同行学者的注意；并从中国史料上对马可·波罗的行踪作了印证，对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提出反证；书中对涉及回回人的词源及其与回纥、回鹘、维吾尔诸词的关系，回回人物考证及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等都有独到看法。

陈胜粦《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收入13篇论文。其中有关林则徐研究的论文9篇，主要研究和探讨了林则徐的家庭出身、生平业绩、思想体系及其历史地位；有关鸦片战争研究的论文共4篇。其中《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和介绍》一文，对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思潮发展、变化的研究具有开拓之功。

杨讷、陈高华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下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世界历史词典》编委会编《世界历史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李家治、陈显求、张福康、郭演仪、陈士萍《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作者对中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制作的科学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应用科学原理和现代实验技术，对历朝历代陶器及各名窑瓷器胎、釉及彩的化学组成、显微结构、物理和陶瓷性能、物理化学、制作和烧成技术以及原料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论述。

戚其章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几点意见》，系统论述了“三个阶梯说”。

作者认为，在考虑基本线索时，一定要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联系起来。基本线索的标志，应该是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国内阶级斗争。这些斗争，犹如一座座里程碑，标志着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从而能够反映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才能够体现基本线索，构成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梯。

是年

胡绳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苏双碧任《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

《满族研究》创刊，是国际上唯一一种定期公开发行的满学刊物。

《东南文化》创刊。

1986年

※“中外文化比较讲习班”在北京召开。

※ 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出版。

※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出版。

※ 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商周青铜器，引起世界轰动。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出版。

※“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天津召开。

1月

1日　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哲学系等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中外文化比较讲习班”。

讲习班邀请了周谷城、季羡林、周一良、汤一介、陈鼓应、杜维明、庞朴、冉云华、成中英等十八位海内外专家学者担任讲师。讲习班围绕着现代化建设中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从中外文化交汇及其异同的各个层面，探讨了传统文化的认同、中外文化交流史、文化比较方法论以及中外文化发展趋势等方面的问题。

该讲习班被称为学术界空前盛大的一次集会，正式学员近八百人，听课人数多达上千人。杜维明说：“讲习班规模之大不可想象。”讲习班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陈鼓应说在美国的华人知识界听到这期讲习班的盛况都非常兴奋和感慨。

讲习班一直延续到本月16日结束。

6日　庞朴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论纲）》。

文章提出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不同于西方那种与神文精神对立的人文精神。

“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

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专题讨论中国文化的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丁守和、大庭修（日本）、马承源、王元化、王邦佐、刘年玲（美国）、刘志琴、刘泽华、冯天瑜、齐赫文斯基（苏联）、宁可、包遵信、田汝康、汤一介、朱维铮、成中英（美国）、杜维明（美国）、李侃、李学勤、李泽厚、萧箑父、吴泽、来新夏、陈旭麓、陈锦江（美国）、庞朴、庞纬（联邦德国）、周谷城、张广达、金冲及、金观涛、胡绳武、胡道静、姜义华、顾廷龙、耿云志、秦家懿（加拿大）、龚书铎、黄万盛，傅敏怡（联邦德国）、谭其骧、蔡尚思、魏斐德（美国）等。会议主题有两个，一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再估计，二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联系。与会学者围绕中国文化的特征、中国文化的结构、中国文化的阶段划分、中国文化中的儒学、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估价、中外文化交流问题以及中国文化世界化和世界文化中国化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这次会议对于"文化热"往纵深方向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会上表达的一些观点，对中国大陆的文化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会议论文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一九八六年）文集》1987年5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是月　曹伯言、季维龙编《胡适年谱》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编者广泛收集了谱主的生平事迹、政治观点、学术论著、社会活动、个人交往等材料，尤其对谱主学术思想的大旨和各阶段发展变化的脉络做了重点介绍。所选资料主要来源于胡适著作，胡适家人、亲友、学生、同事等撰写的回忆录和纪念文章中，与胡适关系密切的民国报纸，以及社会调查等。

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详细论述了唐朝整个庞大的仓廪系统，对唐朝正仓、转运仓、太仓、军仓、常平仓、义仓等各类仓廪的渊源、设置、职能、管理等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深入分析了它们的作用、发展变化和相互之间的交叉关系，对唐代仓法的基本特点、历史作用及历史地位也进行了探讨。

王明阁《甲骨学初论》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之骅《克鲁泡特金传》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冯尔康在《百科知识》第1期发表《开展社会史的研究》。

作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史学，主要研究经济史和政治史，对社会史几乎没有接触，"恢复、开展社会史的研究，已是当今史学界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

述，真正建立立体的史学，形象化的史学，科学的史学”。

这是1949年以后第一篇倡导社会史的文章，该文的刊出，标志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轫。

其后，作者又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发表同题论文，对社会史的内涵作了进一步阐发。认为中国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史，与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口学等学科有交叉的内容，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史林》创刊。

最初为季刊，2003年起改为双月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

2月

李范文等主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戎笙、龙盛远、贾熟村、何龄修《太平天国运动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20世纪60年代初由郭沫若组织编写，并亲拟章节，邀王、龙、贾、何四人编写，初稿完成后，其中的第二章以《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之名，于196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文革”爆发后，书稿被搁置。郭沫若逝世后，1982年，四作者又对旧稿再行修订。分革命前夕的社会状况、革命战争概观、理想和实践、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清政府的对策等六章。

朱维铮在《复旦学报》第2期发表《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

作者认为，中国经学史，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最强烈保守力量的那一类观念形态史。因为中国没有欧洲历史上那种表面与政权组织分离的宗教系统，而经学一旦形成某种传统，特别是与统治阶级的世俗利益相结合，变成哲学、政治、法学等各种科目的凝聚形式，它就具有神学的外壳。当封建主义大厦倒塌的客观条件没有具备以前，任何击破这个外壳的尝试，结果只能导致对它再度修葺粉饰，这就是孔子和经学的形象，在历史上尽管变动不居，而历代王朝又都需要这种形象的缘故。作者不同意有一以贯之的经学传统的看法，也不同意经学代表中国文化的一贯传统的看法。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作者1957—1960年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文献学”时的讲稿，由其学生徐鹏整理出版，大体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前后我国学者对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认识。本书第一章“绪言”，次列“目录”、“版本”和“校雠”三章，分别对其源流演变以及主要代表人物和重要著作做了较为全面的叙述。

吴廷嘉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要重视和加强史学方法论研究》。

作者认为，加强史学方法论研究，从根本上改进史学研究工作，需要加强对史学理论总体构架的研究，明确史学方法论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继承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汲取和改造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发展和丰富史学研究法，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派的学术成果采取“扬弃”态度，积极地从中吸收一切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

李开元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史学理论的层次模式和史学多元化》。

作者根据史学家的思维认识层次，把历史学划分为底层史学、中层史学、高层史学、哲学史学四个部分，它们在内容、方法、目的上都是很不相同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用系统论的观点看，它们都是相对独立的系统，每一个独立的系统都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标准。这就是说，历史学不但在研究内容、方法、目的上是多元的，在价值衡定上也是多元的，并没有统一的史学研究内容上的具体限定，也没有统一的历史学方法和统一的史学价值，历史学是一个多元的世界。

3月

5日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

是月　白寿彝等著《历史杂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孔子研究》创刊。

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在“发刊词”中肯定了孔子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文化巨人的地位，主张把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科学对象加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

主要栏目有：“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现代经济史”、“中外比较经济史”、“国内外中国经济史研究动态”、“经济思想

史研究”、“港台经济研究”、“民族经济”、“理论探讨”、“专题评论”、“学人与学术”、“论著评介”、“青年论坛”、“读史札记”等。

刘明翰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介》第1卷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工具书性质的学术研究性著作，对外国历史著作中具有特色、影响较大、有代表性的名著进行了介绍，以原著所述史实内容的社会阶段和年代先后编排。每书均对作者、写作目的和历史背景、内容梗概和各章节结构及该书在史学史中的作用、地位予以简介，并寓评价于叙述之中。

吴廷嘉在《社会科学研究》第1期发表《史学理论的层次构架与总体研究》。

文章认为，历史观、历史学、史学方法统属于历史科学的理论内容，它们相互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由于所研究的对象、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的不同，它们又分属于史学理论的不同层次和范畴，形成史学理论的层次构架，三者一方面三位一体，另一方面又不能相互取代。

4月

11日　亚洲地区文物保护技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22日　陈邦怀逝世，终年90岁。

是月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由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是美国华裔学者、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该书是美国中国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对20世纪20年代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提出独到见解，所用史料主要出自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家实地调查所得的资料，尤以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研究人员在华北平原33个自然村实地调查所得的资料为主。书中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是在理论上提出了农村“过密化”或“内卷化”（involution）的命题，以此来解释中国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这一观点引起中外学界的高度重视，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学术影响。

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走向未来丛书”之一种。作者认为，近代儒家文化缺乏一种在西方挑战面前进行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难以实现从传统观念向近代观念的历史转变，从而只能继续以传统为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和陈旧的认识

思维框架，被动地处理种种事态和危局。由于观念与现实的严重背离，近代儒家文化陷入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作者从近代中国正统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认识心理与社会心理三个层次上展开分析，考察他们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态度，极端守旧和少数先觉者内心的苦闷和压抑。本书在论述过程中不是简单地堆砌史料，也抛弃了传统的近代史叙述的“侵略——反侵略”套路，而是充分借鉴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对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

茅家琦、史式主编《1978—1985 太平天国史研究概况》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内容为 1978—1985 年间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情况和动态、各地太平天国史研究机构、学会和召开学术会议的情况，以及此间发表的论文目录和著作简介。

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 1 册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共 7 册，至 1990 年 8 月出齐，近 400 万字。

是书系依据 20 世纪 30 年代王重民编《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中有关地理类资料编成，分通论、总志、方志、河渠、水利、山川、游记、古迹名胜、外纪和边防八部分。

（英）柯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汉译外国史学理论名著丛书”之一种。

作者被誉为英国迄今最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书中扼要梳理了从古希腊到现代之间西方历史观念的演变及其特征，所论多切中历史学的核心问题，其中的一些著名论断如“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学术界广泛流行，影响巨大。

1997 年，译文经过重行校正和修订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重版。

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在南中国海域盗掘大批中国清康熙年间青花瓷器等珍贵文物后，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进行拍卖。

被盗文物包括约 15 万件瓷器、125 块金锭等，总价值达 3700 万荷兰盾（约 2000 万美元）。此事引起中国考古学、博物馆界强烈不满。1986 年 4 月 22 日，新华社《参考清样》刊登《我国陶瓷专家建议重视水下考古工作》的情况反映，引起高层关注。1986 年 7 月 9 日，国家科委科技促

进发展研究中心与文化部文物局联合召开有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广州市博物馆以及国家海洋局、交通部救捞局、外交部条法司、海军司令部等单位专家、学者参加的座谈会，研讨在中国开展水下考古工作的筹备工作。1987年2月6日，文化部发出《关于筹建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的通知》，1987年3月13日，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第一次会议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行，标志着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正式成立，我国水下考古工作开始启动。

黎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创刊号发表《关于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

文中对“恶”在推动历史前进方面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文章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文明首先是对人类的奴役，然后才显示出社会的进步。如果说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那就不足以说明人类文明史直到资本主义为止全部是在阶级剥削和对抗基础上发展的真相。”

5月

6日　第三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安徽歙县召开。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主办。会议的主题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与方法论。

28日　翁独健逝世，终年80岁。

是月　庞朴在杭州发表《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演讲。

提出文化结构包含三个层面：外层是物的部分，即马克思所说的“第二自然”，或对象化了的劳动；中层是心物结合的部分，包括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理论、社会组织制度等；核心层是心的部分，即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这三个层面彼此相关，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中国近代所发生的中西文化冲突，无异于文化结构的逻辑展开：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是在器物上“师夷之长技”的时期；从甲午战争，经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进行变法的时期；从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化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五四运动强调了文化的时代性，忽略了文化的民族性，其遗留下的文化课题有待于我们今天继续完成。

该文以隐喻的方式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定义为新一场“五四”运动。本年《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刊登了这篇讲演稿。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由岳麓书社出版。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集刊第 1 辑出版。

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是研究顾颉刚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书。作者为长期跟随顾氏的学生。书中系统而全面地叙述了顾颉刚学术思想和著述的发展过程，介绍了顾氏所作一些名篇如《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等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尤其对顾氏之学所产生的国际影响作了细致的爬梳，比较完备地搜集了自 1926 年到 1983 年将近六十年间世界各地受顾氏学术影响的各种资料、评论、介绍，以及承受顾氏学术思想影响来研究中国古史的各种论文、著作、资料等。

作者还对顾氏学问上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论述。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本书内容为作者 1984 年在北京大学讲学期间的讲演，其中介绍了西方考古人类学以及有关考古分类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意义，并分析了我国上古三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书中介绍了西方学术界有关理论和方法论，并以此为工具来观察中国古代文明，对中国考古学研究颇多启示。

陈直《居延汉简研究》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分居延汉简综论、解要、释文校订、甲编释文校订、系年等五部分。作者以出土简文与历史文献互为经纬参照考辨，所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

何新《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由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以探讨中国上古太阳神崇拜为中心，系统阐述了中国原始神话、宗教以及基本哲学观念的起源，所论均涉及中国上古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该书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

陈铁健《瞿秋白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比较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传主的生平事迹，从各个侧面描述了这个争议颇大的历史人物。作者遍读公安部从 1954 至 1964 年十年间办理瞿秋白案的全部审讯记录数十卷以及其他档案材料，并访问了所有与瞿案有关的人员，亲赴长汀察看了当年囚禁瞿秋白的囚室以及刑场，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纠正了过去流行的一些史实上的错误，恢复了传主的本来面目。被称为“是使党史研究成为科学跨出的大有意义的一步”。

黎澍在《评陈铁健著〈瞿秋白传〉》一文中认为该书“是党史研究的一项意义重大的卓越的科学成果”，并指出党史、革命史、现代史要成为科学，理论方法固然重要，但若讳言真实，再高妙的理论方法也无济于事。违抗流俗，独具创见，揭露历史真相，总结历史教训，这需要胆识和气魄，需要历史学家的史德、史才、史识。其中，在历代专制高压下所形成的，我国优秀史学家的传统美德，诚实的道德，勇敢的道德，实事求是的道德，独立思考而不媚时的道德尤其重要。

1995年，该书易名为《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再版。2009年，作者再次修订此书，由红旗出版社重新以《瞿秋白传》为名出版。作者在修订版后记中说，这次修订，重新审视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诸如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与中国革命关系，工农运动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的关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莫斯科与中共党内斗争，等等，都依据近十余年来公布的新资料，吸纳众多学者的新成果，进行了必要的改动，力求客观真确公允平实。

（意）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王和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近年来中国文化研究概况述评》。

文章剖析了新时期中国文化研究热的起因，介绍了“文化热”的概况，着重评析了国内学者在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和核心精神、怎样认识传统文化价值和作用、“国民性”等几个重要问题上的主要观点。该文是较早对“文化热”进行研究的文章之一。

6月

4日　王仲荦逝世，终年73岁。

10日　《文史哲》杂志编辑部举办“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

会议主要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如何评价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以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和态度等问题。

是月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揭示了禅宗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分四部分：禅宗的兴起及其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禅宗与中国士大夫的人生哲学与审美情趣；禅宗与中国士大夫的艺术思维；结束语：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禅宗。书中提出了一些比较深刻的问题，出版后影响较大。

李振宏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终极原因”与“相互作用”》。

本文主要针对系统论过于强调“相互作用”而忽视“终极原因”的探索而作。文章认为，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就史学界整体说，确实存在过“过分重视经济原因”而把唯物史观教条化的错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忽视了历史运动中各种历史力量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的研究。因此，引进现代科学方法，重视揭示各种历史力量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充分认识历史运动的复杂性、整体性、规律性，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历史，彻底贯彻唯物史观，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需的。问题的关键是，现代科学方法引入史学方法论体系时，要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要在唯物史观原理的指导下去运用。它只能作为史学方法论中的具体方法、手段，而不能取代唯物史观占据史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

《西北民族研究》创刊。

创刊号刊登了赵俪生的《论晚清西北之学的兴盛》等文章。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也是我国第一本断代历史人口地理专著。作者依据大量的文献记载，从人口变化规律、农业生产及粮食产量三个方面考察了西汉二百年间的人口增长、分布、迁徙情况。

庞朴在《北京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本文是作者本年1月在中国文化书院“中外文化比较讲习班”的演讲。文章开创性地指出文化具有两个与其空间存在、时间存在相关的根本属性，即民族性与时代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民族性既是内容又是形式，时代性既是内容又是形式。应充分尊重文化的民族性，任何民族、任何个人都无法把血液换一遍，文化传统已经深深沉淀在民族的血液中。中华民族无论在生活方式、价值判断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和思维方式上都有着悠久的或沉重的传统，这种传统能够随时代迅速地更新，但却无法彻底铲除。作者特别指出，国民性不能等同于国民的劣根性，其中还应该包括姑且称为“优根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既然文化有时代性，那不能用一个绝对的标准衡量不同时代的文化和历史。作者从结构上把文化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物质的层面，第三个层面是心理的层面，第二个层面是二者的统一，即物化了的心理和意识化了的物质，包括理论、制度、行为等，并从文化的三结构出发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重新进行评价。作者认为，文化三结构由浅入深的过程，展开为中国近代

史的三大阶段。因此，对完成引进物质技术任务的洋务运动应该持一种肯定的态度，而对未能解决文化深层结构问题的五四运动不能过于偏爱，过于宽容。

该文是“文化热”中少有的对文化理论、文化学本身进行研究的论作，其对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划分影响深远，广为学界接受。

李显荣《托洛茨基评传》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详尽评述托洛茨基一生的学术专著。

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季平《唐代奴婢制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开大学历史系成立我国第一个中国社会史研究室。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由三联书店出版。

7月

18日　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开始在广汉县三星堆遗址发掘商周时期两个大型祭祀坑，发现大量珍贵文物，引起世界轰动。

该遗址出土了大量巨型青铜人头像和全身像，以及数量众多的其他铜器、金器和玉石器，总数近千件，这两座祭祀坑的发现，有助于确定三星堆为蜀都的历史地位，展示了一个高度发达、地方色彩鲜明的古代青铜文化，由此引发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古蜀文明的重视。

30日　黎澍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发表《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文发表后，作者所提出的见解被认为离经叛道，遭到非议。为推动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深入，在《光明日报》史学版约请下，黎澍发表该文。文章继续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进行质疑，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观点完全错误，不仅有转述中产生的错误，而且最初提出这个命题的逻辑推理也是错误的，不值得苦心加以维护。

是月　黄宗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发表《略论华北近数百年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兼及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

该文是作者于1985年9月和10月间，分别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所做的学术讲演讲话稿。文章对其《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的基本出发点、架构和思路作了介绍。

周远廉、赵世瑜《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第 2 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为纪念顾颉刚逝世五周年而编的一部甲骨文与商代历史研究论文集，共收入论文 13 篇。

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1983 年至 1984 年，余英时在香港《明报月刊》推出《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三篇长文。1984 年，余氏又在台北《中国时报》及《联合报》副刊上分别发表《陈寅恪的"欠砍头"诗文发微》和《文史互证、显隐交融——谈怎样通解陈寅恪诗文中的"古典"和"今情"》等，对晚年陈寅恪的心境进行解读，在海外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同年 8 月，署名"冯衣北"的辩驳文章《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在第 224 期《明报月刊》刊出。一年后，"冯衣北"又发表《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两文旨在对余英时有关陈寅恪晚年诗文中存在"兴亡遗恨之类的遗民情绪"的"暗码系统"这一观点进行驳斥，认为余对陈晚年对当局不满情绪的渲染毫无依据。其后，余英时以《弦箭文章哪日休》作答，发表在同年 10 月号的《明报月刊》上。这场讨论曾引起海内外很多学人的兴趣和关注，余英时认为冯为"大陆官方学术界的代言人"。关于这场论战，陆键东在《陈寅恪最后 20 年》中写道："在胡乔木的指示下，广东省委有关方面开始布置写论战文章。此重任落在 1960 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写手身上。"余英时在《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一文中也说，"早在 1983 年年尾，我已知道胡乔木在积极布置向我进攻了。事有凑巧，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位明清史专家来耶鲁大学访问，一见面便向我索阅《明报月刊》所刊长文。我很诧异，问他怎么会知道我写了此文？他说，在他访美前，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曾有意让他出面写反驳我的文章，并说明：只有在他应允以后才能将那两期的《明报月刊》交给他。他婉拒了这一任务，因此也失去了读我原文的机会。很显然的，胡乔木在北京一直未能觅得他所需要的写手，最后才通过'广东省委文教战线负责人'找到了一个'冯衣北'。"

该书即"冯衣北"两篇文章的结集。余英时的五篇文章也作为附录收入其中。附录篇幅大大超过了正文（正文 44 页，附录 167 页）。余英时说："若不是托庇在他的两篇《商榷》之下，大陆读者是看不到我关于陈

先生‘晚年心境’的一系列文字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由岳麓书社出版。

《八十忆双亲》主要追忆其父、其母，情深意切，拳拳之心跃然纸上，读来感人肺腑。《师友杂忆》主要叙述其与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众多学者的交游，为了解现代中国学术史提供了鲜活资料。该书对认识作者多部名著背后的历史观和文化观也具有重要意义。

8月

1日　青岛大学与山东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青岛联合举办中西文化讲习研讨会。

研讨会场面宏大，张岱年、何兆武、李泽厚、陈鼓应、庞朴、杜维明等海内外著名学者十几人担任导师，每天上午主讲，下午答问讨论。与会者超过八百人。据参加者回忆，时我国已毕业和在读的人文社科类博士仅一百六十余人，与会者超过百人，硕士则有两百多人，大学教授、讲师四百人，集学界一时之盛，集中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盛况。

20日　“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

本次会议的主要讨论议题为：“在新形势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需要解决哪些理论认识问题”、“如何对待外国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不少与会者提出，由于理论研究落后，严重阻碍了历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必须要打破把理论教条化的思维模式。有学者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不等于史学理论，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理论。关于如何对待外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史学的发展需要引进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与会者还对如何引进进行了讨论。

27日　赵光贤在《光明日报》发表《史学危机究竟何在》。

作者说：“如果说我国史学存在着危机，我以为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没有理解透，用教条主义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用形而上学代替了辩证法。这样就僵化了马克思主义，使它不能与时俱进，使它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其次在于读书不多，掌握史料太少，对史书史料史事不搞考证，不能去伪存真，以致真伪杂糅，无法解决历史问题。如果我们能认清史学危机的真正所在，迷途知返，走上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危机就可以转化为生机。如认不清这点，空想一些没有科学根据的理论，抹杀史学作为一种

科学的特殊性，那我们就要走回头路；以新的教条和空论代替旧的教条和空论，那才是真正的危机。”

是月　刘大年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历史研究〉的创刊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该文以回顾《历史研究》“百家争鸣”办刊方针缘起的方式对《历史研究》杂志委婉提出批评，希望《历史研究》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做“杂志阀”，不要只发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文章，不发表观点不同的文章。

钱穆《朱子新学案》由巴蜀书社出版。

李振宏在《文史哲》第 4 期发表《关于史学理论与史学概论的初步意见》。

作者认为，史学理论体系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以历史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以史学各专门领域为对象的理论概括、有关史料的理论和方法。

李学勤在《北方文物》第 3 期发表《考古学与古代文明》。

该文是作者讲课记录稿，分五讲。第一讲，关于考古发现与中国文明的起源。重点从文字起源角度谈古代文明的起源。第二讲，关于夏商时期的文明。认为论证夏代要有三个条件：一是从考古上要有一个系统的时间延续较长的发掘遗址；二是要有文献记载；三是要有像甲骨文那样的古文字发现。第三讲，关于中国青铜器的演进和发展。第四讲，东周特别是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认为这一时期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从考古学看，是由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从经济史看，是井田制崩溃和奴隶制的衰落；从政治史看，是以宗法为基础的分封制到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的建立；从文化艺术看，是百家争鸣的繁荣和结束。第五讲，关于新发现的简牍帛书和古代文明。认为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所发现的大量战国、秦代和西汉初年的简牍帛书，大多数是前所未有的佚书，使后人对古书的形成与流传过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沈长云在《天津社会科学》第 4 期发表《关于华夏族形成的几个问题》。

作者将民族学与历史学、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与我国古史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对我国古代民族为什么称作华夏及华夏民族形成的途径、时间和标志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对华夏族形成问题的新观点。第一，至少在盘庚以前，中国土地上林立民族部落还没有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民

族。周族利用了夏的旗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对其他部族的征服和在分封制基础上与各族的长期混居与融合，造就了华夏民族的基础。第二，我国历史上导致不同部落人们混居的决定性步骤，是与周初的征服和封建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春秋战国之际的华夏已不再具有狭隘的血缘集团的含义，而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华夏部族和中原地区其他古老部族共同融铸成华夏民族。

黄盛璋主编《亚洲文明论丛》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堃《原始社会发展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列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地研究蒙元历史的断代史，全面论述了蒙古国家的建立、蒙古的征服战争、元朝的建立、元代的社会经济、元朝社会矛盾的发展、元末农民大起义、元代的边疆各族、元代的文化科学、元朝的对外关系等方面内容。书中广泛利用了十分分散的有关蒙元史的大量资料，除援引将近三百种汉籍外，还大量使用了波斯、阿拉伯、拉丁文等外文原始资料的西、俄文译本以及蒙古文、突厥文、藏文等少数民族语文原始资料。在撰述过程中，充分吸收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对蒙元史领域一些未曾深入研究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发表了不少创见。

该书代表了当时我国蒙元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的首卷，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作为六卷本总论的“叙篇”，二是讨论先秦史学。“叙篇”主要讨论史学史学科的理论和发展问题，进一步深化了作者此前对中国史学史分期的观点。书中对先秦时期历史观念的萌芽和历史知识的运用进行了论述。

2006年，本书另外五卷同时出版。第2卷《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成长》由许殿才著，第3卷《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由瞿林东著，第4卷《五代辽宋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由吴怀祺著，第5卷《明清时期（1840年前）：中国古代史学的嬗变》由向燕南、张越、罗炳良著，第6卷《近代时期（1840—1919）：中国近代史学》由陈其泰著。

全书贯穿了白寿彝关于中国史学史发展脉络及其阶段性特点的思想。

赵吉惠《历史学概论》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出版。

该书是在夏鼐为首的编辑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历经五年时间编撰而成。内容包括概论、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三国两晋南北朝至明代考古、国外考古七个方面，由夏鼐、贾兰坡、安志敏、张政烺、王仲殊、宿白、林志纯分任各编写组主编，参加执笔的专家学者共计120余人。收录条目1005条（连同参见1200余条），释文总计202万字。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考古学领域各项基础知识的大型综合性工具书，对我国考古研究的现有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

9月

10日　王玉波在《光明日报》发表《为社会史正名》。

作者认为“首先要为社会史正名”，指出社会史以人的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为基本内容，研究对象主要涉及到社会主体的人的自身状况、社会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社会生活方式及其规范、社会的生态环境、社会结构、社会问题和社会调节。

是月　刘泽华、张国刚在《文史哲》第5期发表《历史认识论纲》。

文章全面论述了历史认识的特点、一般形式与过程、认知结构、基本方法以及关于历史认识的检验与发展。

安作璋主编《中国史简编》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全书跨度五千年，叙述了从远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国历史，内容简明扼要。

孔经纬《东北经济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研究汉字字形变化的几种必然、偶然因素和规律，以及根据这种规律考证古文字形体的方法为重点，对于省吾提出的研究文字“以形为主”的方针多有总结和阐发。书中对运用古音知识研究古文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探索字义的途径等问题都做了论述。论者认为，从理论上综合探讨古文字的构造方式、具体的发展规律，介绍考释古文字应遵循的一般方法、原则等的著作尚不多见，本书弥补了此方面的一些不足。

10月

14日　“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天津召开。

研讨会由南开大学、天津人民出版社、《历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共

同发起，讨论的问题包括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和作用、社会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如何将社会史研究推向深入等，其中社会史究竟研究什么是本次会议讨论最为热烈的论题。

《历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集中刊发了这次会议的论文，并发表了“本刊评论员”文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文章认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左’的思潮影响，人们在理解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事史学研究时出现了偏颇和失误，将社会生活这一重要历史内容的研究视为‘庸俗’、‘烦琐’而逐之于史学门槛之外，并且美其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殊不知，此言此行恰恰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吁请史学界扩大视野，复兴和加强关于社会生活发展史的研究”，“另辟蹊径，促进史学的改革和创新，突破流行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断代史等著述格局，从研究社会生活的角度着手，开拓和填补鼎足之下的边缘地带和空白区域，同时再以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为中介，连接和沟通鼎立的‘三足’，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使之血肉丰满，容光焕发，改变以往史学那苍白干瘪的形象”，真正“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此文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响应，标志着中国历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新的转向。

此次研讨会的召开，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的开端，此后，中国社会史研究日渐繁荣，成为史学研究的热门。天津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社会史丛书”、“中国社会史丛书”、“中国社会史文库”等。

是月　晁福林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殷墟卜辞中的商王名号与商代王权》。

作者从殷墟卜辞中的商王名号问题着手考察商代王权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情况，重点在于说明商代王权的特征。文章指出，继统时的兄终弟及和禅让是商代王权特征的第一项内容。商代王权的第二项特征是它虽然有一定的专制独裁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它在种种制约下呈现着某种原始民主色彩。在商代社会结构中，王权由弱而强，不断发展，充满无限的活力。这是商代王权的第三项特征。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开拓了从语言学角度来理解文化史变迁的崭新途径，对方言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书中主要论题是方言与移民的关系、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历史方言地理的拟测及其文化背景、语言化石与栽培植

物发展史、从地名透视文化内涵、方言和戏曲及小说、方言与民俗、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等，皆为学术界极少或从未探索过的新问题。

该书出版后产生较大影响。

钟敬文、何兹全主编《东西方文化研究》创刊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谭其骧主编《黄河史论丛》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收入谭其骧、邹逸麟等研究黄河的论文 14 篇，对上起《山经》记载下迄清代期间的黄河历史变迁及治理状况进行了论述。

刘茂林、叶桂生在《晋阳学刊》第 5 期发表《抗战时期的中国历史学》。

文章分别对抗战期间马克思主义史学、“资产阶级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形形色色的反动史学思潮”的斗争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唯物史观作了新的发展，对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对中国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理论的概括，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做出了特殊贡献。中国社会史断代与专题研究方面，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发展，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国奴隶社会分期、封建社会长期性、农民战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大大推动了古史研究的深入。作者肯定了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吕思勉、邓之诚、洪煨莲、吴承仕、王礼锡、邓初民等所谓“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史学实践，并对他们在材料整理、钩稽、考辨、校勘和编纂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对蒋廷黻、钱穆、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的史学思想则进行了批判。

荣天琳主编《中国现代史论文著作目录索引（1949—1981）》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收录 1949 年 10 月至 1981 年 12 月间国内发表和出版的有关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的论文、著作及史料约两万余条。全书分为四编：一、概述论文；二、分期史论文；三、历史人物研究论文及史料；四、历史著作。每条著录篇名、著译者、报刊名称或出版单位、出版时间等。条目来源涉及国内各种报纸、期刊、学报、丛刊、通讯、研究资料、革命史资料、地方史资料等。1990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成汉昌编《中国现代史论文著作目录索引（1982—1987）》，是本书的续编。

史苏苑《历史人物评价论稿》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独辟蹊径，通过诗文等大量文学资料中所蕴藏的史料信息对唐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和研究，鲜活再现了唐代科举士子的群体形象。既生动可读，又有严肃的考证和分析，既着眼于广泛的社会背景，又不拒细微的景象，被称为文史并茂的范例。

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由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对唐五代的赋役制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除对租庸调制和两税法有详细考察外，还对唐五代实行过的其他赋税，如地税、户税、资课、勾剥、工商税、杂税、土贡、进奉、和籴、和市、和买、常平仓和义仓等均有议论，基本再现了唐五代名目繁多的赋税的基本面貌。书中对唐五代的徭役也作了较多的探索，叙述了力役、杂徭、色役、和雇、兵役等各种徭役的施行情况。全书考证精详，广征博引，显示了比较深厚的功力。

11月

12日　全国科技史与文物考古学术讨论会在郑州召开。

17日　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是月　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珍贵文献史料》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于1983年3月至1984年5月在美国、英国和联邦德国作访问、研究期间，发现《天兄圣旨》和《天父圣旨》这两种非常重要而此前学术界并不知悉的太平天国印书，回国后即将其编注出版。这两种印书记录了历次天父天兄下凡的活动，涉及金田起义准备时期和金田起义前后的史事、太平天国的宗教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关系的演变等等，几乎每件事此前都未知其详，它们的发现和出版大大丰富了太平天国的历史，成为研究太平天国早期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使研究者得以对太平天国的史事和思想文化作更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并为破解一些长期聚讼未决的历史疑案提供了文献依据。

张维华《晚学斋论文集》由齐鲁书社出版。

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由黄山书社出版。

除收录胡适《四十自述》外，还选收了《先母行述》、《我的信仰》和《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等三篇。

刘敦愿在《文史哲》第 6 期发表《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

12 月

2 日　黎澍在《文汇报》发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作者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虽然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而艰难的道路，但它的主要完成形式并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和亲'之类的友好手段，而主要是暴力，特别是战争征服。"因此，"古代的民族战争推动和加速了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

3 日　陈启能在《光明日报》发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该文最早把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明确作了区分，并对史学理论研究的内容作了具体阐述。

17 日　黎鸣在《光明日报》发表《历史是创造者创造的》。

文章从"信息增殖"的意义来解释"创造"，提出了所谓"新英雄史观"，使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再起波澜。黎文认为"'创造'即是给出新的、综合的信息（包括自然信息和文化信息）选择"。而"人类历史是人类社会系统信息总量的增殖，谁为这种信息量的增殖做出了贡献，谁就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从这种观点出发，作者认为"人类的多数是行为的模仿者、学习者、重复者，是传统的因循者，并不是创造者"。

30 日　李泽厚在《文汇报》发表《开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阶段》。

作者认为："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范畴、命题、判断……有的则是流行多年，奉为定论，其实却似是而非，大可商榷。例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的概念和命题，便是如此。"

是月　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1934—1984）》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选编了 1934 年至 1984 年五十年间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的论文 17 篇。内容涉及教团与封建国家、世俗地主的关系，教团内部的阶级结构和经济结构，寺院经济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盛衰变化等一系列问题，包括敦煌、吐鲁番寺院经济问题。此书不仅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对汉唐寺院经济研究的总结，而且昭示了今后研究的方向。附录有《五十年来（1935—1981）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汉唐寺院经济论文目录》和《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地区学者研究中国汉唐寺院经济主要论著目录》。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主要介绍清朝前期至鸦片战争以后的史料，兼及清开国时期和溥仪故宫小朝廷时期，以史料的体裁分十二章叙述。第一章绪论，从理论上阐明了史料学和清史史料学的性质、任务和作用，概述了清史史料的基本情况及本书的内容范围。其他各章则分类叙列了清史史料的来源、体裁、史料价值和利用方法。

本书的开拓之处在于专章阐述了谱牒史料，指出其在研究宗族制度、人物传记、人口问题、地方史等方面的价值和功用，介绍了宗谱真伪鉴别及利用的方法。对宗谱体例、国内外的研究状况也作了详细介绍。书末附有《清史专题史料基本书目》和《清代档案史料书刊目录》。

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由齐鲁书社出版。

本书采用编年体例，以时为经，以事为纬，逐日记述义和团运动时期的重要史事。上以1896年3月山东曹县、单县大刀会酝酿起义为开端，下以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为结束，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义和团运动发生、发展直至最后失败的全部过程。全书由正文、按语和注释三部分组成。正文简要叙述义和团运动的重要史事，勾画这一运动的基本轮廓和大致情形。按语部分则主要对正文中所涉及的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解释，对典型材料，也一一摘抄列出。注释部分主要说明所引史料出处，也有少量考订史料、史事及介绍人物事迹的内容。

田昌五在《殷都学刊》第4期发表《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

作者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结合起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认为在夏代之前，无所谓统一的王朝，也就无所谓禅让和篡弑。尧、舜、禹不过是早期华夏文明圈中先后兴起的三个部落奴隶制王国的代表。他们先后称雄于中原，谱写了中国的早期文明史。通过历史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的相互印证和分析，作者指出，早期中国文明形成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中国文明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前后延续将近一千年，中原龙山文化最为典型。第二，早期华夏文化的各个类型反映的是几个不同的部落国家或部落国家集团。第三，无论从传说或考古上看，华夏文明的形成都是多源的，而不是像过去所理解的那样，由一个源头发展而成的。

林沄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6期发表《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几个问题》。

该文依托田野考古和先秦文献的新发现及新研究成果，运用新模式勾勒了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作者认为，国和邑不是同义词，国的原始

意义有强调地域的方面，邑概念的核心是人口的聚居。国不可能由单独的邑演进而成，而应该是分别源于一个个邑群。邑群中心大邑为都，其他邑则成为该邑的鄙。由一个都鄙群构成的最简单的国，由中心大邑及其四周的郊、郊外的野构成。一个都鄙群构成的国发展到多个都鄙群构成的国，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自然衍殖，一是武力吞并。多个都鄙群构成的国起初是相当不稳定的复合体，存在着分化的倾向，其结构实际上是“国中有国”，随时可以分化出独立的国。国与国的联合体中王（天子）与诸侯之间存在着等级关系，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而非国内关系。诸侯制代表的国与国的联合体虽然表现出一种使分散各国趋向一体的倾向，但这种趋向和小国发展为大国的趋势是根本不同的。这种联合体的发展制约了中央集权大国的发展。作者在文章末尾指出，虚构中国自夏代以来就有东方式的中央集权大国，将其作为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并从这种观念出发来理解先秦文献史料及考古资料，是不科学、不客观的。

《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等编《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李时编著《国学问题五百》由天津市古籍书店出版。

原书 1934 年 3 月由北平君中书社出版，1935 年 5 月再版，按经、史、子、集分类。

蔡尚思《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通论与专论两大类，共收入论文 56 篇，计 40 万余言。所收论文选自作者 1931 至 1986 年间所撰有关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论著，其中 7 篇是首次发表。

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赵俪生《顾亭林与王山史》由齐鲁书社出版。

宁可在《历史研究》第 6 期发表《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文章主要目的在于纠正斯大林忽视地理环境的观点。作者认为，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时绝不能忽视地理环境及其作用。地理环境对社会的作用首先而且主要表现在人类一切活动中最基本的和最具决定性的方面——生产上。地理环境或自然条件中的另一部分，虽然不是直接参与生产过程或直接作为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但它们通过对生产资料或劳动者

的影响，从外部间接作用于生产力。这种作用有时可以达到相当大的程度。地理环境的特点影响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从而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不平衡性，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斯大林完全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复杂的交互作用及其自然的和社会的影响，而是用一种机械论的观点来对待地理环境问题，贬低乃至实际上否定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是年

葛懋春、姜义华主编《外国史学理论丛书》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1986年12月）及《历史计量研究法》（1987年11月）两书被收入丛书。前者编译了国外近年来有关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论文19篇，约35万字，论述了历史比较研究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特征，介绍了苏联和英国历史比较研究的发展状况，并介绍了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历史课题的代表性论著，是国内第一部专题性介绍当代国外历史比较研究的译文集。后者编译了外国学者有关历史计量研究法方面的论文26篇。内容包含历史计量法发展过程和主要特征的介绍以及如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计算机的讨论，还包括运用历史计量研究法研究具体历史的论文。论文来自波兰、英国、美国、日本、苏联、法国、罗马尼亚等国的历史学家，其中苏联11篇，美国7篇。

《军事历史研究》创刊。

该刊由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编辑出版，是研究军事历史的大型综合性学术季刊。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辽海文物学刊》（半年刊）创刊。

李范文主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何兆武由中国社科院调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

该编委会成立于本年秋，成员主要来自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当代西方哲学的一批研究生，甘阳任主编，苏国勋任副主编，编委有于晓、王炜、王焱、王庆节、刘东、刘晓枫、孙依依、纪宏、余量、何光沪、陈来、陈平原、陈维纲、陈嘉映、林岗、周国平、胡平、赵越胜、徐友渔、郭宏安、阎步克、秦晓鹰等。编委会的宗旨是介绍“当代

（20世纪）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和引介西方优秀名著，出版“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其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产生巨大影响，是80年代最著名的学术团体之一，它的成立，被普遍看作是中国学术新生代的崛起。

1987年

※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全国展开。
※ 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出版。
※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出版。
※ 刘起釪《尚书源流及传本考》出版。
※ 宋代沉船“南海一号”被发现。
※ 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成立。
※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出版。
※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出版。

1月

13日　吴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

16日　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全国展开。

是月　乔志强《辛亥革命前的十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京生在《党史通讯》第1期发表《中共党史学史概说》。

该文率先提倡研究中共党史学史。文章发表后，在党史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史学情报》第1期发表《进一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苏秉琦关于辽西考古新发现的谈话》。

苏秉琦认为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发现说明，中国考古工作者找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在于：（1）突破了现在通行的中国文明史只有四千年的说法，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2）突破了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传统看法，表明北方地区在文明的起源过程

中，起了重要的作用；（3）揭示了中国文明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的真理——这是中国文明起源不同于世界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的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中国文明能够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

针对苏秉琦的观点，安志敏在《考古》1987年第5期上发表《试论文明的起源》一文，指出国内一些报道称辽宁凌源牛河梁、甘肃秦安大地湾的考古发现"将中华文明提早了一千多年"，不仅对这些考古发现的时代及社会属性造成错误的理解，同时也使文明的概念陷于含糊不清。作者阐述了人们对文明起源的认识过程。认为关于中国的文明起源，从历史研究的传统观点着眼，一般把夏、商、周的所谓"三代"作为中国文明的具体代表，从考古发现的实证来看，中国文明至迟开始于商代。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文明的特殊含义，把文明同史前文化混为一谈，就难以得出正确的答案。文章还反驳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或是多元认识上的"满天星斗"说和"四大区域"说。

童恩正在《考古》1989年第1期发表《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与安志敏先生商榷》。文章限定了广义和狭义的文明含义，认为"文明"在中国文献中的出现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原意是反映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某一较高的阶段，中国学术界完全可以使用这一名词，并将之作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时代来理解，无须死守摩尔根的三段分期法。作者强调，历史规律的总结和约定成俗的基本概念的出现，都应该是在充分的学术讨论之后，而不是产生于讨论之前，特别是当旧的理论框架已经不能包容新的资料、新的现象时，应该允许别人提出发展和修正。"百家争鸣"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安志敏又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上发表《谈谈中国文明的起源》，坚持自己的观点。文章认为作为文明的发祥地，必须首先独立地进入文明社会，并对周围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那种有头无尾或昙花一现的迹象，是无法作为文明起源的发祥地来对待的，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中心。作者继续对"文明的曙光"和"满天星斗"说进行批评，认为"文明的曙光"一词模棱两可，使人们很难判断它究竟是意味着进入了文明时代还是没有，诸如所谓的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和大地湾孤立的一座"五千年殿堂遗址"不能作为文明时代的标志。"满天星斗"说的实质是从根本否认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见解，以试图抹杀商周国家的历史作用，这并不符合我国或世界的历史实际。

《复旦大学学报》从第1期开始开辟"复旦大学、夏威夷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专栏"。

本期专栏刊登了朱维铮《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一文，认为文化研究

除坚持实事求是、从传统本身说明传统的原则外，还必须辨别现实中间有无所讨论文化传统的踪影，区分死文化和活文化，关注所讨论文化传统的正负面，不因其正面而完全肯定文化传统，也不因其负面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此外，还必须鉴别新传统和旧传统，外来传统和固有传统，顾及中华民族的整体。各民族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互相学习，才是发展中华文化传统的必由之路。

《民国春秋》创刊。

该刊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主办，辟有民国史事、人物志、往事追忆、名人轶事、历史文学、民国要案、文化集萃、社会百态、史事辨析、台湾之窗等十多个栏目，主要刊登介绍民国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文章。

2月

18日 《瞭望》周刊第8期刊发记者访谈《历史学家刘大年谈“全盘西化”的由来和为什么行不通》。

第9期连载。

此文意在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者指出，“全盘西化”问题，是一个“历史概念问题”，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即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制度的概念问题。“西方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东方，即中国，代表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不能把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起来或混为一谈。“现代化决不等于西方化。现代化指的是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并以此应用于社会生产。西方化指的把中国变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西方资本主义怎么样，中国就‘化’成那个样子，越彻底越好，也就是后来有人所高唱的‘全盘西化’。”近代中国的道路，只有中国共产党选择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走通了。因此，“全盘西化”说既“无历史根据，也无社会根据”，“历史否定了中国‘全盘西化’的道路”。中国不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西方有用的东西，如科学技术、有价值的学术思想的拒绝。“对于科学文化，必须采取科学的、分析的态度。一切先进的东西，不管来自何方，都应吸收过来丰富我们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该文引起理论界和史学界广泛关注。

是月 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由齐鲁书社出版。

本书稿成于20世纪30年代，为作者讲授中西交通史的讲义，经订改而成，内容按交通、宗教、文化分为三编，简洁勾勒出明清之际中西关系

史的轮廓和基本线索。第一编讲中西交通关系，介绍了中国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的商业交往；第二编论述明清之际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情形；第三编为作者用力最勤部分，论述中西文化汇合交流的过程，内容涉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及艺术、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书中使用了较多的私家笔记、文集等史料。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下册于 1988 年出版。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经济史，被称为填补空白的奠基性著作。分绪论和正文五编，93 万余字，历时十年研究才告完成。作者在占有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从历史角度解释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种种原因，深刻阐述了宋代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阶级关系变化，土地兼并与地租、地价的关系，农业、手工业社会分工的发展，货币流通等关系重大的问题，并进而从理论上总结了宋代社会经济中最具典型特征的、带有规律性的特征。

王曾瑜在《中国经济史和宋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一文中对该书学术价值予以高度评价，称该书既"总结了过去，也开拓了未来，确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不论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角度看，还是从宋史研究的角度看，都是如此。"

1999 年经济日报出版社以《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为名再版。

汪宁生在《社会科学战线》第 1 期发表《略谈民族考古学》。

该文是国内系统论述民族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第一篇文章，就民族考古学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学科定义、发展历史、选择民族志材料的方法、研究的范围和问题及如何进行类比研究等做了深入探讨。其后，作者又先后发表《再谈民族考古学》（载北京大学《迎接 21 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1998 年）、《三谈民族考古学》（《考古》2007 年第 4 期）两篇论文，对民族考古学作进一步阐述。

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从广州的海外贸易这一个案出发，探讨了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过程、其对宋代商业的促进、封建官僚专制主义的控制和阻碍、商品经济对封建经济的分解作用等问题。

陆震在《历史研究》第 1 期发表《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对象诸问题》。

该文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社会史是研究什么的，与社会发展史有何不同？社会史的学科对象是什么，其功用为何？为什么现在提出建立

社会史学科，其来龙去脉怎样？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蓝本，就是作为社会史学科创始者的年鉴学派所提出和坚持的那种社会史，即注目于广阔范围内的人类日常生活、人们的微观社会活动，从这些内容的历史演变过程去加深对社会宏观部分及其发展过程的理解。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所收文章仅包括1949年之前部分。

2009年4月，中华书局又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延请各领域专家，将1928年第1本第1分至2000年第71本第4分所刊全部论文按照现代学术分科，重新编排，影印出版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分类汇编》。共6编13种50册，分为《语言文字编》（15册）、《历史编》（19册）、《考古编》（5册）、《文献考订编》（6册）、《思想与文化编》（3册）、《民族与社会编》（2册），其中《语言文字编》和《历史编》下设卷。《语言文字编》分卷有：《音韵卷》（6册）、《语法卷》（2册）、《方言卷》（3册）、《文字卷》（4册）。《历史编》分卷有：《先秦卷》（3册）、《秦汉卷》（4册）、《魏晋隋唐五代卷》（4册）、《宋辽金元卷》（3册）、《明清卷》（5册）。为体现《集刊》的办刊宗旨，将蔡元培所撰《发刊词》以及傅斯年所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置于各编卷首，各编（卷）所收论文，均按刊期排列。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作者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在史学史、国际关系史、西欧史方面造诣深厚，先后执教于英国圣约翰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及美国的加州大学等著名学府。该书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编写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一书的历史学卷，作者在参考国际学术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提供的专门报告以及近二十年出版的数百种史学著作的基础上，以恢宏的视野对第二次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来世界各国历史研究的主流和新趋势作了精辟阐述，指出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是历史主义的衰落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扩大、对新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探求、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汇流和历史研究领域在时空方面的扩展。

该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对推动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起了重要作用。

3 月

《史学理论》（季刊）创刊。

该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前身为《外国史知识》，是我国唯一一份有关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专业性学术刊物。张椿年任主编，陈启能任副主编，刘家和、苏双碧、何兆武、张芝联等任编委。该刊的诞生，是中国史学界在改革开放形势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全面和系统地探索史学理论的重要标志之一。

发刊词《时代·历史·理论》云："我们的社会要改革，我们的史学也要改革，其中，理论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战后几十年来，国外的历史学有很大的发展变化，这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西方的史学理论思想，同哲学思想一样，已经并正在经由研究客体向主体的转变，注意对认识论问题的研究；西方历史学研究的整体化趋势，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以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愈益融合、渗透和交叉，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新兴学科，诸如历史人口学、生态史学、心理历史学、历史地理学、计量史学等的兴起，我们都所知不多，为此，本刊将用相当多的篇幅翻译介绍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文章、资料。"

1989 年停刊，1992 年复刊，改名为《史学理论研究》。

瞿林东在《史学理论》第 1 期发表《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

该文从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高度对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区别进行了论述。

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比较政治史著作，主要论述了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道路问题。作者通过对已经或基本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国家所走过的道路的历史的比较和探析，总结出实现政治现代化的三种基本道路模式的结论，即：（1）英国式的渐进改革的道路；（2）法国式的人民革命道路；（3）德国式的把民族和国家引向毁灭——毁灭后在外力的强迫下走向民主和新生的道路。作者推崇英国式的道路，进而指出，二次大战以来正力图实现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也分别走在这三条道路上。

戴逸《履霜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收清史研究论文 38 篇，内容涉及乾隆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中外关系、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工业、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等。书名出自《诗经·魏风》"纠纠葛屦，可以履霜"。作者在自序中表示，要以履霜冲寒的精神，努力前进，为我国的清史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严文明在《文物》第3期发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从事史料工作三十余年的结晶，收录了《关于史料的鉴别》、《论考据》、《史料真伪谈》、《考订记事》等论文，对新时代史料学的内容和方法作了论述。作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指导下，考史之学应包括三个方面："一、鉴别史料的真伪，二、考订记事的虚构，三、校勘文字的舛误。"作者对史料鉴别和整理中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做了过度强调。

杨翼骧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1册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2册、第3册分别于1994年、1999年出版，第4册清代部分因作者于2003年辞世未及出版。

本书系将先秦至明朝末年重要史学事迹按年编列，所引文字以原始资料和最早记载为主。后人的论述，除对于考证史学事迹确有必要者外，概不具录。在体例方面，采取首列公元纪年的编年、次列各朝帝王的年号及年数的记事方式，是本书的最大特点。该书资料宏富，除史家的史学活动及历史著述外，还特别注意到历代官方史学活动、史官制度、重要历史观点和史学见解，以求勾画中国史学史的全貌。

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绍连在《中州学刊》第1期发表《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线索及其启示》。

4月

吴于廑在《世界历史》第2期发表《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

该文是《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一文的续篇，主要讨论工业世界出现于亚欧大陆西端之前这个地区农业发展的背景，说明农耕世界最初怎样孕育了近代的工业世界。文章从工业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可割断的历史连续性这一基本思想出发，主要论述了以下三个问题：（1）农本经济生产剩余量的增长，是工业得以在农耕世界生长、发展的前提；（2）乡村工业，主要是纺织业，是工业世界孕育在农耕世界母体中的胚胎；（3）初生的工业世界为历史带来了一些不同于以农为本的社会的特点。

该文与《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一起，从世界史全局着眼阐述游牧、农本、工商三种经济在漫长的历史与广大地域表现出的矛盾与承袭关系，并突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在西欧产生与发展的特点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相互影响，在世界史学界具有广泛影响。

祁龙威在《江海学刊》第2期发表《关于发展历史科学的几点意见》。

作者认为，历史研究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是我国发展历史科学的指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历史科学的根本。研究阶级社会史，一定要坚持唯物史观的动力论，即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不可能从某些资产阶级学说中找到替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的史学指导思想。"客观主义"、折中主义、抽象比较法等，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而是早已被马克思主义否定了的陈旧的错误理论，对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不可能起积极作用。

王永兴编《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共上下两册，汇编了有关隋唐五代经济史的大量原始资料，本编为"阶级和阶级关系"，分别辑录了隋唐五代时期官奴婢、官户、杂户、工户、乐户、太常音声人、私奴婢、部曲、客女、随身、女妓、客、客户、庄户、庄客、佃户、寺户、民间工匠及其他各种特殊身份户的资料，以及租税制、徭役制、高利贷和其他经济关系、乡里制和五保制、团貌和丁中制、户等、计账和户籍等资料，主要采自是隋唐五代时期的史籍和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以及这一时期的文集、诗集、笔记小说、金石文字中的有关资料，并作简要的校勘和注释。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唐代景教进入中国以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一千多年间发生的大小教案为基本脉络，通过一件件教案，透视东西方在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冲突，并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作用、中国政府的对策等进行了研究。作者对西方宗教传入中国的功过是非以及由此引起的教案，均给予公正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并未因教案反映了东西方尖锐的矛盾，就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对西方传教士一概否定。本书从宏观上将教案史分为两个阶段，认为19世纪以前来华传教的西方教士，"在中华文化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绝大多数可谓是虔诚的基督徒，仅有一小部分人带着淘金

目的东来中国”。这一时期教案的原因，多为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外来传教士的驱逐、迫害以及下层民众文化心理的对外来宗教的排斥。19世纪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争相把宗教作为侵略的先锋，鸦片——大炮——传教士实际成为三位一体的掠夺工具。

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本书主要探讨了原始种植业和农业的起源、原始农业时代的生产和生活、原始共产制和私有制的产生、从宗教和神话看原始农业时代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发展等问题。

张国刚《唐代官制》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研究唐代中央职官机构的设置、各自的职掌与相互关系、地方官制的构成，以及边疆、要塞地区和少数民族政权的官制构成、唐代官吏的管理制度及其变化情况等等。作者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以唐代最为典型和完备时期（开元时期）的官制体系为基本框架，对唐代官制作了探讨。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由黄山书社出版。

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我国学者所著的第一部日本明治维新史。

王仲荦《𡻕华山馆丛稿》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作者的论文集，收录文章32篇，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社会分期、孔孟思想的评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考释以及作者的个人经历和治学经验等多个方面。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发掘扶风县法门寺塔基遗址及唐代地宫，出土了佛骨舍利、阿育王塔等珍贵文物。

5月

吴承明在《教学与研究》第5期发表《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外部和内部因素——兼论张謇的实业路线》。

朱维铮在《复旦学报》第3期发表《十八世纪中国的汉学与西学》。

陈炜湛《甲骨学简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星灿在《考古》第 5 期发表《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

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为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提供了一把钥匙，使敦煌寺院经济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作者依据敦煌文书，对唐五代敦煌寺院的经济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中国古代一种特殊人口——寺户的兴衰的原因。书中追溯了寺户制的源流和寺户的几种来源，并按照吐蕃管辖时期(8 世纪 80 年代至 9 世纪 40 年代)、归义军时期（9 世纪 50 年代至 11 世纪 30 年代）的时代顺序，详细探讨了敦煌寺院的地产结构、寺户编制、地租形态和寺户的身份、婚姻等各方面问题，对敦煌寺户制的渊源、性质及其兴衰作了缜密的考察，并由此得出敦煌寺户是从印度传来的内律中的“净人”制度与中国晋唐间荫户部曲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是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农奴式人口这一结论，从而为解决敦煌寺户性质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做出重要贡献。作者还把敦煌寺户制衰落过程中寺院经济结构的变迁与吐鲁番及内地寺院经济结构的演变作比较研究，对因缺少资料而难以窥清的中原地区部曲佃客制度也多有发明。

6 月

8 日　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会议由东华师范大学和王氏故乡浙江海宁市人民政府筹办。参加研讨会的有中、日、美等国的专家学者、王门弟子，以及王国维的亲属，共八十余人。会议收到国内外学者论文近八十篇，内容广涉王国维的生平、政治思想及哲学、文学、美学、戏曲、殷周古史、甲骨金文、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学、蒙元史、西北地理、版本目录学、校勘学、音韵学、教育学等各方面。

25 日　中国史学会和北京历史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 50 周年学术讨论会。

是月　刘大年在《历史研究》第 3 期发表《说“合力”》。

文章对“合力”推动历史进步说提出否定，认为合力说是人们对恩格斯长信中有关词句的“误解”，恩格斯并未给合力说提供依据。主张合力说的人是企图以合力说否定和取代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的动力说。作者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当然推动历史前进。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通过人来表现，通过社会来表现，也就是人和人的关系。没

有人怎么有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不是人和人的关系吗？地主和农民的关系、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上级和下级的关系，等等，反正是人和人的关系，这个集团和那个集团的关系；而人和人的关系不是别的关系，是阶级和阶级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的最后还是个阶级的关系，在阶级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怎么推动历史前进，还是通过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那是以后的事情。”

此文发表后，受到不少人批评，形成了一次历史动力问题讨论的高潮。《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分别发表吴廷嘉《“合力”辨——兼与刘大年同志商榷》和陈孔立、施伟青《〈说“合力”〉质疑》，对刘文提出不同意见。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八篇论文组成，分别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胡适 陈独秀 鲁迅》、《青年毛泽东》、《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略论现代新儒家》、《漫说“西体中用”》。一方面反省五四运动，一方面反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及未来趋向。其中，《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通过对五四运动的两重性质——救亡与启蒙的分析，勾勒出二者在五四时代由相互为用走向救亡压倒启蒙的错综复杂的过程，并将其看作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发展主线。这一理论为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回顾历史、分析现实和展望未来，提供了一个有解释力的概念工具，为学界普遍接受，影响巨大。为了突破“中体西用”的格局，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西体中用”的发展之路，冀图借此改变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

吴承明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发表《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文章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向下沉沦的过程的观点提出辩驳，主张突破把中国近代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归之于19世纪西方文明冲击的“冲击—反应”模式，深入挖掘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更多研究中国土生土长的手工业发展在中国近代化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总结出中国式的工业发展道路。作者指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者的任务，不仅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还应当从中找出积极的东西。

蒋大椿在《学术界》第3期发表《关于中国史学科的现代化》。

作者认为，总括而言，中国史学科的现代化，就是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和当代科技发展的新高度上，采取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更加全面系统地整理有关中国历史发展的资

料，对中国历史做出新的探索，进行更加深刻全面的总结，建立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史学科体系。分而言之，中国史学科现代化的内容，包括指导思想、资料工作、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以及作为史学研究主体的历史科学工作者的现代化。

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由知识出版社出版。

苑书义、林言椒《太平天国人物研究》由巴蜀书社出版。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华夏考古》（季刊）创刊。

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姜亮夫《敦煌学论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收文28篇，为作者平生研究敦煌学之结晶。内容涉及敦煌经卷在中国文化学术上的价值的综述、对儒家经典如《毛诗》、《尚书》的校录，对《道德经》及道教佚经的综合研究，以及各种韵书的考释，归义军史的订补等。其中有关韵书者最多，收《瀛涯敦煌韵辑补逸》等13篇。书中所用资料多系作者早年在法国进修时在英国、法国抄录。

7 月

6 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宛平城举行落成典礼。

20 日　纪念金毓黻暨东北史学术讨论会在辽阳举行。

是月　谭其骧《长水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水集》上集所收为作者1949年前旧作，共36篇，主要集中在沿革地理和民族迁移两方面；下集所收为1949年后至1981年论著，共31篇，内容主要为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所作专题研究及有关历史地理学科发展理论和方法的论述等。所收文章大多产生过广泛影响。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主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创刊。

该刊由史念海倡导创办，为我国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重要期刊。

章太炎讲演、曹聚仁记录《国学概论》由巴蜀书社出版。

（英）波珀著，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苏）科瓦利琴科主编，闻一、肖吟译《计量历史学》由四川人

民出版社出版。

项观奇在《学术研究》第4期发表《试论历史数量研究法》。

蒙文通《古学甄微》由巴蜀书社出版。

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收论文12篇，所论包括古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租佃关系和商品货币经济等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中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全书以商品经济研究为主线，既有宏观论述又有微观考索，各篇文章互为补充，自成一体。

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编《近四十年来孔子研究论文选编》由齐鲁书社出版。

收录1949年至1985年孔子研究论文37篇，其中大陆论文31篇，港台6篇，反映了这一时期孔子研究所达到的水平。

8月

9日　钟凤年逝世，终年100岁。

18日　首届全国北朝史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大同举行。

21日　中国近代史体系体例学术讨论会在湘潭大学召开。

会议围绕中国近代史的体系和体例、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展开激烈争论，指出1949年以来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专著基本上是一个模式，千篇一律，主要原因就是史学研究方法的陈旧和僵化。会议呼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发展观来重建中国近代史体系，从世界全局来考察中国近代史，从世界近代历史潮流来把握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方向。

31日　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曲阜举行。

关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论述以及儒学的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是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其中，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会议最为关注的问题，并形成了激烈争论。部分学者认为儒家学说有助于克服高度发达了的现代工业文明中出现的社会弊病。另一部分人则坚决认为儒学是阻碍了现代化的，它不可能对中国现代化产生积极作用，近代史上三次大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不同程度地批判儒学，但未能把以儒学礼教为主体的封建思想压下去，致使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迟迟不能实现。也有学者持折中观点，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在割断历史的情况下进行，唯一的办法是粉碎传统儒学的理论体系，给以科学的扬

弃，批判地继承儒学中的积极方面，“保存国粹”和“全盘西化”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此次会议推动了“文化热”的进一步深化。

是月　刘起釪《尚书源流及传本考》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尚书》的源流作了系统、简明的阐述，并用醒目的图表列明许多复杂的问题，对《尚书》今文、古文、伪古文之争等疑难问题，以及《尚书》石经、写本和版刻本等各种传本、《尚书》独特的“隶古定”写本等都做了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使异常紊乱的《尚书》衍传情况完整而有条理地展现出来。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作者博士论文，填补了历史政区地理研究中断代政区地理方面的空白，解决了清代以来许多学者没有解决的问题。全书由引论、上篇、下篇、附篇四部分组成，通过对西汉史的全面考察，分析了西汉一代政区变动的原因和规律，以此弥补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不足，复原了西汉各个时期郡国一级政区的面貌，描述了二百年间郡国置废离合及领域伸缩的全过程，并略及县邑级政区沿革的若干问题。

蒋大椿在《近代史研究》第 4 期发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历史研究》。

宋代沉船“南海一号”被发现。

“南海一号”沉船为南宋时期商船，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长 30.4 米，宽 9.8 米，型深不超过 5 米，船舱内保存文物总数估计为 6 万到 8 万件。

1987 年 8 月，交通部广州打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广东阳江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沉船时，意外在珠江口以西、距广东省阳江市东平港以南约 20 海里处发现一艘宋代商船，打捞出二百多件珍贵瓷器。1989 年经国务院批准，被命名为“南海一号”。

2001 年至 2007 年初，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多次对“南海一号”进行试掘或勘探调查，打捞出大量的金、银、铜、铁、陶瓷类器物以及铜钱，有文物四千多件。2007 年 12 月 21 日，“南海一号”被整体打捞出水。

张正明《楚文化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国内外第一部跨学科、全方位、多层面研究楚文化的专著。作者归纳了楚文化的六个要素：一、青铜冶铸工艺；二、丝织和刺绣工艺；

三、髹漆工艺；四、老子和庄子的哲学；五、屈原的诗歌和庄子的散文；六、美术和乐舞。并认为这六个要素就是楚文化殿堂。

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突破既有的抗战史书写的框架，摆脱“左”的思潮的影响，对抗日战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客观地叙述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及其军事指挥员的军事活动，肯定了国民党爱国将士对抗日战争所做的贡献。全书材料丰富，兼收并蓄，广泛吸纳了各种不同资料及统计数字。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由中华书局出版。

收录18篇论文，主要研究了摩尼教经中亚传入中国的过程及其影响。

9月

2日　第四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四川温江举行。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等单位联合组织发起。主题是历史认识论。

10日　中国殷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安阳召开。

120名国内外学者参加会议，提交论文107篇。会上成立了中国殷商文化学会，胡厚宣为会长，田昌五、李学勤、李民、邹衡、郑振香为副会长，田昌五为秘书长，王宇信（常务）、杨升南、李绍连、聂玉海为副秘书长。

14日　侯外庐逝世，终年85岁。

20日　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敦煌莫高窟召开。

这是首次在中国召开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日本、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印度、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的八十多位敦煌学家。

是月　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从文化史的角度入手，对道教的产生、发展、作用、影响以及其思想、仪礼等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强调了“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的观点。全书共三编，上编梳理了道教哲理、神谱、仪式、方法的发展脉络；中编依时间结构叙述了道教在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发展演变的轨迹，重点阐述了中唐至北宋道教发展的三种趋向；下编着重探讨了道教对士大夫文

化、俗文化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揭示中国士大夫在生活情趣、心理境界和外在生养诸方面受到的道教的影响。书中还将道教与同样对中国文化具有重要影响的儒学、佛教进行了比较，分析三者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斗争、渗透以及传播等情况，以期使道教的特征及其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得到更好的说明。

《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下卷 1988 年 1 月出版。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编，共收录了作者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所写的论文 35 篇。上卷共收论文 17 篇，主要内容为中国古代社会史及先秦至隋唐的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下卷共 18 篇，选编了明代中叶至近代的思想史的研究论文。全书可以看作是作者一生研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总结，体现了作者的治学道路及治学方法。

苏秉琦在《中国建设》第 9 期发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

该文从考古学的角度论述了华（花）人，龙的传人，中国人的源、根从何而来及三者成为同义语从何说起这一事涉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问题。作者以恢宏的视野勾勒了中国文明发展的轨迹，提出华（花）和龙最早分别出现在距今六七千年间的华山脚下和燕山之北，而两者的根（祖先）的成长时间则在当地距今七八千年间。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等可以看作是以龙和华（花）为象征的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结合到一起（距今五六千年）迸发出的文明“火花”。作者认为，距今五千年左右期间，中华古文明又发生了一次历史大转折。标志就是青铜器的广泛传布和文字的发明。距今四五千年间，以晋南襄汾为中心的“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种古文化发展到了比红山文化更高的阶段，他们的文化面貌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说明了“中国”这一观念形态与政治实体的形成。距今四千年至二千年间，为夏商周三个王朝，直到秦统一中国。秦统一的这个“中国”不同于“五帝”时代和舜之“中国”的那个中国，已和我们现在说的“中国”从词义上讲没有不同了。一统中国从理想到现实，就是距今四千年至二千年间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自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

《北京大学学报》第 5 期发表一组“文化问题笔谈”，呼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这组笔谈包括季羡林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邓广铭的《中国文化

的继往与开来》、张岱年的《文化建设的方向》、金开诚的《文化发展岂能随心所欲》、叶朗的《中西文化研究的两个问题》。

赵吉惠《历史学方法论》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清）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章学诚所著目录学专著《校雠通义》原稿共4卷，后来遗失了第4卷，成为现存的《内篇》3卷。王重民根据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章氏遗书》，删去了其中的《外篇》，余下的共18章，128条，逐章逐条做了解释。书中对于一般的文字、人名、书名不作解释，但对于比较生疏的文字和典故，对于需要解释或有问题、有错误的人名、书名，都做了必要的校勘和注解。全书重点在说明章学诚所阐述的目录学方法和理论，同时也指出了章氏学说中的得失和是非。

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此书是从现存的八百多种隋唐古籍中，选择二百多种对断代史研究有价值的文献，分纪传史书、编年史书、典制文献、政法文献、地理文献、农杂文献、佛教文献、笔记小说和综合类文献加以排比。每类书前有概述，说明这一类文献的缘起及发展演变过程、唐代文献的数量、特点以及资料价值等。各书分别解题，说明本书作者简历、修撰过程、发凡起例、资料来源、编纂方法、版本流传、相关著作、文献利用价值，同时对一些重要典籍多有考辨订正，并提出个人研究心得意见，以备参考。

10月

5日　周秦汉唐考古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

7日　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

会议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中华民国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史学会共同发起，会议主要研究民国档案的开发利用与民国史上的重大学术问题，主题是1937—1945年的中国，以及如何发挥民国档案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

陈高华编《隋唐画家史料》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研究室编《历史科学的反思》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了当时学术界有关“史学概论”研究对象和体系讨论的论文

27 篇，作者包括白寿彝、宁可、苏双碧、葛懋春、黄元起、项观奇、李振宏、谢保成、赵吉惠等。书中探析了“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体系等一般理论，还探讨了史学概论同史学史、史料学和文献学等学科的联系和区别，并介绍了其他国家如苏联、日本、捷克等国史学概论课程的基本体系及代表性作品，为我国史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作用。

李桂海《中国封建结构探要》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在书中采用了当时比较流行的结构主义、系统论和控制论等新研究方法，对封建社会的不同范畴和类型，进行了探讨和阐述。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作者依据大量西南历史地理古籍，并进行实地考察，历时半个世纪而成，也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翔实地考释西南历史地理沿革的奠基之作。书中共收 2100 多个地名，对上古至明清今云南、贵州大部及四川西南部政区治地沿革、民族部落、土司、卫所、巡检司、山川、关隘、驿站等进行了系统考释。重在阐明历史发展的轨迹，揭示历史演进的规律。全书依各时期疆域与地名的变迁分作六篇，分为上古至汉初西南地区部族考释、西汉至南朝时期西南地理考释、北周至初唐时期西南地理考释、唐代后期云南安抚司地理考释、五代两宋时期西南地理考释、元明清时期云南省地理考释。书中分期不依照王朝的政治设置，也不依据社会发展阶段，而是依据政区地名的沿袭与更革的情况。每篇先作概说，揭示历史情况，以明确地名的社会背景，阐明历史发展的过程与空间活动的关系。每考说一个地名，先录出历史资料、校核原文，再列举不同说法，参互佐证，勘谬正误，最后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使所考地名证据确凿，结论可靠。对某些与较大历史事件有关或有争议的地名，以专篇或专题加以论证。对于清代的地理，则重点考论被英、法等国侵占的边界地名。

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制度、租税制度、徭役制度、户籍制度、阶级关系以及人口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收文十三篇，尤重对素为学界忽略之处的发掘，《东吴屯田制略论》首次系统地探讨了东吴的屯田制度，《魏晋南北朝徭役制度杂考》则对史家向未过问而在当时又相当盛行的“给恤”等官禄问题做了考释。另外，书中对史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提出独断之见，《关于东晋时期黄、白籍的几个问题》厘清了黄、白籍的起源和区别，《北魏均田法令校释》则对均田令作了全面的考释与辨证。作者还敢于打破成说，对曹魏屯田是否“始于许下”以及对“占田”的

解释和曹魏田租户调制度的颁行年代等都提出了新说。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1 月

30 日 李侃在《人民日报》发表《历史学要走出“史学界”》。

作者认为，要走出“史学危机”，历史学要走出“史学界”，即立足于历史学本身，以历史学本身所具有的科学特点，更好地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取得社会的更多关注和更多一些的社会效益。其一，要把研究的重点从人们比较熟悉的、反复讲过多次而又难以深入和突破的老课题，转入人们想要了解而又应该了解的新课题上来。其二，在历史学写作的体裁和表现形式上，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拘泥于一种现成的和固定的框架和公式。在坚持科学性和历史事实准确性的同时，要尽量增强可读性。其三，有许多专门性、学术性很强，而读者范围又有限的历史学科，诸如历史考古学、金石学、蒙古学、西藏学、敦煌学、突厥学、西夏学、宗教学、服饰学等等，不但可以“走出史学界”，而且可以走出国界。其四，随着现代文化媒介传播工具的日益发展，特别是电视、电影和广播事业的日益普及，历史学在传播普及方面，也有了新的载体。我们的历史学，也需要以自己的历史真实性、内容科学性和更强的可读性，去获得更多的读者，从而走出“史学界”。

是月 中华孔子研究所编《孔子研究论文集》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中华孔子研究所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议论文集，收入张岱年、梁漱溟、冯友兰等人的论文 32 篇。

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下册 1988 年 9 月出版。该书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历史地理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学术专著。

安志敏编《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编者是裴文中的学生。

该书辑录了作者在史前考古学方面不同时期的代表作 12 篇，其中 4 篇由外文译出。内容包括史前考古学基础理论、我国旧石器方面的研究论文及相关史料，以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其中《论史前石器和假石器》一文是根据作者写成于 1936 年的法文版的博士论文“史前人类使用的硬岩石的破碎和成型中自然现象的作用”一文翻译的，在国际旧石器考古学发

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中国古代陶鬲及陶鼎之研究》一文是作者研究器物类型学的一篇代表作，也是国内首篇关于陶鬲和陶鼎的专题研究论文，对类型学的运用产生很大影响。《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以周口店和河套等遗址为代表的四种文化来叙述中国旧石器文化，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进行了全面概括和分析，建立了一系列的分期体系，引起了学术界广泛重视。《龙骨山的变迁》简述了中国猿人化石的发现及失踪的经过，是一篇关于周口店发掘的重要史料。《甘肃史前考古报告》是裴文中于1947年在甘肃一带考古调查的成果，提出了“齐家文化”，突破了安特生所提出的“六期”体系，《中国西北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的考古调查》一文原载《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丛刊》1948年第8号，对这一带史前遗址的分布、分期及史前期的“丝绸之路”均提出了重要的观点，特别是“沙井文化”的提出，再次突破了安特生的“六期”说。

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按国别或地区分篇论述了1949年以前中外文化交流的历程，分22个专题，分别叙述了中国与缅甸、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日本、朝鲜、马来西亚和文莱、尼泊尔、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俄国、英国、美国、越柬老印支三国、阿拉伯世界、非洲、拉丁美洲等32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往来，并将中外政治经济方面的关系、友好往来、交通路线等作为背景加以概括叙述，较为广泛地反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

吴达德在《云南社会科学》第6期发表《历史人物研究与心理分析》。

作者指出，以往的历史人物研究中过分强调政治与阶级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了绝对化、简单化、脸谱化的倾向，因此主张要重视对于历史人物心理的研究，借鉴和运用心理分析方法来研究、评价历史人物。

中国第一家从事水下考古学研究的机构——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成立，拉开了水下考古的大幕。

11月20日，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主办的内部刊物《水下考古通讯》创刊。

北京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室与深圳大学文化研究所在深圳联合举办“国际中国学讲习班”。

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该书选编了当代港台及海外学者研究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些重要成果，所选论文包括殷海光的《自由主义的趋向》、傅乐诗的《现代中国保守主义的政治与文化》、张灏的《新儒家与当代中国思想的危机》、刘述先的《当代新儒家的探索》、艾恺的《梁漱溟——以圣贤自许的儒学殿军》和杜维明的《探究真实的存在：略论熊十力》，这些著述的引入，对处在“文化热”中的大陆学人了解港台及海外学术思潮、讨论现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12月

2日　梁钊韬逝世，终年71岁。

14日　胡华逝世，终年66岁。

15日　黎澍在《文汇报》发表《关于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继续从多个方面来质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两个命题，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命题除了逻辑上错误外，还在于其不适当地强调了人民群众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也受本身历史条件制约，并为其他不同意向所平衡，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形式之一种。但是作为历史动力的阶级斗争只能是先进阶级的阶级斗争，并非所有的阶级斗争都起历史动力的作用。论者多有认为人民群众的作用就是“推动历史前进”，事实并不尽然。传统的惰力作用也往往是由人民群众的习惯表现出来的。这种作用未可忽视。

是月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及其复杂的演变过程，企图观察和呈现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本书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着重进行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研究。作者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通过这一突出重点的研究方式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进而探索中国文化的独特形态。

作者着力探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形成的过程。无论是对先秦的“游士”还是后来的“士大夫”，侧重点都在于考察他们自由、独立以及反叛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其对汉晋之际士人的自觉意识的觉醒和魏晋士风的分析，更是突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和反叛精神。这些探讨

都对促进知识界传统文化精神的觉醒起了重要作用。

此书为庞朴所编选，在“文化热”中影响巨大，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

杨西光主编《历史科学研究的新历程——1978 至 1986 年〈史学〉专刊文论》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项观奇在《历史研究》第 6 期发表《论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的形成》。

文章认为，轻易否定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不合适，因为整个学术发展水平似乎尚未达到能够对这一问题做出新的结论的程度。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收论文 28 篇，附录 4 篇。论文中，7 篇采自《中国近代史问题》和《赤门谈史录》，其他散见于报刊和有关的文集上。论文加附录，写于“文革”以前的不足四分之一，写于 1979 年以后的多于四分之三。28 篇论文分为 4 类：1 至 6 讲历史学理论；7 至 17 讲中国近代史；18 至 21 讲亚洲史、中国古代史及其他；22 至 28 评述当代史学研究和有关人物。史学理论文章为全书重点，所收文章包括《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历史上的群众与领袖问题》、《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历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其中《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和《历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从头改写。

作者在“弁言”中说：“1979 年以后写的一些文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认为代表了某种倾向，而且是‘有力的代表者’，意存奖饰，一种认为划框框，定调子，难于接受。”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的文集。在中国历史分期上，作者抛开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以“中世纪”指称秦到清这一历史时期。在体例上，采用类似古人读书笔记和读史札记的形式，有不少是关于历史的“断想”。该书提炼了以往明清史研究的成果，考察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以后思想文化的变迁，展示了中国从晚明到晚清开始走出中世纪的艰难而又波澜壮阔的进程，颇能反映作者博通的治学特色。邹振环在《朱维铮先生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史”》一文中认为，该书代表了作者对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看法，“正如章太炎的《訄书》及《检论》，这些似乎零篇散记不仅展示了作者对中国文化史的宏阔视野，而且蕴含着作者尝试重新解释中国历史，和构建文化研究新体系的雄心。与后来朱先生的所有著作类似，

这些尽管是讨论历史的论著，却常常给读者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该书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内涵，其对中国历史分析的独到眼光和尖锐思想，受到敏感的海外学者和汉学家们注意”。

该书出版后以其启蒙倾向在“文化热”中产生巨大影响，畅销不衰。“走出中世纪”一度成为学界流行语。作者对该书格外重视，以为最能代表其学术思想和学术理念，晚年又对其进行修订，2007 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本，并将相关文章另行汇集，出版了《走出中世纪二集》。

彭卫、孟庆顺《历史学的视野——当代史学方法概述》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当代西方盛行的五种史学方法，即比较方法、心理分析方法、计量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和口碑记述方法进行了评述。书中论述多有独得之见，尤其是前言中对当代史学方法发展的总体趋势的论断为学界称道，即认为当代史学的走向是从单向化趋向整体化、从疏阔化趋向精微化、从含糊化趋向准确化、从枯燥化趋向生动化、从单维化趋向多维化。

邹衡在《文物》第 12 期发表《中国文明的诞生》。

作者认为，要找出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只靠古代文献记载办不到。商朝从建立开始就已处于文明时代，但早商文明不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始，必定还有一个更早的文明演进阶段即夏文明。考古发现已证实，二里头文化是夏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即夏文化。文中从文明起源的三个要素论证了夏文明是中国最早的文明。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唐代藩镇研究的名著。作者从藩镇的类型分析入手，以扎实的史料依据和文献分析，用“藩镇格局”来代替“藩镇割据”，描述安史之乱后唐代的政局，对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以及东南财源型藩镇进行逐一分析，从而比较客观地把握了唐代后期一个半世纪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际动态，基本上勾画出唐代藩镇的历史面貌。书中对唐代藩镇的各项具体制度如军事体制、军将职级、财政体制以及监军制度、辟署制度、进奏院制度都有深入讨论，对过去学术界忽略或认识模糊的诸多问题做了富有新意地补充和澄清。

杨志玖在该书序言中认为张著标志着“唐代藩镇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陈旭麓主编《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对五四以来主要政派及社会思潮作了系统的研究。全书以五四新文化、国民革命（大革命时期）、十年内战（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五大革命运动为框架，分五编论述了民主主义思潮的高涨与社会主

义思想的传播，新民主主义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与三民主义思想的新发展，无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尖锐对立及各政派，全民族抗战思想的确立与发展，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并以国共两党的思想对立为主线，对二者在各个阶段的活动、主张以至双方的斗争和合作做了详细考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书中还介绍了众多思想派别，如国家主义派、东方文化派、现代评论派、托陈取消派、乡村建设派、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对它们的产生、发展过程、主要政治倾向等情况进行了论述，基本勾勒出这一时期中国政派的概况。

是年

《明实录类纂》开始编纂出版。

该项目由国家教委古委会立项，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负责编纂，李国祥、杨昶任主编，联合了西南师范大学、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中南民族学院、宜昌师范专科学校等单位的学者共同承担。该项目从两个系列着手进行，一是从现今行政区划着眼，编成各省区的史料系列；一是从内容的类别着眼，按官府朝廷、中外关系、人物传记、地理沿革、战争、刑法、礼乐、选举、宗教等事项为准，分门别类，构成专题史料系列。从 1990 年开始到 1995 年止，除《明实录类纂·广西史料卷》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 11 月）出版外，其他 20 册均由武汉出版社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翻译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开始陆续出版。

所收著作包括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福尔索姆著《朋友·客人·同事：晚清幕府制度研究》、芮玛丽著《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R. J. 史密斯著《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外国雇佣兵与清帝官员》、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以色列学者谢爱伦《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等，皆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重要作品。

1988年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中山大学召开。
※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第1集出版。
※"纪念殷墟发掘60周年座谈会"在河南安阳召开。
※ 王元化主编《新启蒙》丛刊创刊。
※ 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1月

13日　国务院公布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58处。

是月　田昌五在《山东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历史是怎样创造的——谈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作者认为，历史人物评价应该运用对立统一观点，并对历史人物评价中存在的片面性毛病进行了批评。指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有同一性，剥削阶级人物与人民是对立统一的，以往评价剥削阶级人物的主要毛病是片面强调对抗性，抹杀有一致的地方；而对代表劳动人民的人物如农民起义领袖、民族英雄则片面强调与人民的一致性，忽略对立性和非对抗性矛盾向对抗性矛盾的转化，所以出现了不适当的拔高。

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可以看作是一本研究社会史的工具书。书中探讨了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内容，并依次叙述了史学界"先秦两汉社会史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社会史研究"、"宋辽金元明清社会史研究"、"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状况，介绍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及其观点，为读者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和社会史研究的历史线索。其最大贡献在于，对1930年以来有关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专书简目和重要书目进行了整理和编排。

徐泰来在《湘潭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提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近代化说"。

作者认为，确定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应该首先明确中国近代史起点的发展趋向和近代史的终点的归宿结局，然后在近代历史的繁复复杂的历史现象中理出一条能将起点和终点串联起来的一以贯之的主线，围绕这条主线可将各方面的历史现象按其本身的逻辑串联起来。作者认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总的趋向就是资本主义的近代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生产力方面由手工业操作向机器生产变化，在生产方式方面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变化，在政治方面由封建专制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变化，以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之发生。

2 月

王学典在《文史哲》第 1 期发表《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

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论点：物质生产财富的历史是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共同创造的，并以此为据对黎澍相关看法的不彻底性进行批评，认为撇开剥削阶级谈论文明时代生产历史的创造，是黎澍所持论点的缺陷所在。并提出要“在深刻反省我们以往对唯物史观理解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唯物史观。”

黎澍在 1988 年《文史哲》第 3 期发表《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答王学典》对王文进行回应，认为“王学典对我的批评意见，其基本精神我认为是对的”，并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一步说明和辩护。黎文呼吁，要重新认识唯物史观，把社会科学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恢复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固有的活力。

李时岳在《历史研究》第 1 期发表《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思考》。

文章矛头指向近代史研究的“双沉沦”说。作者指出，人们习惯于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似乎半殖民地半封建就是在封建主义之外加上帝国主义，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完全是“历史的沉沦”，这一判断并不准确。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起，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20 年间中国的领土、领海、海关、司法等主权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化，国家地位不断沉沦。这是一个方向。另一方向，和沉沦的趋势相抗衡并最终结束了这种趋势的，是新兴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这种新兴力量是和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相联系的，也就是说，是和中国的半封建化相联系的。不能否认，中国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是经过太

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前仆后继的艰苦奋斗的结果。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社会，是社会的进步，而不是“历史的沉沦”。

庞卓恒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作者认为，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主要是由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三个部分所组成。史学本体论是指关于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认识，其核心是社会历史观，但其外延又比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历史观更宽广。史学认识论是关于历史认识——既包括关于具体历史现象的认识，也包括关于一般历史过程的性质特点的总的认识，即史学本体论方面的认识——的性质特点等等的认识。史学方法论是指关于历史研究的方式、方法的性质特点等等的认识。史学本体论在史学理论体系中居于前提、核心和主导的地位；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在整个体系中则居于基础的地位。

同期还发表了赵轶峰《历史认识论的相对性》、王正平《历史认识对象的特点》等文。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利用明清土地契约，对明清时代的经济结构、土地制度进行了研究，并对山东、安徽、浙江、江苏、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区域性土地契约关系和特点作了专题探讨和分析。作者将宏观纵论与微观辨析结合起来，结论多有新说，在学界影响较大。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由三联书店出版。

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对审美发生问题的思考》由三联书店出版。

姚孝遂等著《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是书将《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英国所藏甲骨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怀特氏等所藏甲骨文集》等甲骨文资料做了摹文和释文，更便于研究者所用。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续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3月

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朱春荣在《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第 2 期发表《中唐封建说》。

文章认为盘庚迁殷到战国，是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即井田制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或宗法奴役制社会；战国以后，进入铁器时代，井田制、宗法制和分封制瓦解，土地国有制代替了井田制，国家贵族的统治代替了宗法贵族的统治，一直到唐，中国社会既不是奴隶制，也不是封建制，而是国家贵族所有制社会；中唐以后，中国历史才进入封建社会。

叶显恩、陈春声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1 期发表《论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

该文是较早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论之作，在历史学界最早提出了“区域史”的概念。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史的区域研究中，应该强调以下几点：第一，注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第二，重视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中，尤其应该重视家族制度、聚落形态、社会心理等传统因素的长期影响。第三，加强定量分析工作。数理统计、经济数学方法和数理模式在史学研究中的大量运用，有助于建立一套能被更多的史学研究者认可的论证方法，使研究结论更为精确。在社会经济史区域性研究中应用计量方法，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更科学、更全面地反映社会底层人民大众的生活情况、生活方式以及心理状态。第四，加强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在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中，尤其应该注意宗族、村庄、集市、工场等较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个案分析。区域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不仅指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而且包括同一地区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比较，还应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域性比较。区域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比较研究，纵向、横向、顺向、逆向都可作比较。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和同类社会经济现象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形式，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彩多姿的风貌。

蒋善国《尚书综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书围绕《尚书》今古文真伪之争，归纳各家学说，对这段历史作了总结性综述，可称一部《尚书》专史。

胡厚宣《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了许多《甲骨文合集》、《美国所藏甲骨录》等书未曾著录的海外甲骨中的重要材料，虽然都是摹本，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路遥、程歗《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由齐鲁书社出版。

该书可看作是对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3 年出版戴玄之著《义和团研究》

一书的回应。戴著首次向劳乃宣提出的并在史学界流行六十余年的“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说”发起了全面挑战。路、程二人在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讨论了义和团在山东的组织起源问题。其基本观点是，义和团这种四处纷起的民众运动，不是任何一个既成组织所能和它的形式相容纳的。当时的各种力量及其组织都在复杂的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上表现自己，形成了一种源多流杂的抗争群。在这个群体中起主导作用的组织，是山东腹地和直、东交界地区在一个很长的历史脉络里产生的带有教门信仰的拳会刀社——主要是大刀会、义和拳和神拳。义和团的行迹和清史上的“拳教”大相径庭，但继承了信仰和拳会相结合的古老的传统。

齐世荣等著《人类历史的进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庞朴《稂莠集——中国文化与哲学论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4月

李绍连在《中州学刊》第2期发表《“文明”源于“野蛮”——论中国文明起源》。

该文认为，必须到原始社会后期去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过程。作者反对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坚持中国文明起源多元的观点，提出中国文明发祥地有四大区域，并将他们细分为九个原始文化区，即黄河中游、黄河下游、黄河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长江下游、珠江上游、珠江下游、北方地区。这九个文化区与中国文明都有密切关系，都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

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刘森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由黄山书社出版。

宋德金《金代的社会生活》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余树声《历史哲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学典在《史学理论》第2期发表《“阶级观点”再认识》。

该文从根本上质疑流行阶级观点的理论基础，彻底否定伦理史观。文章以四个关系重大的质疑为框架来展开论述，这四个质疑是：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必定是否定剥削与压迫的观点吗？二、只有劳动者的反抗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或唯一）动力吗？三、剥削者作为一个阶级不能进入历史创造者的行列吗？四、观察历史的阶级立场就是站在“劳动者

一边”吗？对这四个长期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作者都做了否定的回答。文章通过考察历史上剥削与压迫对历史进步的推动，深刻揭示了伦理史观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重大缺陷。作者提出，应把“只有人民创造论”驱逐出理论领域，应该根据马、恩“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来评判整个人类文明史。那种以为历史研究永远应该倾向历史上的劳动阶级的立场，绝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而是伦理史观的表现。

《中国改革备忘录》认为此文的基本论点是“1988 年史学理论研究的一大突破”。

5 月

26 日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中山大学召开。

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纪念陈寅恪的大会。会议成立了由季羡林任主任的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成员包括邓广铭、王永兴、石泉、刘大年、李侃、陈胜粦、周一良、林甘泉、金应熙、胡守为、唐长孺、蒋天枢、蔡鸿生等人。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有两个：一是评价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及其治学态度和方法，二是研讨陈寅恪所从事研究的各个学术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刘大年在会上致贺词，并就陈寅恪在历史学上的地位、陈寅恪的思想倾向、历史研究者与政治的关系、如何评价陈寅恪等四个方面作了题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地位》的讲话，认为陈氏是“中国近代历史学上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评价陈寅恪在历史学上的地位，不论看法有何出入，一个前提已经肯定了，那就是我们尊敬这位近代杰出的有代表性的爱国主义历史学家，希望从他那里总结出新的东西，推进学术研究，丰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1989 年 6 月，《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收论文和发言五十余篇，涉及陈氏的治学精神及其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学、敦煌学、突厥学、藏学、佛学等方面的成就。

是月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第 1 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最杰出的一部区域历史地图集，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千年古都北京的文化、政治的独特风貌。共有地图 81 幅，其中 77 幅为历史地图，以历代北京政区沿革图为主，增加了北京城市变迁图和园林陵寝图，每幅图后附有文字说明，形成了多层次结构的城市历史图集。图集的编制工作始于 1979 年，经六个单位共二十余人花费近八年时间而成。

姜义华在《复旦学报》第 3 期发表《论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

传统文化的双向运动》。

文章认为："在中国，确实是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并存，而且还有不少更为古老的东西。在考察近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发展过程时，人们都非常注意中国如何一步步从古代走向近代、现代，而往往忽略了历史运动中不断出现的各种盘涡、回流。当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世纪的历史在中国演进时，古代并没有按比例地逐步缩小它的地盘及影响。它一面被破坏，一面又在重建，在许多场合反而因新时代因素的出现而产生更为强固的粘合力。近代中国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的变化是这样，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运动，更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特征。"

作者指出，反观我国文化论争的近百年史，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事实就是：一方面，由于传统的单一化的积习太深，几乎所有各派都不免受传统文化"定于一尊"倾向的影响，总想变近代化与现代化进程为确定自己一派思想文化独尊地位的过程，而另一方面，现代化进程本身却正利用着文化的多系发展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曲折与反复之中开辟着符合中国及世界实际的自己的道路。

乔幼梅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宋元时期高利贷资本的发展》。

本文就宋元时期高利贷资本的几个问题作了论述。文章指出，在宋代私人高利贷活动中，已经形成了以"库户"、"钱民"为中心的高利贷网络。到了元代，这种私人高利贷网络继续发展，私人高利贷活动非常活跃，而且官营高利贷有了更大的发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章还勾勒出宋元时期高利贷利率变化的轨迹（大体上经历了高—低—回升—更高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并且探讨了出现这一变化过程的原因。此外，文章还就高利贷对元代社会的作用做了说明。

金观涛、刘青峰《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发展的哲学》由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刘泽华等著《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从十个方面对专制权力进行了探讨：一、君主集权国家的形成与特点；二、君主集权国家对人身的支配；三、君主集权国家对土地的支配；四、政治权力与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五、权力与分配；六、政治支配形态下的工商业；七、政治权力与古代中国的城市；八、政治权力与文化；九、君权与社会普遍危机和周期性动荡；十、关于几个问题的思考（君主专制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向背关系、君主专制下人的臣仆化与社会的僵化、民众的贫穷愚昧与君主专制的互补、没有制约机构与强谏多悲

剧、君主专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

在“反传统”的背景下，该书出版后一纸风行，首印两万册很快销售一空。

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由武汉出版社出版。

1991 年 8 月，作者又著《国共两党关系通史》，由武汉大学出版。

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林干《突厥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马伯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册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中册、下册于 1992 年出版。

(美) J. W. 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张志哲《中国史籍概论》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6 月

陈支平《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陈旭麓在《历史研究》第 3 期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提出“新三次革命高潮说”。

作者认为，对中国近代史线索的考察，不能停留在以前的 80 年时限内，而应延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 110 年内。因为这 110 年内是一个特殊的完整的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陈旭麓指出：“它的线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一个变革与反变革、反复推进的时代。”他认为在中国近代 110 年的全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三次革命高潮应是：第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第二次，国共合作的 1927 年大革命即国民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第三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1949 年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这三次高潮，总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后面还加上反官僚资本主义。三次革命高潮是新陈代谢的集中体现，都要求全局性的变革，它们的依次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反映了政治上、思想上新陈代谢的快速步骤。

李振宏在《历史研究》第 3 期发表《论史家主体意识》。

该文集中对历史认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史家主体意识结构主要由哲学观点、政治立场、知识基础、生活经验、情感、性格气质等六个基本的要素所构成，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渗透是无可奈何的事实。那种排斥主体意识、追求纯客观性历史认识的认识理想化倾向，是一个顽固的思想偏见，它排斥主体意识的发挥，遏制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作者特别呼吁要加强主体意识问题：首先，历史学家应该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学理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次，要提出进一步强化自觉的主体意识问题。最后，重视主体修养的问题，加强理论修养，改变知识结构单一、贫乏，研究手段原始、落后的状况，广泛吸收自然科学和其他科学的知识素养和方法论手段，从旧的史学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该文对于长期以来忽视历史认识主体作用的偏见形成了强烈冲击，对于推进历史认识论相关讨论发挥了重要影响。

郭振禄、刘一曼《甲骨文书籍提要》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许纪霖《无穷的困惑——近代中国两个知识者的历史旅程》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郭沫若纪念馆对外开放。

起初对外称为“郭沫若故居”，1994年7月，开始正式起用“郭沫若纪念馆”馆名。

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编了六七十年代以来港台及海外出版物中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论著38篇，其中包括余英时、徐复观、杜维明、唐君毅等人的文章。

7月

18日 “第五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烟台召开。

会议由国家教委、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山东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山东大学承办。会议的主题是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本次会议达成的一大共识是：奴隶社会并非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必经阶段，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这是史学界在中国社会形态认识上的一次跨越。

23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举办“史学新学科与史学理论基础讲座”。

至本年8月16日结束。讲座包括罗凤礼的《西方心理历史学》、叶秀

山的《哲学面对“历史”的挑战》、于沛的《文化、文化史和文化历史学》、范达人的《当代比较史学论纲》、王容芬的《马克斯·韦伯的历史理论与史学方法》、胡作玄的《科学技术与史学理论》。

部分讲稿刊登在次年的《史学理论》杂志上。

27 日　中国史学界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来自全国的95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选举戴逸为中国史学会会长，丁伟志、李侃、张岂之、金冲及、张椿年、齐世荣为副会长，王庆成为秘书长。

会议的主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加强与改进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刘大年、陈旭麓、孙文良、张岂之、孙祚民、苏双碧、陈国强、苑书义、王庆成、谢肇华、梁巨祥、林志纯、任继愈、姜义华、乔志强、刘志霄、段本洛、彭树智、陈育宁等 19 人作了大会发言。发言主要集中评论当时史学研究的状况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及研究课题两个方面。

代表们对“史学危机”问题展开集中讨论。刘大年指出，历史无用论现在相当流行，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是从当前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反映出来的；陈旭麓则认为史学最大的苦恼，是失去了读者和知识界对它的信任，这不是少数人的感受，而像流感一样带有普遍性；孙文良认为，这一次社会改革使史学受到的冲击之大，实在令人震惊，以致史学工作者普遍有“危机感”；梁巨祥认为，关于“史学危机”的议论，除了认为史学研究方法和手段落后以外，主要是因为史学研究范围狭窄，风格单调，课题陈旧，而且不少课题和时代隔膜，与现实联系不密切；陈育宁认为，“危机”说客观上反映了目前历史学研究存在着理论思维薄弱、研究内容和方法陈旧、体裁和形式呆板、社会功能不显著等问题。

代表们认为，当前我国史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不紧，不能很好地从对以往历史的反思和总结中给人们以历史的启迪，对现实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不能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给以科学的说明。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引起普遍重视。刘大年指出，历史学研究的事实是过去的，它提供给人们的认识，则应当是与现实生活相关，是为了解答某些重大的现实问题；苑书义认为，史学只有适应社会的需要，才能具备旺盛的生命力，否则就会停滞、萎缩乃至湮灭；孙祚民认为，史学出现脱离现实的倾向，其远因是把史学看作一种纯学术，为研究而研究，近因是以为史学不是应用学科，不能为现实服务；段本洛则认为，史学只能间接服务于现实的传统观点应当打破，并以区域史研究为例，证明史学研究应当而且可以直接为改革、开放服务。

争取学术民主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之一。陈旭麓指出，史学改革

主要是观念和方法上的改进，要多一点科学性，多一点民主性；张岂之认为，“左”的幽灵并没有完全消失；彭树智认为，史学界存在的脱离社会现实状况的主要根源在于“左”的思想、“左”的办法、“左”的规定；孙文良也认为，史学发展需要进一步打破禁区。

是月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室成立，刘梦溪任主任。

1993年4月28日，经文化部批准，在原中国文化研究室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仍由刘梦溪任所长。

（苏联）茹科夫著、王瓘译《历史方法论大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天文台编《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李启谦《孔子弟子研究》由齐鲁书社出版。

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第一部分类介绍楚文化的专著，也是第一部先秦区域文化志。全书共18章，约35万字。书中系统论述了楚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产业结构、生产技术、科学、文学、艺术、哲学乃至风俗等方面，从多个方面展示了楚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系。

林增平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近代湖湘文化初探》。

文章首次提出“湖湘文化”这一概念，开拓了近代湖湘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刘志琴在《史学理论》第3期发表《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

该文最早提出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标志着“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学科的出现。

张富祥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齐鲁文化综论》。

文章认为，齐鲁地区自古已成为统一的文化实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至西周初期齐、鲁两国建立，标志着“齐鲁文化”的正式诞生。它的源流区划，应以大汶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作界定。

蔡凤书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中华文明起源“新说”驳议》。

文章对中国文明起源多中心说提出驳正。作者认为，在文明的诸要素中，城市的出现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的形成必须建立在较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在我国，真正可称为城市，时间上最早的是尸乡沟商城及郑州商城。其年代在公元前 16 至前 15 世纪。稍早的二里头文化晚期够得上称为文明。与城市的出现密切相关的文字，目前也只能确定到商代，比商代更早的文字还没有发现。作为文明又一因素的青铜器从考古出土物可知是从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而被人誉为文明起源点的红山文化则没有发现过青铜器。礼仪性建筑的出现也并不能意味着一定出现文明，其在文明诸要素中只占有一个“仅供参考”的位置。因此，在公元前 1600 年前后，除了黄河流域，中国境内的其他地区还没有具备文明的基本因素。中国文明起源点“满天星斗”说是过分夸大了中国文明在各地区发生的独立性，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文明的诸要素，最初是以孤立的状态存在于各地，但并非每个有文明因素的地点都发展到文明，只是为中华文明的产生作了铺衬。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黄河流域凝聚了自身和其他文化的因素，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文明的起源点。

8 月

苑书义《中国近代史论稿》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收录作者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发表的代表性论文 35 篇，既有宏观综论、也有重大历史事件的探微，以及著名人物的评议。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首次全面系统地叙述了西夏佛教史，考订了西夏文大藏经的译成年代和过程，对西夏刻印汉文大藏经、西夏辑录佛经、西夏藏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都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法）勒戈夫、诺拉主编，郝名玮译《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法国新史学发展趋势》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周元正编《台湾出版抗日战争史著作论文索引：1950—1987》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边疆史地论著索引》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求是》第4期发表黎澍谈话《尊重历史，冲破教条》，就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问题发表重要见解。

黎澍认为："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被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为了打破这种永恒真理或绝对真理，必须普及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这就是：在认识范围内，没有永恒真理，一切认识的真理性都是相对的，都是随着实践的深入而发展的"，"凡以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治人者，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相对真理还治其人之身，庶几不致为害太大"。

"纪念殷墟发掘60周年座谈会"在河南安阳召开，出席会议的有40位国内知名学者。

9月

黎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徐天在《史学理论》第3期发表《史学，"危机"何在?》

文章认为历史学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史学价值观念的危机。越古越有价值，越专越有价值，越细越有价值，大多数人越不懂越有价值，离现实越远越有价值，这一乾嘉时代衡量学术价值的尺度的至尊地位在史学界仍未从根本上被动摇。整个中国社会正处在一场大变革的前夜，以考证为"正统"的史学观念，却鼓励史学家们不食人间烟火，这必将把史学置于为整个社会所遗弃的境地。二是流行史学体系的危机，主要指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既有形态的危机，亦即新民主主义史学体系的危机。新民主主义革命早已结束，但在这个革命中产生并为革命服务的史学却在继续。这种状况不但于整个社会无益，也严重影响了史学队伍的成长。

10月

21日　冯尔康在《人民日报》发表《社会史研究与史学研究》，对什么是社会史进行阐发。

作者认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僵化史学模式的反思，是社会史研究开展的国内条件。改革开放后，当代世界史学思潮和社会史研究动向像一股热浪涌进中国，是社会史研究兴起的国外社会条件。

作者认为，社会史是研究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组织、

社会结构、人口社会、社会生活方式与风尚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其他直接表现社会关系的社会生活。社会史也渗透到政治史、经济史等专史领域，凡是这些专史中属于人们社会关系的内容，也是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社会史不应只停留在了解人们社会生活的现象上，还需要深层次地研究人们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意识，这样才可能更好地揭示人们社会生活的状况和演变规律。社会史与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在研究内容上有局部的重叠、交叉，可以说它是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系媒介，是带有边缘学科性质的史学分支。在社会史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上，社会史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法，并把它引入历史学，促进了史学研究法的发展。社会史研究提出后，史学家把它的研究范畴、任务纳入到自身的研究中，社会史课题就是历史研究课题，社会史的研究任务就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之一，这就把社会史的认识论变成为史学的方法论。同时，社会史研究为历史学的综合研究法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26日　第二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

会议由南开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市社科联等十一个单位发起组织，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主要讨论了社会史的定义、学科内容及理论方法，中国古代的士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等。

是月　王元化主编《新启蒙》丛刊创刊。

这是20世纪80年代影响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套丛刊，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1989年5月25日，王元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新启蒙”一辨》，文章说：“我们的宗旨就是论丛的名字——新启蒙，或者说是新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也就是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就是文化启蒙。今天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建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反对个人迷信、批判极‘左’思潮、反对两个‘凡是’的基础上的。这是把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称作‘新启蒙’，以区别于五四启蒙思想的主要原因。”

《新启蒙》共出版发行了四辑，分别为《时代与选择》(1988年10月)，《危机与改革》(1988年12月)、《论异化概念》(1989年2月)，《庐山会议教训》(1989年4月)，均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五、六两辑已编完，因故未能刊行。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毕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史研究，尤以古荆楚地区的史地研究见长。该书意在推翻千百年来关于古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解释体系，对

荆楚地区历史地理沿革进行新的论证。全书约40万字，收13篇论文，包括《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古竟陵城故址新探》、《云杜、绿林故址新探》等力作，核心是《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一文。作者认为，先秦至六朝齐梁时期荆楚地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重要城邑山川湖泽位置并非如流行说法所认定的那样，分部在长江边，而当在汉水中游地区。只是由于南朝晚期梁陈之际，遭逢大动乱，政区兴废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系列原在汉域的地名随人流徙，移至江域，后世不察，常以陈（周）隋唐以后的地名位置套用于齐梁以前同名异地的城邑山川湖泽等，遂以致误。这一见解，极大地改变了古代荆楚地理面貌，颠覆了千余年来形成的对古代荆楚地理传统解释的根本格局，堪称惊世骇俗，引发了强烈反对。书中自序仿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对自己四十余年来从事荆楚历史地理研究作了介绍。

刘家和在《读〈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一文中评论：这是一部以深厚的功力写出的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著作，发现了自唐初《括地志》以来逐步形成的古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传统说法中的矛盾，并以严密的考证突破旧说而建立起一个新的解说体系；作者以严肃的求真精神与缜密的论证程序在治史方法上做出了一个好的范例。

2004年，作者又出版《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

苏秉琦在《东南文化》第5期发表《中华文明的新曙光》。

本文为作者1986年8月18日接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专访的谈话提纲。文章指出，研究文明问题需要澄清文化史和文明史两个不同的概念。原始文化即史前文化可以上溯到一百多万年前，文明史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水平文化的历史。关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作者认为把黄河中游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而把它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作用——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文中对中国版图中不同地域在中国文化总根系中的作用进行了具体论述。

苑书义主编《中国历史大事典》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收词目2942条，内容以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史事为主，兼及某些重要的典章制度、学术派别、科技发明等。按时间顺序排列，分则一事一条独立，合则前后连贯一体。

刘泽华主编《士人与社会（先秦卷）》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我国大陆学者第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专著，对先秦时代知识分子的起源、士人格相对独立与自由思考、知识官僚与社会结

构的活化、智能竞争与争士养士、士与科技知识、知识分子的不同追求、不朽业绩与自作思想枷锁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论述，从整体上揭示了知识分子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所论多富有创造性。

该书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1992 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由三联书店出版。

陈直《文史考古论丛》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俞伟超《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论先秦两汉的“单—僤—弹”》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本书根据古代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物，对中国两汉以前的农村社会基层组织的结构与功能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对甲骨文、金文有关材料的研究，作者揭示这种组织的名称就是“单”，并对“单”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以往学界对公社组织的研究，多集中在材料较为集中的周代，作者则把这一研究的材料推溯到商代，认为“单”至迟在接近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就已存在，是一种家长制的家庭公社。约从商周之际起，“单”就成为以地缘纽带维系为特征的农村公社。

多数学者认为公社组织至战国之际已基本解体，作者认为这一论点是不正确的。迟至两汉，“单”仍存在，偶然作“僤”，东汉晚期常写作“弹”，有时亦用同音字“团”来代替。这时的单内有极为细密的分职，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西方有代表性的社会史专家的论著中选译了 17 篇文章，所选文章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反映了西方社会史发展的梗概和当代西方社会史的研究趋势。二、介绍了西方历史家关于社会史的定义、范畴和方法等问题的论争。三、比较集中地介绍了法、英、美等国社会史学者研究的成果。四、明确阐述了社会史与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关系。

主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目下，中国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社会史研究的生命力不像那些‘微观’史学仅仅关注于历史的细枝末节，也不像那些‘宏观’史学仅仅重视重要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变化，它的努力不管是‘全面的’、‘总体的’，还是‘局部的’、‘片面的’，都服务于再现过去社会生活的目的。它的着眼点是现在和未来，通过再现过去，映照出我们生活的来来图景。”

11月

10日　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引起较大反响。

会上，二百多位学者就现代化理论内涵、历史过程、发展模式以及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着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进行了探讨。

28日　王元化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传统与反传统——从海外学者对“五四”的评论说起》。

该文对部分海外学者杜维明、唐德刚、林毓生等否定五四的“偏激态度”提出抗辩，认为这是从新儒学和儒学第三次复兴的崇儒立场出发对“五四”运动的否定。针对海外学者对“五四”的反传统的诘难，作者逐条做了辩护。作者认为，“五四”并没有像新儒家们所指控的那样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和主张全盘西化，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问题，“五四”主要的是反儒家的“吃人礼教”。五四所面临的是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主义，因此，五四对它的反叛就得使出加倍的力气，而不像西方启蒙运动那样，是在对付一个远比长期盘踞的超稳定性力量要脆弱得多的封建主义。责备五四反传统用力过猛的人，恰恰忽视了这一事实。

是月　《学术研究》第6期开辟“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讨论”专栏。

发表了该刊记者林有能撰写的《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广东史学界的一场争论》。该文为《学术研究》杂志邀请广东部分史学工作者就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进行的座谈纪要。

李时岳的发言对“两半”（半殖民地半封建）论提出了强烈质疑，认为“两半”论的失误，在于无视向上发展的方面，过于轻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的巨大历史进步意义，尤其对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文化上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缺乏足够的重视和估价，后来并予以全盘否定。由于没有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不是统一的整体，导致不能了解反帝任务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反封建任务的完成。没有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就难以产生自由、平等的社会观念，“封建残余”就不会自动退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两半”论延误了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这是时至今日反对“封建残余”仍然是严重而艰巨的斗争任务的思想认识根源。

张磊等对李时岳的观点提出反驳，认为“两半”论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定性分析，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期对国情研讨的结果，在这认识基础上建立和制订的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政纲已被历史进程所验证。应该说，它是科学的——反映了社会客观存在。不应把半殖民地半封建分割

为不相联属的范畴，它们是同步共生的，两者标志了近代中国社会过渡型而非相对独立的基本状态和属性。

同期还刊登了《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记者问：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应该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括，以突破现存的近代史的框架，探索新的构架呢？答：显然有这样的意图，确切地说，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提法，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

姜义华等编《港台与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王戎笙编《台港清史研究文摘》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大陆第一部全面介绍台港清史研究状况的大型文摘专书。1982年，编者在美国访学期间，搜集了大量台港学者35年来所发表的有关清史研究的学术论文、专著和资料。回国后编辑成书。该书共选重要论文一百余篇，专著二百多部，涉及作者一百多人。另外，还有一部分专史和通史著作。分为30个专题、211个条目，基本上反映了海峡两岸隔绝以来台港清史研究的整体情况。该书对大陆学者增进对台港学术的了解有诸多助益。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是中国上古史研究的经典之作，本为作者三十年代在燕京大学开设“中国上古史”一课时的讲稿。书中旁征博引，对先秦、两汉典籍中的三皇五帝等古史传说做了详细的考辨，目的在于推翻了它们的史实地位而恢复其传说地位，澄清古史系统中的非历史成分，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创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堪为信史的古史系统。

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至2005年出版至第6册。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该书被认为是第一部由历史学家运用全球观点囊括全球文明而编写的世界历史。作者采用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上，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该书的引进，对全球史观在中国史学界尤其是世界史

学界的推广起了巨大作用。

邓广铭、漆侠《两宋政治经济问题》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

该书政治问题部分由邓广铭完成，经济问题部分由漆侠执笔。

12月

1日　陈旭麓逝世，终年70岁。

9日　黎澍逝世，终年76岁。

12月14日，新华社播发《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黎澍同志逝世》一文，文中评价黎澍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并说：“黎澍同志一生执着地追求真理，从不向邪恶势力妥协。十年动乱期间，他横遭‘四人帮’的诬陷和迫害，却从没屈服。粉碎‘四人帮’后，他积极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为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大胆探索，在史学领域提出了许多新论点，特别是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主义、近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等问题，都有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是月　安作璋、孟祥才《刘邦评传》由齐鲁书社出版。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大型刘邦学术评传，对刘邦一生的事非功过及其与时代的关系作了论述，同时对秦末汉初这段历史上许多经验教训和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了探讨。评论认为：“该书不仅是刘邦个人的传记，而且是一部西汉立国史。”

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祁龙威《太平天国史学导论》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书中对太平天国史学史的线索进行了梳理，评述了萧一山、郭廷以、简又文、罗尔纲等人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书中还叙述了太平天国印书、文书和文物的发现、整理和出版情况，并对太平天国词语及史实进行了考订。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运动史稿》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出版。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辛亥革命史教材。

龚书铎《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录96篇讨论中国近代文化的文章，内容涉及中国近代文化与近代革命的关系、中西文化之争、近代文化的结构及文化诸领域，对近代哲学、经学、佛学、史学、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报刊与图书出版、体育、摄影、建筑、风俗习惯、婚姻状况等都有论述。

是年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开始陆续出版。

该丛书包括《清代边疆史地论著索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刘戈、黄咸阳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海南及南海诸岛史地论著资料索引》（李国强、寇俊敏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国边疆古籍题解》（范秀传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刘美崧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出版）等著作。

1989 年

※“纪念法国大革命 200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办。
※ 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出版。
※“孔子诞辰 254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举办。
※ 王元化主编《海外汉学丛书》出版。

1 月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在自序中说，所谓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这一论断构成了本书的立论基础。书中对东晋几家大门阀士族的渊源、经济基础、文化面貌，特别是与皇权之间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发展演变作了富于创造性的论述，阐明了东晋政权的形成及其特点。该书在史料的考证及运用上体现了较深的功力，向为学林所重。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四库全书》纂修的社会环境、学术文化渊源、编纂、庋藏的具体过程及其学术价值、历史局限等，做了全面的评述考证。书中既有对《四库全书》得失的评判，也有对中国古代学术演进规律进行的初步探讨。论者评价该书“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集以往诸家研究之所长，皆取得了总体性的突破”。

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民族考古学论文集，收入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发表的论文 25 篇。包括《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从原始计量到度量衡制度的形成》、《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等。

乔幼梅等在《山东社会科学》第 1 期发表《新时期十年的历史学评估》。

文章对 1978—1988 年间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进行了审视，认为和文学、经济学领域相比，十年来的史学界显得比较沉闷和保守，因此，全面细致地、系统而深入地进一步审查、反省、检讨和清理那些早为我们所信奉不疑、甚至融化到我们血液里的史学的基本观念，把史学家从这些观念的缠绕下解放出来，是史学界面临的继续解放思想的任务。作者提出，流行的史学观念还在窒息着史学，史学危机实质上是还流行的陈旧史学观念的危机，清理那些导致史学发生危机的观念，是史学走出低谷状态的思想保证。而冲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是史学走向繁荣的起点。作者要求，以生产力为标准重新研究以往的文明史，刷新对人类文明史的整体认识，同时大幅度调整研究课题，加强对当代史的研究。

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众多法国史专家合力撰写，以政治史为骨架，以叙事为主要体裁，对上起史前时代，下讫当代的法国历史进行了系统完备、论述详明的介绍，涵盖了法国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寓论于史、在叙事中体现观点是该书最大特色。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姚孝遂等著《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继日本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之后资料最完备、使用率较高的一部甲骨文工具书。

罗凤礼在《史学理论》第 1 期发表《西方心理历史学》。

本年 10 月，作者又在该刊第 4 期发表《再谈西方心理历史学》。两文全面介绍了西方心理历史学出现的历史背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及其影响，心理历史学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非精神分析心理方法与历史学的结合，心态史学与心理史学和历史心理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西方心理史学发展的态势等问题。

两文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学者对西方心理史学与心理方法的认识和所达到的研究水平。1998 年 6 月，作者出版《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对心理史学在西方的崛起、发展和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情况，以及心理史学与一般史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地阐发。

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由春秋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了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文章 23 篇，作者包括黎澍、李泽厚、戴晴、朱学勤、许纪霖等。这些论文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社会环境

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出发，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多个侧面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对理解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和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极端状态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2月

罗荣渠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论一元多线历史观》。

该文着意破除长期流行的五种生产方式单线演进的历史观。作者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中关于某一历史问题或某一历史进程的观点奉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哲学图式，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附加上去的。从马克思关于世界史的许多具体论述来看，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是多线式的而不是单线式的。单线式的历史发展公式与马克思的辩证的发展思想格格不入。在地球上任何地方，从采集野果的原始社会，直到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都没有直线进步的发展。社会形态的转变，不是任何单因素可以支配的，而是众多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与奇特的凑合。文章从宏观上对有史以来人类文明的多线发展趋势进行了勾勒，并设计出全新的世界史写作框架。这一框架完全以物质生产力为尺度来划分历史阶段，抛弃了“五种生产方式说”的生产关系尺度，彻底地否定了“五个阶段”的历史分期，并从生产关系、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等诸方面再现世界历史的复杂多样、丰富多彩。

该文是对基本历史理论的突破，影响深广。尹保云在《马克思主义与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中认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突破了长期以来贯穿于各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科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构架。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是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站在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通观世界整体发展的历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那由严密的逻辑体系所提供的新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具有重要而持久的影响力。

朱本源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替理论是科学假说》。

通过论证，作者认为，马克思在1859年《序言》所提出的“大体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一命题，是一种科学理论（假说），而不是完全用经验的历史证明了的普遍的发展规律。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替理论不是不可辩驳的、关于普遍规律的绝对真理。

沈长云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关于奴隶制几个基本理论问

题的商讨》。

作者不赞同奴隶制是人类普遍必经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成说，认为这一问题之所以得不到解决，除了思想方法上的原因以外，很大程度在于对有关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一些基本概念或基本理论问题存在着严重分歧：一是马恩关于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概念，以及这个概念是否对于各种类型的奴隶制都具有普遍意义；二是农奴制是否可以继原始公社制之后产生，以及这种农奴制的性质；三是奴隶制社会的概念，以及如何理解奴隶制社会形态的差异性。

秦晖在《天津社会科学》第 1 期发表《关于社会形态演进一般规律的假说》。

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立的社会形态演进模式在近年来所面临的挑战，在实证方面主要是历史与现实的两个难题。就历史而言，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历史均有“缺代”现象，即没有按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的顺序依次发展。就现实而言，现代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欧美各国并未按马克思的预想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倒是相对落后的不发达国家俄国、中国以及亚非拉一些地区实现了这种变革。这也使人们对传统的社会发展序列理论产生疑问。显然，这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得到解决。为此必须在各社会形态演进的具体规律之上抽象出更一般的规律。由于作为一种“全称陈述”的科学规律只能从不完全归纳中得到实证，任何为我们的认识所实际上把握的“规律”从严格的科学逻辑来说都只能是假说，即相对于理想的“自由王国”的终极规律而言的“有益的假说”，原则上它没有永不被证伪的保证。然而这个“缺点”正是科学得以永远保持发展活力的原因。在不断的证伪中，“有益的假说”将不断逼近终极规律。

吴怀祺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 1 期发表《中国近代考据学和王国维的“古史新证”》。

3 月

14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史学会联合在京举办“纪念法国大革命 200 周年学术讨论会”。

16 日　中国史学会与北京历史学会联合举办在京青年史学研究工作者纪念五四运动 70 周年学术座谈会。

是月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本全面介绍文化人类学基础知识的读本。作者借助英、法、美等国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搭建起了文化人类学这一“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科学”的知识体系。作者特别强调将文化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与中国的历史和实际生活相结合，书中使用了大量中国材料和中国案例，希图用人类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实。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著，赵世玲、赵世瑜译《欧洲史学新方向》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该书考察了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流派的发展的基本动向，重点对法国年鉴学派、德国社会政治史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史学理论进行了评介，对西方其他国家的史家与史学也做了论述。作者指出，尽管上述各派理论主张不同，但在总趋势上存在基本一致之处，即重视从社会科学中汲取概念、理论和方法，强调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该书的引进对国内史学研究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开始走出传统政治事件史范畴，转而研究民间社会，并将地理学、经济学和计量统计的概念和方法，以及人类学、心理学工具引入到历史研究中。

（英）B. A. 哈多克著、王加丰译《历史思想导论》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唐代史学研究的专著，共收论文23篇，分上下两编，上编7篇，多为总论，下编16篇，为分论。书中论述了唐代史学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和成就，唐代史学与唐代社会（特别是与政治统治、时代特点）的关系，唐代史学在历史理论、历史认识与历史编纂上的贡献，唐代史学中直书与曲笔的斗争，唐代史家的层出不穷和他们风格各异的治史特色，以及唐代史学在整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及时代特点等，大致勾勒出唐代史学发展的轨迹。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由中华书局出版。

（苏）巴尔格著，莫润先、陈桂荣译《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李时岳在《广东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义和团运动再认识》。

该文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渊源、时代背景、运动过程及其后果等作了考察和分析，并对义和团运动持激烈的否定意见。

作者认为，近代中国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争取国家的独立，一

是谋求社会的进步。从总体上说，两大任务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因为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的借法自强，维新派的变法救亡，在当时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正确方向。那种盲目排外、反对"以夷变夏"、回归闭关锁国的旧时代的企图，反映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垂死挣扎，既阻挠社会的进步，也无助于国家的独立，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是不值得肯定的。始终受封建顽固思想支配的反洋教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是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相悖反的，尽管事出有因，并有广大群众参加，但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群众反侵略、反欺凌的热情被引向盲目排外的、非理性的暴烈行动，甚至成为野心家篡位夺权的工具，难道值得一味歌颂吗？

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杨国桢《林则徐论考》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容包括对林则徐主要历史活动的论述、林则徐思想的分析、林则徐诗词书法的研究，以及有关林则徐的若干史实、史料的考辨。书中所引林则徐信札及手稿均系从未公开的林氏后裔家藏。

严文明在《北京大学学报》第 2 期发表《略论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和传播》。

4 月

1 日　刘大年在《求是》第 7 期发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它一旦与中国内在根据相结合以后，就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不能只有古代，没有近代。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占着近代中国文化主导的位置。""只要不割断历史，我们就会承认孔子、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了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不同历史时代的文化主流。"

针对"儒学热"，作者特别指出，孔学是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能搬用孔学体系来认识和处理现实生活。不去用批判态度对待以孔学为代表的古代文化，除了表示倒转历史车轮，难以表示别的什么。孔学保守、封闭带来的危害，近代的中国人、外国人不知讲过多少。他们的严厉批评，在今天仍然值得引起注意。

20 日　郑鹤声逝世，终年 88 岁。

是月《近代史研究》第 2 期发表一组“怀念黎澍同志”的文章。

作者有刘大年、余绳武、王庆成、丁名楠、丁守和、张海鹏、张友坤、耿云志、蒋大椿、王好立等。

庞朴在《历史研究》第 2 期发表《继承“五四”超越“五四”》。

文章认为：“五四”精神是批判精神，值得后来者永远继承。但继承“五四”精神需要以“五四”的精神来继承。“五四”打倒了传统偶像，绝不可再把“五四”崇奉为偶像传统，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五四”超越了前人，超越了时代，当然也会要求后人超越它所不曾超越的局限。“五四”已经提出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如批判传统、实现民主、尊重科学）有待我们来继续，“五四”未能提出而有待我们继续的课题（如分析传统、研究现代化的模式）只有我们来促成。继承“五四”必须超越“五四”，超越“五四”正所以继承“五四”，这就是“五四”的批判精神。

葛剑雄《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针对“中国历史的主流是统一，统一的时间远远超过分裂的时间，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分裂的时间则越来越短”这一长期流行的说法，该书一反成说，用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中国历史上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短暂的。书中对统一时期的消极因素和分裂时期的积极因素进行了论述，在国内及海外学界产生较大影响。

后作者在该书基础上添加部分内容，写成《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一书，于 1994 年 10 月由三联书店出版。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成立，丁守和任会长。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书根据陈寅恪手批《旧唐书》、《新唐书》整理而成。书中或依据大量古籍、前人论著、诗文和出土文物对《唐书》正文进行考证；或对唐代将相的出身、民族、氏族提出质疑或论定；或对唐代人物、史事进行评论，或对旧新《唐书》自身的得失加以审定或评议，体现了陈氏一贯的在史中求史识的治学观点，充分反映出陈氏的治学方法和态度。

罗尔纲《困学丛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录作者专著十种，上下两册，共 80 万字。所收著作内容丰富，既

有珍贵的文献资料《天地会文献录》、人物传记《李秀成传》，又有学术专著《太平天国史考信录》、《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志》、《太平天国的游击性运动战》、《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统计表》、《八法对笔迹的鉴定》、《文史稽考集》，还有总结和介绍治学经验的《治学篇》以及作者平生所写记、序、跋的合集《记序文存》。该书序言中说："这部《困学丛书》，和他的《太平天国史》、《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等，同是内容充实、论述精辟的鸿篇巨著。"

5 月

3 日　田居俭在《光明日报》发表《深入开展社会史之我见》。

关于社会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先指出"不仅要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其理论方法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指南。

5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五四运动 70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除北京外，全国各地都以不同形式召开了纪念五四运动 70 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座谈会。

22 日　中国周易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济南召开，唐明邦为会长，刘大钧（兼秘书长）等为副会长。

是月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甲骨文发现以来第一部甲骨文字典。

湖北郧县发现距今一二百万年的早期人类头骨化石，被命名为"郧县人"。

白化文、杨宝玉《敦煌学目录初探》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中国、英国、法国、苏联和日本所编各种敦煌写本的馆藏目录和专科目录进行了述评，详细介绍和评价了各目录的编者、收录范围、分类情况、编号系统、著录情况、附录等情况，并在比较分析的角度对各国的编目工作进行了总览。作者还对敦煌学编目工作提出建议，认为新的敦煌写本总目应是分类的、按图书馆学的要求编制出来的标准化目录。

（美）格奥尔格 · 伊格尔斯主编、陈海宏等译《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系统地论述了二战以后世界历史研究的

新领域和新方法，第二部分对美国、西欧、日本、社会主义各国、印度、南部非洲及拉美各国和地区的历史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并着重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研究特征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论证。

学界对本书翻译质量不无微词。

高光晶《中国国家起源》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探讨了中国国家产生的原因及过程，并通过与古希腊、罗马地理环境的比较，分析了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特点。

在此书基础上，作者又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国家起源及形成》。

李文海、刘仰东《太平天国社会风情》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太平天国，全面生动地描述了太平天国时期人民日常生活的各个侧面，如宗教活动、婚丧礼仪、服饰装束、妇女生活、过节度岁、家庭结构、文化心态等，是从社会史视角研究太平天国的拓荒之作。

耿云志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上发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

作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个未完成的运动。它所提出的基本目标至今仍有待我们努力加以实现。70年后回看新文化运动，其最大功效是它的启蒙作用。不难理解，没有个人价值的确立，是不会有民主的，没有破除对偶像与教条的迷信，不扫除虚文空谈的习气，是不会有科学的发展的。我们说的启蒙作用，就是指这种为确立民主、发展科学而扫除障碍、开辟先路的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科学与民主，并为之做了开榛辟莽的工作。但政治、经济领域里缺少为确立民主发展科学所必要的中坚力量。结果是民主制度无法实现，科学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新文化运动自身也累遭厄运，屡受攻击和剿禁。奇怪的是，有些人不知是何用意，他们竟把中国民主不能实现，科学不能发达，中国整个现代化的延搁的责任反推到新文化运动的头上。真是冤哉枉也！"

田居俭在《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发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姜义华在《复旦学报》第3期发表《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中国启蒙运动与农民运动文化互化研究》。

作者站在新启蒙的立场上，对"毛泽东为什么一直对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化特别偏爱"问题做了探讨。作者认为，毛泽东早已提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比之传统的经学文化、子学文化，传统的史学文化在中国传统的规范性文化中，做到了熔铸儒、法、道诸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与实践于一身，而且具有特别切实的借鉴、训诫与实践性质，成为历代统治经验总汇集的百科全书，历代有作为的帝王从来都把阅读史著作为他们接受终生教育的基本教科书。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伟大统帅，这种荣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本人的心态，影响了他对传统史学文化的特别偏爱和嗜好。

《北京大学学报》第 3 期组织“关于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笔谈”，继续呼吁弘扬传统文化。

笔谈文章有季羡林《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张岱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罗荣渠《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思索》等。

李桂海《现代人与历史的现代解释》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以论述史学理论如何现代化为中心，试图用现代意识以及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从新视角来阐述“历史的现代解释”的科学范畴和认识方法。

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作者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应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学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学两大历史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学又分为三个阶段，本书据此分为三编。第一个阶段即第一编，为鸦片战争前后到太平天国时期，即 1840—1864 年时期的史学。第二个阶段即第二编，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到义和团运动时期，即 1865—1901 年时期的史学。第三个阶段即第三编，为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五四运动前夕，即 1902—1919 年时期的史学。每一时期以及每一章节中注意论述史学思想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基础，并揭示其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又注意把握中国近代史学史发展的特殊规律。本书按史学发展的阶段性，按时代顺序介绍历史著作和历史学家，希望通过这种安排深入阐明各个史家、各个史学流派在某一特定时期的阶级地位、世界观和历史观，究明每一历史著作编写的时代背景和指导思想，以及各个史家、史学流派对立斗争或相互渗透的情况。

《文史哲》第 3 期刊登一组纪念和反思“五四”运动 70 周年的论文。

纪念“五四”的文章有庞朴《以五四精神继承五四精神》、彭明《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孙思白《纪念五四运动 70 周年断想》、李景

彬《五四文化意识的反思与中国文化结构的重建》、何中华《试论中国文化的启蒙与超越——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钱逊《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文化研究中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问题》、颜炳罡《五四·新儒家·现代文化建构》等。

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杨燕起、俞樟华编《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6月

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该书以广博的视野论述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全书分十个专题来展开，对先秦儒家之大一统思想、公羊学派之大一统思想、汉武帝之大一统与董仲舒之对策、司马迁与公羊、何休对公羊学的总结、宋儒之春秋学、清代前期的大一统论与公羊学、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及其大同思想等进行了系统阐述。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包括先秦编、两汉编、魏晋南北朝编、隋唐编、宋元编、明清编、近代编，共七编，按照中国历史的脉络，详尽地介绍从先秦到清末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对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汉代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清代的"考据之学"和近代的"西学"进行了详细的阐发，完整地再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面貌。

孙柏录在《山东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唯物史观与毛泽东》。

饶任坤、陈仁华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广泛收集了广西有关太平天国之口碑、碑刻、族谱、契据、手稿等资料。作者以《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为基础，精选收编了《太平天国史调查报告》、《太平天国史调查资料》等书的内容，并增加了在桂平、贵县、南平、蒙山、宜山等县收集的新资料，还收录了罗尔纲1942年与简又文到金田采访所得的资料。

**周朝民、庄辉明、李向平编著《中国史学四十年》由广西人民出

版社出版。

该书在编纂体例上有所创新，将“史学史”的形式揉进专题性研究中，注重从史学研究的具体领域和问题入手来阐述中国历史学四十年来的发展与变化。全书共列有 120 多个专题，网罗宏富，举凡中国史、世界史、史学理论、通史、断代史、考古学、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皆涵盖其中，特别强调重大历史事件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并重点说明史学界重大问题产生的原因、发展线索、主要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在从长时间大跨度方面回顾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史学发展历史方面具有首创之功。全书共分四编：第一编“初步发展”（1949—1966），第二编“严峻考验”（1966—1976），第三编“拨乱反正”（1976—1979），第四编“继往开来”（1979—1989）。

作者认为：“正确地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应该是中国史学正常地、健康地发展的唯一基础；同时也就是我们反思、描述、批评 1949 年至 1989 年中国史学四十年发展历程的思想立足点。”作者期望借助本书对中国史学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有一个文化学方面的反思”。

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

《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是反映太平天国运动、以战争为主线的专史地图集，共有地图 104 幅，图片 132 帧，图说 10 万字，全面反映了太平天国史上历次重大战役。该书汇集了 40 多位专家学者在太平天国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所有图幅都是在占有大量史料、进行详审考证的基础上编绘，并经过了反复的审核和多次修订。它在微观上可供查考太平天国战史上的许多具体细节，在宏观上又能帮助读者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过程和全貌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是《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的姐妹篇，为《图集》的考释部分。全书以太平天国战事考为主体，其中含有金田团营、占永安、围桂林、破全州、出湘鄂、克南京、天京城防、北伐西征、经略江西、两破江南江北大营、三河大捷、东征苏常、三战上海、皖南之役、石达开远征、二次西征、保卫安庆、天京失陷等战史的考释文章 27 篇，各篇内容联为一体，合起来成为一部完整而翔实的太平天国战争史。书中另有与太平天国紧密关联的释文 13 篇，内容主要涉及天朝宫殿考、太平天国行政区划考，以及捻军和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起义史事考。

该书填补了太平天国历史地理方面研究的空白。

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总结了甲骨学九十年研究的成果，系统论述了甲骨学的基本规律、研究方法与课题、甲骨学论著和甲骨文的流传与现藏、甲骨学家的贡献以及西周甲骨这一新分支学科。

祝瑞开《两汉思想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美国通史》各卷开始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该书被称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里程碑，从筹备编撰到完成出版，其间历经25年。

1978年，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座谈会提议，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由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牵头，编写《美国史》。1979年4月21至26日，在武汉大学召开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决定，由即将成立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组织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后改名东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6校有关人员，编写一套约150万字的6卷本《美国通史》，并推选南开大学杨生茂、武汉大学刘绪贻任总主编，杨生茂负责前3卷，刘绪贻负责后3卷。1979年11月29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会上对本书的编写任务作了分工：第1卷写殖民地时代，由北京大学负责；第2卷写独立战争前夕至内战前夕，由南开大学负责；第3卷写内战至19世纪末，由吉林师范大学负责；第4卷写20世纪初至20年代末，由四川大学负责；第5卷写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后改为1929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由武汉大学负责；第6卷写20世纪50年代至现今（后改为战后美国史），由南京大学负责。1980年，南京大学负责的第6卷改由武汉大学承担。由于各卷编写进度参差不齐，全书不能保证从第1卷起按顺序出版，邓蜀生建议将全书暂称为《美国通史丛书》，哪一卷先定稿就先出版哪一卷。由刘绪贻主编，韩铁、李存训、刘绪贻合撰的第6卷《战后美国史，1945—1986》最先写出初稿，由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6月出版。这是《美国通史丛书》的第1本（该书增订本《战后美国史，1945—2000》于2002年4月出版）。其后，由丁则民主编，丁则民、黄仁伟、王旭等合撰的第3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于1990年6月出版；张友伦主编，张友伦、陆镜生、李青等合撰的第2卷《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于1993年9月出版；刘绪贻、李存训著的第5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于1994年12月出版；李剑鸣著第1卷《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以及余志森主编，余志森、王春来、陆颖等合撰的第4卷《崛起和扩张的年代，1898—1929》于2001年9月同时出版。至此，

《美国通史丛书》6卷全部出齐，全书总字数超过原订计划近一倍，共约300万字。在此基础上，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10月出版了6卷本《美国通史》合集，这一迄今为止国内美国史研究的最大项目终告完成。

《美国通史》被视为中国世界史研究中的精品巨著，是我国目前内容最为丰富、篇幅最大的美国通史著作，标志着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7月

（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系统批判了长期以来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遵从的“冲击—回应”模式、“传统与近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挑战性地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所谓“中国中心观”，就是在研究中国历史时，“（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科，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

该书大幅度转换了中国历史学者的学术视角，出版后旋即引发巨大反响。此后，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者开始像柯文倡导的那样脱离“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进行研究的轨道，“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并在方法上大力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和工具来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

朱维铮在《复旦学报》第4期发表《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

作者认为，分裂的文化心态引导出的分裂的文化政策，是解释清代经学史的一个关键。中国保存中世纪统治形式的最后一个王朝，向以君主个人的高度专制著称，但适应政治“大一统”局面的经学，却始终是分裂的，而且出现“异端”居于主流、“正统”的理学反而被冷落的奇特景观。

唐长孺《山居存稿》由中华书局出版。

杨向奎《缁经室学术文集》由齐鲁书社出版。

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1989年，费孝通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一次著名的学术演讲，题目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讲所提出的观点和基本内容，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这篇演讲里，费孝通回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认为这个过程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自身特色是，从华夏族到汉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汉族在不断壮大的同时，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在中国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该文对中华民族构成的全局和中国的民族问题做了高层次的宏观的新概括，提出了民族研究中一个重大的新课题。学术界认为，这一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提出并通过论证而确立了"多元一体"这个核心概念在中华民族构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

1999年出版修订本。

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由齐鲁书社出版。

本书首次起用"明清实学"这一概念来概括明清时代"崇实黜虚"的学术特点，把明清实学总结为批判精神、经世思想、科学精神和启蒙意识四个特征。全书共分3卷62章，上卷写明代中后期，主要介绍实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状况；中卷写明清换代之际，论述了实学思潮的鼎盛时期；下卷写清代初中期，考察了实学思潮由盛而衰的过程。从内容上看，本书不是一部单一的思想史、哲学史，而是一部多维度的综合性学术史。

8月

15日　中国明史学会成立，白寿彝任名誉会长，王毓铨任会长。

是月　（法）勒高夫等主编，姚蒙编译《新史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该书系根据勒高夫和诺拉主编的《历史研究》和勒高夫、麦蒂埃、勒韦尔主编的《新史学》编译而成。所选文章皆出自法国年鉴学派主要代表

之手，系统反映了西方历史学理论的新进展、历史研究的新方法以及与历史学交叉的边缘学科的新动向，对国内史学界了解和把握西方史学发展大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童书业著、童教英编校《童书业美术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书主要由美术史札记、绘画论集、瓷器论集等三部分组成，选收了作者 1936 至 1966 年三十年间的有关论著，集中了作者在绘画史、瓷器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蔡少卿、孙江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回顾与前瞻——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认为，社会史的广义定义是“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其狭义定义可以是研究社会结构变迁时普通人的经历。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史研究发展的轨迹，可以归结出以下四个特点：课题激增，包括人口和家族血缘关系的研究、城市史、阶级和社会团体问题、人类学意义上的“心智”、“集体意识”或者“文化”的历史性研究、社会变迁（现代化或工业化）、社会运动或社会反抗现象；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领域的拓宽；新概念、新模式的采用。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帮助中国史学进行历史观的检讨，同时帮助中国史学走出危机。

同期还刊登了王家范《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一文，作者强调社会史作为“新史学”的特性，认为“社会史首先应作为传统史学的叛逆角色出现在学术舞台上”，社会史既不是历史学的一门专史，也不是分支。社会史应该一反历史学偏重经验叙述的旧习，通过“构建”和“理解”历史，使历史成为具有活的生命的、“有灵魂的人”。社会史必须紧紧围绕着从远古而来的我们是谁，我们是怎样走到这里来的，我们会走向何处，我们应该走向何处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新的社会历史反思，寻找新的角度和新的理论去重新认识历史的自我和现实的自我。中国社会史将以“我们是谁”为中心，综合回答以上四个相关的问题。

9 月

9 日 《考古》编辑部召开中国文明起源学术座谈会，座谈纪要发表在《考古》1989 年第 12 期上。

10 日 “殷墟甲骨文发现 9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安阳召开，120 名海内外学者出席。

20日 陈伯达逝世，终年85岁。

是月 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为藏学家、人类学家，中国社会学、民族学和藏学的开拓者之一。1938年，作者接受陶孟和、顾颉刚建议，深入甘南藏族地区拉卜楞寺，进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调查，研究藏族宗教，历时三年，取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并结合文献记载，撰写了《拉卜楞寺的僧官暨各级职员的类别》、《拉卜楞寺概况》等多篇论文，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国内各大刊物。该书就是这些文章的汇编。1947—1948年，作者赴美教书，1948—1949年赴英考察，其间作者将在国内已经发表的甘南藏区研究论文译成英文，并修改、整合成为一书，即《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稿件交美国耶鲁大学出版部后，作者回国，不久，中美断交，出版事宜就此搁置。1985年3月4日，作者逝世，由王辅仁将《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整理、校订，终于得以出版。

本书被认为是有关藏族宗教史的第一部杰作，全书分四编十五章，约23万字，分别论述了藏传佛教的几个主要教派并对甘肃南部藏族地区格鲁派名寺拉卜楞寺做了详细调研。

林增平、郭汉民、李育民《辛亥革命》由巴蜀书社出版。

（美）卡尔·A. 魏特夫著、徐式谷等译《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大陆史学家的讨论和批评。

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纵、横两个角度对1949—1989年间的中国历史学进行多侧面的回顾，分37个专题对史学理论、断代史、专门史、国别史、地区史进行了深入评述，从总体上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十年来史学界取得的成就。

甘肃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甘肃省图书馆合编，牟实库主编《丝绸之路文献叙录》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共收论文764篇，分政治军事、历史地理、丝路交通、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族宗教、语言文字、音乐百戏、丝路人物、丝路考古、敦煌文化、丝路研究综述等12大类，每大类下又涵盖多种专题，每篇论文都介绍内容梗概、学术观点和学术贡献。

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主编《中国远古人类》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系为纪念北京猿人发现六十周年而作，系统总结了我国自20世纪初开始的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以及第四纪哺乳动物学方面研究的主要成就和若干理论问题，因涉及面广、材料丰富翔实、观点鲜明新颖而广受好评。

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述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概括介绍了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选官制度的发展过程，剖析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各种途径和层次，并对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经验与缺陷进行了总结。

10月

7日 "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曲阜举行，江泽民就孔子问题发表看法。

本次会议由孔子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举办，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孔子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会议重点讨论了三个问题：孔子的思想及评价，包括孔子的"人学"思想，孔子的仁与礼、智，孔子的中庸思想；儒家思想及评价，包括儒学总论及其基本特征，儒家政治学说，儒家道德论，儒家教育思想；儒学与现代化，包括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儒学是促进还是阻碍现代化，儒学自身现代化问题。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接见了部分海外学者。他说，中国古代有孔子这样一位思想家，我们应引以为豪。孔子思想，是很好的文化遗产；应当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发扬。他在谈话中引用了孔子主张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强调不要思想僵化，不要主观主义。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公开对外发表关于孔子评价的言论，这是首次，表明了官方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视，产生很大影响。

20日 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是月 杜维明著、高专诚译《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由三联书店出版。

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仰韶文化专题研究论文16篇，作者从分析典型遗址入手，系统讨论了仰韶文化的类型和分期问题，全面考察了仰韶文化发生、发展、消亡以及转化为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历程，并对仰韶文化内部的融合和

分化、相邻原始文化在仰韶文化发展演变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书中对进一步开展仰韶文化研究的方法和途径也进行了论述。

2009 年又出版了增订本。

（英）古奇著、耿淡如译《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开始由上海书店出版发行。

本丛书为目前国内影印出版规模最大的一套书，共分十一大类：即哲学、宗教类；社会科学总论类；政治、法律、军事类；经济类；文化、教育、体育类；语言、文字类；文学类；美学、艺术类；历史、地理类；科学技术史类；综合类。原计划收编 3000 种左右文献，分十编陆续出版。已出版一至五编，共收书 1126 种，主要包括民国时期在我国境内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并酌情选收了同时期国外出版的中文图书。1996 年后出版陷于停顿。该丛书的出版对于保存民国学术著作和历史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 1700 余页、130 万字，考察了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期间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成的过程，侧重从中外贸易、农村经济、银行钱庄、水上航运等领域，分析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破坏，叙述列强对华早期资本输出、中国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产生及其同中外势力的联系与矛盾。全书内容翔实，资料丰富，整理和引用了大量罕见的外文档案（包括海关档案）和中外文报刊资料。

1991 年，该书荣获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在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发奖会上评价说，这部著作“是解放以后 40 年来我国最重要的社会科学著作之一，代表了已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最高成就。这部巨著从 50 年代初即着手进行，历时近 40 年，是几代经济史学专家学者的劳动成果。这部著作突出的特点和优点是：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我国鸦片战争以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史，依据对史实的分析，得出自己的论断，在一些问题上，不拘泥于已有的论断。如对鸦片战争的原因、性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形成和构成，帝国主义侵略，农民起义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创见。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结合。旧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演变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紧密相

关。该书用相当篇幅分析了旧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用史实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统治势力相勾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破坏作用。该书既是一本科学著作，又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三、史论结合，实事求是。全书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经过精心筛选，取材精练，论述清晰，和其他一些经济史著作相比，这方面比较突出。四、全书结构严谨、分析细腻，文字流畅。”

11 月

21 日　刘大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旧体诗《见说四首》，对孔学热提出批评。

诗序云：“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据说得力于奉行孔学。到底是孔学可以指导现代化还是要把现代生活拉回到孔学思想里面去，没有本领参加讨论，打油数首存疑。”

第四首写道：“一钱一果互相争，现代微言未许轻。泰斗为文呼祸本，青天传语又时行。新儒有道推君子，老店无缘拜圣人。我自沙滩楼下过，可怜德赛两先生。”

诗歌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

是月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白钢等著《历史学的发展趋势》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作者在对中国史、世界史研究的过去、现状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未来作了展望，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新体系的具体方法和步骤。

姜义华、赵吉惠、瞿林东、马雪萍《史学导论》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作者借鉴了中外史学理论成果和史学实践经验，将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本体论、史学形态学以及历史认识主体自身的素质整合为一个统一的论述体系，借此来揭示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分析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考察关于历史实际及其规律的本体论，探讨史著、史学论文等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阐述历史学家为提高自身素养、担负起时代使命所应走的必由之路，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一些颇具前沿性、原创性的论点。

2003 年，姜义华、赵吉惠、瞿林东三人又合作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提出了以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这三大范畴来建构史学概论教材的框架。上编“史学本体论”，主要对史学研究进行本体论反思，把史学研究实践作为一种“存在”去研究，以弄清这一人类认识活动的目的、性质及其意义，对“什么是历史科学”这一问题进行回答。中编“历史认识论”，主要对史学研究成果作知识性反思，集中回答历史知识如何形成、何以可能的问题，即对研究历史知识的性质进行研究。下编“史学方法论”，主要对史学研究的经验程序、思想方法、研究途径进行反思，它对史学研究的思维活动程序作抽象化、形式化、相对固定化的研究，主要解决历史认识手段、方法、途径的合理性、科学性问题，为如何获得正确的历史认识提供方法论指导。这三部分相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作者对史学概论教材框架的建构独树一帜，为学界许多人接受。

（美）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美）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由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为美籍华裔学者。该书以《文心雕龙·史传篇》为基础，分立二十四个专题，从中西史学比较的角度对中西史学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梳理、剖析，凸显了中西史学不同的发展脉络与体系，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册于1991年3月出版，下册1991年11月出版。

12月

13日　“评析金观涛三本历史著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该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和《史学理论》编辑部联合举行，邀请了北京、上海、天津、吉林、山东五省市的部分史学家就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三本书举行座谈和评析。

会议纪要说：座谈会由《历史研究》主编田居俭主持，先后发言的有林志纯、廖学盛、刘修明、沈定平、田昌五、林甘泉、蒋大椿、庞卓恒、丁守和、陈启能、胡绳武、王思治、夏良才、李祖德等。会议从认识论、

方法论和学风等方面，剖析了这三本书的严重问题。会议认为，“超稳定结构”、“庸俗系统论”是反唯物史观的认识论，把“新三论”无条件运用于历史研究是错误的方法论。

会议还对当时的学风进行了反思，认为在金观涛之后，国内又出现了“三论史学”和“新三论史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视为代表“新史学”发展的趋势，而实际在国际史学发展中并不存在。这种赝品长期被视为珍品并长期得不到纠正是不正常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说，与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一贯的大气候有关，与没有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史学研究中存在着需要革新的问题。此外，从学术风气和治学态度的角度看，也有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训。那种热衷于追求“轰动效应”、急于成名成家、急于构筑庞大体系、动不动就宣布解决了“历史深层之谜”、动不动就宣布创造了一个新的体系等做法，是应当否定的。

16日　刘大年在《求是》第24期发表《说历史的选择》。

作者认为，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斗争，特别是和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全国政权的斗争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中国近代历史说明，社会主义道路是三四代先进的中国人总结经验教训作出选择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选择的，是大多数中国人在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在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空前提高了觉悟，群起参加选择的。近代历史提供了两个基本认识：一个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它是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各个社会阶级、各种社会势力之间长期反复斗争的结果；另一个是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转变为社会主义，是历史选择的继续。

18日　“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国际学术讨论在复旦大学召开。

会议分总体反思、孔子是非、儒家透视、个案探索、现代意义和未来估计六个专题展开。学者们围绕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展开了争论。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认为，儒家思想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文化资源。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儒家人文精神所体现的知识分子的典范，可以成为未来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形态。复旦大学姜义华认为中国新型文化的创造，是一个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之流重新疏浚，并对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汇合流积极疏导的巨大工程。只有将古今中外思想文化成就进行整合，才能有大成。清华大学钱逊认为孔子和其他儒家所提出的重义轻利、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原则，是合理的和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是至今仍需提倡的道德原则。美国马里兰圣玛丽学院罗思文指出，《论语》

等早期儒家著作中的思想，对西方哲学的结构框架构成根本性的挑战，可以提出新视角。复旦大学谭其骧则认为，儒家思想体系是历史的产物，只能放在思想史中研究，历史地对待，把儒家思想和未来社会联系起来，大有功利主义之嫌。

是月　胡道静主编《简明古籍辞典》由齐鲁书社出版。

本书共收辞目1944条，主要介绍了古籍图书和古籍整理等一般知识，古籍图书的体例、古籍的分类和目录学知识等。分为七个门类：（1）统类，介绍古代典籍的名称和古籍整理知识，凡136条；（2）体例，介绍古籍编纂体例，144条；（3）分类、目录，介绍古籍分类和目录学知识，以及重要的古籍书目，49条；（4）版本，介绍古籍版本知识，160条；（5）人物，介绍重要的著作家和藏书家，503条；（6）要籍，介绍经、史、子、集四部主要典籍的内容，751条；（7）藏书处，介绍历代官、私藏书楼，201条。

《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罗义俊编著《评新儒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要介绍了什么是新儒家，新儒家的精神、哲学思想、历史文化观念是什么，有什么贡献、不足和缺陷等等。

林耀华著，庄孔韶、林余成译《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是以小说体裁写成的学术著作，于1944年在美国出版，副标题为“一部家族的编年史”。1947年在伦敦出版修订本，副标题改为“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篇幅上增加了最后一章的理论阐述，并请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斯教授为之作导论。1977年，中译本在台湾出版。1983年，庄孔韶、林宗成重译，并于年底出版。

该书所叙述的故事发生于自辛亥革命到日本入侵中国期间，以中国南方闽江中游的农村、乡镇乃至都市为背景，再现了这一地域农业、商业、文化、政治等基本情况。书中的主要情节围绕在黄东林和他的姐夫张芬洲为代表的两个家族兴旺、衰败的历史，尤以黄东林的家族生活为主。作者用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细致描绘了中国南方广阔的社会生活，对这一地域的传统农业、商业、地方政治、民间仲裁以及看风水、供灶神、祭祖先、婚葬仪式、节日娱乐，还有大家族的亲属关系、礼节与纷争等进行了逼真的反映。“著者序”中言：“《金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这部书包含着我的亲身经历、我的家乡、我的家族的历史。它是真实的，是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历史；同时，这部书又汇集了社会学研究所必需

的种种资料，展示了种种人际关系的网络——它是运用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的结果。”

马曜、缪鸾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中国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发起，邀集大陆和港台约三十多位专家撰文。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凡六篇，记述陈寅恪的事迹，讨论其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第二部分三十七篇，就陈寅恪生平曾经涉及过的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问题进行专题探讨。

季羡林为该书作序，语云：“寅恪先生继承了清代朴学考证的传统，但没有为考证所囿。考证学者往往不谈义理，换一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不大喜欢探索规律。但是，寅恪先生却最注意探索规律，并不是就事论事。他关于隋唐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证。他间或也发一些推崇宋学的议论，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今世论者往往鄙薄考证之学。实际上，研究历史首先要弄清史实。考证不过是弄清史实的手段，既不必夸大其词，加以推崇；也不必大张挞伐，意在贬低。我们历史学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高唱‘以论带史’，却往往是‘以论代史’，其甚者甚至置史实于不顾，而空谈教条，这样的教训还少吗？提倡一点考证，可以济我们历史研究之穷，不是一件坏事。寅恪先生利用考证达到弄清史实的目的，一直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创刊号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创刊词”集中反映了该刊的办刊旨趣和学术主张，云：“深入的学术研究不需要热，甚至需要冷，学者的创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仅需要独立而且常常以孤独为伴侣。”“着眼点在学术，即主要对文化现象作学术研究”，“对具有中国学术特点的一些专学和绝学，如甲骨学、敦煌学、西夏学、周易学、许学、选学等等，以及为时尚淹没的学科和被冷落的学者，本刊将给予格外的重视”。还提出：“本刊确认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只求其是，不标其异。新，固然是人心所向往；旧，亦为人情所依恋。关键是一切从学术出发，提倡独立的自由的学术研究，自由才能独立。即使物境不自由，学者的心境也应获得自由。为学之道，尚同比求异更重要而且深刻得多。”在方法上，“提倡从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入手，主张宏观与微观结合，思辨与实证结合，新学与朴学结合”。并宣称“为了走向世界，首先还需回到中国”。

黄永年、贾宪保《唐史史料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书采用我国传统四部分类法而略作调整，按纪传类、编年类、典章制度类、职官类、仪注类、法令类、诏令类、地理类、谱牒及职官姓名类、杂史杂说小说类、诗文类、类书类、金石类、书目类、敦煌吐鲁番文书类介绍各种唐史研究所需掌握的各种史籍史料及其源流、利用方法，也指明其对于唐史研究之功用。对于研习唐史具重要的指导作用。

耿云志编《胡适年谱》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苏双碧《洪秀全传》由大地出版社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目录提要（1949.10—1985）》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本书辑录了1949年10月至1985年公开发行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专著和论文的目录，共有298篇论文提要，论文目录2158条，著作目录235条。

是年

《北朝研究》创刊。

该刊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主办，初为半年刊，后改为季刊。它是第一种专事北朝史研究的刊物。

王元化主编《海外汉学丛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丛书遴选日、美、欧洲著名汉学家对中国哲学、历史、文学、宗教、民俗、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经典性著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所收包括铃木大拙著、葛兆光译《通向神学之路》；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译《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高友工、梅祖麟著，李世跃译，武菲校《唐诗的魅力》；斯蒂芬·欧文著、郑学勤译《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内田道夫编、李庆译《中国小说世界》；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严寿澂校《南明史》；何炳棣著、葛剑雄译《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和基督教》；唐纳德·J. 蒙罗著、庄国雄等译《早期中国“人”的观念》；莱芒·道逊著、金星男译、朱宪伦校《中华帝国的文明》等。

刘东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开始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该丛书是近年来规模最大、行销最广、影响最深的一套海外汉学丛

书。丛书总序说：“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逐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该丛书预计翻译出版海外汉学著作 100 种，所收著作皆为海外著名学者的代表性作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包括韦伯、费正清、史华兹、谢和耐、魏斐德、周锡瑞、周策纵、艾尔曼、柯文、列文森、孔飞力、史景迁、施坚雅等名家的名作，如《儒教和道教》、《中国：传统与变革》、《中国古代思想的世界》、《中国社会史》、《洪业——清朝开国史》、《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从理学到朴学》、《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等等，基本上涵盖了海外几代汉学家的代表性作品，反映出海外汉学几代人不同的学术框架与发展。这些学术框架主要是：一、“冲击——回应”模式，二、“传统——现代模式”，三、“中国中心取向”模式。

该丛书虽冠名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但着重介绍的主要还是“美国的中国研究”。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主编认为：“这套书的真正贡献并不在于引进了多少孤单的断论，而在于以相对完备的覆盖面，引进了一个自我更生的自成一统的学术过程，从而为我们的精神视野竖起了另一个参照系。”

上海博物馆主办《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季刊）创刊。

它是目前我国文物保护和考古科学技术领域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唯一一份正式出版专业刊物，主要刊登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科技考古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论文、应用经验、综合论述及相关信息。

何光沪主编《宗教与世界丛书》开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这套丛书包括《宗教与文学》、《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社会中的宗教》、《我的佛教观》、《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等外国学者的著作。

吴汝祚在《辽海文物学刊》第 2 期发表《我国社会发展到文明的两个里程碑》。

该文认为，我国的文明史应该提到五千年以前，应与西亚、北非同步进入文明时代。中国文明的产生在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主要表

现在距今六千年前后的分工、产品分配的不平等和私有制的产生。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有不少陶器已由原来的生活用具变成礼器，表明当时大汶口文化社会的大变革将要或已经来临，即将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以及东北地区辽河流域一带的史前文化，都呈现出史前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的转折。第二个里程碑是在第一个里程碑的基础上相继出现了具有文明时代的基本要素。如大汶口文化、陶寺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在出现大型墓葬的同时，还出现了不曾为一般人所拥有的特殊随葬品，且数量多、质量高，是贫富分化、等级贵贱、阶级对立的见证。这一时期的人殉、人祭的出现，与宗教有关的坛、庙、冢等礼制设施，都表明当时已经有了文明曙光的信息。作者认为，我国早在五千年以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1990年

※ 季羡林、周一良、庞朴主编《东方文化丛书》出版。
※ 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出版。
※“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
※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出版。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
※ 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出版。

1月

10日　岳麓在《光明日报》发表《一个假科学的范本——评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

仓山在《光明日报》发表《“表象背后”的启示》。

文章对“金观涛现象”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金观涛和他的‘超稳定结构’论之所以在一段时间里成了热门话题，是有历史原因的。一是历史学界通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有一种走出旧框框的迫切心情。二是人们朦胧地认识到学科交叉和科学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认为这毕竟是一种新的尝试。三是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似乎是用一种新的方法解释了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老问题，即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得以长期延续等。”

是月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共两册，330余万字。陈翰笙为编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刘思慕、吴于廑、朱庭光。主要介绍了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大洋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国际关系史等。凡人类起源、社会经济形态、宗教、外国史学史及史学理论、中国世界史研究机构及学者等都有涉及。所收词条撰写质量较高，从整体上反映了当时我国世界史研究水平。

吴于廑为该书撰写了序言《世界历史》，提出世界历史演进沿着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运行，并以高度概括的笔触概览了世界历史全局，在世界史学界产生广泛影响。

晁福林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论殷代神权》。

本文以甲骨卜辞为依据，结合文献及考古学的有关材料，系统地论述了殷代神权的内容和特点，突破了过去那种以“帝”为殷代最高神的传统认识。作者认为，殷代神权基本上呈现着三足鼎立之势，即以列祖列宗、先妣先母为主的祖先神，以社、河、岳为主的自然神，以帝为代表的天神。三者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帝只是殷代诸神之一，而不是诸神之长。居于殷代神权崇拜显赫地位的是殷人的祖先神，而帝则不过是小心翼翼地偏坐于神灵殿堂的一隅而已。整个有殷一代，并未存在过一个统一的、至高无上的神灵。

田昌五在《世界历史》第1期发表《从西方历史看中国封建社会——兼评超稳定社会结构说》。

作者认为：“金观涛把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改组为超稳定社会结构说抛出来，……这不是对历史科学的推进，而是历史研究的倒退。尽管金观涛以什么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自诩，他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却是唯心主义的。”“超稳定结构说否定封建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毫无道理的。”“超稳定社会结构说是以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方向为旨归的。这就是超稳定社会结构说的要害所在。”

苏双碧《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月

王毓铨《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作者在其所著《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书中依据出土文物，对我国秦代以前的货币，特别是金属货币的沿革作了概述。全书正文共分十章，主要介绍了我国最早的货币——贝、布钱、刀货、圜钱、古代货币单位、楚国货币——爰金和铜贝、铸钱权等古代货币知识。书中收录了秦代以前钱图43幅，均按原样墨拓。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发展演变的通史性著作。全书以

中国有史以来的少数民族为主，联系华夏汉民族的产生、形成与发展，既记述各民族自身的生成与演化，又叙述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与融合，同时概括出各个民族盈虚消长和兴衰治乱的特点和规律，是中国民族关系研究领域中一部重要著作。

陈宝辉、尹福庭、庄建平《太平天国诸王传》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入太平天国有王号者 33 人的生平事迹，包括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秦日纲、胡以晃、李世贤、杨辅清、蒙得恩、罗大纲、林凤祥、李开芳、曾立昌、曾添养、林启容、陈得才、赖文光、梁成富、黄文金、黄呈忠、范汝增、谭绍光、陈坤书、陆德顺、汪海洋、谭体元、周春、洪春魁等。

该书是迄今记叙太平天国人物最多的一本传记。

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三卷，110 万字。第一卷为先秦至隋唐五代部分，第二卷为两宋至鸦片战争前部分，第三卷为近代部分。全书共对包括《尚书》、《春秋》、二十四史及《明儒学案》、《畴人传》、《中国文化史》等在内的 86 部古今史学著作进行了论述和介绍，重点在于对史学著作中的重大学术问题、史著体例的优劣、史著作者的学术流派、学术思想等进行阐发。书中尤其对问世较晚的近代史学著作给予充分肯定。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且具有工具书性质。

2006 年，作者又在三卷本基础上进行修订完善，出版了五卷本。

范达人《当代比较史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从理论和史实两个层面入手来展开论述，在当代比较史学的可行性、功能、模式及具体程序等方面颇有创见，并重点对美国、苏联及港台地区比较史学的现状进行了评介。后附国外著名比较史学家的重要论文和我国近年来发表的比较史学论文目录。

3 月

26 日　“第六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厦门大学召开。

主要议题为“40 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总结与回顾”。与会者着重就 40 年来史学发展状况的基本估价、关于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关于西方史学的引进问题、关于史学理论科学的建设问题进行了讨论。

是月　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出版。

全书将中共党史研究分成萌芽、初建、成型、挫折、复兴五个阶段，分别论述五个阶段党史研究的概况、特征，论述了其中的代表性著作。作者认为：从1924年至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为“萌芽”期；从1935年红军抵达陕北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为“初建”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夕，为党史研究的“成型”期；从1966到1976年的“文革”十年，为党史研究的“挫折”期；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本书写作的1989年，为党史研究的“复兴”期。

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用编年体例记录了各省区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八十年间水、旱、风、雹、火、蝗、震、疫等各种自然灾害的情况，详细叙述了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受灾范围和程度、灾区群众的生活情况以及政府的救荒措施和弊端，是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拓荒之作。

在此书基础上，李文海等又编撰了《灾荒与饥馑：1840—1919》（1991年出版）一书，对中国近代史上历次大的自然灾害的发生、程度、影响范围、造成的危害以及政府救灾措施和弊端做了具体全面的描述和分析，堪称中国近代灾荒史的纲要。

1993年9月，李文海等又出版了《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为《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姊妹篇，记载了后者未涉及到的1919—1949年的灾荒史，全面反映了这三十年的灾荒面貌。

《裴文中科学论文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书中收录了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奠基人、北京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所撰重要论文36篇，集中反映了作者在旧石器考古、第四纪哺乳动物和第四纪地质等多方面所取得的卓越研究成果。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由北京大学出版，中国的现代化研究由此发端。

本书收集了1920—1948年间我国思想界关于东西文化观、中国现代化问题、中国文化出路问题、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问题等几次大论战的有关文章。书前有主编长文《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

刘修明在《世界历史》第2期发表《发展的中国社会和凝固的超稳定系统——对金观涛〈兴盛与危机〉等书的质疑》。

方立天《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在体裁上独辟蹊径，一改中国哲学史写作中以人物和学派发生的历史先后为纲来叙述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的俗套，采用“问题解析体”的形式，即以问题为纲来叙述各类重要的哲学问题的源流演变，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全书共论列十二个问题：（1）宇宙生成论，（2）本体论，（3）时空观，（4）常变观，（5）矛盾观，（6）形神观，（7）人性论，（8）人生理想观，（9）历史观，（10）名实观，（11）知行观，（12）真理观。设十二章，对每一问题的本末源流、基本论点、发展演变作了详细明晰的论述。

王先明在《河北学刊》第 2 期发表《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

认为社会史通过研究和描述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再现社会历史的基本面貌，并揭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是建立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点的一门边缘学科。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自序对该书内容做了说明，云：“凡前人之说有可取者，悉甄采之，句读之有误者正之，史证之偶疏者补之，亦间附论说以评断之。”作者对《汉书·艺文志》的句读和标点极为审慎，有些地方纠正了目前一些通行本的错误，评断的内容非常广泛，多为作者创见。

冻国栋《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局限性，下篇论述唐代商品经济的经营管理形式，并从理论上探讨了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限度和商品经济经营管理方式的历史特征。

4 月

乔幼梅在《历史研究》第 2 期发表《从中唐到北宋钱荒问题的考察》。

“钱荒”是唐中叶、两宋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演变过程中产生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经济现象，长期以来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众说纷纭。针对这一奇特社会经济现象，作者从具体地分析情况入手，对从中唐到北宋的“钱荒”问题进行了细致地考察和探索。文章辨析了“钱荒”问题的提出和由来，对北宋时江淮、两浙等地“钱荒”的具体表现，北宋时期铜钱蓄藏、外流、销铸和局部地区钱币壅滞不通情况，造成钱荒的实质性问题等进行了研究。

史全生《中华民国文化史》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尹达、张政烺、邓广铭、杨向奎、王煦华等主编《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由巴蜀书社出版。

张岂之主编《中国儒学思想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由绪论和十五章组成，从孔子写起，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为止。书中提出先秦儒学是人学的看法，对其产生的历史文化积累过程和人学的基本内容作了考察，并对封建社会儒学思想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该书重点是：一、对《大学》、《中庸》的研究；二、对《易学》的研究；三、对儒学思想与自然科学关系的研究；四、对儒学思想与佛、道关系的研究；五、对宋明学表现形态——理学两重性的研究；六、对清代实学的研究。

作者认为，先秦儒学实质是研究人际关系的人学，从汉以后，儒学作为研究人的本质和调节人际关系的理论，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存在着多方位的关系：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成为儒学发展的奠基石之一；另一方面，儒学中的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独断主义、神秘主义，既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积极的推动，又给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强大的精神束缚，因而尽管它在一定阶段给数学、天文学、医学、农学等领域带来了辉煌的成就，但直到清代实学产生之前，中国古代自然科学都未能找到高度抽象的逻辑形式，亦未能取得学术的主导地位。书中这些看法引起了争论。

杨向奎、张政烺、孙言诚《中国屯垦史》上卷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中卷由张泽咸等著，1990年7月出版。下卷由王毓铨等著，1991年12月出版。本书共82万字，以屯垦为中心，结合开垦土地、兴修水利、改革农具、技术革新以及田制等有关各方面，对我国古代屯垦的历史进行了综述。

郑家栋《现代新儒学概论》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研究海内外新儒家思想的论著。除导言外分“现代新儒学的思想特质”和“现代新儒学的逻辑发展”上、下二篇，共六章。附录“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评述”。上篇重点从文化、哲学和学术方法三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探讨了现代新儒学的文化立场、思维方式、理论特征、历史观念以及关于如何诠释历史文化的学术方法的认识，下篇具体论述现代新儒学的几个主要的历史阶段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上篇主要着眼于现代新儒家的共性，下篇则更注重探讨现代新儒学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以及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间思想上的个性差异。

作者将新儒家划分为四代，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是第一代，冯友

兰、贺麟、钱穆是第二代，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是第三代，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是第四代。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蒋大椿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发表《金观涛的理论追求及其迷误》。

文章批判金观涛从非难“终极原因”着手，否定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贬低哲学的功能，否定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宣布唯物主义已经被“证伪”，否定实在世界和事物的客观性质，最终只能使他的错误的理论追求坠落深谷。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说存在基本理论错误。

5 月

9 日 朱杰勤逝世，终年77岁。

25 日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成立暨第一届学术年会”在南京召开。

罗尔纲担任该会名誉主席，王庆成、苏双碧、陈周棠、沈嘉荣、茅家琦（常务）、钟文典、郭毅生、段本洛为主席团成员，方诗铭、史式、牟安世、祁龙威、江地、李侃、林增平、谢兴尧、戴逸等担任顾问。

是月 王玉哲主编《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1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唐）、第2卷（两宋元明）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共3卷，第3卷（清、近现代）于1993年7月出版。

该书收录了上起先秦下迄现代八十多位地理学家的评传，介绍了其生平、学术造诣、研究成果，以及其在中国地理学发展史的学术地位，基本反映了中国地理学的学术源流及发展脉络。

《史学月刊》第3期出版《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殷商史）。

魏宏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由档案出版社出版。

6月

陈启能主编《史学理论丛书》第1辑《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史学理论》于1989年底停刊后，为使刚刚复苏的史学理论研究不至于中辍，陈氏筹措出版《史学理论丛书》，至1992年《史学理论研究》创刊，两年间共出3辑。第2辑《福尔摩斯的符号学——皮尔士和福尔摩斯的对比研究》、第3辑《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于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蒋大椿在《天津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马克思主义是在开放中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

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曾做出这样一个论断，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所谓"封闭的思想体系"。这个无知的谬说，对于不太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年轻人，可能具有一定迷惑作用。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不适合中国国情"论，在逻辑上也是以这个谬说作为立论根据的。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巴蜀文化研究基金会编《郭沫若史学研究》由成都出版社出版。

周一良《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录作者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80年代所撰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文18篇，论述了中日不同时期历史、文化、政治关系中的重大问题。所收文章包括《围绕汉字的中日文化交流》、《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选择问题》、《中日文化的异与同》、《从中秋节看中日文化交流》、《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日本推理小说与清朝考据之学》、《鉴真的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入唐僧圆珍与唐朝史料》、《荣西与南宋时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几个侧面》、《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中日人民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日本——兼论宫崎寅藏与孙中山的关系》等。

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由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古代和亲的学术专著，对和亲起源、性质、作用以及历史上不同时期和亲的特点等问题做了探讨。

郑师渠《中国传统文化漫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牛平汉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

季羡林、周一良、庞朴主编《东方文化丛书》由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

“总序”中说：“我们这一套东方文化丛书，顾名思义，就是想给读者以有关东方文化的知识，帮助他们了解什么叫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东方文化中占什么地位？东方文化当前的作用是什么？衡以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的发展前景如何？”所收书籍包括季羡林《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周一良《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印顺《中国禅宗史》、胡晓明《中国诗学精神》、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 1 卷）等。

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该书辑录作者有关古西域史地及文物方面的 17 篇论文及 1 篇书评。所收文章皆发表于《文物》、《文史》、《考古》、《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另有 5 篇有关史地文物方面的论文作为“附卷”附于书后。

作者通多种外语，故能在书中应用多种中外文献阐发考证。作者是我国对新疆出土的佉卢文字全面调查、归类、分析而又做出成绩的第一人，也是我国早期整理、利用、研究吐鲁番文书取得成绩的重要学者之一。

陈智超编著《陈垣来往书信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收陈氏 1917 至 1969 年间与蔡元培、章士钊、郭沫若、胡适、王国维、傅增湘、柯劭忞、顾颉刚、傅斯年、范文澜、余嘉锡、冯友兰等 200 余人来往通信 1261 通，内容涉及切磋学问、解析疑难及购书谋事、通问起居等，反映了近现代社会及学界情况，特别是陈氏的学术经历。大体按人物和通信时间排列。编者除对通信者和通信时间考订以外，还查证了大量资料，对各信的撰作人及信件的内容和背景作了注释。

2010 年 11 月，三联书店又出版增订本，篇幅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陈智超在前言中说：“增订本的一个任务，就是要纠正初版中的失误”。但新版中仍存在一些编年、注释等方面的疏失。

7 月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中国大陆第一本断代社会史，涵括内容极其广泛，凡有关清代各民族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结构（诸如等级、社团、宗族、家庭），生活方式和习俗风尚（诸如衣食住行、婚嫁丧葬、岁时节日、文化娱乐、社会交往），人口增殖和社会救济（诸如人口的增减与分布、年龄与性别、就业与移民、社会的灾荒与救济）等均有论及。作者力图分析社会生活在清代全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集中探讨了清代社会生活自身的发展演变及其规律，阐释了清代社会生活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广采博摭，

除了运用历史学的归纳法、演绎法、考据法外，还利用了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姜义华等编《孔子——周秦汉晋文献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集了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现存文献中有关孔子言行的各种资料，按儒家经书、周秦诸子与史志、两汉诸子与史志、纬书、魏晋南北朝诸子与史志分五卷加以编辑，附录一篇敦煌遗书，并扼要地对这些文献的沿革情况与史料价值作了介绍。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72至1982年间，甘肃省考古工作者调查并发掘了肩水金关、甲渠候官（破城子）、甲渠塞第四燧遗址，获汉简1万余枚。本书所收即是这批汉简中的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出土部分。

李均明、何双全辑《秦汉魏晋出土文献散见简牍合辑》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张培瑜编《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研究中国历史、年代、历法，查阅史日的工具书和天象资料书，也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天文年代学著作，内容包括中国历代颁行历书总集（历表）和制订历法依据的天象汇编（朔望分至八节日食）。其中《前1500年至公元2052年合朔满月表》详列精确的朔望的月日时刻，使人可以了解其间任何时候真实的月相和历法的合天情况，对于重建殷周年代甚为重要。书中不仅在《历代颁行历书（摘要）》中注记二十四节气，还提供了《前1500年至公元2050年分至八节表》，这一开创性的工作丰富了中国天文年代学的内容，也大大提高了历谱的科学性，在天文年代学领域确立了独特的地位。

论者认为，该书与其他中外天文年代学著作相比，具有年代久、资料齐备、数据计算精确、使用方便四大特点，是中国天文年代学最重要的著作，为中国年代学、天文学史、历法史、科技史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准确的资料。

8月

26日　金冲及率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参加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第17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27 日 “鸦片战争 15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30 日 钱穆在台湾逝世，终年 95 岁。

31 日 “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出席会议的代表和特邀代表共 80 余人，其中来自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专家学者有 22 人。本次会议是改革开放后在国内举办的有关这一主题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是月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国文化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规模较宏大、体系较完备的中国文化通史。近百万字，上起中华文化的发生，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系统翔实地论述了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生态环境，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相互推动的发展历程。

刘大年主编《中日学者对谈录——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文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第一部对商周家族组织形态及其演变情况作系统、深入研究的专著。书中借鉴了现代人类学的成果和方法，跨用甲骨文、金文、侯马盟书等古文字资料，利用田野考古发掘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见解，出版后受到广泛赞誉。

韦实在《求是》第 15 期发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不容否定》。

文章归纳了黎澍对历史创造者问题所持观点的主要论据，即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提法是苏联哲学家尤金在 1939 年首创的，“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这样说过”，“人民群众仅仅提供了‘舞台’和‘源泉’”，“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等，对其进行了逐条批评。

作者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如黎澍说的是“僵死的历史公式”。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历史。

傅筑夫编《中国经济史资料》（先秦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系统而详尽地论述了我国封建土地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规律，提出一系列新颖独到的观点。论者认为，该书在“如何认识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土地私有制是如何从共同体土地所有制的母胎中产生出来的”、“如何判断土地私有制的封建性质”、“如何认识我国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特征”、“如何判断我国封建社会何者为封建土地国有制和何者为封建土地私有制以及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等重大理论问题上实现了突破，是“一部自成体系的独具匠心之作”。

9月

李侃《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作者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考察，回顾了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封建旧文化在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变革中所受到的冲击和挑战，并对近代新文化的产生和形成过程进行了考察。

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八国联军侵华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1949年后第一部研究八国联军侵华史的专著。

龚书铎、刘桂生、王俊义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评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的基本立场是肯定传统和传统文化。所辑录的十篇文章从多方面批驳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种种表现，并对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契合、关于文化研究中的反思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杜经国、庞卓恒、陈高华《历史学概论》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内容分为三编，分别讲述“什么是历史”、“为什么要学历史”和“怎样学习历史”三方面问题。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景有泉等主编《中国历史研究专题述评》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宗华《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本书包括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的全部照片、释文、注释，其中六种附有语译。

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 1 分册）由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

第 2、3 分册于 1996 年出版。

（波兰）耶日·托波尔斯基著，张家哲、王寅等译《历史学方法论》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中英合作编撰大型图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开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在敦煌文书研究上有划时代意义，共 14 卷，1995 年 5 月出齐。

中英合作项目启动于 1987 年 8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者共同对英国所藏敦煌文献进行拍摄、整理、研究、出版。各卷主编皆由中方编委担任，主要编辑工作由沙知、宋家钰、周绍良、张弓、宁可等主持完成。本书选材范围为斯坦因获自敦煌的汉文文献，包括原藏于英国国家博物馆今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者、藏于伦敦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者、藏于英国国家博物馆者。选择内容限定为佛经以外的汉文文献，包括各种文史资料、官私文书、寺院文书以及道教摩尼教经典等，兼及少量图书。不收的佛经指经、论、律、疏、译传、疑伪经品以及附属的题记等。

该书受到海内外敦煌学者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反映英藏敦煌文献最清晰、最完整、最准确的图版本，其图版清晰之程度，远远超出过去人们广泛使用的缩微胶卷或从微卷翻拍的照片。该书出版后，除了极少数照片不如原卷清楚外，大部分英藏敦煌汉文佛经以外的文献已经可以看作是可以信赖的文本。

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旨在“将义和团研究的视角移向区域性考察”，作者将文献资料与口碑资料相结合，冶历史研究法和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于一炉，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群体组织、民俗信仰、文化心态、人生观念等方面来探察义和拳衍生的文化土壤。书中刊有大量图表，其中包括山东冠县、邱县、临清和直隶曲周十八村村落图，以及义和拳起义斗争活动的路线图，还有义和拳起源地的人口状况、土地经营、财产变迁等方面的统计表。编者还选辑了中外文档案中有关义和拳源流的资料，有些是新发现的第一手材料。

10月

7日　中国史学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主办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济南召开。

130多名中外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28名外国学者分别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波兰、匈牙利等国家。会议的议题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义和团与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教会、教案与义和团运动”、“对义和团运动及该时期人物的评价”。会议论文集《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

14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对郭家庄墓地北部的160号墓进行发掘。

该墓未经盗掘，共出土铜、陶、玉、石、骨、牙、竹、漆等各种器物共353件。其中青铜器291件，38件铸有铭文。青铜器有礼器、乐器、工具、兵器、杂器等，种类齐全，以兵器为主，有钺、刀、戈、矛等，计200多件，镞900多枚，礼器41件，有鼎、甗、簋、尊、罍、卣、盉、斝、觯、觚、角、盘、斗、方卢形器等。出土玉器33件，并出土一竹篓。学术界认为，该墓属殷墟文化第三期，墓主人应为一地位显赫的武将。

殷墟160号墓的发现，填补了殷墟研究中缺乏第三期较大铜器资料的空白，对研究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23日　“第三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成都举行。

会议由四川大学主办，来自全国21个省区、直辖市共70余个单位的135位代表出席了这次讨论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近80篇、专著12部。会议的主题为“中国社会史研究与现实社会”，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家族、家庭的历史与现实和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

是月　王子今《中国古代交通文化》由三环出版社出版。

江应樑主编《中国民族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该书长达112万言，撰述了自原始社会至清代前期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该书突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将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纳入一个整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分阶段加以叙述，使各民族的个性显示于共性之中。书中不是简单地以王朝更迭为线索编写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而是在具体阐述之中，很好地将二者结合、融汇于一体，揭示出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历史规律，从而突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作者还着重论述了各民族关系史，将民族关系史作为民族史研究的一项主要内容，实事求是地反映各民族之间的有机联系和日益强化的凝聚力，并进而

揭示其客观规律。

马雪萍在《历史研究》第 5 期发表《20 世纪的西方史学与当前的新取向》。

文章对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西方史学出现的“叙事的复兴”进行了介绍，对叙事与史学传统，“新史学”的成就与缺陷，“新叙事史”的内容、特点及其与“新史学”的关系，西方史学发展中这次路标转换的背景及对中国史学的启迪等作了阐述。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讲集（1961—1988）》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作者以扎实的史料分析为基础，把唐代江南农业放在一个较大的时空范围中进行多向度的比较考察，提出了唐代江南农业变革的观点，对学界关于宋代农业革命的传统看法进行了修正。书中从发展背景、生产技术的进步、集约化水稻农业的形成、农村副业的成长、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方面对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水平进行了系统研究，厘清了唐代江南农业发展的历史及其对后世农业的影响。关于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与国家统一、税制改革的关系，该书也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法国当代著名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家贾永吉（Michell Catier）于 1991 年在西方负有盛名的《年鉴》（Annales：Economies Societes Civilisation no. 5，1991）杂志上对该书发表长篇专评 *Aux origines de l'agriculture intensive du bas Yangzi*（*note critique*）。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重版。

11 月

巫宝三主编《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国外社会科学》第 6 期刊登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的《历史编纂学与后现代主义》。

该文为国内最早引进的介绍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论文，对此后的“后现代史学热”产生了广泛影响。

12 月

叶文宪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 6 期发表《中国国家形成之

路》。

作者认为，中国国家的形成过程及形式不是雅典式、罗马式或德意志式的，而是在部族的冲突斗争中形成的。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划分为六个文化系统，这六大文化系统为后世夏、商、周、羌、戎等古代部族延续。夏禹时期发生了自然灾害，各地先民从四面八方向中原迁徙，各部族在中原地区展开了争夺生存空间的剧烈冲突，从而形成了各部族间的文化大交融，中国国家正是在这种文化大交融中形成的。

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主编《中国历史地震图集（远古至元时期）》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

此前，1983年出版了《中国历史地震图集（明时期）》，1990年3月出版了《中国历史地震图集（清时期）》。全书用地图反映2700年来发生在中国的历次破坏性地震的震中、等震线和烈度，为迄今为止最完整、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震图集。

《剑桥中国秦汉史》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晁福林《天玄地黄——中国上古文化溯源》由巴蜀书社出版。

该书主要阐述中国上古时期文化发展源流问题，重点探析了我国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风貌，以及我国原始时代与文明时代交错发展的社会文化变迁的特征及其王权问题，对商代的社会文化与宗法观念下的周代文化都做了系统论述。书后附有《论图腾》论文，专门研究了图腾观念的发展及其与原始思维的关系等问题。

余绳武在《近代史研究》第6期发表《殖民主义思想残余是中西关系史研究的障碍》。

文章对《剑桥中国晚清史》关于鸦片战争起因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是年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90年开始出版，至1995年第一批选题8种已出版了7种，它们是《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马汝珩、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赵云田著），《辽代经营和开发北部边疆》（林荣贵著），《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袁森坡著），《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

疆》(潘志平著),总字数达 300 万字。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创刊。

该刊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1996 年停刊,共出 42 期。

国家文物局公布本年度十大考古发现。

湖北郧县人头骨化石(旧石器时代)、山东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旧石器时代)、河南殷墟郭家庄 160 号墓(商代晚期)、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周代虢季墓(西周晚期)、山东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 2 号战国大墓(春秋、战国)、陕西汉景帝阳陵从葬坑及其彩绘陶俑(西汉)、陕西汉长安城陶俑官窑窑址(西汉)、河南隋唐洛阳城应天门东阙遗址(隋唐)、宁夏宏佛塔天宫西夏文物(西夏)、北京金中都水关遗址(金)。

1991年

※ 陈平原、汪晖等举办学术史研究座谈会。
※ 张岱年主编《国学丛书》出版。
※ 何芳川《崛起的太平洋》出版。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
※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出版。
※ 首届中国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兰州举行。
※《清代全史》出版。
※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
※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出版。
※“首届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在黄山召开。

1 月

9 日　徐中舒逝世，终年 92 岁。

10 日　江苏省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太平天国运动 140 周年座谈会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召开。

18 日　陈平原、王守常、汪晖等 13 名学者举办学术史研究座谈会，并于同年 11 月出版人文研究集刊《学人》。

《学人》第 1 辑卷首登载了一组 11 篇“学术史研究笔谈”，集中表达了“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为学旨趣，是 20 世纪 90 年代学风转变的标志。

在这组笔谈中，陈平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不否认这个时候谈论学术史研究，有对 80 年代中国学术“失范”纠偏的意图。他认为：如果说 80 年代是学术史上充满激情和想象的变革时代，“跑野马”或者“学风空疏”都可以谅解；那么，90 年代或许更需要自我约束的学术规范，借助于一系列没多少诗意的程序化操作，努力将前此产生的“思想火花”转化

为学术成果。目前学界的通病，不在于迷信“规范”，缺乏超越的愿望和热情；而在于过分蔑视“规范”，学无根基且自视甚高。并非嗓子哑了舞台拆了，唱不了戏，只好改为评戏；治学术史应该是一种自觉自主的选择。在他看来，这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王守常则认为，今日提倡学术史研究，只是一个象征意义，那即是在学术研究上提倡一极旧的新学风：认认真真读书、老老实实做学问。刘东则认为，谁要是想借“学术史研究”来逃避进行思考的责任，那他实在是太弄巧成拙了。在他看来，真正的“学术史研究”，是更加需要胆识，更不怕得罪人，更敢于冲破家法的樊笼。尽管个别的专门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一定要表现为思想，但学术史研究却一定要体现出思想的力度。诸君所倡导的“学术史研究”，半遮半掩地亮出了一面复古的旗帜，好像在号召大家从某种程度上“回到乾嘉去”。倘若大家真心实意地要来反省过去治学的道路，那么最当务之急的，莫过于去追问那些“有术无学”的人，他们打了一辈子基本功到底是为了什么？

22 日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系召开纪念太平天国 140 周年学术座谈会。

23 日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胡乔木任名誉会长，刘大年任会长，白介夫任执行会长。

学会的宗旨是正确研究抗日战争史，科学地总结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经验，推动中国史学的研究。

24 日　严中平逝世，终年 82 岁。

28 日　纪念太平天国一百四十周年暨罗尔纲九十华诞学术座谈会召开。

是月　四川外国语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所”成立，张春良任所长。

该所主办的《国外中国研究》于当年 5 月创刊。

2 月

9 日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在广州和泉州参观访问，并举办了“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两个国际学术讨论会。

考察队于1990年10月23日乘“和平”号考察船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出发，沿着古代商船的航道向东方行驶。历经16个国家和地区，于1991年3月9日在日本大阪结束。我国学者刘迎胜（南京大学）、陈鹏鹏（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李德金、余永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参加了这次考察。

20日　魏秦在《文汇报》发表《战后迅猛发展的国外中国学研究》，该文介绍了国外中国学研究近况，呼吁国人重视海外中国学研究。

25日　纪念巴黎公社120周年理论讨论会在烟台召开。

是月　乌廷玉《中国租佃关系通史》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研究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租佃关系，重点阐述了20世纪30、40年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租形态、押租制度、借贷关系、苛捐杂税、超经济强制等问题。作者使用大量前人未引用过的档案及农村调查资料，在研究中采用了计量历史学的方法，从而使以往租佃关系史中一些比较模糊的概念和命题变得更为精确和清晰。

姜义华在《同济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胡适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运动》。

此文意在突出胡适在20世纪中国文化运动中的领导者地位。作者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运动是一个多元的复合的运动，充满了内在的与外在的矛盾与冲突，因之，给胡适在20世纪中国文化运动中定位，对之做出准确的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综观胡适一生，他在我们这个世纪文化运动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以下三个运动：一是发端于19世纪末，至今仍未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二是与思想文化启蒙同步发展，至今仍在持续之中的思想文化建设运动；三是涵盖思想文化启蒙与建设其内，并直接制约、规定着它们发展的方向、速率、水准的社会大变革总运动。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就可以大致了解胡适在20世纪中国文化运动的地位和作用。

3月

9日　江泽民致信李铁映、何东昌，强调要对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

14 日　北京市历史学会、北京大学历史系共同举办的纪念巴黎公社 120 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是月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讨论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的专著，为作者集几十年研究心得，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古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力作。全书时限上自原始社会末期，下迄魏晋南北朝。书中依据大量的史料，从国家形态、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诸方面的变化综合论述了古代中国社会从原始的氏族部落到早期的（即古代的）的国家，到封建制国家的发展和衍变的历程，被称为魏晋封建说的扛鼎之作。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作者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对国外中国观的萌发、形成、发展的历程进行详尽的分析，并运用文化学、历史学、比较哲学等多学科工具深入探究诸种中国观的价值取向，在指出其中由误读所造成的谬误与偏见的同时，又对其所蕴藏的真知灼见予以肯定。

肖前在《阵地》第 3 期发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不能动摇》。

文章对黎澍“全盘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原理的科学性、真理性”“实在难以苟同”，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不能动摇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因为这是大家熟知的常识，而对黎澍的意见简单地予以否定或不予理睬。因为熟知不等于真知，常识不一定科学，如果不认真地分析黎澍的文章，对他所提出的质疑做出摆事实、讲道理、有说服力的回答，是无法真正弄清楚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内容的，不利于澄清这一重大理论是非。

文章力图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说明“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着重论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原理，不是现成的公式，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作者后来还发表《再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不能动摇》，继续对黎澍的观点进行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大型《边疆史地丛书》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细致入微地展现了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指出了流经汉代文化河床的“浊流”在这里已被过滤净化为涓涓清流，从而使传统文化注入了生气，跃上了新高度。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由作者所撰《古典目录学浅说》一书修订而来，以时序为经，从史的角度勾勒了我国古代目录学发生、发展的概貌，并对我国古典目录学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4月

2日　诸葛亮学术讨论会在郑州举行。

是月　何芳川《崛起的太平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从宏观与比较史学的角度，对环太平洋地区的历史发展作了勾勒，考察了太平洋地区史前史和古代太平洋文明圈，比较了历史上的郑和远航与哥伦布航海的不同背景、动力与结果，描述了早期太平洋探险事业、帝国主义殖民活动及被压迫民族的抗争，探讨了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变迁，分析了冷战产生的原因与结局，并从经济上预测了“太平洋世纪”的前景。

该书被称为太平洋地区史研究的基石。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兴于汉，并最终在隋唐演变为科举制的察举选官制度的七八百年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作者把官僚制理性行政、帝国政体下的特权分配与权力斗争，以及作为帝国官僚来源的知识群体的动态作为制约察举制变迁的三个主要动因，并由此出发对大量相关史料进行了考订梳理，在此基础之上，对察举制中的“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文取人”及“以名取人”、“以族取人”因素的表现形式、相互关系及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述，从而对这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向科举制的演变，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解释文本。

邓广铭在《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

文章认为，王安石援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合乎“义理”的部分以入儒，特别是援佛老两家学说中的合乎“义理”的部分以入儒，这就使得儒家学说中的义理大为丰富和充实，从而也就把儒家的地位提高到佛道两家之上。因此，从其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及其对北宋后期的影响来说，王安石应

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居首位的人物。

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选录近代中国关于史学理论的论著90篇，基本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全书内容分为9组：第1组包括近代学者关于社会历史观的论述，如唯物史观、进化史观、实用主义、怀疑主义、综合史观、人文史观、三民主义史观、英雄史观等，17篇；第2组为总体概述历史学的理论论述，5篇；第3组探讨了历史学学科的基本性质，8篇；第4组，为各家对历史学对象、内容功能、价值的论述，11篇；第5组为各家关于史学方法和方法论的论述，20篇；第6组论述了历史学在学术领域的位置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9篇；第7组关于历史著作体裁和历史学家的素质训练，8篇；第8组为近代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研究及述评，5篇；第9组为近代学者对国外史学的理论研究及评价，7篇。

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史学》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收入作者"文革"后所发表的文章26篇，该书对新时期史学思潮进行了跟踪研究与评述，容纳了较为丰富的新时期以来、包括1949年后整个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信息和资料，从而为人们了解把握史坛动向趋势提供了较多的方便。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5月

5日　张岱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以分析的态度研究中国学术》。

该文是作者为其主编的《国学丛书》所写的序言，张岱年认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总起来说，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其中一部分固然已经过时了，但是仍有一部分具有充沛的生命力。中国学术是人类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具有历久常新的精湛内容。""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创造了灿烂光辉的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古语云：'国有与立'。我们中国必有其足以立国的思想基础。这立国的思想基础即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精湛思想。""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必须对于以往的学术成

就进行批判性的总结。”“认真钻研祖国的学术思想，以科学方法加以分析整理，这是一项严肃的任务。”

该文的发表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提国学”的先声。

《国学丛书》的宗旨是：“愿承继前贤未竟志业，融汇近代以降国学研究成果，以深入浅出形式，介绍国学基础知识，展现传统学术固有风貌及其在当代世界学术中之价值意义，期以成为高层次普及读物。”是年12月，该丛书开始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共20种，包括《国学今论》（张岱年）、《先秦儒学》（钱逊）、《谶纬论略》（钟肇鹏）、《魏晋玄谈》（孔繁）、《宋明理学》（陈来）、《天学真原》（江晓原）、《岐黄医道》（廖育群）、《道经总论》（朱越利）、《汉字说略》（詹鄞鑫）、《易经图书大观》（赵中伟）、《古典兵略》（史美珩）、《象数与义理》（张善文）等。

8日　纪念京杭运河贯通70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山东济宁召开。

10日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

薄一波、李政道任名誉会长，周谷城任会长，萧克任执行会长。

12日　商承祚逝世，终年90岁。

商氏为广东番禺人，中山大学教授，生于1902年。21岁即以《殷虚文字类编》一书成名，与唐兰、容庚、柯昌济一道被誉为20世纪20年代古文字学四少年。主要著作有《十二家吉金图录》、《石刻篆文编》等，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

15日　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客家学研究中心，吴泽任主任。

该中心是在华东师范大学1988年成立的客家学研究室的基础上扩建而成。

16日　纪念太平天国运动140周年暨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23日　中国首届比较史学讨论会在贵州举行。

是月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进行了专题探讨。1990年春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主办了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阐明了他们对这一理论的见解。

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由浙

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围绕冲突中的融合这个主题，追溯现代英国形成的过程，展示了英国独特的民族精神。

陈支平《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由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全书根据大量的族谱、契约文书以及民间调查材料，从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的角度，全面论述了福建的家族社会，是 1949 年后第一部区域家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专著。

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启能主编《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迄今唯一专门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世界史研究历程的著作，依照断代史、地区史、重要国家、重要课题的分类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整理和初步总结，着重对世界史研究界存在的争论、各派意见进行了评述和介绍。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根据大量材料，对少有人研究的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走向作了重点描述，大大拓展了无政府主义研究的时间范围。作者改变过去那种一味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做法，对无政府主义在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专制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启蒙作用给以积极肯定。该书是此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作。

赵靖、石世奇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 1 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凡 4 卷，第 2、3、4 卷分别于 1995、1997、1998 年相继出版。

该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先秦以迄鸦片战争前的经济思想，详叙了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深刻剖析了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规律，代表着国内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较高水平，无论是理论体系、研究方法，还是在分析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的实质、特点和发展脉络等方面都有诸多突破与创新。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出版。

下卷于1993年6月出版。

该书是作者1988年4月向中共中央提出，得到赞同后开始撰写的，书中详细记述了“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上册写1949至1956年，下册写1957至1966年。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见证人和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参与者，作者采用把个人回忆和历史文献档案资料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对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经济建设、生产关系的变革、党的建设等作了全面阐述和分析，尤其对一些重大失误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评论。被称为“党史著述中的空前力作”，“在我国党内是一个重大的创举”。

6月

1日　全国晋文化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师范大学召开。

4日　首届墨子学术讨论会暨中国墨子学会成立大会在山东滕州举行。

会议由山东大学和滕州市联合举办，讨论的议题包括墨子里籍、墨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命运、墨学的现代意义等，匡亚明、任继愈、张岱年、杨向奎、张政烺、张知寒、田昌五、漆侠等学者出席会议。

该次会议，是墨学研究在当代复兴的开端。

7日　孙子学术讨论会在山东广饶召开。

28日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

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是“探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涵与本质，论证其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及二十一世纪人类和平与发展可能产生的作用与深远影响”。会议由匡亚明主持，张岱年、周谷城、金景芳、吴泽、李慎之、张岂之、庞朴、萧萐父、刘梦溪、冯天瑜以及来自国外及港澳台的汉学家安子介（香港）、费德林（苏联）、吴德耀（新加坡）、汪德迈（法国）、成中英（美国）、曾祥铎（台湾地区）等近百名代表参加了大会。

是月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论述中国有史以来人口发展历史过程的一本中型专著，分上中下三编。上编论述了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现有人口资料

的评价和运用；中编是以往两千多年间人口数量的发展及其原因和特点的分析，对各个主要历史时期的人口总数做出了新的估计；下编则对人口的构成、再生产、分布迁移作了概括性的论述。全书附地图12幅、表格36张。

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黄宗智认为，本书是世界上以任何语言撰写的已出版的中国人口史著作中最好的一种。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辑录了20世纪初以来在敦煌地区陆续发现的八批共2484枚汉简的简影和文字材料，包括全部汉简的图版、释文和部分汉简的摹本，并附编号索引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这些汉简内容丰富，多为汉代边防屯戍文书，也有私人信函、契约、古书残篇等，是研究汉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对了解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边防情况、民族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本书不仅首次刊布马圈湾汉简资料及有关发掘报告，还将原来零碎分散、难以搜求的材料广为网罗，使之汇于一集，为相关研究带来了很大方便。

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开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12卷，约600万字，系根据胡乔木的建议，自1978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组织编著的。全书记述了1919至1949年中国革命三十年的历史。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篇幅巨大、资料翔实、学术价值较高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著作，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

王戎笙主编《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中华文明》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绪论“关于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的思考”为全书之纲，集中阐述了关于中华文明的性质与范畴、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发展方针和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等方面的问题。全书考察和论述了中国文明起源、先秦百家争鸣、儒学及其发展、道家与道教、中国佛教及其源流、史学与文献、文学、艺术、科技、海陆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食货”之路、历代政治制度演变、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等问题，并对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转变及其原因、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历程进行了回顾，从整体上反映了中华文明形成、演进的发展图景。作者对文化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和故步自封倾向予以否定，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新文化是现阶段中国文化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

史式《太平天国史实考》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集54篇考据文章，大致分为三部分：一为太平天国词语文字考释，弄通了长期以来不明就里的太平天国专用词语及造字、改字情况；二为太平天国史事疑案考析，澄清了长期以来被曲解、误解或费解的史事和称谓，对天京事变中的“逼封万岁”问题做了详尽考辨；三为石达开远征史事考证，这部分分量较大，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四十五，考证尤为详审。

苑书义《李鸿章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学典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从偏重方法到史论并重——40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动向之一》。

文章认为：“20世纪的最初10年，尤其在20年代，是中国史学界崇尚材料、崇尚考据的时代。而崇尚理论，崇尚方法，则是30年代中国史坛的主流。到40年代中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经过与史料学派的长期较量后，总结了自身以往失误的教训，逐步认识到掌握史料的重要性。注重史料，注重考证，敬重史料学派，构成了40年代中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本倾向。”

其后，作者又发表《从强调“一般”到侧重特殊——40年代后期中国历史学的动向之一》（《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40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动向之一》（《史学月刊》1999年第1期），继续探讨40年代中国史学思潮的演变轨辙。

7月

1日 《炎黄春秋》杂志创刊。

该刊是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纪实性刊物，内容多涉及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以及重大现实问题的讨论。

28日 首届中国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兰州举行。

与会代表共有150余人，其中来自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和日本的学者共40余人。会议主要交流了1972—1979年调查和发掘新出居延、敦煌汉简的经过以及1972—1976年新出居延汉简的整理概况和史料价值。何兹全就如何更快更好地将丰富的出土简牍资料运用到中国史研究中，发表了富有启发性的意见和建议。

29日 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在成都举行。

受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委托，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古文献所、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联合发起召开。

是月　《清代全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

该书是一部反映我国当代清史研究水平的学术著作，共10卷，300多万字，项目负责人为王戎笙，不设总主编，采取分卷主编负责制。参加本项目的多为本领域专家。第1卷由李洵与薛虹主编，第2卷由王戎笙主编，第3卷由郭松义主编，第4卷由王戎笙主编，第5卷由韦庆远和叶显恩主编，第6卷由喻松青和张小林主编，第7卷由龙盛运主编，第8卷由宓汝成主编，第9卷由徐彻和董守义主编，第10卷由刘克祥主编。

北京大学考古系资料室编《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00—1949）》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收录1900至1949年间国内出版的有关中文书籍和报刊资料8000余条。

卢勋、李根蟠《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三个方面论证了我国少数民族对中国物质文化所做的贡献。

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周易研究史》由湖南出版社出版。

8月

16日　首届辽金契丹女真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大同举行。

17日　儒家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讨论会在威海市举行。

与会人员就儒家伦理的社会价值、批判继承及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20日　首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昌举行。

是月　刘起釪《古史续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集了作者继承《古史辨》之学研讨古史的论文36篇，分为考辨古史、古籍、历史地理三组。对自盘古历三皇五帝各种古神古帝古先王的神话和古史资料，依其出现的时代先后做出条理清晰的表述。对错综杂乱纠葛甚多的华夏族族源、夏商周三代史事，通过辨析纠正误说提出新的认识。对最难厘清且多误说的历史地理难题，博涉史籍深入研究试图理出端绪。对《尚书》、《逸周书》、《周礼》等，辨析古籍，考镜源流，做出了中肯评价。

林甘泉认为，《古史续辨》既继承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正确观点和方法，又注意避免了它的片面性，“确实是继《古史辨》之后考辨古籍、古史和历史地理的一部难得的学术著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书中力图应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来阐明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并且尽可能吸收了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这就使得此书比起《古史辨》来具有自己的特色。

庞朴在《二十一世纪》总第6期发表《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

该文为作者在南京大学“传统文化与二十一世纪”讨论会上的发言。作者将中国的人文精神归结为忧乐圆融，是对台湾学者徐复观等人将中国文化的深层特质归结为“忧患意识”以及李泽厚将中国文化归结为“乐感文化”的修正，认为两者都不能完整地概括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中国文化既有“忧患意识”，又有“乐天知命”的精神，“忧乐圆融”的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根据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决定，为纪念中共成立70周年而撰写的。邓小平题写了书名，胡乔木作了题记。该书试图对中国共产党在70年中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和所取得的经验作一个完整的叙述，被认为是最完整、最权威的一部党史著作。

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大辞典》由武汉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大规模辛亥革命专史辞典。主要介绍辛亥革命的史实和史料，同时也全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状况和成果。条目为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社会党团、政治术语、历史文献、报纸期刊、典章制度、史迹、纪念馆、研究著作、研究机构、学术会议等十二大类。附录有辛亥革命大事记，1949—1989年全国辛亥革命研究重要论文索引，收国内外学术著作计200余种，论文1600多篇。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该书概要论述了辛亥革命发生、发展、胜利和失败的整个过程，对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个历史时期一些关键性问题做了较详细的剖析，并力求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全书155万字，是第一部大型的孙中山年谱。该书根据国内外大量已经刊布和未曾发表的孙中山著述和有关档案材料，经过认真鉴别考订，全面、系统、详细地记述了孙中山的生平思想、言论和革命实践活动。

“夏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洛阳市举行，120 名海内外著名学者出席。

郑振满在《厦门大学学报》第 4 期发表《中国家族史研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不同视野》。

本文试图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史学界、日本汉学界及欧美和台湾地区人类学界有关中国历史上家族组织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的回顾，并分析其学术传统与研究视野，以期促进不同学科及不同学术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作者认为，以往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家族组织，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极为多变的外观，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因此，研究这一复杂的历史现象，必须搜集尽可能完备的资料，进行多角度和多层次的综合分析，才有可能得到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前人的有关研究，往往片面强调家族组织的某些类型或某些特性，其具体结构难免有所缺失。然而，只要不是以偏概全，无论是历史学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都是值得借鉴的，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可以并行而不悖的。

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分上中下三册。该书全面论述了太平天国的历史，着重考察了太平天国兴亡的原因与历史影响。作者充分利用了第一手资料，不仅从纵的方面揭示了太平天国的兴衰过程，而且从横向考察了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人物等各个方面，做到了“点面结合”，既从整体上描绘了太平天国的发展过程，又使重要的历史事件得到了解剖。导言部分概述了百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和太平天国文献资料、遗迹遗址的情况，并详列研究论著、史料为附录。是书的出版，代表了当代我国史学界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水平。

9 月

16 日　第七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湖北十堰举行。

会议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九个单位发起并主办，主题是从理论上探讨外国史学与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关系。

17 日　“中国夏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河南洛阳召开。

会议由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省洛阳市海外联谊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中外学者就夏文化、夏代国家、文明起源、殷商历史、甲骨文字释读及辞法等问题展开讨论。

24日　聊城师范学院傅斯年研究所与聊城市政协联合主办傅斯年学术研讨会。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傅斯年学术研讨会，全国各地5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傅门弟子张政烺、何兹全、王利器、杨志玖及季羡林等与会。

是月　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发掘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

丁公遗址位于邹平县苑城镇丁公村东，遗址总面积近24万平方米，时代为距今5500—2000年前后。丁公遗址以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和重要。遗址内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城墙宽25米左右。出土各类遗物标本五千余件，其中一件陶片刻有“文字”，比安阳甲骨文还要早八百年，最为重要。文字整齐地刻在一件泥质磨光灰陶大平底盆底部残片的器内面，计有五行十一个字。刻文笔画流畅，独立成字，刻写有一定章法，排列也很规则，已经脱离了符号和图画的阶段。文字中除一部分为象形字外，有的可能是会意字，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性。1993年4月26日，《光明日报》发表“丁公陶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和争议。绝大多数学者对丁公陶文持肯定意见，王恩田认为是“东夷文化系统的字”，严文明说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文字”，田昌五建议将丁公遗址出土的、由成组文字组成的陶文，称之为“陶书”，以与单个陶文相区别，裘锡圭认为丁公陶文并不是一种处于向成熟的文字发展的正常过程中的原始文字，而是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

丁公龙山文化陶文的发现，为探讨中国文字的产生与发展，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等重大历史课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包括引言、绪论、第一编“决裂——在传统中挣扎”、第二编“祖国在危急中”、结语和后记六个部分。主旨在于通过论述和剖析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的一些基本状况，“揭示近代法国政治动荡和法兰西民族政治参与意识的文化心态根源”，并从中对法兰西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进行透视，进而“探寻革命运动、政治动乱的一般规律和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作者把“政治文化”概念比较成功地引进了法国大革命史学研究领域，对这一传统课题作了比较系统的政治文化学和心态史学的思考和阐释，从而开辟了“研究和思考的新径”，实现了法国大革命研究领域的突破和超越。

张芝联评价该书为“堪称近年来外国史研究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出版较早、价值较高的史学思潮与流派史，具有开拓性贡献。书中论述了自鸦片战争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史学发展大势，并依据历史进程和时代特点来把握这一阶段的史学思潮及史学流派。作者指出：从史学发展本身的特点来看，中国近代真正形成史学思潮的主要有经世致用史学思潮、新史学思潮、国粹主义史学思潮、疑古史学思潮以及屡屡泛起的复古主义史学思潮等。这些思潮的依次递兴，大致经历了一个由依附于一般的学术思潮到逐步形成独立史学思潮的过程。

谢保成等编《中国史书目提要（1949.10—1966.5）》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收录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出版的中国古代史方面的著作1399种。分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通史、断代史、经济史、自然科学史、政治史、法制史、军事史、农民战争史、民族史、哲学思想史（附宗教史）、文化史、教育体育史、艺术史、语言文字史、文学史、史学史（附书史）、地方史和历史地理、中外关系史、人物传记等类。撰写提要的图书为749种，每书介绍著述缘起、基本结构、主要内容、出版情况等。未写提要的为650种。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凡四册，154万余字，历时四十载，前后五易其稿，是作者毕生心血之作，也是作者一生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总结，被誉为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里程碑和传世之作。

该书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体例上的重大创新，将中国传统史书的纪传体与西方传入的章节体融合起来，各取所长，创立了由叙论、纪年、表、志、传相结合的综合体，多层次、多角度地记述了太平天国的全貌。书中用“叙论”来叙述太平天国运动的时代背景、历史分期、革命性质、作用影响和经验教训，以作为《太平天国史》全书的总纲。又加入“纪年”以记军国大事，并用“志”记载社会经济和典章制度，“表”罗列纷纭繁杂的史事，“传”记重要的历史人物。“叙论”、“纪年”、“表”、“志”、“传”五个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又互相区别、互相补充，构成有机的整体，这种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推陈出新的史志结合的新体例，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堪称独树一帜。

本书采撷宏富，考证精详，引证资料上千种，所有资料无不经过考证辨伪，审慎选用。作者崇尚“独断之学”，对太平天国历史提出了一系列

真知灼见。

夏良才《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概览》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作者对1949年后国内外有关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进行了系统地、分门别类地论述，书中使用了大量中、英、法、俄、日文资料，对近代中外关系史诸领域已有成果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评析。书后附有国内外有关研究论著目录。

河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窖穴H3内发现大批甲骨。

其中有刻辞者579片，是继1936年YH127甲骨窖藏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抗日战争研究》创刊。

该刊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以抗日战争史为研究对象。创刊号上刊载了聂荣臻的题词、胡乔木署名的代发刊词和刘大年的《做什么，怎么做?》等文章。刘文提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要求和目标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项：一是认识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一是认识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独特重要地位。

《明史研究》创刊。

该刊是中国明史学会主办的一份不定期刊物，以反映代表明史研究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主，兼及经过科学考证的具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和资料、新著评论、读史札记、史坛信息等。

《文史哲》第5期刊登一组墨子研究文章。

包括苗枫林的《给墨子以应有的学术地位》、陈之安的《关于墨子的两个问题》、蔡尚思的《墨子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张岱年的《论墨子的救世精神与“摹物论言”之学》、杨向奎的《谈谈〈墨经〉的研究》等。

10月

5日　国际岩画委员会年会暨宁夏国际岩画研讨会在银川举行。

这是我国首次召开的国际岩画研讨会，代表来自澳大利亚、意大利、美国和中国等12个国家的文物和美术考古界的专家学者。

6日　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9日　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

11日　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济南召开。

14 日　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学术讨论会在济南举行。

15 日　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

论文集《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由中华书局出版。

21 日　第一次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

这是 1949 年后首次举行此类会议，“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和“青年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贡献”是两个主要议题。参会论文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以《成长中的新一代史学》为题结集出版。

是月　郑师渠、史革新《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反思》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论述了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10 年间中西文化论争的情况，包括洋务运动期间的“中学”与“西艺”之争、“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等。

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分上下两篇，上篇 46 条考西安长安，下篇 13 条考东都洛阳。该书考证了众多前人遗留下来的、长期弄不清楚的重要问题，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被称为超越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佳作。

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现代化在英国农村发生过程的著作，也是第一部将中英封建晚期农村现代化进程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作者在观察视角上独辟蹊径，始终把封建晚期最基本的生产者——农民作为主要考察对象，从农民个人力量发展与社会结构关系的角度对现代化问题进行了大胆而深入的探索，提出了独立的见解。作者的这些见解和研究，或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或使以往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系统。该书由九章构成，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集中论述了英国中世纪农民个人力量——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余下的篇幅则对封建晚期的中英农民进行了多向度、多层次的比较研究。

张岂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

姜义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历史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分为史学理论篇、中国古代史篇、中国近代史篇、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篇、世界史篇五个部分，涵盖了 1949 年后历史学展开争鸣的 139 个方面的问题，对四十年间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争论课题进行了大体的描绘。在序中，主编将这四十年的史学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概括，论述了四十年来中国史学在六个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归纳和总结出新时期十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三个特点。

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

该书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总图部分汇集在一起，便于不能购买八巨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读者利用。

11 月

1 日　三国文化国际研讨会在成都举行。

“首届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在黄山召开。

这是 1949 年后举行的第一次规模盛大的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由黄山文化书院、黄山市社联、徽州师专发起，安徽大学主办，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华东师大哲学所、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安徽省古籍办等单位参与举办。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八个省市的高校科研机构及其他文化学术团体的五十余名专家、学者。与会者认为，胡适是个复杂人物，对他所做的任何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是片面的。在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胡适思想作历史的、客观的分析，还其本来面目，是有助于我国文化学术事业建设的大事。

5 日　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西北大学召开。

来自西德、加拿大、比利时的外国学者和来自全国二十三所高等院校及研究单位的三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强调要对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分析和改造，灌注新的时代精神，使之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发生精神催化剂的作用。

古代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

会议的议题是古代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开发、进程、特色以及经济开发对社会政治、区域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

7 日　“全国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在绩溪举行。

这次会议召开于胡适诞辰100周年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起，讨论的议题是胡适与文学革命、胡适与整理国故、胡适思想的核心等，论文选《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由三联书店出版。

这次会议与黄山“首届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一起，预示着“胡适热”的兴起。

27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参加研讨会的有徐苹芳、苏秉琦、纪仲庆、任式楠、杨锡璋、邵望平、宋建、黄宣佩、牟永抗、王明达、汪遵国、邹厚本、郭大顺、孙守道、高炜、郑光等16位考古学者，发言主要围绕三个议题：(1)关于文明的概念和因素；(2)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点和模式；(3)文明起源研究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和今后探索的途径。与会学者认为，国家是文明起源的主要标志，私有制、城市、文字、礼制、青铜器等也是文明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点是多源性。

《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发表在《考古》1992年第6期上。

是月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研究迄今出土的东周与秦代各诸侯国的文物考古材料及有关历史问题；第二部分，研究当时的青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丝织品及制造技术、货币、玺印、简牍、帛书、帛画、文字等。

佟柱臣在《考古》第11期发表《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

陈高华等著《海上丝绸之路》由海洋出版社出版。

作者依托大量史料，介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产生、发展、鼎盛和衰落情况，并围绕着海上丝绸之路，叙述了古代中国和海外诸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以及一些海外国家的风土人情，勾勒出海上丝路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地位。

（英）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沃尔什，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本书把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概括为两大类，即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前者是研究历史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后者则是研究历史学的认识论。这一区分现已成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界的一项重要共识。“译序”中说，该书的出版，目的是希望能给

我国对于历史理论（本书思辨的历史哲学部分）和史学理论（本书分析的历史哲学部分）感兴趣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一部有参考价值的导论性的著作。

陈述《辽金史论集》由北京文津出版社出版。

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秦汉思想文化和华夏民族传统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

钱乘旦主编《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继《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之后的第三种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专集。全书收入论文、札记、书评等28篇，约25万字，皆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所撰。全书主体是有关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论文，共17篇，敦煌学方面的9篇，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其中包括4篇有关敦煌写本书仪的长篇论文，即《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之二），《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书仪源流考》等。最后两篇是有关文物考证方面的短文。

12月

25日　苏联正式解体，存在了69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此成为历史。

26日　刘大年作《感事》诗一首，感怀苏联解体。

诗云：半天风雪恶连宵，大国吹从地面消。侯览仓皇除党会，谯周匍匐拜星条。飞扬未觉龙蛇远，开辟犹闻海宇摇。他日列城王气动，镰刀锤子复旌旄。

是月　苏秉琦在《考古》第12期发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

文章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及高度，重点论述了中国史前史的性质与任务、内容和时空框架。

关于史前史的研究途径与方法，作者提出：区系观点是个纲，纲举目张；文明开始是把金钥匙，是要大力开拓的课题；文化传统的根系要上溯到旧石器时代；由近及远，一个课题一个课题逐步积累。

宁可、汪征鲁编著《史学理论与方法》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

社出版。

何芳川、万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刘进宝《敦煌学述论》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内容涉及敦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历史地位，莫高窟的创建和石窟艺术，藏经洞及其收藏遗书的内容、价值和流布，以及我国与世界各地敦煌学的历史发展、研究现状等等，对了解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敦煌学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濮茅左编《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集了自1898年甲骨文发现以来至1987年国内外学者所作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分为甲骨学、商代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科学技术、考古、其他等八部分。

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由中华书局出版。

收论文22篇，读史札记11篇，内容涉及元代的社会经济、农民战争、宗教与思想文化、中外关系、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等方面研究。

霍俊江《计量史学基础——理论与方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从理论高度对计量史学的产生、发展、对象、方法论及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具体介绍了计量史学的基本作业方法，如抽样推断、决策分析、回归分析、相关分析、模糊数学等。

是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季刊）创刊。

该刊选题广泛，包括中国边疆史地学科的许多重要方面，从各个角度探究边疆各种问题。诸如边疆史地理论、中国历代疆域、边疆民族、治边政策、边疆开发、边疆文化、边疆外交、边疆政教、边疆海岛、边疆人物、边疆考古、边疆历史地理和近代边界变迁等最新研究成果，都在选择之列。

中国文物研究所正式成立。

《中华学术丛书》开始陆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所收书目包括：项楚《敦煌文学丛考》、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汤志钧《西汉经学与政治》、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孟森《满洲开国史》、饶宗颐《梵学集》、柳存仁《和风堂文集》、王重民《冷庐文薮》、章鸿钊《石雅·宝石说》等。

国家文物局公布本年度十大考古发现。

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新石器时代）、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和大墓遗址（新石器时代）、西藏拉萨曲贡遗址（新石器时代）、河南殷墟花园庄商代甲骨窖藏（商代）、河北定州商代方国贵族墓葬（商代）、江西瑞昌铜岭商周铜矿矿冶遗址（商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虢仲墓（西周）、甘肃敦煌汉悬泉置遗址（汉晋）、河南永城芒砀山汉梁孝王王后墓（西汉）、黑龙江渤海国王陵区大型石室壁画墓（唐）。

1992 年

※ 姜义华发表《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引发“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
※ 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出版。
※ 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出版。
※ 李学勤发表《走出“疑古时代”》。
※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六卷本《世界史》开始出版。
※ 中国社会史学会成立。

1 月

4 日《光明日报》发表座谈会纪要《部分在京学者座谈：在市场经济中历史学应适应形势迎接挑战》。

参加座谈会的有王思治、王春瑜、宋德金、蒋大椿、诸葛计、田人隆、谢保成、陈淑梅、王和等。

与会学者提出，史学应当面向市场。史学研究成果应当为人们所接受与承认，不能仅仅是书斋里学者孤芳自赏之物。史学研究应当重视与文学、艺术结合，雅俗结合，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以及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结合。历史题材的人物传记、影视作品不乏读者、观众，说明大众对历史的接受与欢迎。历史读物读者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好，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令人遗憾的是，撰写通俗历史读物被一些人视为“小儿科”，不算科研成果。与会者呼吁有关部门对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的优秀通俗历史读物应给予正确评价，加以扶植鼓励。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史学工作者应当善于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需要。

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王学典在《史学理论研究》1994 年第 2 期发表《向内转：市场经济背景下历史学的应有选择》，认为历史学不能走向市场，让“史学走向市场”，接受市场的调节，无异于让史学走向毁灭。把史学看作商品，视为市场要素，这是泛商品化、泛市场化倾向走向

极端的表现。史学应该向内转，发展纯粹的学术。

是月　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袁行霈任主任。

该机构集合北大文、史、哲、考古等学科的学术力量，以发掘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2000年初，更名为北大国学研究院。

严文明在《文物》第1期发表《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文章指出，考古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探讨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整个发展进程进行全面考察。作者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分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和铜石并用时代早、晚五个发展阶段，认为公元前3500年左右是一个重要分界点，此前为新石器时代，此后为铜石并用时代，而中国史前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就大致发生在铜石并用时代。作者认为，铜石并用时代相当于史书记载的五帝时代，其中黄帝、颛顼、帝喾三帝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而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则与唐虞时代相吻合。

钱乘旦《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由南京出版社出版。

本书探讨了英国工人独立的政治运动起自何时，为什么说他们的活动是激进主义的，以及宪章运动的性质、地位如何等。

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选编了历年来台、港及海外学者论著20篇，包括中国现代化历程总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以及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等内容。

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陈启能主编《史学理论研究》创刊。

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较系统研究西方历史哲学史的专著，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此前，国内学者在研究西方哲学史时多侧重于认识论、辩证法、逻辑、自然哲学、伦理学等领域，对历史哲学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该书弥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这个方面的不足。作者以西方哲学中的历史哲学为研究对象，把一些重要哲学家的历史哲学收集汇拢起来，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线索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并对诸多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

2 月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由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收录了作者 1987 年至 1989 年在台湾《中国时报 · 人间副刊》上发表的 33 篇谈史文章，内容以第一帝国（秦汉）、第二帝国（隋唐宋）和期间的大分裂时期魏晋南北朝为讲述的重点，而此前的春秋战国和此后的第三帝国（明清），也有一定的涉及，大致概括了中国古代史的全貌。

书中对地理条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均田令的特点、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和中国古代的政治模式等问题均有独到解释。作者提出，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弊端，就是不能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也就是说，历代统治者治国不是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和制度，进行可以量化、技术化的经济和法治的管理，而是仅仅依靠过于简单化、随意化和僵化的道德信条和意识形态，实际上，这一点归根结底体现了以道德代替法律的泛道德政治的本质。

本书秉承深入浅出的写作风格，以人物为中心，通过其人其事在历史关键处的作为，探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并以今天的立场加以分析，且多从常人不经意之细节入手，挖掘出极富启发性的新见，娓娓叙来，发人深省。

该书是《万历十五年》中译本之后，又一本席卷大陆读书界的力作。

张友伦、李剑鸣主编《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改革》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全面系统的社会史专著，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建构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范畴体系。

该书冲破了长期以来模式化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框架的束缚，舍弃了千篇一律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以重大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为纲撰写中国近代史的做法，转而从社会史这一崭新视角来研究中国社会。作者将近代社会史内容划分为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三大块，对近代人口、家庭与婚姻、社会阶层、物质精神生活、人际关系、社会各种功能等长期以来被历史研究忽视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打开了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途径。

邓广铭在《历史研究》第 1 期发表《试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诏书之谜》。

3 月

10 日　庞朴在《文汇报》发表《黄帝与混沌（论纲）》。

文章说：黄帝号轩辕，轩辕即殷代铜器铭文中的天鼋，天鼋是一个图腾，这个图腾的形象是一个人伏在革囊上渡河。囊名浑脱、混沌。《山海经》中，将这种浑敦的革囊神话化，说它“实为帝江”。《左传》中，又将神话传说化，说这个浑敦，名叫帝鸿。而帝江或帝鸿，在史话中常称为黄帝。于是，反过来看，也就是帝鸿，也就是混沌，也就是革囊。混沌，在汉语中有各种音变，分别用以命名不同的事物，馄饨、糊涂、囫囵、温敦、混蛋、葫芦等。从葫芦，又演化出瓠、盘古的神话和史话。

作者认为，黄帝就是混沌，黄帝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而混沌则是宇宙生成、哲学架构以至一切科学的开始。因此，说中华文明始于黄帝，便具有了新的意境。因此，不必做煞风景的事，嘲笑“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的信念，但也不要真的相信，有那么一位黄帝其人。最妥当的办法，是承认有那么一个时代，叫作黄帝时代，或叫作混沌时代，这倒是有根有据的。

该文原为作者同年1月出席杭州“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外文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黄帝与混沌：中华文明的起源》提要，全文载汤一介主编《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删节本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2期。

因该文否定黄帝其人其事，在学术界引起激烈争论。

是月　吴承明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作者赞成“史无定法”的说法，认为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采用不同方法。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做出选择。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而应“史无定法”，吸取各家之长。关于史料学与考据学的方法，作者认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傅斯年说：“史学本是史料学”，曾遭非议，但从方法论说，治史必须从治史料始，则是道出根本。不治史料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所以说“治史料”，因为史料并非史实，经考据、整理后，庶几代表史实。史料（包括文献、文物、口碑）都是人为的，其中不免失误、失真、夸大、缩小、隐讳以至伪造，这就需要考据学，“考而后信”。又历史是连续的，而史料皆属片断，或仅见一个侧面。这就需要史料学予以整理，“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以期得到比较全面的认识。清乾嘉学派的朴学，实包括史料学和考据学两者，是我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

文章还论述了经济史研究中的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经济史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等。

杨志玖主编《中国古代官制讲座》由中华书局出版。

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出版较早的社会史著作。作者广泛收集方志、档案、笔记、家谱等各种资料，比较全面地对近代中国的人口数量、过剩人口问题、人口分布及迁移、人口城市化、人口构成以及人口思想等各个方面作了扼要的论述，受到人口史、经济史、人口学、社会学和近代史诸方面学者的重视。

《清史研究》(季刊) 创刊。

该刊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是目前国内唯一研究清史的定期学术刊物，其办刊宗旨是注重学术性、资料性、信息性，研究论文涉及清史理论、清代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民族、宗教、外交、人物、文化、学术思想、社会风俗、文献调查、学术动态等。第一任主编为李鸿彬。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吴宓的日记、遗稿为依据，如实记述了吴宓与陈寅恪二人长达50年的深厚情谊。披露了陈吴二人大量鲜为人知的学术观点和社会活动。对研究二人尤其是陈寅恪的著作和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书出版后受到读书界的广泛欢迎，推动了“陈寅恪热”的出现。

蒋大椿、李洪岩在《史学理论研究》第1期发表《史学中的跨学科方法研究概述》。

文章详细介绍了“文革”结束后史学界讨论史学跨学科方法若干理论问题，以及引进社会历史学的方法、心理历史学的方法、地理学方法、人类学方法到历史研究中的情况。

4月

姜义华在香港《二十一世纪》4月号发表《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引发“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

1988年9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25周年纪念讲座上发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长篇演讲。这篇演讲的主旨是：自戊戌变法，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近现代思想就走上了一条持续激进化的道路，到20世纪60年代大陆的“文革”时期登峰造极。这一“激进化”思想主流在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它非但没有为中国带来其最初慷慨允诺的“自由”、“民主”，反而大大延迟了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因此可以说，社会主导思想的激进化是中国至今都不能顺利完成现代转型的罪魁祸首。演讲稿出版后于90年代初传到大陆，引起了思想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首先刊文对余英时的观点提出挑战，从而拉开了90年代初影响深远的关于近代中国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问题的争论的帐幕。

姜文指出："保守主义者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恐怕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保守主义势力不是太弱，而是太强。"而在百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激进主义事实上不是太强，而是太弱，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变革如此之慢、如此之难。关于"文革"的性质，姜的观点也同余英时截然相反，他认为"文革"不是激进和反传统，而是封建专制主义和传统中糟粕的大泛滥。余英时在同期杂志发表《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答姜义华先生》对姜文进行回应，认为自己与姜义华讨论的问题属于不同层次，他指的是思想史上的激进现象，而姜谈的是中国社会上的保守力量有多强大。他认为，姜义华的最大问题是完全看不到激进主义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对其在1949年之后造成的灾难没有感觉。至于"文革"，如果不是那个特殊的激进理论在当时占据了绝对权威的地位，那些传统的糟粕成分就不可能真正发生作用；更何况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和天才论来源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将之归为中国的"封建余毒"是说不过去的。

其后，《二十一世纪》又刊登多篇文章，将这场"激进与保守"之争推向纵深，内地刊物和学者也纷纷卷入笔战。余英时的观点得到了内地众多知名学者如王元化、李泽厚等人的支持，而对保守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多为活跃于国内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

李绍连《华夏文明之源》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重点对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社会文明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对长江与珠江流域、北方和周边地域的文明起源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书中主要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政权等更具文明本质意义的方面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

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调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的通知》，匡亚明任新一届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

同年5月，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制定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并针对当时形势和需要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点作了适当调整。

赵俪生《日知录导读》由巴蜀书社出版。

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由成都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入 32 篇论文，分别从历史、学术、反思的角度对帮会、黑社会、宗族、婚姻、家庭结构、赌博、迷信等种种社会问题进行探讨和剖析。其中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对“社会文化史”的学科概念作了比较完整的解说，对这一新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意义等作了集中论述。

5 月

方克立主编“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第 1 辑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第 2 辑 1995 年出版。两辑共 14 种，分别辑录了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方东美、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成中英等 14 位新儒家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论著。

该丛书出版后产生了较大影响，为“国学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分序言和正文上下两卷，上卷是“宗周社会”，分“氏族篇与地理篇”、“建国篇”、“社会篇”；下卷是“宗周的礼乐文明”，分“礼的起源”、“周公对于礼的加工与改造”、“孔子对于礼乐的加工与改造”。

作者将文献、考古材料和民族学资料结合在一起，用“三重证代替了过去的双重证”，先后两次到洛阳、豫西和关中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弄清了周朝建国初年的地理环境和有关问题。本书对儒家思想所做的一个判断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因为不高明不会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不中庸不会长期稳定而守恒。

叶桂生、谢保成《郭沫若的史学生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中国现代史学的产生、发展为线索，对郭沫若一生的史学足迹进行了考察，追溯了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古史学、文物考古、古籍整理等方面的著述与活动，系统说明了郭沫若史学思想的演变历程，并揭示了时代和个性对其所造成的局限。

全书分启蒙（1892—1913 年）、转折（1914—1927 年）、成长（1928—1937 年）、发展（1937—1949 年）、攀登（1949—1966 年）、晚年（1966—1978 年）六章，对每一时期都进行了详细介绍和评价，尤其增加了对以往研究中相对忽视或很少涉及的有关郭氏早期与晚年史学活动情况

的评述。

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朱政惠《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作者对吕振羽各个时期的关键之作逐部考察，力图辨明源流，衡估影响。对每一著作，作者都深入其中，并上下贯通，左右比较，条分缕析，深入挖掘，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一部“掘井”之作

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研究了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并把它提到文化层次的高度加以深度论述。

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论述了5—15世纪英国的封建主义组织、土地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阶级结构、城市制度、商品经济、货币和信用等，从制度史的角度对英国封建社会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作者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对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方封建社会各种制度追根溯源，剖析其背后蕴藏的社会历史基础和学术背景。并且以中国历史为参照系，对英国封建社会进行了独具一格的解读，意在破除西方历史独特性的神话，说明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

2005年修订再版，新增了6万字。

牙含章、王友三主编《中国无神论史》（上下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上册包括导言、先秦编、两汉编、魏晋南北朝编、隋唐编，下册包括宋元明编、清代编、近代编和少数民族编。每编除第一章是绪论外，其他各章为个人或某部重点著作的无神论思想概论或某一少数民族的无神论思想总结。每编绪论主要概括此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概况、当时的宗教有神论与世俗迷信、无神论思想有何发展及无神论思想发展的贡献与局限等。全书共论及历史人物九十余人及反映他们无神论思想的各类著作，较全面、系统地概括了中国古代各民族无神论思想的全貌。

漆侠《知困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代两广粮价单和雨雪粮价奏折中，收集了近十万个米价数据，并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对这些数据进行数理分析，计算了 18 世纪广东和广西东部各府州的米粮地区差价、米价变化的长期趋势、季节变动、不规则变动和各地区米价变化的同步性。又结合从清代广东二百多部方志和正史、政书、笔记、小说、碑刻中收集的大量描述性记载，讨论了在 18 世纪广东商品货币关系发达的背景下，人们的经济选择与粮食供求的关系，粮食市场的结构与有效性，商人的活动及其社会文化内涵，粮价变动背景下不同社会集团的处境与反应，政府、士绅等在粮食供需与救灾活动中的作用等等问题，进而分析了传统条件下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作者试图说明，18 世纪广东米价的整合程度超过同一时期的法国，但中国并未进入近代化，其因在于“农户经济活动的非市场导向性”和“整体市场活动的非经济导向性”。

6 月

（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汉籍流布概论编”，论述了汉籍自古以来东传日本的轨迹与各种形式，以及日本汉籍目录学著作研究、日本刊印的汉籍和刊本研究，介绍了 20 世纪初甲骨文字与敦煌文献东传日本以及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文献典籍的劫夺情况；下编为“汉籍流布特藏编”，在对流传于日本的汉籍作总体考察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日本汉籍重要搜储机构以及流布于日本的具体汉籍，如宫内厅皇家的汉籍御藏、日本汉籍的公家特藏和私家特藏、日本大学系统的汉籍特藏、日本宗教组织的汉籍特藏等。

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创刊。

该刊是研究道家和道教文化的综合性学术研究辑刊，前十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十一辑以后改由三联书店出版。主要发表海内外学者研究道家和道教文化的学术论文，探讨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对一些重大的课题如“马王堆帛书”、“敦煌道教文献”、“郭店楚简”等辟专号进行讨论。

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社会史与学术史相结合的角度，对清初顺治、康熙两朝，即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叶八十年间的主要学术现象进行了系统清理和再认识，对清初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行了重新探索，所论多为学界首创之见。作者认为，清初学术既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学术，也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而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当理学衰微之后，在明清更迭的特定历史条件之下，清初学术界无从提出取代理学的学术形态，只好回过头去，到传统的经学中寻找依据。清初学者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倡导，实事求是的为学风尚的示范，诸多学术门径的开启，“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训诂治经方法论的提出，都为其后乾嘉汉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于是清初学术成为由宋明理学向乾嘉汉学转换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其间，有许多优秀的成果值得总结和表彰，也有若干深刻的历史教训应当认真记取。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主要依据闽台地区现存的族谱、分家文书等民间文献，考察了明清时期福建家族组织的内部结构、社会功能、发展模式与演变趋势，探讨家族组织与社会伦理、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明清时期的家族组织，是一种多层次及多功能的基层社会组织，具有“泛家族主义”的文化内涵，反映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因此，研究明清时期的家族组织，有助于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多元结构及其弹性特征，加深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

刘茂林、叶桂生等著《郭沫若新论》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书力求全面反映郭沫若的形象，对郭沫若的政治、文学、史学活动及其个性进行了综合考察。

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何芳川在《世界历史》第3期发表《太平洋贸易网与中国》。

文章认为，太平洋贸易网五百年的发展史，同中国关系至深。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编织和发展太平洋贸易网的过程中，使中华民族从古代国际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主角、强者和影响者，逐步沦为西方的附庸，也带给中国人民无尽的耻辱和灾难。另一方面，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太平洋贸易网给中国带来了先进资本主义的东西。从洪秀全到毛泽东，近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家、革命家们，正是经由这一贸易网获得世界的

先进成果，直至马克思主义，终于历尽劫难，缔造了新中国。今天，在争取建立冷战后新秩序的艰难工作中，中国也必将充分利用太平洋贸易网所带来的机遇，勇于交流，长于取舍，善于消化，以推进现代化的宏伟大业。

晁福林《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由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是台湾锦绣出版事业公司与北京三联书店合作出版的“中华文库”第一册。全书分六章，分别论述了两周之际社会政治局势及变化轨迹，以及春秋五霸的兴盛与争霸情况，对从春秋霸业到战国七雄的历史演进路程进行了梳理。

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收录了作者有关古籍整理、古代语文、古器物以及古代历史（商至汉）方面的论文25篇，反映了作者在文史研究领域的多方面重要成果。

7月

31日 《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与《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在北京召开“开创史学理论研究新局面”座谈会。

京津史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共约四十人出席了会议，何兆武、刘家和等十余人在会上作了发言。

是月 余英时在《中国文化》第6期发表《钱穆与新儒家》。

文章认为，钱穆与“新儒家”的学术途辙截然异趣，彼此的学术取向及对儒学传统的认识格格不入，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把“新儒家”之名强加在他头上。

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共10卷，300万字，1993年出齐。本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的历程、现状和成就，精选了日本第一流学者近百人所撰二百余篇优秀论文。这些论文代表了不同学派和学术风格，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第1卷通论，第2卷专论（战后中国史论争），第3卷上古秦汉，第4卷六朝隋唐，第5卷宋辽金元，第6卷明清，第7卷思想宗教，第8卷法律制度，第9卷民族交通，第10卷科学技术。每卷都有前言，概述该领域研究史、研究现状及研究展望和作者简介。

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晚年致力于构筑以“新陈代谢”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史新体系和理论分析框架，本书就是反映这一探索的专著。生前未及完稿，是由其学生根据其遗稿（主要是历年的讲课提纲及记录）整理完成的。本书视野广阔，不仅考察了近代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革，而且考察了城乡基层组织的演变，以及不平等条约激起的社会变化；不仅研究了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内部因素，而且寻找出外部冲击引起的社会习尚的改变；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的社会心态的变化。通过充满激情而又思辨的论述，勾画出中国近代社会百年的新陈代谢和急遽变革。本书思辨深邃，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好的导论性著作。

李学勤在《中国文化》第7期发表《走出“疑古时代”》。

本文为作者在一次小型研讨会上的发言，由李零等人整理。文前所加的“编者按”说，此文“痛感疑古思潮在当今学术研究中产生的负面作用，于是以大量例证指出，考古发现可以证明相当多古籍记载不可轻易否定，我们应从疑古思潮笼罩的阴影下走出来，真正进入释古时代”。“走出疑古时代”、“进入释古时代”的口号由此正式提出。

文章把矛头指向顾颉刚的“疑古”学说，指出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有副作用，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文章指出，在现在条件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现在的学者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做出重新估价。

随后，“走出疑古时代”逐渐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学术思潮，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直接导致其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提出。

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研究汉民族发展源流为对象，在综合几十年来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特征、文化进行了论述。

蒋大椿《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该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十多年我国学术界、史学界围绕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问题所进行的探索和讨论进行了描述和总结，对于了解这一阶段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的理论探讨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书中详细论述了这一学术争论的焦点、分歧的根源、思想方法以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并清晰地理出了深化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研究尚需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提示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与方向。书后附有“历史主义与阶级

观点论著索引”。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六卷本《世界史》开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分《古代史编》、《近代史编》、《现代史编》，每编分上下册。1992 年 7 月，刘祚昌、王觉非主编的《近代史编》率先出版。刘家和、王敦书、朱寰、马克垚主编的《古代史编》和齐世荣、彭树智主编的《现代史编》分别于 1994、1995 年出版。

该书贯彻了吴于廑的“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学说，按照世界历史“是由各地区之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这一中心线索来展开论述。吴于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撰写的“世界历史”词条被作为总序。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学者逐步创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对全面提高世界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六卷本《世界史》成为继 20 世纪 60 年代的四卷本《世界通史》之后，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史上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述。

黄盛璋主编《亚洲文明》第 1 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研究亚洲文明起源、发展、不同国家与地区间文明交往与影响，以及亚洲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的大型学术集刊，每年出版一集。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论文集共选收陈寅恪有关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敦煌学、民族学以及宗教学论文 52 篇，多为陈氏史学论著中的精品。

赵俪生《学海暮骋》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收入 42 篇论文，内容丰富，以文化史为主，包括先秦文化、魏晋至宋明史事、宋明理学、西北学、山东诗文等有关论著以及对师友的回忆文章等。

徐杨杰《中国家族制度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8 月

28 日　谭其骧逝世，终年 82 岁。

是月　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由黄山书社出版。

该书是第一部宋代史学的断代史专著。作者力图把史学和哲学联系起来，从时代的哲学思潮中去观察和把握史学的变化和发展。同时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史学和社会的关系，以相当的篇幅评介了两宋的思想家、历史家的历史变革观点，并且联系社会的变革进程来说明史学思想对社会变革的作用。作者特别重视宋代史学的区域研究，分别阐述了浙东史学、蜀中史学、江西史学各自的成就与发展特征。

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戴逸《步入近代的历程》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国家与民族”、“民族史”、“回族史”、“回族史料序录”、“伊斯兰教史”、“行纪和地方史话”及“民俗学记闻”七部分组成，全面反映了作者在民族和宗教研究上的重要成果。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由巴蜀书社出版。

瞿林东《中国史学散论》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9月

22日　第四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暨中国社会史学会成立大会在沈阳举行，选举冯尔康为会长。

来自全国六十个单位的九十多名历史学以及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的研究工作者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社会史研究与中国农村”。会议讨论的重点有三个方面：其一为“家族与婚姻”，包括历史上的婚姻和人口问题、家庭、宗族组织和制度、两性关系等；其二为“社会史理论与社会结构及社区的宏观研究”，涵括社会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社会史学的关系、社会结构理论、古代农村社区结构、士人与社会等问题；其三为“灾赈、宗教、农村社会等问题”，主要讨论了天灾人祸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对灾变的预防和处理及效果、社会消费风俗的变迁、民间宗教意识和活动、古代复仇观念、乡村教育等问题。

“首届西方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在安徽歙县召开。

是月　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文化视角入手来研究史学，对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双向考察。书中对孔子、《左传》、司马迁、班固，乃至全祖望、王鸣盛、钱大昕、章学诚、魏源、黄遵宪、夏曾佑、梁启超等名家、名著都有论述。

1999 年出版增订本，增补了论司马迁在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等三章共 4 万字的新内容。

戴逸、罗明编著《清代人物研究》由巴蜀书社出版。

胡伟希《传统与人文——对港台新儒家的考察》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对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港台地区新儒家思潮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等情况作了论述，对其中影响最大的钱穆、徐复观、张君劢等人的思想作了分析，阐明了这一思潮的来龙去脉及其内涵、特点和历史意义。

赵俪生、郑宝琦主编《中国通史史论辞典》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中型专业工具书，共收考古学、中国古代史、货币史、中国近代史条目 1682 个，囊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通史范围内的绝大多数曾经产生争鸣性的问题，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有代表性问题皆有反映，类似人物生卒年及地名考订之小问题也收罗殆尽。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民族、人物、交通等各个方面，堪称一部相当完备的当代中国史学研究概览。该书尤重学术性，每一条目均备列此一问题上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首创者及其各自论点，方便读者从学术史角度了解该论辩的来龙去脉。

(美)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由中华书局出版。

据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译出，书名为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938—1985。作者运用“中国中心观”模式研究了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沿用其《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的研究方法，依据 20 世纪 30 年代费孝通、林惠海等以及“满铁”对长江三角洲村庄的调查材料，结合有关文献资料，以及自己对松江县的实地调查，进行了大跨度的历史研究。书中对生态环境、稻麦梓桑、商品市场、集体家庭、副业生产、乡村工业、人口状况等进行了缜密的考察和论述，并对各家各派理论进行了评判，提出了小农经济能在高度商品化条件下持续支撑高水平市场扩张的结论。

黄氏在该书中不仅对自己的“过密型增长”理论作了系统化阐述，同时也对包括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等在解释中国经济模式问题上占有主导地位的经典理论与规范认识提出了全面挑战，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学界都引起了激烈、持久的论战。

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纲》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

《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发表《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笔谈》。

第4期连载。

第3期所载笔谈包括：王觉非《研究世界历史的新任务》、丁守和《从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谈起》、刘祚昌《反思过去，向21世纪奋勇前进》、廖学盛《加强与早期阶级社会有关的理论研究》、彭树智《世纪之交的中东地区史、国别史研究管窥》、黄德楠《愿史学在改革大潮中加快前进步伐》、彭卫《变革时代历史学家的责任》。

第4期所载笔谈包括：张芝联《牢固地建立史学理论这门学科》、田昌五《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而努力》、陈崇武《支持、吸收、拓宽——世纪之交对中国史学的几点建议》、蒋大椿《开创史学理论研究的新局面》、罗凤礼《关于史学评论及其他》。

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第一部隋唐文化专史。

10月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林甘泉、黄烈主编《郭沫若与中国史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为纪念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而编，分上下篇，比较全面、深入地探讨了郭沫若的史学思想历程及其对中国史学诸多领域做出的贡献。上篇分七章：一、才华卓著的一代史学宗师；二、早期的史学思想及其向唯物史观的转变；三、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四、西方文化的影响；五、传统考据学的批判继承；六、治史的个性特色；七、史剧与史学关系的探索。下篇分八章：一、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二、历史人物研究；三、农民战争史研究；四、先秦诸子研究；五、甲骨文研究；六、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七、先秦时代其他出土文献的研究；八、成绩斐然的古籍整理。书中对郭沫若史学研究的不足之处也作了分析。

夏春涛《太平天国宗教》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第一部以太平天国宗教为主题的专著，被誉为“八九十年代交替时期我国史学界关于太平天国宗教研究的集大成者”。

庞卓恒主编《西方新史学述评》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分上下两编。上编系统介绍了当代西方史学界的新兴学科社会史学、人口史学、家庭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心智史学等，并对其源流作了综述。下编论述了西方史学的新方法，对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和口述史学进行了评析。

林家平等著《中国敦煌学史》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

此书以年代为经，专题为纬，系统介绍了我国1909至1983年间敦煌学的重要成果，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又按当时研究的内容分章作专题阐述，既有编年史的性质，又具有专题性特色。在介绍每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代表著作、重要学术活动时，特别在对研究成果的评介上，多有独到之见。

赵世瑜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11 月

南炳文《南明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记述了自清军入关，到南明诸政权及其与之合作的各支农民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描绘了一幅完整、系统的南明历史画卷。作者尤重史料的总括，除遍搜考信明清实录、野史、笔记、方志、文集及外国人著述等多种资料外，在重要史事的叙述上，多注明多种取材来源。作者在提出一家之言的同时，还注重博采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方面反映了学术界在南明史研究上的整体水平。

在写作方法上，该书以叙事为主，而将评论穿插其间，从而将历史头绪繁多、错综复杂的南明史写得前后照应、浑然一体，表现了作者较强的统摄能力。

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专著，系统论述上自1919年“五四”运动，下迄1956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和发展的历程。作者以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就为中心，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卓越成就。

启良《史学与神学——西方历史哲学引论》由湖南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探讨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从原始神话到上帝史观；二、阳光下的阴影：近代西方历史哲学；三、把人类的历史还给人类：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四、走下神坛的克莱奥：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书前有《代

序：从西方历史哲学史上看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思想价值》，可以看作是全书的导论。

该书目的在于使人们尽可能摆脱传统的机械论历史观的束缚，以其深度和富有启发性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美）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收入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论文七篇，包括《略论华北近数百年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等。所收文章充分展示了黄氏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和探索，即综合运用经济学、人类学、法学和史学等门类知识进行跨学科研究，特别推重进行微观的社会研究，尤其是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通过获取细密的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

12 月

27 日　林增平逝世，终年69岁。

是月　宋衍申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要》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编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分所藏敦煌文献》（简称《俄藏敦煌文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出版。

俄罗斯东方研究所与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一样，是世界敦煌文献四大藏家之一。其所藏构成和来源较为复杂，除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自敦煌石窟藏经洞的文献之外，还混杂进包括俄罗斯驻新疆使馆官员所获取的新疆、黑水城文献，甚至少数更晚时期的文献。这批文献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完整地向世人公布，在学术界始终是个谜，一直被敦煌学界视为一大缺憾，因此，该书的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全书共17册，至2001年底出齐。收录了敦煌文献弗鲁格号368件（包括补收的《一切经音义》2件）、敦煌号19092件，以及附收的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8件敦煌文献残片，总计近2万号。不仅文献数量大，内涵也极其丰富。佛经部分多为藏外佛经，与佛经相关的祈祷

文、忏悔文、讲经文等也占了较大的篇幅；四部类经史子集文献及五代时期大量的世俗文书，是考订文献和研究当时社会的重要材料。

该书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之一种，除最为重要的《俄藏敦煌文献》外，该丛书还包括大批尚未公布的散在各地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已经出版的有《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等。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长期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的总结性著述，书中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进行了系统论证，并在陈寅恪研究的基础上对唐代南朝化倾向进行了全面论述，在相关问题的认识上实现重大突破。“最大贡献在于对中国三至九世纪七百年历史的演变及其规律，进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

全书除“绪论”、“综论”之外，凡三篇，第一篇“论魏晋时期的变化”，第二篇“论南北朝的差异”，第三篇“论唐代的变化”，故以“三论”为名。“绪论”考察了汉代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综论”总括全书并对一些重要论点在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王家范主编《十大农民起义》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彭卫《历史的心境——心态史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系统地介绍了弗洛伊德以来心理史学及其流派、方法在欧洲大陆和美国的进展情况，分析了心理学方法及其运用的若干问题，并特别论析了心理分析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作者还利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具体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汉武帝、班超、王莽等历史人物的心理人格，令人耳目一新。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贾东海、郭卿友主编《史学概论》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赵忠文主编《中国历史学大辞典》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

秦晖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发表《古典租佃制初探——汉代与罗马租佃制度比较研究》。

作者认为，人们往往从奴隶制等同于奴隶社会、租佃制等同于封建社会、奴隶制为租佃制所取代的先验框框出发，看到汉代奴隶劳动不如罗马发达，便认为汉代理所当然应该是租佃关系发达的“封建社会”了。他们没有想到，汉代奴隶劳动固然没有发展到罗马的水平（严格地说，应该是没有发展到罗马意大利的水平），然而租佃制更没有发展到罗马的水平。如果说，汉代没有罗马那么多奴隶，便成了“封建社会”，那么汉代没有罗马那么多的佃农，岂不又该是“奴隶社会”了吗？

作者指出，过去借以划分社会形态的方法论值得反思。奴隶制、租佃制与雇佣制、债利剥削等等作为元素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经济系统中。应该把注意力从元素的分析转移到系统整体结构及其运动规律、功能特征上来。

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徽州文书的发现轰动国际学术界，与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明清故宫档案并称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文化的“五大”发现，并形成一个崭新的学科“徽学”。该书即为大型影印徽州契约文书汇编，分宋元明编和清、民国编，每编各二十册。共收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藏十万件徽州社会文书中选出的散件三千二百余件，簿册近百册，鱼鳞图册十六册，包括田土买卖契约、租佃文约、合同文书、誊契簿、租谷簿、典当文约、卖身契、税契凭证、推单、赋税票据、黄册底籍、鱼鳞图册、田土号簿、户领册、会簿、借券任命状、试题试卷、兰谱、信札、诉讼案卷、旌表批文、政府公文等，内容涉及土地买卖、赋税徭役、宗法乡俗、司法诉讼、盐政茶法、奴仆制度及经业经营等众多门类，皆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该书为迄今为止海内外出版的种类最齐全、内容最浩繁、部头最宏大的一部徽州原始契约文书资料汇编。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是年

国学大师丛书开始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

该丛书意在从整体上重现现代中国“国学大师”集体风貌，包括章清著《胡适评传》、汪荣祖著《陈寅恪评传》、吴俊著《鲁迅评传》、宋志明著《熊十力评传》、刘炎生著《林语堂评传》、景海峰著《梁漱溟评传》、欧阳哲生著《严复评传》、麻天祥著《汤用彤评传》、顾潮和顾洪著《顾

颉刚评传》、徐清祥和王国炎著《欧阳竟无评传》、黄开国著《廖平评传》、王思隽和李肃东著《贺麟评传》、马镜泉和赵士华著《马一浮评传》、董士伟著《康有为评传》、谢保成著《郭沫若评传》、张晓唯著《蔡元培评传》、孙永如著《柳诒徵评传》、姜义华著《章太炎评传》、郭齐勇和汪学群著《钱穆评传》、吴锐著《钱玄同评传》、刘烜著《王国维评传》、李中华和王守常著《冯友兰评传》、孔庆茂著《辜鸿铭评传》、罗琨和张永山著《罗振玉评传》、张荣华著《张元济评传》、方光华著《刘师培评传》、刘义林著《张君劢评传》、刘乃和著《陈垣评传》、王宁著《黄侃评传》、吴廷嘉著《梁启超评传》。

该丛书在“国学大师”的选择上表现出鲜明的倾向性，所选人物仅有郭沫若来自唯物史观派。

由钱宏执笔撰写的序言《重写近代诸子春秋》呼唤复兴国学，创造国学繁荣的新时代。

轩辕黄帝研究会主办《中华文化》杂志创刊。

张岂之任主编。1994 年更名为《华夏文化》。

国家文物局公布本年度十大考古发现。

湖北鸡公山遗址（旧石器时代）、内蒙古兴隆洼原始聚落遗址（新石器时代）、湖南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古城址（新石器时代）、江苏赵陵山良渚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山西晋侯墓地的发现与研究（西周）、河南丹江口水库楚国贵族墓（战国）、安徽天长三角圩汉墓群（战国、西汉）、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西汉）、内蒙古辽代耶律羽之墓（辽）、河南洛阳北宋衙署庭园遗址（北宋）。

1993年

※“顾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召开。
※ 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国学研究》创刊。
※ 第一届“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
※《人民日报》发表《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引发普遍关注。
※ 湖北省郭店出土战国时期楚国竹简。
※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出版。

1月

（法）布罗代尔著、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由三联书店出版。

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了美国学者海登·怀特《话语转义学：文化批评论文集》中的四篇论文，包括最能体现其后现代史学观念的那篇《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作者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只需要转变他的观点或改变他的视角的范围就可以把一个悲剧境遇转变为一个喜剧境遇。……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作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造的运作。”因书中海登·怀特是以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家面目出现的，故此文没有在历史学界引起重视和反响。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由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综合运用社会学、计量学、都市学、心理学等多种方法，对1644

年至辛亥革命以四川为重心的长江上游区域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分别从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人口、耕地与粮食，农村经济与农业发展，区域贸易与市场网络，手工业与工业，政治结构与地方社会秩序，新旧教育体制的变动，社会组织及其功能的变化，社区、社会阶层与社会生活，传统文化与近代意识等方面，对这一区域的近代化进程作了整体的研究。该书是改革开放以来有代表性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专著。

王育济在《山东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金匮之盟"真伪考——对一桩学术定案的重新甄别》。

文章主要对学术界几成定案的"金匮之盟"伪造说提出质疑，并以细密的考证反驳了张荫麟、邓广铭等人对"金匮之盟"真实性的怀疑。作者认为，学术界有关"金匮"一事的所谓种种"破绽"，或是昧于时代习尚的变化而误以常事为不情；或是仅据"独传约"发论而与"三传约"之真伪无涉；或是刻舟求剑，早已支离于"金匮"一事之真伪而成另一问题。凡此种种，皆不足据之而将整个"金匮之盟"断之为伪造。

该文为断解"金匮之盟"的有无这一学术公案提供了新探索。

2月

沈长云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华夏民族起源与形成过程》。

作者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为指导，阐述了"华夏"族称的来历和华夏民族的具体形成过程。作者认为，华夏民族的形成，也就是华夏祖先从部落状态向国家过渡和摆脱氏族血缘联系向地域组织过渡的进程，最终摆脱血缘羁绊而实现按地区对国民的划分，才可以看作华夏民族形成的标志。在我国，国家的形成经历了由早期的部族国家（由氏族和部落组成的国家）到完全以地域组织为基础的国家这两个发展阶段。夏商国家是建立在氏族联合组织而非地缘组织的基础之上的，直到西周大封建之后，由于社会历史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华夏各部族才开始由部族状态向民族共同体演化，而华夏民族形成过程的最终完成则是在春秋战国之际。

《中国史研究动态》第2期发表《"中国历史学面临新的挑战"笔谈》。

编者按说："近十年来，中国历史学一直处于十字路口。新时期的历史学如何与建国以来的传统史学接轨，怎样拓展史学的内涵和社会功能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史学的基础研究应该有什么创新等等，这些问题一

直萦绕在史学工作者的脑海，并且进行过认真的探索和热烈的讨论。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深入，中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将更猛烈地冲击中国的历史学界，无论是史学研究、史学研究的组织管理还是史学工作者的心理调适，都会面临一系列新问题。”

参加笔谈的包括赖长扬《社会的整合与历史学的地位》、彭卫《今天历史学家的肖像》、孙晓《市场经济与历史学》、江小涛《历史学的出路何在》、田人隆《中国历史面临新的挑战》。

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除研究唐代人口升降、分布外，还着重探讨了唐代各类人口的迁移及影响，并运用吐鲁番文书研究唐代的人口结构，是迄今最深入地研究唐代人口的力作。

3月

黄宗智在《史学理论研究》第1期发表《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

本文原载英文版《近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第17卷第3期（1991年7月）。文中论及中国经济社会史上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如自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商品化与发展的问题、自然经济与市场的问题、公民权力与公众领域问题、封建主义问题等等，尤其是从方法论的高度指明了在这些问题研究上的“规范认识危机”和一系列悖论现象，向传统的解释提出强有力挑战。作者的观点在美国理论界、史学界激起很大反响。

作者指出，当前的中国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危机是全世界历史理论危机的一个部分，这一世界性的历史理论危机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尖锐对立的终结而出现的。这一局面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机会去突破过去的观念束缚，参加到寻求新理论体系的共同努力中。中国史领域长期借用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中国历史套入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理论。我们现在的目标应立足于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并非是退回到旧汉学的排外和孤立状态，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把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

《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后围绕黄文中提出的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

孙达人、王家范、孙如琦、刘九生在《史学理论研究》第1期发表《中国农民史论纲》。

文章论列了中国农民史研究中“四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一、农民史研究回顾；二、中国农民的特点和贡献；三、历史周期和农民战争；四、“高水平均衡的陷阱”和其他。

作者认为，廓开视野，积极吸取国内外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史和农学史的新成果，扩大研究领域，除农民战争之外，同时探讨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行为模式等等的发展演变，全面展示他们兴衰荣辱的风采和遭遇，是研究农民史必须要做的事。

秦晖《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发表《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析之一》。

作者主要引用关中各县土改档案，描述了土改前即20世纪40年代后期关中农村社会经济模式的主要类型学特征。作者认为，关中“封建关系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有产（生产资料，主要指土地）者与无产者的对立模糊，而有权（身份性特权与政治权力）者与无权者的对立突出；主佃冲突几乎不存在，主雇冲突也并不激烈，而官（豪）与平民的冲突则异常紧张；建基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尤其是土地所有制）的阶级分化模糊，而建基于人身依附关系（统治——服从关系）的等级分化极为鲜明；“按资产（包括地产）分配”的两极分化很不发达，而“按权分配”、“按身份分配”的两极分化则异常尖锐。作者的这一结论因存在着广泛的现实性而备受学界关注。

蒋大椿、李洪岩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发表《解放以来的历史比较方法研究》。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主要探讨了已进入仕途的宋代文官，特别是中下层常调文官的选任问题，论述了宋代任官之制的主要特点、考课法在宋代的施行、铨选中占特殊重要地位的荐举制度等。

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成立。

为解决青年史学工作者“出书难”问题，从1994年开始，该基金会推出“东方历史学术文库”，遴选优秀史学著作予以出版资助。

顾潮编《顾颉刚年谱》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系谱主女儿，书中利用谱主大量的日记、来往书信及个人读书笔记等第一手资料，详细记录了顾颉刚一生的学术、教育、政治等方面的活动。该书叙事详赡，力求客观，不单可以作为顾氏的个人记录，更因记载了其与学界的往来及创立的各个学会和学术杂志的情况，可视为当代中国

学术史的重要记录。

《文史哲》第3期刊登“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专栏。

发表的文章有王煦华《顾颉刚先生对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及贡献》、顾潮《顾颉刚与傅斯年在青壮年时代的交往》、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卓越的〈尚书〉研究》、顾洪《关于顾颉刚先生读书笔记的特色》。

《东北师大学报》第1期发表《进一步解放思想，繁荣史学研究》笔谈。

编者按说：“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历史任务，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面向实际，了解实际，研究实际。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史学研究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史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参加笔谈的包括詹子庆《历史研究要有时代气息》、朱寰《大力开展比较研究是发展史学的重要途径》、姜德昌《世界史研究呼唤改革》、宋衍申《历史研究要与时代发展同步》、胡维革《跳出误区，提高史学研究层次》、赵毅《加强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崔丕《积极开展对战后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研究》。

4月

9日　吴于廑逝世，终年80岁。

是月　郑永福、吕美颐《近代中国妇女生活》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主要研究了涉及妇女生活的天足、服饰、婚嫁、宗教、城市妇女、农村妇女、女工等七个方面的内容。作者采用将生活现象和发展变化过程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展开研究，并结合各个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迁，从宏观到微观，多角度、多层次地阐析了有关问题。书中对近代中国妇女的生活生产活动状况、生活方式，及其形成和发展变化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原因等都做了细致的研究。书中设计了五十余个统计图表，对农村妇女的结婚年龄、夫妻年龄的差数、农村婴儿死亡率和成活率、农村妇女田间和副业劳动在农村生产劳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各省城市女工的人数、劳动时间、工资水平和物价、罢工斗争状况等，都做了量化研究。所引资料丰富而全面，大量使用了各近代史资料丛编、专辑、地方志、个人专集、外人著述、笔记小说、回忆录、社会调查、时事画报等文献。

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历史研究》第 2 期发表“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

笔谈文章包括王家范《从难切入，在“变”字上做文章》、冯尔康《深化与拓宽》、田居俭《关键还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乔志强《深化中国社会史研究》、刘志琴《提高社会史水平的三部曲》、李华兴《方兴未艾、任重道远》、陈春声《中国社会史研究必须重视田野调查》、陆震《以“人”为轴心展开社会史研究》、周天游《探微知著、“活”现历史》、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赵清《切近现实，重视近现代社会史》、彭卫《时代体验与历史知识的汇合》、蔡少卿《扩大视野，注意理论方法》等。

《史学理论研究》第 2 期发表“面临改革大潮历史学怎么办笔谈”。

这次笔谈背景是：1992 年的改革开放大潮引起了史学界的适应性恐慌，史学更加被边缘化，导致了新一轮的史学危机论的蔓延。

参加笔谈的包括强盛《客观衡量自我，历史学无须心慌》、张艳国《历史学科也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侯云灏《变革传统模式，繁荣史学研究》、尘凤《安贫乐道与开放搞活》等。

马如森《殷墟甲骨文引论》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5 月

7 日 “顾颉刚先生诞辰 100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苏州召开。

胡绳在会上发表《建设社会主义，要吸取人类以往的全部文化》的讲话，对顾颉刚做出高度评价。

讲话着重谈了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对非马克思主义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讲话指出，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正确，对非马克思主义只能批判、反对、驳斥，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要善于从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中学习。

是月 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创刊。

发刊词说：“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不是一潭止水，它宛若滚滚不尽的江河，不断纳入支流，或直或曲，或速或缓，或涨或落，变动不居。国学也是这样，汉有汉学，宋有宋学，今后则必有以今之时代命名的学派。历史悠久的国学只有不断以新的形态代替旧的形态，才能永葆青春。”“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国学，必将抖落身上的尘埃，吸取各国优秀文化的营养，以其扶疏的枝叶向全世界展现旺盛的生命力。”

该刊的出版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兴起的标志之一。

姜义华在《复旦学报》第3期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

该文实际上是“激进”与“保守”之争的继续。作者认为，在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曾有过三次浪潮。它主要源于外来的强烈刺激，而非中华民族自身在近代化方面的发展，因而它的特征是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特别发达，而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则异常薄弱。由于对付沉重的民族压迫主要是靠保持原先生产方式的农民，所以中国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双重的：推动了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紧密结合，也使得形成真正的近代民族多了一层障碍。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民族主义进入了新阶段（解决“球籍”问题），民族主义的内涵已从政治转向经济。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编《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1961—1990）》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系统研究了以章太炎、刘师培诸人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作者在系统地考察国粹派崛起的历史机缘、学术渊源及其新学知识系统的基础上，对国粹派的文化思想，包括文化观、史学思想、伦理思想、经学思想等都做了具体深入的研究。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史的范围，采取文化史的视角，且注重综合研究，着意从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和政治格局的变动及其相互交感的大背景下，为国粹派定位。本书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例如，肯定国粹派倡“古学复兴”，“其本质是创新，而非复古”；指出国粹派“以史为武器，助益革命”；其经学思想体现了“时代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国粹派俗化和历史化孔子与《六经》，不仅开创了近代“国故学研究之新运动”的先河，且为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作了必要的思想铺垫等等。

6月

1日　第一届“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

是月　沈志华、于沛等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1898至

1991 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该书记述了苏联共产党从建立到解散共九十三年的历史，并收录了多幅珍贵历史照片。

“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第一种《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丛书为中法合作项目，由法国外交部赞助出版，被称为是一项全面展示西方汉学在西域敦煌学领域里总体水平的大工程。已出版《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突厥历法研究》、《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等著作。

吴承明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2 期发表《论历史主义》。

该文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续篇，对历史主义的叙事方式、研究模式、方法工具、价值判断等方面特点进行了评判。

作者认为，历史研究应该有价值判断，这是史学的功能之一，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判断标准会因时代而异，各家判断会有分歧，都可留待争鸣。社会科学本有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两种。前者研究“是什么”，考察其运行规律，不管结局好坏。后者研究“应该是什么”，要评论良窳。史学要有价值判断，但不是说它只作规范研究，不作实证研究。实际上，实证研究是史学的主要方法，弄清楚“是什么”，才能作价值判断。

《北大史学》创刊。

本刊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主编，为不定期连续出版物，主要收录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中外历史论文，并适量收录校外和国外的专家学者的相关论文。

《世界历史》第 3 期发表“在新形势下如何推动世界史学科发展笔谈”。

参加笔谈的有罗荣渠《历史学要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钱乘旦《跳出老框架，走向新天地》、张象《通过多种途径发挥世界史学科的社会功能》、楼均信《世界史研究要“眼睛向下看”走通俗化之路》、刘绪贻《在新形势下如何推动世界史学科发展?》、柳植《开扩视野 丰富智慧》、叶书宗《发展世界史学科必须转变观念》、葛新生《世界史学科应走向大众》等。

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在勾画出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进程与全貌同时，着重对中国早

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与变革、城市化与社会结构、民情风俗的变迁、中外关系格局和外交的早期现代化等诸方面进行了探讨。该书是国内从现代化角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第一本综合性、通论性的学术专著，在方法和理论上作了新的探索，不是仅以革命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乃至社会史的某一线索和内容为研究对象，而是从整体的网络式的眼光和思路，来观照和分析中国社会在近现代数十年间的变化过程。该书在理论上的贡献，在于尝试建立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架构，把“一般现代化理论和中国近代史的本质特征相结合”，强调中国早期现代化“始终围绕着如何回应外国列强的不断挑战这个主要线索”，并“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步深化而变化”，因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欧美国家以及日本、俄国，也不同于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家。

7月

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在写作方法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治史的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长处，以年、月为序，分“大事记”和“时事报道”两大部分，全景式地记录了南京国民政府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人事变动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大事记”采编年体，按月记事，力求略人所详，用最简洁的文字且最大容量地反映国民政府各个方面的信息。“时事报道”采纪事本末体，力求详人所略，从大事记中择其要者作最详尽的报道。

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由巴蜀书社出版。

本书主要借助实证的个案研究来描述晚清苏州商会产生与发展变化过程，着重探讨其组织系统、社会职能、团体性质及其在社会生活多层面扮演的角色与作用。

侯仁之在《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

作者提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这在历史地理学新一代人才的培养上，应该是提到教学日程上来的时候了，这也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

8月

2日　《光明日报·史学》专刊改名为《史林》。

为此《光明日报》刊登了《致读者与作者》，云："遵循'立足学术界，面向全社会'的办刊方针，《史林》在保持特色、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将集学术性、知识性为一体，并通过对中国史与世界史、尤以中国近现代史的宣传，帮助读者认识社会、增长知识，释疑解惑。""为使《史林》雅俗共赏，我们将以研究、信息、知识作为本刊的基本内容，并新开辟以下栏目：《借鉴与启示》、《读史随笔》、《史林漫步》、《人物春秋》、《域外沧桑》、《史家近况》等。"

5 日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主办《中国文化研究》创刊。

该刊旨在弘扬中华文化，介绍和传播中华文化之精华，积累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促进其广泛传播，为国内外文化研究者和文化教学服务。

16 日　《人民日报》发表记者毕全忠撰《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

该文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北京大学大型学术集刊《国学研究》第 1 卷的出版和该校考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编者按说："在社会上商品经济大潮的拍击声中，北京大学一批学者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他们认为研究国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北大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北大的好传统，使国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

文章说："北大的领导者和众多的教师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其一就会翻车，就不能腾飞。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我国的文化传统。所谓'有中国特色'，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北大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它曾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凝聚了中华各族人民，支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今天也仍然渗透在现实生活之中，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起着潜在的支配作用。深入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中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等等，都是一项基础性工程。他们认为，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尊为'国学'，并无不当。"

该文"编者按"认为："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

《人民日报》对国学复兴的积极肯定引起了普遍关注。该文的发表因此被看作是 20 世纪 90 年代国学研究再度复兴的标志。

8 月 18 日，该报又在头版《今日谈》栏目中刊发《久违了，国学》一文，继续为国学研究造势。文章说："1950 年以后，'国学'二字废而

不用了，许是避免有当年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之嫌吧。其实，北大的一些学者始终在孜孜不倦从事国学研究，近年来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当然，今日北大的学者已突破旧北大以考据为主的局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注重总体研究、多学科研究和中外对比研究，把国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是月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商人与近世社会相互作用这一角度来考察商人在近世变革时代的特有功能。作者从近代商人群体的形成、商人的地域分布、各具特色的经营活动及其方式、商人的社会生活与心态、商人与都市文化、都市社会经济的变迁及近世商人自身的变迁等各个侧面对商人阶层进行了全面论述，指出在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下，商人始终处于两难境地，至今难以走出近世社会的怪圈。书中借鉴自然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文化学、谱牒学的跨学科研究。

赵吉惠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与重建》。

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先明在《近代史研究》第4期发表《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兼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

作者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构建不能依循“社会学化”的单一偏向发展，而只能在保持“历史学”特征的前提下实行“双向整合”，既从事历史学的社会学化也进行社会学的历史学化的系统的理论创建。唯此，近代社会史才能以一个新的系统的学科赢得社会，独立于学术文化之林。作为历史学的近代社会史理应强化它的史学特征而弱化“社会学”的特征。首先，必须从理论上和学术实践上在学科对象上同社会学划清界限。其次，近代社会史的理论构建必须从总体上具有展示近代社会历史变迁及其内在规律的功能。社会史的学科对象应该是：历史的社会和社会的历史。

王震中在《中国史研究》第3期发表《祭祀、战争与国家》。

“郑州商城与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郑州召开。

苏双碧《太平天国史综论》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容包括改良与暴力之间、进军阶段的得和失、天京政权初期的政治

军事与外交、几种思想的剖析、太平天国的历史归宿等十章，并附录太平天国史研究状况评述。

“中国南方青铜器暨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南昌召开。

李明主编《殷商社会生活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9 月

8 日　“第八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广东江门市召开。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编辑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江门市委党校等单位联合举办。主要议题是毛泽东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思。本届大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并选举产生了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

是月　杨向奎《墨经数理研究》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作者几十年研究墨子成果之结集，共收录十篇文章，除对墨家时空观和宇宙观进行阐述之外，还对《墨经》中的物理学、数学和力学成就进行了揭剖。文章包括《墨子的思想与墨者集团》、《墨家的时空理论及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墨经〉有关数学物理条文校注》、《〈墨经〉中的弹性力学条文疏解》等。该书是研究墨子自然科学成就的重要著作。

陈启能《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收录有关史学理论、史学研究和思想史的论文 23 篇。作者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史学理论问题及相关历史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历史认识论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该书在介绍西方当代史学实践新动向方面尤具开新之功，对当代西方史学的两次转向，即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传统史学范型转向“新史学”范型和 70 年代开始叙事史的重新抬头，都做了细致地爬梳。

王子今《交通与古代社会》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朱维铮在《复旦学报》第 5 期发表《清学史：汉学与反汉学一页》。

第 6 期连载。作者认为，19 世纪初叶，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以及与之针锋相对的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三书相继出现，在清学史上属于超越学派之争的事件，它表征着 18 世纪以来清统治者推

行文化分裂政策以驾驭学术文化界的伎俩失效，也表征着18、19世纪之文学界领袖阮元等调和汉宋的努力，效应适得其反。由扬州学派名士江藩和桐城派文士方东树分别反映的两种学术取向，并没有随着帝国统治的内外危机的深化而消失，反而随着晚清政坛的矛盾加剧，而呈现越发变幻的形态。问题在于清学史的这一页，自清末以来屡遭简单化的处理，不同的价值判断的主观需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分别扭曲了历史的事实，无疑只有对原著双方的矛盾陈述进行清理之后，才能了解。本文便是考证当初历史真相的一次尝试。

姜锡东《宋代商业信用研究》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探讨了宋代民间及官府的赊买赊卖、预付贷款、商业信用中的牙人和担保问题、信用证券、交引买卖市场与交引铺的经营等经济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官民之间的商业信用和榷货务的职能也进行了细致考察，并深入分析了宋代商业信用的特点、作用及影响。

10月

龚书铎《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大学生百家社团联合发起“国学月”活动，季羡林、邓广铭、张岱年、阴法鲁等学者作专题演讲，共15讲，引起轰动，“国学热”进一步升温。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一号楚墓出土战国时期楚国竹简。

共发现楚简804枚，其中有字的竹简有726枚，字数有13000余个，全部为先秦时期的儒家和道家典籍，共18篇。儒家典籍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四篇；道家著作有《老子》（甲、乙、丙）三篇和《太一生水》。其中，除《老子》和《缁衣》与传世本相似、《五行》于二十年前在长沙马王堆出土外，其他十余种著作，今人皆所未见，出土后引起海内外学界的极大关注。这批竹简的儒家部分，大体相当于思孟学派，其成书年代早于《孟子》，填补了儒家学说史上的一段重大空白。

郭店楚简的出土，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先秦儒家思想史乃至中国学术史和中国哲学史。德国汉学家瓦格纳评价说：“世界上只有1947年埃及出土的大批基督教的佚书可与郭店楚简的出土相提并论。”

张岂之、陈国庆《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由中华书局出版。

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包括绪论、乾嘉学派的奠基者和先驱、《明史》的编纂与乾嘉史学、《四库全书》的纂修与学术风气的变化、康乾盛世与乾嘉学派的兴盛、扬州学派与乾嘉学派评价、19世纪前期的学术思潮与龚自珍魏源等七章，对清代学术文化发展演变历程，清代学术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学术流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特别是乾嘉学派的萌生、发展、成就、学术特色及蜕变、衰落，乃至今文经学的兴起，都有阐发。

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李时岳《近代史新论》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近代史探索文章的汇集，收入《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化和辛亥革命》、《论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研究四十年》、《近代改良派和先秦法家》等33篇有着广泛影响的论文，折射出新时期近代史研究的理论风云。

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主要从历史角度对东方社会经济形态的特点及运动规律进行研究，为作者一生研究中国社会形态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总结之作。全书共二十章，分别论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基本理论问题，东方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古代公社和公社所有制诸形态，地理环境与农村公社及其所有制的兴衰，东方城市的起源、演进与特点，东方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的历史进程，古代中世纪东西方土地所有制诸形式，封建社会行会制度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行会制度的解体与近代资本所有制的确立，近代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与东方社会形态学说，俄国农奴制解体时期的“亚洲式”村社制与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俄国资本主义初期村社土地所有制与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俄国资本主义后期土地改革道路和土地国有化性质问题的论战，列宁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与普列汉诺夫“亚细亚复辟论”的论争，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性质与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等进行了论述。既有理论思辨，又有史实考辨。

有论者认为，作者仍局限在已过了时的命题当中。

周良霄、顾菊英《元朝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继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之后第二部全面研究元朝历史的

专著。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首部从历史学角度探讨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整体进程的专著，被称为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开拓之作。全书共有三编：第一编是“大转变时代的新历史观”，用马克思主义评介西方现代化理论并探讨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第二编是“现代世界发展趋势通论”，从总体上考察近两百年来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以及现代化的不同发展模式和特征；第三编是“转型期中国发展趋势通论”，探讨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和特点。

此书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冶理论、历史与现实于一炉。在批判地审视当代国际学术界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作者结合马克思逝世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发展进程的丰富经验，对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动力以及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发展道路和特点进行了新探索，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综合框架体系，为建立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奠定了基础。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由辽沈书社出版。

该《日记》实为作者的长篇读书治学札记，也是其长期致力于东北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治学实录。《日记》规模宏大，时间跨度长。起笔于 1920 年 3 月 6 日，迄止于病重前的 1960 年 4 月 30 日，长达四十年之久。计分 169 卷，装订成 17 函 170 册，共约 550 余万字，荟萃了作者一生为学之所得，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鸿篇巨制。《日记》虽不无应酬之琐事，但大多为治学之札记，作者许多著作大都来自于这些札记，如《辽东文献征略》、《东北文献拾零》、《东北古印钩沉》、《辽海书征》等著述，皆为有关札记整理编辑而成。作者自谓本部日记“作日记读可，作全集读亦可”。举凡四十年之生活经历、时事政治、读书笔记、治学心得、文物搜集、考古游记、遗闻轶事、诗文唱和等皆载入其中。合之为一部书，分之可成为几部书。可于此一书中辑出文集、诗集、经说、学谱、杂著多种。《日记》更是一部东北史研究集，其中有许多关于东北史论著之酝酿、起笔、杀青、出版情况；有重要学术观点之提出、讨论、变化、形成，学术人物、学术论著之评介，东北舆地、古迹、金石之考证论述；更有许多已发、未发的论文、著作、讲话、书札等，或待发的论文草稿，如《孔子与东北》、《吴佩孚失败之因》等。同时，《日记》对四十年间国内外发生的大事，诸如“直奉大战”、“九一八”事变、“东北易帜”、日本投降、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等等也都有所记载和记录，所以也被看作是一部半个世纪国内外政治变革的风云录。

李学勤主编《简帛研究》由法律书社出版。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由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

11 月

13 日　中国史学界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全国史学界代表95人出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通过新的中国史学会章程，选举新一届中国史学会理事会及其领导班子，探讨新时期历史科学的任务。戴逸再次当选为会长，丁伟志、王庆成、齐世荣、李侃、张磊、张椿年、林甘泉、金冲及被选为副会长，张椿年兼秘书长。

代表们就如何应对商品经济大潮对史学的冲击展开讨论。戴逸在开幕词中指出，历史学有自身的重要价值和存在的必要性，它的价值是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刘大年认为，历史研究不能与商品生产联在一起，当前国际共运中的挫折与失败，并不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历史科学需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代表们普遍认为，新的历史时期，历史科学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和作用，虽然它不能直接地与商品生产联系起来，但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放弃学习自己的历史，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将是没有前途的。史学工作者应该积极主动地为谋求历史科学的生存和发展，谋求历史科学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发挥其作用而努力。

是月　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该书重点在于专题介绍和研究作者在国外新发现的240余册太平天国原始资料、书籍，并根据这些新文献来研究有关的史事，把文献同相关史事对照起来进行研究。书中附有作者从国外收集来的各种文献图片64幅。作者对洪秀全与罗孝全的关系、太平天国的国际观念和对外关系、太平天国与上海小刀会起义者的关系、儒学在太平天国的命运、太平天国印书的制度等问题，都在寻根究底澄清史实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

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入《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唐天宝敦煌差科薄研究》、《从田令和敦煌文书看唐代土地制度中几个问题》等论文。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对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关于曹操的几个问

题、东三郡与蜀魏的历史、孙吴建国的道路、北府兵始末等进行了探讨，是魏晋南北朝研究的重要成果。

杨豫《西方史学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何兹全《历史学的突破创新和普及》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收文31篇。作者在序言中说，这本书中论及了几个理论问题，都是“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问题”，一是阶级社会的开始和国家的起源问题，二是农奴制、依附关系和封建社会的关系问题，三是资本主义以前商业交换经济对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问题，四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的本义问题。主要文章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本义》、《关于古代史的几个理论问题》、《两汉豪族发展的三时期》、《秦汉地主与魏晋南北朝地主的不同》、《孙吴的兵制》、《十六国时期的兵制》等，《十六国时期的儒学和五德终始思想》、《南北朝时期南北儒学风尚不同的渊源》和《玄学——洛阳之学》等文则重点探讨了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流变。该书最后一部分是治学经验和随笔，包括《学史经验和体会》、《杂谈学习魏晋南北朝史》等。

12月

4日 “首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8日 “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

24日 纪念范文澜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胡绳、刘大年等二百余人出席。

是月 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科举考试制度的创立、贡举考试科目、贡举应举人资格、贡举考试方法、贡举考试内容、贡举考试机构及考官、贡举及第与授官、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详细考察，资料翔实，考辨精审。

宁可、郝春文《敦煌的历史和文化》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周伟洲主编《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突破史学界长期以来把帝国主义和清王朝归为一方、义和团为另

一方的“侵略、出卖——抗争”的研究框架，提出了对这三种势力的交叉互动关系作全局性和变动性把握的新思路，对多年以来许多流行的定论提出了质疑并形成新论说。该书考证精详，论证严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被看作是对既往义和团研究中若干重大问题的总结。

陈剩勇在《浙江社会科学》第 6 期发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随想》。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的姊妹篇，上编《中国都城的起源和发展》和下编《宋代以后都城制度的变革及其重要设施》，系统论述了中国都城的起源和发展，重点探讨了唐宋之际都城制度的重大变化、北宋东京的新结构和新街市等。

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较早的胡适研究著作。作者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视角全面、系统地评析了胡适的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并通过胡适思想的个案剖析，对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对其历史命运给予了合理阐释。

《何干之文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三卷，编录了何干之 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所撰全部理论著作和论文。

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分现代化与历史文化传统、通向工业化的道路与历史经验、政治变革与社会文化发展三编，收论文二十多篇。

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包括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两部分，前者包括气候、植被、土壤、自然灾害、水系、湖沼、海岸，后者包括人口、农业和城市。

李零《中国方术考》由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的代表作，以战国秦汉时期数术、方技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来勾勒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图景，探索中国古代思想变化的基础与内涵。全书内容除绪论和附录三则外，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数术考）从第一章至第四章主要以古代占卜系统为主体，探讨人的宇宙或天地观；下篇（方技考）从第五章至第八章以神仙、

养生之术为中心，主要介绍古代与人类相关的知识技术。作者对大量考古资料进行了细致严谨地梳理，并以此来印证文献资料的记载，在此基础上追寻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概貌，探究中国古代数术方技、科学技术与古代思想世界的关系，从而弥补了现存古代思想史研究在“知识体系”上的不足，提供了一条对古代思想世界重新进行解释的新途径。该书对中国科技史、中国思想史以及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000年，该书修订本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同年，作者又出版《中国方术续考》，同样是以考古材料为主，讨论早期方术。

陈尚胜《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十三篇专论组成，主要讨论了明清两代王朝对外政策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明清海外体制的建立及其内部结构和功能、明清时期海外贸易情况的基本估价及政策等问题，并重点对决定明清时期中外关系发展趋向的几宗重大事件或活动进行了考察。该书目的在于通过讨论学界未曾解决或未曾注意的重大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此来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对外关系发展的脉络，从而为人们提供一个对闭关与开放和社会控制与发展之间关系问题进行思索的历史基点。

是年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办、张岱年主编综合性学术文化双月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创刊。

创刊号刊载了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等文。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开始出版。

本丛书由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委托其学术委员会（主任傅璇琮）组织编辑，并交由多家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巴蜀书社都曾经出过该丛书的单本书籍。所收均为以古籍（包括出土文物）为依托对传统文化各个专题进行的有理论、有系统的高水平研究专著。每年1辑，每辑10种。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中国边疆史地文库”开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国家文物局公布本年度十大考古发现。

贵州盘县大洞遗址（旧石器时代）、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新石器时代）、

浙江余杭莫角山良渚遗址大型建筑基址（新石器时代）、山西大同晋侯邦父及夫人墓（晋）、湖南长沙国王后“渔阳”墓（西汉）、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三窟遗址（北魏）、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唐）、江西丰城洪州窑窑址（唐）、河北宣化下八里辽代壁画墓群（辽）、辽宁绥中元代沉船水下考古调查（元）。

1994年

※“评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工程启动。
※ 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丛刊创刊。
※ 中山大学历史系举办“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成立。
※ 范文澜、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完成出版。
※ 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化集成》开始编纂。
※ 胡绳发表《介绍一篇文章》，批评国学热。
※ 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入战国楚竹简。
※ 重庆三峡工程淹没区考古调查大规模展开。

1月

杨奎松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发表《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

文章廓清了长期以来对向忠发种种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丑化，还原了向忠发的本来面目。

刘大年在《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历史要分析——谈〈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阐述的历史方法论》。

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总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趋势”、上编“19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和下编“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组成。总论论史学发展趋势，兼论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继承和对通史体例的探求；上编论龚自珍、魏源、徐继畲、夏燮、黄遵宪等人的史学；下编论梁启超、夏曾佑、陈寅恪、陈垣、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等人的史学。

周谷城、姜义华主编《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历史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按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传记、史钞、史考与史评、典章制度、地理、金石与目录11类，介绍史学名著260部。

《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

双月刊，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主要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相关研究成果。

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断代交通史，对秦汉之际的道路建设、津桥设置、车辆制作、船舶生产、陆路运输、水上航运等交通形式，以及在学术研究上尚属空白的秦汉都市交通建设、交通管理、主要文化区的交通结构、粮运和盐运的组织形式、其他产业的布局和运销区划等都进行了评述。该书对与交通关联的人口迁移及人口流动，如移民、军役、游学、仕宦、罪徒、饥流等，也从交通史的角度进行了考察。

马植杰《三国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2月

郑大华《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由中华书局出版。

《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一组笔谈，纪念《历史研究》杂志创刊40周年。

这组笔谈的作者为刘大年、罗尔纲、张磊、彭明、隗瀛涛、何兹全、张芝联、陈锡祺、陈诗启、胡厚宣、金冲及、夏东元、庞卓恒、罗荣渠、宋德金等。

齐世荣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

文章总结了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基本经验。第一，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必须拿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我们只要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能写出对外国人也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著作。第二，要进一步大力普及世界史知识。第三，要重视新材料、新理论、新方法的使用。近几十年里，在西方史学以及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兴起了许多新流派、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出现了若干交叉学科，对于它们的“合理内核”，我们都应予以利

用，而决不可采取轻视甚至排斥的态度。第四，研究世界史的人，要懂得中国史。这样要求，有两个理由。其一，我们研究世界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洋为中用”，吸取外国历史的经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不懂得中国史，就做不到这一点。其二，既懂得外国史，又懂得中国史，中西对比，眼界自然开阔，能有新视野，看出新问题。第五，要下苦功夫，不要求速成。

马克垚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探讨》。

该文对中国和西欧小农经济和商品经济进行了对比考察。作者认为，说不上二者之间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它们的发展都有导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所以，中西社会后来发展的不同，从本质上说只是速度不同，而不是道路不同，方向不同。作者指出，一个社会如何过渡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十分复杂的运动。从现在的研究来看，指出某种单一原因作为其过渡的动因往往不能使人满意，而应作多种因素的分析。我们是社会发展的一元论者，但在具体分析社会的发展变化时，应分析其内部经济、政治、社会以至意识形态诸结构的运动及相互影响，才能得出较准确的结论。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部分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的研究为中心，探讨与“东西方贸易担当者”有关的丝路实况，旁及“白银之路”及“香药之路”。本书采用的方法是陈寅恪倡说的“二重证据法”，具体办法是以出土文书与其他考古发现相参证，以地下出土物与史籍相参证。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多少作一点中史与西史的参证。本书不是对丝绸之路历史的面面俱到的解说，而只是以一部分有关文书资料和部分考古发现为骨架的二重参证的研究记录。

作者资料准备工作凡四年，属稿及修改又历时七年。

何兹全主编《中国大事典》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分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史卷、辽金元卷、明代卷、前清卷、晚清卷等9卷，收条目991条，简要记述了我国自先秦至晚清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书后附“中国历史大事一览表”、“重要人物年表”。

陈少峰主编《原学》创刊。

3月

31日 “朱熹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

本次会议由“广东朱熹学术思想研究会”主办，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各地的 100 多位专家学者及朱氏后裔，就“朱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和朱子思想的当今价值”展开讨论。

是月　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有清一代的官方修史制度、官方修史活动以及康熙、乾隆诸帝的史学思想与一些重要的官修史书作了体统论述，既有宏观上整体考察的概括，又有微观上具体史实的考证，提出一些颇受学术界重视的新看法，具有较高学术水平。

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漆侠所著《宋代经济史》的姊妹篇，对辽、夏、金三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的经济活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拓荒性研究。书中充分揭示了汉族在辽夏金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对辽夏金在边疆地区开发上所做的贡献也予以充分肯定，并强调了中原与边疆的经济联系的重要性。

顾颉刚、谭其骧主编《〈禹贡〉合订本》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集中了《禹贡》半月刊自 1934 年第 1 卷至 1937 年第 7 卷所有文章，全套共 7 卷 12 册。

王学典《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对当代中国一股重要史学思潮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作者认为，当代中国史学史，可以归结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冲突史。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碰撞和较量，是贯穿于前“文革”时期以至 80 年代中期史学主潮的中心线索。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之间的是是非非，是当代中国史学的关键之一。书中对历史主义思潮的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揭示了一些重大史学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对其中所蕴含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阐释和评价。该书兼具史学史、历史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三重性质，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历史观念出发，批判性地探讨了一系列长期困扰中国文明史研究，特别是引发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争论的重大理论难题，是该书的独特价值所在。

本书印行后，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被认为“抓住了史坛的要害”，“对于恢复唯物史观的真谛，无疑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学典在《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发表《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

该文是最早从总体上对新时期史学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文章。作者认

为，“回到60年代初期去”、“回到马克思去”、“回到乾嘉去”、“走向系统论”和“走向跨学科研究”等思潮的出现，大体上记录了新时期以来历史学对发生了深刻变动的社会的反应，勾画了历史学伴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所经历的曲折而艰难的进程。

郭小凌《克丽奥的童年——古典西方史学》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杨共乐《罗马史纲要》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包括导论“走出疑古时代”及“论古代文明”、“神秘的古玉”、“新近考古发现”、“中原以外的古文化”、“海外文物拾珍”等五部分，所收论文散见于多种报刊，其主旨都围绕“走出疑古时代”来阐发。1997年增订本增加“续见新知”部分。

该书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对“走出疑古时代”口号的风行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一些大学的历史、考古、哲学等院系把它作为本科、研究生的教材，或列为必读书目。

黄兆群《纷然杂陈的美国社会——美国的民族与民族文化》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

4月

26日　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余姚召开。

是月　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中国近代社会的过渡性为视角，对早期资产阶级的形成道路、内部结构、组织形态、心理结构，及其在近代化进程中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早期资产阶级属于一种正从混沌走向有序、从初生状态向比较成熟和完备状态转化的过渡类型的阶级形态，亦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复杂混合体，其基本特征是严重的不纯粹性和软弱性。这些特征既来源于又反映着中国迈出中世纪、走向工业化社会的艰难历程，揭示了社会形态与阶级演化的相互关系。书中对早期资产阶级的结构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重点论述，不仅分析其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阐明其在分化过程中同时存在着纵横两方面的严重粘连及其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主要特征，而且分析了这个阶级的社会组织结构与社会心理结构，指出了组织结构上的过渡性、群落性和二重性，心理结构上的非稳定性和新旧交融、

由旧趋新的特点。这些见解大大推进了学界对于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的认识。

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100 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分为远古暨三代史、春秋战国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夏史、元史、明史、清史、民国史共十个断代，每个断代又包括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宗教史、习俗史、科技史、教育史、文学史、艺术史共十个专业领域，故称《百卷本〈中国全史〉》。

赵津《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史论》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第一本论述 1840—1949 年中国城市房地产业的专著。

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史的专著。作者意图摆脱以往只从阶级分析来研究中国社会的陈习，转而从等级分析入手来揭示中国社会复杂的社会结构，重点追索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状况和演变轨迹，以及这种演变的内部动力。

5 月

16 日　“评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上海行政学院等联合举办。与会者就美国学者魏特夫于 1957 年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对比研究》的内容和实质进行了讨论。学者们指出，魏特夫理论的核心是他提出的“治水社会”，将治水看作古代中国、印度、埃及等东方国家专制主义政治权力产生和强化的唯一前提，这种理论完全是主观的虚构，早在水利工程修建和管理之前，东方国家就已经产生，而且这些国家也并不一定会形成专制制度，“治水”和专制统治并无必然的直接的联系，魏特夫的“治水—专制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是西方冷战政策的产物。

是月　李洪岩、仲伟民在《近代史研究》第 3 期发表《刘师培史学思想综论》。

文章对少有人研究的刘师培的史学思想作了系统翔实的阐述。文章认为，刘师培的历史观，糅合了民族主义、庸俗社会学和古文经学思想，尖锐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他的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关于历史对象的选择、史料取材范围、历史认识途径、历史纪年四个方面，并且采用了若干种在晚清时期颇为先进的研究方法，阐述了他的古代史官论、史书体裁

论、史书文体论，为从封建旧史学向现代新史学过渡做出了贡献。

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由湖南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作者发表在1991年《东南文化》第1期上引起关注的4万字长文《东南地区：夏文化的萌生与崛起》铺陈发展而来，书中对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提出挑战，将夏文化的兴起从黄河流域溯源到长江流域，提出了“夏文化萌生于中国史前时代的东南文化圈”、“夏族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地区，而不是传统史家所说的黄河流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崛起于东南地区”等有别于主流观点的看法。

《文史哲》第3期开始开设“国学新论”专栏。

编者按说：随着东亚经济的腾飞和现代化的崛起，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东方传统文化，再一次成为世界学人关注的热点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学”，已成复萌之势。然而，如何在国学研究中发现新材料、新问题，选择新角度、新方法，从而得出新结论、新成果，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该期专栏刊登的文章有张岱年《如何研究国学》、张世英《传统与现在》、萧兵《“新国学”的悬想》、叶舒宪《国学方法论的现代变革》。

6月

《二十一世纪》6月号“三边互动”栏目刊登李泽厚1994年4月致编辑部信，信中将20世纪90年代学风概括为“学术家凸显，思想家淡出”。

信云：“90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王国维、陈寅恪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这很有意思，显现出某种思想史的意义，提示的或是人生价值、学术价值究竟何在，及两者的复杂关系等等问题。”此论一出，旋即在知识界掀起轩然大波。赞同者众，反对者也不寡。作为回应，王元化撰文倡导“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

李氏此论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同，成为学界衡估20世纪90年代学术的基本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外事局合编《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书中对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捷克和斯洛伐克、丹麦、法国、

德国、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日本、朝鲜、韩国、马来西亚、荷兰、挪威、俄罗斯、瑞典、瑞士、英国、美国等数十个国家的1434个中国学家的原文姓名、译名或汉名、通讯地址、出生时间、出生地点、学历、经历、著作等逐个作了介绍。

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概述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的大势，系统整理发掘了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的遗产，对中国史学批评的各个不同阶段以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都进行了概括和论述。作者的目的是要“用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来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通过从现代意义上挖掘古代史学批评的理论价值，为今天的史学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该书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全面研究，为现代史学评论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戴逸等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黄邦和等主编《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哥伦布以来东西两半球汇合的世界影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为纪念哥伦布首航美洲500周年而编选的，分三编：哥伦布及其划时代的航行、东西两半球汇合的世界影响、新世界与中国。本书主题在于通过哥伦布的航海活动，多方面揭示东西两半球汇合50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深刻变化。

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孙家洲在《孔子研究》第2期发表《秦汉祭天礼仪与儒家文化》。

该文认为秦汉祭天仪式虽然继承了上古祭天仪式的某些内容，但是更多的却是在帝王个人意志、方士活动、儒家文化等因素作用下的创新发展，且儒家文化逐渐成为祭天仪式的核心。

赵生群《太史公书研究》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集中探讨《史记》的文献问题，显示出深厚的文献功力。虽为论文集，但各篇论文之间构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在《史记》研究多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作者对《史记》文献作了系统考释，由具体问题结合而为

总体，不仅有关《史记》文献重大课题均已囊括，而且描绘了《史记》的总体结构，内容丰富。书中提出了“《史记》取材于诸侯史记”的新观点，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作者对《史记》历史编纂学以及《史记》纪传与传记文学等问题也作了理论探索。

7月

4日 《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工程启动。

该书被列入国家重点出版工程，宋木文任《续修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主任。编委会主要由版本目录学家组成，顾廷龙、傅璇琮担任主编。王世襄、任继愈、侯仁之、徐苹芳、张岱年、戴逸、饶宗颐、钱存训、王振鹄等担任学术顾问。为了保证学术质量与版本质量，根据经史子集四部选目特点的不同，分别聘请特约编委，负责选目工作。全国各地专家共有百余人参与了选目工作。

该书沿袭《四库全书》体例，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收书5213种，比《四库全书》所收书籍3462种增加了51%。所补选之书主要是被《四库全书》遗漏、摈弃、禁毁或列入存目而确有学术价值的图书。四库馆臣对戏曲、小说持鄙视态度，一概未予收入《四库全书》，此次编选，马致远、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等人的传世名剧和《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忠义水浒传》、《红楼梦》四大名著都收罗在内。续选之书主要是乾隆中期以后至辛亥革命以前近三百年的书籍，既有清代中期以纪昀、戴震、翁方纲、彭元瑞、任大椿、孙希旦、王念孙、阮元等为代表的乾嘉学派的著作，也有清朝后期以魏源、龚自珍直至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为代表的新学。乾隆以后近三百年的著作共收入2770种，占全书的52%，在经史子集的各个分部，乾隆以后的书目也都占有一半以上的比例。

《续修四库全书》是继18世纪编修《四库全书》以来，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的大规模清理与汇集，两者配套，中国古代重要典籍大略齐备，因此被称作是中国文化事业的里程碑。

2002年4月，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完成影印出版，共1800册。

是月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古代（1868年以前）、近代（1868—1945）、战后（1945—1992）三卷，系统而翔实地叙述了日本自原始社会以来的历史。

陈支平在《东南学术》第4期发表《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

戴逸在《历史教学》第7期发表《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因与后果》。

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

郑焱在《学术研究》第4期《打破束缚，更新观念》。

文章认为："西方的大炮也是一身兼二任，它既是在野蛮地侵略中国，又是在强迫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走出封闭，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此论后招致激烈批评。

8月

2日　中国社会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国际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

来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日本、英国、法国、韩国和香港地区的近百名学者出席了会议。

10日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举行《国学研究》第2卷出版座谈会。

座谈会的议题是进一步明确开展国学研究的宗旨。参加座谈会的有袁行霈、季羡林、邓广铭、傅璇琮等，发言内容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11日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等单位在青岛召开"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学术讨论会。

17日　纪念甲午海战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是月　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丛刊创刊。

该丛刊提倡"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每年出版四辑。主编在第一卷编后记中云：《学术集林》大概是颇不合时尚的读物。我们不想遵循目前流传起来的说法，把学术和思想截然分开。《学术集林》发表的文字，希望多一些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倘不是在非常时期，知识分子毕竟应在知识领域中发挥作用，而不应抛弃自己的本来职责。第二卷编后记中主编又为考据学辩护："过去我所深信的所谓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的说法，其实只是理性主义的过分自信。在历史的进程中，虽然也可以发现某些规律性，但历史和逻辑毕竟不是同一的。逻辑推理不能代替对历史的实际考察。清人钱大昕说训诂考据乃'义理所由出'，即阐明此义。可是长期以来，只有观点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训诂考据则多遭蔑视。

……不必讳言，过去不少训诂考据文章，往往流于琐碎，有的甚至变成了文字游戏。但不能因此断言考据训诂是无用的。正如不能因为有大量假大空的理论文章，就断言观点义理是无用的一样。我不同意把观点义理置于考据训诂之上，做出高低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不能抽象对待。对于庄稼来说，下雨好还是晴天好，要根据具体情况才能判定。观点重要还是考据重要，也是同样性质问题。……我觉得学术工作所采取的不同研究手段，其作用虽有大小，但也应作同样理解。庄生所谓泰山非大，秋毫非小，也就是阐明万物并育互不相害之理。这句话隐隐含有平等与自由的意蕴。”

文丛出版后，在海内外广受关注，为20世纪90年代国学的复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季羡林言：“《学术集林》实为高规格高水平的学术文丛，不按时好，朴实无华，然而篇篇内容充实，言之有物，与时下流行的许多刊物，以新名词、洋名词哗众取宠者迥异其趣。”

2000年第17卷出版后停刊。

王生平在《哲学研究》第8期发表《跳出“国学”研究国学——兼评〈论天和人的关系〉》。

文章对“国学”的复兴提出质疑，认为在史学、思想史领域中，不从考察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入手研究历史，只抓住个别经典、圣人，以之作为曲直是非的尺度标准，不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不是“新学”的方法，而是径直退回到“旧学”的“考据”、“义理”上去了。我们的史学研究今天也不完全排斥考据和义理，但不应该脱离生产、实践而单从史料、古代经典中进行考据和阐述。

文章认为，海内外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国学虽然有它自身存在的理由和可取之处，但四千年的古文明光荣已成过去，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戴着古老的文明花环走进现代化。我国向现代化进军正处于关键的时刻，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愈益突出，是以民族性牺牲时代性，还是以时代性扬弃民族性？我们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从历史发展坐标上定位，只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如果国学只是儒学、道家或兼包二者在内的古代文化，它固然在反对“西化”派的民族虚无主义上有积极的一面，但同时又造成忽视或否定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消极的另一面。它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中国近现代没有什么文化或虽然有某种文化也没有足够的资格与西方近现代文化对话，似乎只有“国粹”才是足以与西方近现代文化“抗衡”，甚至是超出西方文化、指示整个人类的未来的“文化”。

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强烈争议。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明末清初和鸦片战争前的西学传播情况及特点，第一、二次鸦片战争间的西学传播内容和影响，19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及 1900 年至 1911 年间的西学传播情况、特点和作用，西学传入后引起的中国社会巨大反应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论述。全书以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的关系为主线，以传播主体（中外译员、学校教习、报刊编辑）、传播机构（译书机构、新式学校）、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过程、受传对象、受众反应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仅考察了西学东渐的不同发展阶段内容和特点，而且分析了传播主客体素质态度和心理距离、传播媒介的改进、译书方式的中外人员合作、译书机构的多层次多元化等四个影响西学东渐的因素，以及以了解世界、求富求强、救亡图存、民主革命和科学启蒙为主体的西学东渐的五大主题。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综合性的晚清西学东渐史，不仅综合了大量文献，还在不少问题上提供了一些难得的新资料和新观点，被称为研究晚清西学东渐史的力作。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香港史》由中华书局、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出版。

该书主要论述了香港英占前状况和英国的占领过程，以及英占后的政法体制、经济状况、教育和新闻事业、社会结构等情况。书中大量引用了从英国、香港和内地搜集的中外文档案和书刊资料。

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王晓毅《嵇康评传》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李剑鸣《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我国第一本全面论述美国印第安人历史的著作。作者从历史学的角度，借鉴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和概念，对美国历史上印第安人和白人两个种族的文化撞击作了系统的考察，论述了印、白两种文化的不同特性及其对文化接触的影响。在依托大量文献的基础之上，对白人社会和美国政府在印第安人中间开展的办学教育、土地私有化、定居生产、传教、习俗改造等传播白人生活方式活动的来龙去脉作了细致的探讨。作者认为，美国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文化的政策和举措，给印第安人造成了深重的苦难和创伤，文化征服及其失败所得出的一条教训是，文化的边疆是不可用强力突破的，只有在平等开放的条件下开展交流和竞争，

才能推动人类文化的正常发展。

9月

1日　中山大学历史系举办“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

季羡林、周一良等四十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传统”，与会人员围绕《柳如是别传》的写作意图和该书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以及《柳如是别传》对研究国学的启示进行了研讨。会议论文集《〈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5年10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7日　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威海举行。

中外学者138人出席，会后出版论文集《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

11日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成立。

季羡林任总编。共收存目书4508种，绝大多数为善本，约三分之一为稀见本或孤本。由于采用原版影印，无篡改失真之弊，其学术价值在《四库全书》之上。到1997年10月底全书1200册出齐。

1994年秋至1995年春，学术界出现关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论争，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印行存目书，而在于是选印还是全印。《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瞭望》、《读书》、《中国图书馆学报》等报刊上接连发表论文十余篇，一时成为热门话题。主张选印的人士认为，《四库存目》书是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淘汰下来的次品，是“假冒伪劣”，有价值者甚少，今天搜集影印存目书，是“沉渣泛起”，应当选取“精粹”印行。编纂委员会则坚持全印才是最佳方案。

是月　孙达人在《文史哲》第5期发表《王朝周期、农民战争和社会的财富积累》。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立足于文献、古文字研究和考古发现的最新进展，综合运用了田野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深入系统地考察了夏商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涵括环境、居宅、邑聚、人口、婚姻、交通、饮食、服饰、医疗保健、宗教信仰等，史料翔实，见解新颖，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作者还特别重视考察社会生活表象背后的社会结构与政治根源，冀图以此来探寻古代社会生活变化的内在规律。

增订版于2005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除补充了夏商考

古和研究方面的一系列新成果外，还扩充调整了原书的章节，对所有章节几乎都进行了增订改写，正如作者所言："这部增订本也可以说是与初版本不同的一部新作。"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由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该书为作者博士论文，书中内容因突破成说而备受争议。

作者深刻论述了卢梭政治哲学思想及其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揭示了罗伯斯庇尔暴政与其建立道德理想国政治思想背道而驰的悲剧。全书九章，前四章为静态分析，主要梳理卢梭思想的外在资源与内在结构，五到八章为动态描述，追述卢梭思想在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政治实践中的展开过程，最后一章为后论。作者试图通过这样的章节安排来达到以论带史、以史证论的目的，打通从观念到事件、从思想史到政治史这两方面的壁垒。

作者认为，卢梭的道德理想主义可以归结为，肯定人民为了建立理想的社会用暴力推翻暴君统治的正当性，"绞杀或废除暴君"的以暴易暴也是合法的。卢梭的道德理想主义为罗伯斯庇尔所接受，并且应用到法国大革命中，从而造成了道德理想主义在实践中的血腥暴戾和政治恐怖。

在作者看来，法国革命与中国"文化大革命"如此相近，因此，该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剖析法国大革命中蔑视尊严、践踏生命的道德灾变为式例，揭露"文化大革命"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的蔑视和践踏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的血腥。

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由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共收录17篇文章，既有学术文章，也有短论、书评等。书中具有浓厚的"问题意识"，既有对民族命运的关注，也有对精神生命的自我淘洗和执着追求，所论因不合时说而引人注目，其中《地狱里的思考——读顾准思想手记》、《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毛泽东晚年文化思想散论》、《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新儒家政治哲学评析》等文章影响较大。

刘国新、刘晓、贺耀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4卷本）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分"总论"、"重大事件"、"人物"、"大事记"、"文献资料"等类，融史论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编年体、类编体等体例于一书。

徐达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由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史研究

室、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近百位专家学者编撰而成。书中收录了自1949年至1992年中国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重要事件、人物活动、文献、会议等内容。

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收入研究清代人口史、特别是皇族人口史的13篇论文。本书依据清代的《玉牒》以及其他档案或史书，运用计算机和现代统计学方法，对各种数据和文字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反映了历史研究走向具体和精细化、从注重描述向注重分析变化的趋势。

10月

5日　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

谷牧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孔子诞辰2545周年大会主席李瑞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等莅会并讲话。李瑞环称赞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创立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10月7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了部分与会代表。在当时看来，这些都是异乎寻常的举动。

14日　唐长孺逝世，终年84岁。

是月　李泽厚与王德胜在《东方》第5期发表《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

第6期连载。

李泽厚在对话中说；“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

是为“告别革命论”的最早发声。

《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何兹全《三国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事件为中心，大致按时间顺序编次，从“黄巾起义”写到“孙吴的灭亡”，凡20件大事、56个细目。主要写“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司马懿夺权”、“魏国社会和政治”、“吴国社会和政治”、“诸葛亮治蜀和南征北战”等政治、军事方面的转折性大事件，对“建安文学”和“玄学的兴起”等也有勾勒，鲜明地描绘了三国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时代特色。作者强调对典章制度的阐述，尤其注重于经济制度的探讨。

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由中华书局出版。

洪国起、王晓德《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

史卫民《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由三联书店出版。

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辞典》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

范文澜、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1—10卷由人民出版社完成出版。

该书的前身为范文澜所撰《中国通史简编》。

前四卷由范文澜独立完成。1969年范文澜逝世后，蔡美彪接手编写《中国通史》。为了保持文字风格的一致性，减少内容上的矛盾重复，使读者好读好看，由蔡一人撰写主体部分。朱瑞熙、李瑚、卞孝萱、王会安、周清澍、丁伟志、王忠、周良霄、张岂之、范宁、严敦杰、李燕光、杨余练、刘德鸿、汪敬虞、冯尔康、贾熟村、杨天石等也担任撰稿人。内容从宋朝到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全书由蔡美彪统一体例，修订文字。1978、1979、1983、1986年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中国通史》第5、6、7、9卷，1991年出版第8、10卷，各印近百万册。此后，人民出版社又对各卷进行全面修订，为使全书统一，编辑组人员给第1—4卷所有古代地名都标上了现今的地名，编了二百多幅图，增加了人名索引，第5卷在内容上作了较多的修改，其他各卷也作了文字订正，于1994年10月将十卷同时出版。蔡美彪与汪敬虞、杨天石、茅海健等合作完成的《中国通史》第11、12卷，即道光至宣统的两卷也于2007年10月出版。第11卷和第12卷仍沿用了前十卷的体例，依朝代顺序叙事，并不表示社会历史的分期。

全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全面再现了华夏文明的历史轨迹，代表了我国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规模宏大、叙述详密又不失于琐碎，是近百年来最完整、最系统、最具代表性的通史著作之一。

童恩正在《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中国古代北方与南方古

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

该文的预设是，中国由史前时代向历史时代转变的关键时期，不同的人类集团居住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之中，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也会表现出差异。这个时期的南方是指长江中下游一带，北方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作者综合运用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生态学等学科资料对这一时期北方的龙山文化和南方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一些文化的地理环境、农作物品种、与相邻人群集团的关系、水利工程的需要、基层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探讨了南北古代文明发展的不同特点及造成这些特点的原因。

陈明主编《原道》年刊创刊。

该刊立足传统资源进行文化建设，以从中国历史的内在性和一贯性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积极探索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表达式为追求目标。主编在经费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勉力经营，是20世纪90年代创刊的同类刊物中唯一保持连续出版的杂志。

11月

12日　首届禅宗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北省黄梅县举行。

会议由武汉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等九个单位联合发起，主要讨论了禅宗的形成和东山法门的定位、禅的本质和禅学研究方法、禅宗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禅的现代化和禅学生命的弘扬等问题。

16日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暨《中国书评》编委会在北京召开“社会科学的规范化与本土化”的专题研讨会，其后，全国掀起学术规范化问题的大规模讨论。

是年底，为庆祝《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国内版即《中国社会科学辑刊》(论文集)的出版，该编委会又与北京三联书店联合举行了题为“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学术座谈会。且自1995年1月起，从总第3期开始，《中国书评》开辟“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讨论”专栏，每期发表2—4篇这方面的论争文章。同年4月，《北京青年报》理论部主持召开了“规范化与本土化：社会科学寻求新秩序”的小型研讨会。这以后，大量讨论学术规范的文章开始在《现代与传统》、《东方》、《美国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历史研究》、《中华读书报》、《学术思想评论》、《社会科学报》、《文汇报》、《探索与争鸣》、《自然辩证法通讯》、《东方文化》、《江苏社会科学》等报刊上集中出现，众多学者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学术规范化讨论。这一讨论贯穿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1998 年 9 月，南京大学钱乘旦发起，《世界历史》杂志社和南京大学历史系联合在南京举办“学术规范与世界史学科建设”专题座谈会。1999 年 3 月 14 日，《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学术讨论会。1999 年 12 月 8 日，《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和山西大学在北京联合举办“共建学术规范，整饬学术道德”学术讨论会。学术规范化的大讨论，反映了 20 世纪 90 年代学风的调整。

是月　《东方文化集成》开始编纂，季羡林任总主编。

该书由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及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联合组织编撰。丛书由“东方文化综合研究编”、“中华文化编”、“日本文化编”等个部分组成，共五百种，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牵涉面甚广的大型丛书，涵括了东方文化的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音乐等方面，目的在于集中展示我国从古至今，特别是最近五十年来东方文化研究的成果。

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社会史角度对“官与民交接之枢纽”——吏进行了研究，分上下两编，上编对先秦至晚清吏制的发展及沿革进行了梳理，下编则跨用政治学、社会学、行为科学、角色理论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等对吏的结构——功能地位、政治行为及内部网络和外部关系进行了分析，力图探索研究历史的新途径。

周尚意、赵世瑜《天地生民——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孙达人在《社会学研究》第 6 期发表《中国农民史的价值和意义——兼论族谱、村志的社会功能》。

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由三联书店出版。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利用考古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成果同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南美洲等古代文明形成过程进行比较，力图阐述中国文明生成的独有特色。

12 月

5 日　胡绳在《瞭望》第 49 期发表《介绍一篇文章》。

该文是作者在《历史研究》创刊4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所“介绍”的文章为刊发在《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上的《国粹·复古·文化——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署名“罗卜”。“罗卜”的文章对国学热提出质疑，认为此热有用“国学”屏弃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目的。胡文对其总的论点表示赞同，并强调“要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很好地利用文化传统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决不能把腐朽当作神奇，决不要把糟粕当作国粹，以为凭借这些东西就可以解决中国文化的群体问题，甚至可以解决世界文化的群体问题。”

胡文发表后，《孔子研究》在次年第2期上推出一组“传统文化笔谈”（11篇），对胡绳进行反驳，为“国学”辩护。

围绕该文所展开的争论，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国学”的一次正面碰撞。

23日　香港青松观道教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研究所等单位共同主办的“道家、道教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会议主要讨论了道家思想及道家、道教文化的现实意义以及道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与会者一致认为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值得加以发掘的优秀思想遗产。道家着意阐发直觉思维，是对中国哲学思维传统的突出贡献。道教的某些伦理道德思想，对于治疗各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疾病，对于我国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道的学说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智慧，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资源，必将成为世界文明相互交融的凝聚点。与会者还从道教哲学研究、道教教义思想研究、《太平经》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道教斋醮科仪研究、道教文学艺术与音乐研究等不同侧面阐述了道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是月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手稿本）42册由黄山书社影印出版。

1948年底胡适匆忙离开北平时，将大量文稿、书信、日记及公私文件遗留在其寓所。这些资料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保管。该书辑录的胡适遗稿和书信，是这批档案资料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其中胡适遗稿440余件，书信近600通，其家属和他人写给胡适的书信5400余通。最早的写于1908年夏，最晚的写于1948年12月。

遗稿绝大部分未曾发表过，其中《全氏七校水经注辨伪》是迄今发现的胡适考证《水经注》疑案最早且最完整的一篇五万字长文，还有《孟森与赵、戴两家〈水经注〉案》等其他《水经注》考证文稿，共110余

件。书中影印的还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最早手稿、《墨经新诂》手稿、《古代埃及文化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史》、《两河流域文化史》的讲义稿等等，均极为珍贵。另有一部分序跋及杂文和讲演记录稿、最早亲手编订的诗稿，以及随手写的读书笔记、散篇诗词稿等。

书中所印近6000通往来书信，来自900余人，其中多是现代中国社会各界有影响的人物。这些书信涉及民国时期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教育、学术、艺术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珍贵的史料。

张艳国主编《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由武汉出版社出版。

该书汇集了31位有代表性史学家的自述，这些文章以史学观为中心，内容主要包括史学家的治学经历和治学经验，实际上是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反思，为研究当代中国史学史的发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高毅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福柯史学刍议》。

作者认为，福柯的史学著作的显著特点是，总能提出一些以往人们视若不见的重大问题，由此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历史洞察力，他的著作充满对现代文明的批判精神，往往能把人们通常认为当然合理的各种现代惯例体制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因而带有强烈的反主流文化情调。他的文笔落拓不羁，潇洒优美，经常运用文学性的象征手法，文章写得气势磅礴，富有艺术感染力。

该文是较早对福柯后现代史学理念进行介绍的文章。

顾学稼、林霨、伍宗华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谭其骧《长水集续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作者逝世后由其学生葛剑雄据其遗愿编辑而成，收录作者1981年以后所写论文，共50篇，与《长水集》一起同为其毕生治学结晶。

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被认为是迄今国内梁启超研究最少片面性、史料充实、分析中肯、立论公允的一部书。

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150万字，论述了整个中华民族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被称为中国民族史研究集大成之作。本书的开创性贡献在于打破中国民族史编纂中以汉族史、朝代史为中心的习惯做法，改以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民族作为分编分期标准，突出反映了各时期少数民族在创造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过程中所起作用，将中国民族史写成一部以中国有史以来的少

数民族为主，联系华夏（汉族）民族的产生、形成、发展、壮大的综合性的历史，力求找出各个民族的盈虚消长和兴衰治乱的特点和规律。在材料的使用上，该书还克服了以往偏重依据汉文史籍研究民族史的片面性，广泛利用了各种民族文字文献和考古调查发掘材料。全书分为八篇：（1）中华民族的起源；（2）华夏及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3）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南北各民族的融合；（4）中华民族的兴盛和祖国统一的加强；（5）契丹、女真各民族迭起及其建立政权；（6）蒙古统一全国至满族兴起前的南北各民族；（7）满族统一全国和各民族进一步发展；（8）各民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中华民族进一步迎来的解放。

参与撰写本书的多为知名专家学者。

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原由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91 年出版，为余氏纪念其师钱穆的集子，收有《犹记风吹水上鳞》、《一生为故国招魂》、《钱穆与新儒家》、《论文化超越》、《寿钱宾四师九十》等篇，其中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论述影响巨大。书中谈郭沫若抄袭一文在学界引起较大争议。论者认为，该书对 20 世纪 90 年代的学术风气产生广泛影响，加速了史观派史学的陆沉。

丁守和《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高连升《军事史学方法论》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李伯重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4 期发表《“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

本文主要探讨明清江南的气候、土地和人类努力三大农业生产要素的变化及其对水稻生产的影响。作者认为，上述农业生产三大要素彼此之间存在某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和相互代偿的关系，而这些要素又无时不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因此倘若其中某一要素发生变动，必然引起其他要素也发生改变，从而导致农业生产出现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停滞”的农业是没有的。中国的传统农业自然也不例外。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因此探讨农业生产三大要素的变化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出版。

该书共 34 册，历时十年，至2005 年 8 月才告完成。是继《俄藏敦煌

文献》之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文献出版的又一重大成果。在现藏于全世界各地的敦煌西域文献中，法国伯希和收集品向以丰富精彩著称于世，本书主要收录了伯希和汉文文献 Pelliot chin. 2001—6038 号，其中绝大部分为汉文文献，同时包括部分藏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文献。此次出版以搜罗完备、编制精良、出题准确、彩图精美为特色，为敦煌学界提供了一套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的定本。

王永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汇集了1972 年至 1982 年间新发现的简牍 8400 余枚，内容包括官方文书簿册、私人信件、衣囊封检及各种书籍，从各个侧面和不同层面记录了汉代西北边陲的屯戍制度和生活风情，是重新认识、深入研究两汉历史的珍贵文献，对研究中外交通、丝绸之路和汉代文字均有极高价值。

（日）安居香山与中村璋八辑，吕宗力与栾保群等标点、整理、翻译《纬书集成》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据 1971 年至 1991 年日本明德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八卷本《重修纬书集成》翻译整理，被称为明清以来谶纬辑佚书的总结之作。内容大致为《易纬》、《尚书纬》、《尚书中候》、《诗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论语纬》、《河图》、《洛书》等。该书搜罗完备，以《纬捃》为底本，参校了《说郛》、《古微书》、明杨乔岳《纬书》、林春溥《古书拾遗》、刘学宠《诸经纬遗》、殷元正《集纬》、赵在翰《七纬》、《玉函山房辑佚书》与《汉学堂丛书》等九种谶纬的辑佚书，并补充了中国、日本资料中为上列诸书所漏辑的谶纬佚文，为当今搜罗谶纬最完备的书。对于所辑谶纬各条均注明“出典”，并稍作校核，于文字异同作了校勘记，载于各条之上，便于参考。每册末都作有词目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

是年

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入战国楚竹简。

这批战国竹简共有 1200 多支，总字数在 35000 字左右，最长的有 57.1 厘米，最短的有 24.6 厘米。共包括 80 多种（部）先秦古籍，内容涉及儒家、道家、兵家、杂家等，其中多数古籍为佚书，个别见于今本，如《缁衣》、《易经》、《孔子闲居》等，但与传本不同。主要篇名有《易经》、《缁衣》、《子羔》、《孔子闲居》、《彭祖》、《乐礼》、《曾子》、《武

王践阼》、《赋》、《子路》、《恒先》、《曹沫之陈》、《夫子答史蒥问》、《四帝二王》、《曾子立孝》、《颜渊》、《乐书》等。其中，《易经》堪称是迄今为止所有版本中最古老、最原始的一种版本，也是记载比较可靠的一个版本。

该批竹简的发现，填补了先秦文献的许多空白，有助于破解长期困扰学术界一些重要学术问题。

清华大学成立国际汉学研究所，由葛兆光主编的汉学研究刊物《清华汉学研究》创刊。

为配合三峡工程，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等单位联合进行重庆三峡工程淹没区考古调查。

三峡工程淹没区的文物考古调查，是中国文物考古史上一次大的会战，其投入力量之多、参与部门之全、工作规模之大、调查涉及范围之广、投入技术力量之雄厚史无前例。三峡工程淹没区的文物考古调查和试掘工作，标志着以往考古工作相对较少的三峡地区的考古研究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国家文物局公布本年度十大考古发现。

江苏南京汤山古人类头骨化石（旧石器时代）、重庆三峡工程淹没区考古调查（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至六朝）、河南八里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新石器时代）、安徽尉迟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新石器时代）、河南辉县孟庄遗址（新石器时代）、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周贵族墓地（商代至周初）、河南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西汉）、陕西西安隋唐灞桥遗址（隋唐）、陕西隋仁寿宫唐九成宫37号殿址（隋唐）、内蒙古古宝山辽代壁画贵族墓（辽）。

1995 年

※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出版。

※ 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出版。

※ 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出版。

※ 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出版。

※ 中日合作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发掘新疆民丰尼雅遗址。

1 月

5 日　“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在海南召开。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八十多位海内外从事中国历史、考古、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研究的学者参加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国传统学术与思想文化”、“国际汉学的回顾与展望”等。

是月　漆侠在《文史哲》第1期发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文章认为，宋学在对古代儒家经典的探索中，形成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在其创始阶段（庆历新政前后），即表现出疑经等重大特色。它摆脱了汉儒以来章句之学的束缚，以通经致用为目的，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以期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最高理想，从而创造了义理之学。不容忽视，宋学的建立与庆历新政有着本质的联系，而范仲淹则起着组织和带头作用。嘉祐、治平年间，宋学步入发展阶段，形成著名的四大学派，其中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学派占据主导地位，而以二程、张载为首的洛、关理学派终北宋一代尚处于形成时期。四派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也表现出思想和学术上的重大分歧。南宋一朝，宋学发展到演变阶段，作为它的分支的理学兴盛起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同时与之对立的则有浙东事功派。由于理学把内心反省工夫放在首位，同现实生活脱节，日益走上空疏道路，因此隐伏了必然衰落的因素。宋学的形

成、发展以及向理学的演变，无不与两宋以来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何兹全主编《中国历代名僧》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念群主编《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由知识出版社出版。

2月

常宗虎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社会史浅论》。

作者认为，社会史兴起以后，其功绩首先是使史学研究在继20世纪80年代初期几年的失落、徘徊后出现了再度繁荣。其次是使史学研究朝着科学的方向极大地推进了一步，表现在视野拓展，研究课题骤增，某些过去被认为不屑一顾或无足轻重的领域如服饰、饮食、生育、丧葬、节庆文娱、宗教信仰、秘密社会、乡土民俗、婚姻家庭、市政、交通、民间社团等被开垦出来并得到耕耘。而且，在理论方法上实现了创新，受到社会学、心理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其他学科强烈影响，并朝综合历史、整体史的方向发展。第三，社会史研究使中国史学与相对发达的西方史学逐步接轨。第四，某些专题研究的深化对史学研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大冲击。比如近代化研究，8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史研究对它的重新发现和国内发展问题理论研究的紧迫性，近代化日益成为中国近代史中的显要课题。

同期还发表了唐力行的《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

方克立、郑家栋主编《现代新儒家人物与著作》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3月

6日　北京大学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大型系列电视节目《中华文明之光》开始播放。

该节目共150集，每集30分钟，将上自远古传说，下至辛亥革命，中华民族在哲学、宗教、文学、语言、艺术、历史、考古、天文、地理、科技、民俗、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所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与评述，旨在于利用现代传媒，向广大观众介绍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组织了一百多位学者参与撰稿，其中包括季羡林、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侯仁之、宿白、阴法鲁、林焘、朱伯崑、田余庆、汤一介、陈贻焮、金开诚、裘锡圭、严家

炎、袁行霈、张传玺、乐黛云、何芳川、叶朗等。

是月 《现代与传统》第 6 辑刊登朱学勤《五四思潮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对一种反省的反省》以及陈少明《对规范的疑虑——从 90 年代的学术转向谈起》，对 90 年代的学风转向提出批评。

朱学勤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思想重于学术，90 年代学术重于思想。如果没有思想支撑，单方面的学术成就就是跛脚成就，是不健康的。学术界对 80 年代的过分否定，直接助长着重学术轻思想的空气。

陈少明则对学术界讨论的学术规范化问题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不能以某种具体的学科标准作为所有知识门类的共同规范。

两文发表后，1995 年 7 月，杨念群在《中国书评》总第 6 期上发表《“思想”与“学术”岂能两分——就九十年代学风质疑于朱学勤、陈少明两先生》，指出朱、陈二人之所以拔高“思想”，乃是其潜意识仍沉浸于 80 年代启蒙语境的表现。

发生在学界的这一争论，核心关切是如何对 80 年代进行评价。

吴承明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1 期发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

该文可看作是作者《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另一续篇。文章包含三个部分：一、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二、怎样选用经济学理论作为研究经济史的方法；三、经济学中的经济史论。该文后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

张岂之在《清华大学学报》第 1 期发表《王国维、陈寅恪的学术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本文分析阐述了王国维、陈寅恪建立中国近代史学的功绩，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何被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吸收和发展的原因，并对王国维、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成为从传统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桥梁进行了说明。

秦晖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1 期发表《“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清初至民国——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史研析之二》。

本文在《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析之一》的基础上论述“关中模式”产生的社会历史渊源。

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作者考察了晚明至民初中国文化的历史行程中的多个侧面，力图阐释历

史非但没有证明中国存在过自孔子以来便一成不变的传统，而且只能证明所谓传统总在发生时空连续性的变异。故将本书题名为《音调未定的传统》。

中国社科院简帛研究中心成立。

该中心主办的《简帛研究》已经成为简帛研究领域的权威刊物之一。

林甘泉在《史学理论研究》第1期发表《怎样看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

作者认为，《东方专制主义》是帝国主义冷战政策的产物，歪曲了马克思主义。魏特夫将东方社会当作“治水社会”的理论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作者最后指出：“今天西方一些人攻击中国是一个没有自由民主的极权国家，可以说和魏特夫对中国的诬蔑和攻击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批判《东方专制主义》不仅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月

16日　胡厚宣逝世，终年84岁。

是月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由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是作者历经十余年系统研究鸦片战争所得成果，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罗志田发表书评认为：“《天朝的崩溃》一书具有在今日已很难见到的坚实的史实考订基础，这是任何一本要想放得长久的史学著作必须具备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该书已具备成为一本在21世纪持续存放相当长时期的史学精品的基础。在能够预见到的时间内，中外鸦片战争的研究者都不能绕过该书。”

（英）阿诺德·托因比等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11卷。第1卷：1939年3月的世界；第2卷：大战前夕1939年；第3卷：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4卷：希特勒的欧洲；第5卷：美国、英国和俄国的合作和冲突（1941年—1946年）；第6卷：战时中东；第7卷：大战和中立国；第8卷：1942年—1946年的远东；第9卷：欧洲的重组；第10卷：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年—1946年）；第11卷：1945年—1950年的中东。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由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以“人脉”为主线，围绕人事活动来展开全书的叙述，对兴汉会、保皇会、正气会、中国议会、中国教育会、军国民教育会等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组织及其活动进行了探讨。章开沅认为该书在集中检讨国内外新近发表的信札档案、日记及当时著作和报刊资料的基础上，抉剔爬梳，条分缕析，于缜密考订功夫中驰骋宏观思维，对相关研究多有推进。

蒋大椿在《安徽史学》第2期发表《五四运动前唯物史观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吴廷嘉、沈大德《历史唯物论与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朱汉国《中国政党制度史》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非洲通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的编撰于1985年启动，由华东师大艾周昌和北京大学陆庭恩负责。共分三卷，古代卷由北京大学何芳川、宁骚主编，近代卷由艾周昌和北京大学郑家馨主编，现代卷由陆庭恩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彭坤元主编。全书共59章，192万字。

该书既未采取以世界史统一分期的方式，也未采用按地区、国别轮回编写的常用写法，而是根据非洲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整个非洲和重点国家相结合的方法编排，避免了一刀切的弊端，使全书既互相衔接，融会贯通，又各有重点，独立成篇和卷。

该书的出版，被称为是我国非洲史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对非洲问题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5月

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该书堪称改革开放后学术界争议最大、影响最广的著作之一。书中通过对百多年来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反省，认为“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并对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等暴力革命的历史影响作了负面解读。作者对改良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改良比革命好”，“逐步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因此书触及到中国历史走向和现实走向的根本问题，在中国大陆和海外都引起强烈的两极性的回响。中国大陆主流史学界对该书进行了大规模批判，认为该书的主要目的

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收集了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研究胡适的学术论文及回忆文章。共出版3辑，第2辑、第3辑分别于1996年、199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作者在书中征引了大量史料，梳理了五四运动之前全国性学生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过程，尤其对晚清学堂学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对清末社会变迁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何兹全在《中国史研究》第2期发表《中国的早期文明和国家的起源》。

作者认为，以夏为中国国家起源时期的学说和恩格斯国家起源的学说不十分吻合。国家起源应分作两步，早期国家和真正意义的国家。盘庚或盘庚以前开始到春秋战国前，是中国的早期国家时期，春秋战国开始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成熟国家时期。作者提出，国家起源的问题上，乃至在世界多民族的国家起源问题上，划出一个“早期国家”（或者如某些学者划出一个“酋邦”阶段），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观点。在作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论学说较西方学派的国家起源学说更具有科学性。

罗志田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发表《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

作者认为，“西潮冲击——中国反应”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一大主题。用这一典范去囊括一切固然是不可取的，但因为这一典范被用得太滥就转而以为它已可功成身退，恐怕也未必就恰当。近代中国士人面临西潮荡击，被迫做出反应，从而引出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思想的大变化。本文即检讨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能动关系中一些过去未得到足够重视的层面，并试图表明，至少在思想史范围内，西潮冲击中国引起的变化及其对今日学术研究的影响还应作进一步的探讨。作者指出，中西之间的文化竞争是中外矛盾的关键。西方在文化竞争方面是有备而来，中方则是在竞争过程中才逐步认识到“学战”的重要，故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改变了思想方式。中国士人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在失去文化立足点后，更因多层次的心态紧张步入激进化的轨道，造成民国初年思想界群龙无首、不知所趋的局面，为新文化运动准备了时势造英雄的历史条件。同时，由于中国士人在文化竞争中的失败，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渗

透逐渐由中国知识分子来起主要的作用。结果，中西之间形成一种层累堆积又循环往复的胶着，故 19 世纪的西潮已成 20 世纪的“中国”之一组成部分。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由三联书店出版。

《师门五年记》原名《师门辱教记》，记叙了作者于 1930 年夏从中国公学毕业后，在胡适家里向其求学问道，师生相处五年情谊至深的经历，着重描写了胡适怎么指导他做学问、搞研究的事例。写于 1943 年，1944 年由桂林建设书店出版，印数甚少。1945 年作者做了修改，1948 年 8 月胡适写了序，原拟交独立出版社出版，后因故未能出版。胡适离开大陆时把它带在身边，1958 年 12 月在台湾自费出版。胡适说：“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的描写他做学问经验，从来也没有人留下这样亲切的一幅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严耕望称：“此书不仅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实为近数十年来之一奇书。”《胡适琐记》写于 1993 年，是对那五年师门生活的再次追记，真切细致地记述了胡适的学术研究、行政工作和生活琐事。

本书提供了一个学术研究薪火相传的范例，在海内外流传甚广，影响甚大，甚至有“教科书”之称，对于推动“胡适热”起了很大作用。

1998 年修订再版。

乔幼梅《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由齐鲁书社出版。

收录论述辽夏金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女真奴隶制的演变、金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南宋的钱荒、宋代物价与货币的关系等方面论文。多数论文“立足于全局，以大量的事实材料论述问题，提出了开创性的独立见解”。

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作者代表性论文结集，主要论述了晚清社会的风习、心理、思潮、生活、灾荒等问题。

姜义华在《复旦学报》第 3 期发表《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文章认为，中国史学素来有“史官史学”与“史家史学”双重传统，两种传统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史官史学”居于支配地位，“史家史学”基本上笼罩在它的根本宗旨之下。近代以来新兴的“史家史学”一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也常常不免演变为新的“史官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家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真正的“史家史学”在崛起，包含官方组织的史学研究、史书编纂，也越来越倾

向于建立在史家独立思考、对历史多元反省的基础上。这一重大转折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正在从近代壁垒分明的二元化、两极化、高度政治化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多极化、经济与文化日益突显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性变化。

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晚清中西文化观述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中西体用”思潮萌生、形成、嬗变、分解的全过程进行了细致的爬梳整理和深刻的理论阐发，着重考察了晚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特质，对晚清文化圈如何对待中学与西学这个中心问题进行了精微的分析，提出了许多使人耳目一新的论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 1800—1949》第1卷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从现代化变迁的角度来探索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其出发点在于重写中国近现代史。书中以现代化为衡判尺度，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学术、军事、习俗诸方面重新观察并叙述了1800年至1949年的这段历史，试图从新的视角出发全方位展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演变图景和内在脉络。

作为一本具有探索性质的通论性著作，该书对现代化研究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张铠在《中国史研究动态》第5期发表《美中贸易与美国中国史研究（殖民时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作者在当年《中国史研究动态》第7期又发表《美国中国史研究专业队伍的形成及其史学成就（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文对美国中国学作了全面介绍。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辜鸿铭的专著，对辜氏的人生经历、思想历程、“中西文明观”、中外影响等皆有专门探讨。

郭毅生、史式主编《太平天国大辞典》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词近四千条，分总叙、词语、人物、军事与战争、地理、经济及文物、史料、著作七大类编排，是研究太平天国史极有价值的工具书。

何芳川在《北京大学学报》第 3 期发表《太平洋时代和中国》。

本文回顾了“太平洋时代”思想的由来，分析了“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太平洋时代”这一常用提法的弱点，并从人类文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和太平洋地区的历史与现实出发，论述了太平洋时代的标准、特征与主要内容，以及它与中国的关系。文章认为，仅用经济发展的眼光看太平洋时代将导致失误。从政治、经济、文化及文明总体发展水平来看，太平洋时代的到来，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21 世纪可能是这一时代的初期阶段。

6 月

6 日　北京市历史学会和国家教委社科中心举办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这次会议主要批驳“告别革命”论，刘大年、戴逸、金冲及、胡绳武、沙健孙、丁守和、张海鹏、李文海、彭明、吴承明、汪敬虞、耿云志、杨天石、梁柱、龚书铎等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部分发言摘要刊登在《高校理论战线》1995 年第 8 期。与会者指出，要警惕一些人通过编造历史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一些奇谈怪论虽然打着淡化理论、淡化意识形态的旗帜，实际是有着很强的政治意识。有些人意识到只有动摇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历史，才能动摇它的现实。

是月　吴荣曾《先秦两汉史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

共收论文 25 篇，内容涉及先秦两汉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谢贵安《明实录研究》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

全书约 30 万字，历时 15 年乃得完成。共分八章，分别讨论了《明实录》的修纂背景、修纂过程、修纂人员、修纂程序、体例风格、版本收藏、缺陷失误、成就价值诸方面的问题，对《明实录》作了全方位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海内外研究《明实录》篇幅最大、最全面和系统的专著。

庞朴《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由海天出版社出版。

作者认为，一分为三是中国辩证思想的精髓。它弥漫于整个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而不仅限于庙堂的谋略，或者经院的讲章。因此，描述中国辩证思想的面貌和演变，便不能简单求之于社会的经济与政治，也很难得之于范畴的推衍和翻新。老一套的唯物、唯心求证办法，在这里都将无济于事。比较可取的方法，也许应该是一种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吴汝祚在《华夏考古》第2期发表《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几个有关问题》。

余英时在《中国文化》第11期发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

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儒学在近代的解体过程，并进而展望儒学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方面可能发挥什么样的效用。讨论的范围以政治、社会思想为限，不涉及形而上学或宇宙论。作者尝试在清末民初儒家的中西"格义"之间寻找出一条贯通的线索。其基本假设是明清儒学中某些新倾向，恰好构成了现代儒家接受西方观念的诱因。为了具体的证实这一假设，作者在本文中做了两层工作：第一层是在晚清今古文两派所宣扬的西方制度和现代价值中，选出几项共同点，以见现代儒学动态之一斑。第二层则追溯明清儒家的政治社会思想，看看其中有什么新的因素可能为儒学的现代动态提供了历史的背景。为了避免流于空泛和武断，作者除论及儒学与专制的一般关系外，又特别就民间社会组织、富民论、公私观三组事例，考其流变，以推断明清儒学的新基调。这三组事例并不是任意选取的，而是经过了仔细的斟酌。这三者之间互相关联，共同透露出儒家在政治和社会观点上的取向已发生了微妙的转变。这不是传统的范畴，如心学、理学、考据学甚至经世学所能充分说明的。所以关于明清思想基调的这一部分构成了这篇文章的主干。

7月

29日　"台湾史学术研讨会"在庐山召开。

是月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由武汉出版社出版。

共收文21篇，正文20篇论古史，另附1篇治学经验。内容涉及中外古史及其比较，凡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及学术思想均有讨论，集中反映了作者研治中外古史四十年间的学术成果。综观全书，所论多为中外古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焦点"和"空白点"问题。

该书是作者从事学术研究几十年后所写的第一部专著，所收文章皆为在大量中外文献资料中披沙拣金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精研覃思、反复推敲论证而成。作者在后记中言："我觉得，这些文字的是非得失，要请同行

学者和读者朋友们多加指教；而我可以说的只有一点，即这些文字没有一篇是未经长期准备和思考就率尔操觚的。”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写作取向是希望言人所未言，写出一些胡适较少为人注意的层面。作者特别注意强调“文本”（胡适自己）和“语境”（胡适所处时代）的微妙互动关系，强调从这种互动关系中为胡适定位并求得胡适的“真意”和“真象”。作者自谓：“胡适自己曾叹谓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不为世人所注意，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今日若要研究胡适的时代自然要多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如果要理解胡适本人，则不得不去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却为人冷落的篇章。这两者本是互补的。只有在理解了胡适本人及其不为世所注意的一面，明了其为世所不知的诸多原因，才能深入地理解胡适那个时代；同时，也只有在尽可能深入地理解了胡适所处时代之后，才能进一步领会胡适身处特定时代那‘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陈寅恪语），‘以期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胡适语）。”通过对胡适“文本”及其“语境”中较少为人注意的层面的读解，作者挖掘了胡适性格和思想中隐藏较深的若干二律悖反的取向，为胡适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该丛书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共同协作完成。共收书 19 种，即《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中国抗战军事史》、《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经济》、《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抗战英烈录》、《中国抗日战争大事记》、《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日军侵华暴行实录》(1—4)、《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的毒气战》、《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其中《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由地图出版社出版。

刘大年为这套丛书作了总序。

8 月

27 日　戴逸率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出席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 18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是月　张静河《瑞典汉学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作者亲自在瑞典深入考察访问后，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专

著。该书对瑞典汉学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着重介绍了瑞典汉学家把古老的中华文明当作理想的文化模式，欲从东方文化中寻找理想之梦，创建适合瑞典国情的社会的理念。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在序文中介绍了瑞典汉学的起源、发展及现状。

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共收录西周至民国各种契约1402卷。编者在编纂时坚持贯彻了三项主要原则，即“通史体例”、“面向全国和民族地区”以及“契类多样，内容广泛”。书中所收契约，西周分为六类，即典田、租田、易田、赠田、赔偿、买卖奴隶等；两汉分为七类，即家约与先令（遗嘱）、取予、买卖（附买地券）、典当、借贷、雇佣、结惮等；隋唐以后各代，种类更多，除上述各类外，还有租佃、租赁、佃仆、招赘、买奴、领养、立嗣、放良、婚嫁、放妻、阄书、合伙、结社、退股、排年等契约、合同。契约有红契、白契、官版契纸、官印契草，此外还有有关的文牒、问账、公据、契尾、税票、推单等。

本书的资料来源，唐以前的部分，主要收自金石图书、简牍文书、考古报告及一般文献。这些资料过去未被认知，亦缺少收集整理。宋以后的部分，主要收自各有关单位和个人，其中的绝大部分为第一次公之于世，因此与他书所收不存在重复雷同等问题。为了使所收各篇都能较大地发挥作用，在编纂时，先行清录，再加校订，然后依原款式竖排铅印；每件都注明出处，对有关的重要史事、制度或名词、术语等，都有所概述或考释。又从各段资料中选出二十件文字完善、清晰度高、有典型性者制作图版二十版，置于书前，以备参考。

《华学》创刊。

该刊是由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中山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以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为主旨的学术丛书，不定期出版。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与北京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召开“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110位海内外学者出席。会议论文编为《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议专辑》（1997年3月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会议期间，田昌五被选举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

胡滨主编《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侯仁之、周一良主编《燕京学报》新 1 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杨希枚《先秦文化史论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 75 万多字，收入论文 33 篇，汇集了作者 50 年来研究成果的精粹。

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着力建构中国历史新体系，提出了中国历史大循环理论。作者认为，中国封建帝制时代的历史是周期性循环式发展的。这种周期循环性表现在各个方面，在国家的统一和分裂、农业方面的土地关系、赋役制度变革、民族危机、思想史变迁等方面都有三次大的循环。如果把这个时代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可以用三、二、一这三个数字来表示之。三，即三次大循环；二，即汉、唐两次高潮期和相继的两次低潮期；一，即宋代之后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到了南方，而政治中心则转移到了北方，往日繁荣富庶的黄河流域成了南北之间的断裂带。所以，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是循环式跳跃前进的。作者认为，中国已经走出历史上的第三次大循环，进入第四次大循环。

张耕华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关于历史认识论的几点思考》。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开始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 4 卷，第 1 卷大战的起源、酝酿与爆发，第 2 卷大战的全面展开，第 3 卷大战的相持与转折，第 4 卷大战的最后较量、结局与总结。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作者论文选集，收录《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余论》、《从中国传统看学术自由的问题——香港〈明报〉月刊百期纪念答记者问》、《儒家“君子”的理想》、《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十周年校庆讲座》、《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等 12 篇论文。

余氏作为一个有思想的思想史研究者的治学特点在本书中得到鲜明体

现。作者力图通过对中国思想传统中若干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问题的分析来把握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从而能够对中国文化的性质达到整体了解。书中还反映了作者对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深层关注和严肃冷静的思考。

胡厚宣主编《夏商文明研究》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9月

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新时期新儒家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收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11人的学案。

宋文民《后汉书考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作者积多年研究心得，在广泛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后汉书》重新作了一番校雠训诂。全书收有作者考释心得1869条，多发前人之未发，对人们阅读、研究《后汉书》颇有裨益。

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由齐鲁书社出版。

本书旨在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资产阶级史学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中的功绩与局限。虽然“资产阶级史学”一词的科学性受到质疑，但作者明言还未能找到更准确的概念代替它。作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的新史学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启超；从五四运动到整个20年代的实验主义史学阶段；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的多元发展阶段。并分别论述了各阶段的主要特点。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注意了以下三点：第一是写实，从材料出发，材料多的多写，材料少的少写，没有材料的不随便说。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事实原貌，竭力避免断章取义。让史实说话，多述少评，给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第二，立足当代，回溯过去。本书的目的在于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提供材料，所以，一方面力求突出不同时期史学思想的特点，并追寻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的思想和观点，给予一定的篇幅，同时，对某些理论引起的误解，进行必要的澄清。第三，采取思潮、人物、问题相结合的叙述方法。在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发展的第一、二两阶段，有影响的史学家较多，以人物为主结合思潮叙述，大体能说明历史发展的过程，第三阶段有影响的史家甚少，而提出的问题、涉及的方面却很多，这就只能以问题为中心，结合思潮与人物进行叙述。

蒋大椿在《史学理论研究》第 3 期发表《史学理论研究现状及其深入点》。

文章列举了史学理论研究深入的三个表征：一是中国史学理论发展史专题研究的开拓和深入；二是对外国史学理论发展史的研究更为拓宽和深入；三是对史学理论范围的若干专题进行了新的探索。20 世纪 90 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不再热衷于对理论问题的抽象思辨，而是更多地从历史的角度展开。

蒋大椿在《社会科学研究》第 5 期发表《新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历程》。

第 6 期连载。文章总结了当代中国几种关于史学方法论建设的基本趋向：第一，认为阶级分析法是历史研究的唯一基本的科学方法，以刘大年为代表。第二，主张以系统方法为中介，将历史科学方法纳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轨道，建设以自然科学方法作为包括社会历史科学在内的全部科学的统一方法，实际上是以自然科学方法作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以金观涛为代表。第三，主张历史学应当从自然科学的影响中彻底摆脱出来，向着人文化的方向发展，并从人文角度建设历史科学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第四，认为新时期中国历史科学应建设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的，由多角度、多层次、相互联系并互为补充的多样化统一的史学方法体系。

阎步克在《北京大学学报》第 5 期发表《乐师与“儒”之文化起源》。

作者对中国历史上称“儒”者的早期形态和来源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看法。文章认为，早期的称“儒”者与商周王朝中主管乐舞的官员，在文化上有着一脉相承关系。春秋战国之间形成的儒家学派，以诗书礼乐为教；而以诗书礼乐为教，正是此前的王朝乐官的职责。王朝国学中的要担任舞人的青少年学子，可能就是“儒”的早期形态；而教官乐师则相当于“师儒”。儒家与乐师在文化上的这种传承关系，对儒家思想特征的形成，应有重大影响。

10 月

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上中下三编，60 万字。该书以凸显明清启蒙学术思潮及其流向、变异为宗旨，着眼于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文化进程，确立主潮，观其流变，正面论述，彻底跳出所谓“两军对战”、“汉宋纷

争"、"朱陆异同"之类的陈旧模式。在叙述方法上，除每编首章略述时代背景与思想线索以外，基本上以问题为经，以各家论点为纬，以类相从，分层论述，人物副之。全书所讨论的问题，着眼于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前进运动所提出的历史课题，包括个性解放思想、初步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学精神等。新人性论及其哲学基础，新社会理想及对"众治"、"天公"等的向往，新思维模式及对科学方法的探索，依次递进，大体构成全书的逻辑。

朱学勤在《读书》第10期发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该文意在寻找那些在1968年前后就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发生怀疑，并由此展开思考的那批"六八年人"，寻找由这些人组成的在一片癫狂中进行独立思考的"民间思想村落"。

本文刊出后在知识界激起巨大反响。

王先明在《天津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中国社会史学的历史命运》。

作者认为，社会史的勃兴是历史学在研究内容上发生了令人瞩目的三大转折：第一，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第二，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第三，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

文章指出，社会史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关乎社会史学科发展的前景和命运。中国的社会史研究根本不能够疏离其理论体系的探讨而存在，而发展。尤其在学科体系高度开放的当代社会中，诸学科的相互渗透，各种新理论、新范畴、新方法的相互交汇已是必然的趋势。因而，中国社会史如果不加强它的宏观理论学科研究，不从学科体系的层次上对引入的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加以科学整合，就无法最终形成属于自己独特的学科意义上的规范体系。

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我的学术道路》由三联书店出版。

国际儒学联合会编《国际儒学研究》创刊。

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国内首部系统研究美国中国学的学术著作，从学理层面上对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做了细致考察，并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对象、范式、取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作者将战后美国现代中国学发展划分为三阶段，即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摧残时期（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末），复苏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末），新的发展时期（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并对各个时期美国现代中国学在美国的发展情况及其背景作了细致梳理。

晁福林在《历史研究》第 5 期发表《春秋时期的鬼神观念及其社会影响》。

春秋时期鬼神观念对当时社会生活具有重大影响，系统探讨者历来稀少。本文对春秋时期鬼神观念的形成，鬼神的基本特征，神、人的位置关系的变化，鬼神观念对春秋时期社会发展的影响都做了拓荒性质的论述。

11 月

15 日　第 9 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云南昆明举行。

会议的主题是"东方社会历史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

12 月

4 日　姜亮夫逝世，终年 94 岁。

26 日　山东孔子学会在济南举行"鲁文化与儒学学术讨论会"。

是月　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从 6 世纪到 9 世纪》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在《导言》中对胡适以来的中外禅学研究作了一个总结回顾，并依据特定的视角对这些研究方法进行质询、商榷。作者认为，无论是胡适的实证主义方法对禅思想的研究，还是铃木大拙用现代哲学概念所阐释的禅的理性批判思想，在在都是从现代人的知识背景来回溯过去，因此，能否寻绎出古人真实的心路历程是很可怀疑的。作者一反旧习，采用"顺着讲"的方式来叙述禅宗发展史，也就是尽可能地贴近古人，从同情的理解出发，用古人的理路来描述古人的思路，努力在今天的思想中再现过往历史的真实场景，以期能获知中国禅思想史的内在理路和外在走向。全书综合使用大量灯录及经传资料、敦煌文献、碑铭资料以及散见于正史文集及经论注疏中的相关资料，材料翔实，考辨周详，屡破成说。

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有《上古秦汉卷》、《六朝隋唐卷》、《宋元明清卷》三卷，由《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刊行会赞助出版。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与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联合召开"马

克思主义与儒学”学术研讨会，标志着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对国学热的介入。

荣新江主编《唐研究》创刊。

该刊是由美国唐研究基金会资助，每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卷，研究内容是唐代及相关时代的传统学术问题，包括历史、地理、美术、考古、语言、文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尤重书评，除中文外，还发表外文论文。

安志敏在《寻根》第6期发表《中国文明起源于二里头文化——兼议多源说》。

李伯谦在《华夏考古》第4期发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关于中国文明的源头，作者认为中国文明起源并不是一个中心。

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借鉴和运用了国际上近几十年来在与历史学诸相邻学科的大量研究成果，尤其是使用了文化人类学前沿的酋邦理论，对中国早期国家阶段之前的社会政治组织进行了新的阐释，并借此来探讨解决有关中国国家的起源及发展道路的特性问题。书中详尽论证了作者对于中国早期国家问题的理论见解与具体认识，论述了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发生、变化转型以及最终向成熟的国家形态发展过渡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由前国家形态向早期国家过渡，商、周时代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期，春秋、战国时代则是中国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转型期。因此，从夏代开始直至战国末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早期国家阶段，秦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进程的结束。该书还论述了中国自先秦以来国家进程中由中原向周边地区扩布的过程。书中充分运用现有的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等学科的丰硕成果，在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从经济水平、社会结构、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国早期国家的历史，被称为中国学术界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早期国家问题的专著。李学勤曾评价该书：“有了《中国早期国家》，这方面课题的探索就跨进了新的阶段。”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根据广东省档案馆、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所藏大量陈

寅恪的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绘了陈寅恪生命最后20年的坎坷经历，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并从陈寅恪的生存状态和人际交往入手，探索了他的内心世界，以此分析、诠释了陈氏晚年作品的内涵。据作者自述，《陈寅恪的最后20年》是在超过千卷档案卷宗的翻阅积累上而成的。该书除了辑录档案资料外，在抢救、保存相关当事人的口述历史方面也功不可没。

该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把大陆知识界的“陈寅恪热”推向顶点，陈氏也被塑造成追求独立自由的一代知识分子的象征和符号。

廖一中主编《义和团大辞典》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全国80余位专家学者历时7年完成。收选词目1477条，内容涉及义和团的专用词汇、组织、事件、人物、史籍文物及义和团研究学术动态等。

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李学勤、（美）艾兰编著《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是年

《国际汉学》创刊。

该刊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任继愈主编的一本综合性学术集刊。其宗旨是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世界各地汉学研究的历史、成果和最新进展，以拓宽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视域。同时积极推动国内学术界对域外汉学的研究，努力倡导国内学术界与海外汉学家的对话，使“汉学”和“国学”展开一种良性的互动，在一种跨文化的对比研究中，提升汉学研究的水平。第1辑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此后全部由大象出版社发行，初时每年一辑，后每年两辑。

陈平原主编《学术史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总序云：“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

学术追求。”“九十年代中国学人之热衷于谈论‘学术史’，依然大有深意。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

中日合作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发掘新疆民丰尼雅遗址。

尼雅遗址系20世纪初由英国学者斯坦因首次发现。尼雅遗址南面约20公里处是汉晋时期塔里木盆地南缘一处典型的内陆沙漠绿洲型聚落遗址，周围分布着古城、佛教寺院、住居址、畜舍、田地、窑址、道路、果园、官署、墓地等各类遗迹，多数遗迹已被黄沙湮没或风蚀殆尽。

国家文物局公布本年度十大考古发现。

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旧石器末期至新时期早期）、湖南玉蟾岩遗址（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新石器时代）、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商代）、山东长清仙人台邿国贵族墓地（周代）、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西汉）、新疆民丰尼雅遗址（汉晋）、广东南越国宫署御苑遗迹（汉代）、黑龙江宁安虹鳟鱼场渤海国墓群遗址（唐代渤海国）、浙江赵氏太庙遗址（南宋）。

1996年

※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出版。
※“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
※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出版。
※ 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出版。
※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出版。
※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出版。
※《胡适全集》编纂出版工作启动。
※ 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14万枚汉末至三国吴简牍。

1月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力图对20世纪后50年的中国主流史学进行一个全景扫描，从整体上、全局上和较高的理论层面上反思和检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进程。此书的基本线索有两条：一是将近50年间递嬗迭起的若干有影响的史学思潮，概括为“片面反封建”、“历史主义”、“回到五八年去”、“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去”、“回到乾嘉去”、“回到马克思去”、“走向系统论去”、“走向科际整合去”等，并将这些思潮勾连贯通，显其大势，察其底蕴，既重外在的社会学分析，又重内在的学术理路的发掘，记录、剖析了新时期以来历史学对社会变动的反应，勾画了历史学伴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所经历的曲折而艰难的进程；二是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论战”、“历史动力问题论战”、“历史创造者问题论战”、“农民战争史问题论战”等重大史学事件打通，并把这些事件看作是一个对人类文明史，特别是对中国文明史的认识在冲突中不断深化的进程。

该书是史学界论述中国当代史学较具思想深度的著作，被视为近50年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拓荒之作。书中提出的“战时史学”概念引起较

大争议。

严文明在《中原文物》第1期发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

文章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信古、疑古到考古”回顾了从古至今探索文明起源的过程，第二部分“走向文明的脚步”具体勾画了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与环节，第三部分“单中心还是多中心”主要讨论了中国文明的源头这一学术界争论激烈的问题，第四部分对“中国文明的起源模式”进行了探讨，认为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时，应当特别留意地理环境和史前文化的背景，指出中原地区地理环境适宜，处于中心位置，能够博采众长，加以融合发展，故自夏以后越来越成为中国文明发展的中心，以后又扩展到更大范围。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农民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兴衰周期。作者认为：“历史其实是人民自己创造的，在我国历史上，没有比研究皇朝周期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更能为我们探索中国全部政治史的内在动力及其发展的规律提供丰富的资料，揭示最佳的考察角度。”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该书被称为“中国农民学开山之作”。作者避开以满铁资料分析为基础的华北研究和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所谓“太湖模式”，从农民学的角度，提出了分析西北区域经济状况的“关中模式”。作者认为，中国北方的许多重要地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小农”的汪洋大海，自耕农所占比重极大，土地兼并以及大土地所有制现象并不突出。隋唐以后，关中地区逐渐形成“无地主”、“无租佃”、“有封建”的土地关系，几乎成了一个自耕农的世界，地权极为分散，这就是“关中模式”。并借此分析了农民的社会经济行为、政治关系和组织形式。

书中还提到了狭义农民学与广义农民学这一对概念，认为今日的农民研究应当是狭义农民学与广义农民学的结合。狭义农民学应当关注与农民相联系的人文社会问题，如土地制度、乡村社会、社区组织、农民负担、乡土文化、农民流动等；而广义农民学则是研究传统社会、前工业社会、前近代社会、前市民社会或不发达社会的理论，尤其是这种社会的现代化演进的理论。狭义农民学是一种“问题”之学，广义农民学则是一种“主义”之学，作者正是抱着“问题”与“主义”结合、狭义农民学与广义农民学相结合的想法写作这本书的。本书前半部关于“关中模式”的研

究偏重于讨论实证"问题"，后半部关于"前近代社会"的研究则偏重于理论或"主义"。

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八章。第一章"绪论:'农民模式'还是'反农民模式'?"；第二章"农村公社与'俄罗斯精神'的起源"；第三章"'公社世界'的鸟瞰（上）"；第四章"'公社世界'的鸟瞰（下）"；第五章"从'要否分家'之争到'如何分家'之争"；第六章"从'如何分家'之争到村社复兴运动：由改革走向革命的村社俄国"；第七章"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上）"；第八章"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下）"；结语与余论"从奇吉林到卢多尔瓦伊：公社传统与俄国历史的怪圈"。

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唐代阶级结构的基本状况进行了研究，对唐代两大阶级中的地主阶级（贵族官僚地主、庶民地主等）、劳动阶级（乡村次户和下户、佃农与屯田兵民、工匠和手工业者、奴婢、部曲、官户、杂户等）的相互关系和各自所处的经济地位进行了探讨，并透过社会阶级关系之间的变化对唐中叶的社会大变动作了探索。

李治安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专著。主要探讨了唐宋元明清五朝中央与地方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统属关系，各项权力遵循何种原则进行分配，中央政府处理与地方政府关系时存在哪些利弊得失，各个时期的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又是根植于何种历史环境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对社会经济、文化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或可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等一系列问题。

王春瑜《明清史散论》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收专题学术论文 20 篇，主要论述了明清时期的宦官活动、流氓社会、园林建筑、商业文化、农民战争、官宦子弟、历史人物等问题，另收明清史考微知识小录 17 篇，主要对明清时期一些人物或史事进行考证或阐发。

刘森《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

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对公元 13 世纪至 14 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各层面进行了详尽描述，

重点在于揭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书中对元代的行政区划、生态环境、人口分布与身份职业、民族分布与文化交流、婚姻与家庭、服饰与饮食、皇室住房与御用品、城市居民居住条件、乡村居民和草原居民的居住条件、民间主要生活用具、交通与通讯、医疗与养生、丧葬习俗、伦理道德与社会禁约、礼节、岁时风俗与娱乐等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进行了考察。

2月

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3月

张广智在《史学理论研究》第1期发表《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

第2期又发表了《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

两文共分十一个部分，对20世纪百年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进行了回顾与考察。分别是：一、梁启超的功业；二、何炳松与现代美国新史学派；三、李大钊与西方近代史学；四、傅斯年与兰克学派；五、“战国策派”与文化形态史观；六、周谷城与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七、“南耿北齐”与“史学史热”；八、吴于廑与整体的世界史观；九、张芝联与法国新史学；十、陈启能与《史学理论研究》；十一、回顾之后的几点思考。作者认为，为了加快西方史学输入的行程，译书仍为当今之要事，同时应使输入的西方史学与中国史学结合起来。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成功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它的态度。

《民国学术经典文库》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该文库主要收录从1911年至1949年间民国著名学者一些影响深远的著作，分思想史类丛、历史类丛、文学史类丛等，共收书31种。

魏宏运主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依靠文献档案和实地调查资料，对这一时期冀东地区地理环境的沿革、基层政权组织的演变、农业的发展、工商业和集市贸易的概貌、宗族及家族的状况以及乡土文化的历史内涵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涵盖了冀东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立体地、完整地展现出

华北农村社会的历史演变。

(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为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该书从历史和社会学角度，对 1900 年至 1942 年的华北乡村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提出了“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两个贯穿始终的中心概念，论证了 20 世纪前叶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通过探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揭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作者还提出了现代化建设如何与传统文化权力网络整合的问题，深化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研究。

作者认为，在社会史的研究中要想打通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间隔，需要创造一些兼容并包的新概念和新方法，以便能够在具体的研究中连接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偶然性，能够沟通上层文化与大众文化，而“权力的文化网络”正是这样一个起连接作用的概念和方法。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

朱政惠任主任，季羡林、张岱年、王元化、张仲礼、章开沅等学者担任顾问。同年，开始招收海外中国学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

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4 月

4 日　罗荣渠逝世，终年 69 岁。

5 日　李时岳逝世，终年 68 岁。

10 日　北京市历史学会和国家教委高校社科中心联合召开“五四运动与 20 世纪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

会议主旨在于批驳“告别革命”论，沙健孙、李文海、张海鹏、彭明、耿云志、杨天石、胡绳武、林华国、萧超然、龚书铎等 30 多位学者参加会议。会议指出，中国近代的革命，不是革命者任意制造出来的，而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残酷压迫下，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化的产物。不革命，中国便无法取得进步。近代各种改良道路的失败也说明了这一点。对革命本身的否定，势必导致对革命成果——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否定。

21 日　张学海在《中国文物报》发表《环壕聚落·土围聚落·

城堡·早期城市》

该文区分了环壕聚落、土围聚落、城堡、早期城市的联系和不同，认为早期城市的出现，标志着国家的诞生和文明时代的开端。

是月　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研究的问题具有开创性质。作者运用比较研究、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消长、国际资本积累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以及中国国际收支的发展状况及其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资金供给和工业品市场的作用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林甘泉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

文章鸟瞰式地回顾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所走过的道路，共分六部分：一、传统史学的危机与“新史学”的酝酿；二、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及其重要建树；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与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的传入；四、史学在战争的艰难环境中茁壮成长；五、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其经验教训；六、充满生机的新时期历史学。作者认为：二十世纪的上半叶，近代实证史学是中国史学的主流；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中国史学的主流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作者特别指出：之所以说“近代实证史学”，而不说“资产阶级史学”，是经过一番考虑的。长时期以来，许多同志习惯于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家称为资产阶级史学家。实际上这种提法是否科学和准确，很值得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诚然有些人是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但也有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就其社会地位、阶级立场和政治思想来说，未必都和“资产阶级”对得上号。学派分野和阶级分野虽然有一定联系，却不能完全画等号，这是我们考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时，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的这一看法，反映了主流史学对于民国史学态度的重大转变。

张涌泉主编《敦煌文献合集》开始编撰。

该书通过对现已公布的所有敦煌经部文献的全面普查，在分类、汇聚、定名、缀合、汇校等工作的基础之上，把所有相关写卷及其校录成果全部类聚在一起，共11册，2008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5月

16日　“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

项目启动大会在中南海举行，国务委员宋健作了题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报告，报告认为："中国的历史科学要想在世界上获得其应有的地位，中国的历史学家首先要站起来，要敢于做大题目，使历史科学成为中华民族的支柱性科学，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能正是一种纲领性的工作。20 世纪即将结束，我们不能把古史上的迷茫就这样传给下一代。自晚清封建帝制崩溃的 100 多年来，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特别是建国后 40 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的古代史研究已取得极其丰富的成就，处于世纪之交的'九五'期间，应该做一个总结，对三代纪年这个关键问题归纳出一个轮廓。"

"夏商周断代工程"工程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1995 年秋，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请在北京的部分学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宋健提出并与大家讨论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设想。1995 年底国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学院、社科院、国家教委、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共七个单位的负责人组成，会议聘请了历史学家李学勤、碳 14 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作为工程的首席科学家。这一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共分 9 个课题，44 个专题，直接参与的专家学者达 200 人。工程的总目标是制定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具体目标是：1. 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 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2. 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3. 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4. 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研究课题包括：1. 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2. 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3. 夏代年代学研究；4. 商代前期年代学研究；5. 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6. 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7. 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8. 碳 14 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9. 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与总结。在研究方法上，该工程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现象和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学给予计算从而推定其年代，同时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并进行了必要的发掘，获取样品后进行碳 14 测年。

2000 年 9 月 15 日该工程通过国家验收。2000 年 11 月 9 日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该年表把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延伸了 1200 多年，推定以周武王讨伐商纣王为标识的商周分界为公元前 1046 年，并明确了公元前

841 年以前西周十王的具体在位年代，推定夏商分界年代为公元前 1600 年，并明确了商武王以下十二王的在位年代，对于商代前期的历史给出基本的年代框架，推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 2070 年，也相应提出了夏代基本的年代框架。《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也在 2000 年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公布后，受到国内外学界尖锐批评与强烈质疑。斯坦福大学 David Nivison 教授在《纽约时报》发表看法："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2006 年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专辟"疑古与释古"栏目，首先在国内展开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讨论和批评，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和普遍关注，成为当年学术界令人瞩目的重大学术事件。

20 日　为纪念傅斯年百年诞辰，海峡两岸傅斯年学术讨论会在山东聊城召开。

大陆和台湾 50 多位学者与会，主要探讨了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社会活动及傅斯年的社会属性等问题。

是月　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系统地梳理了 20 世纪西方新史学学术流变的总体趋势，对西方现代史学中的新社会史、妇女史、家庭史、两性关系史、计量史学和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比较史学、心理史学等史学流派进行了较全面地分析和研究。

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作者部分遗作，包括《简论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史学》、《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反帝爱国史学》、《二十世纪初年法国大革命史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美国独立史在近代中国的介绍和影响》、《中国近代爱国主义与"亡国史鉴"》、《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英雄人物史鉴》、《中国近代史学界对历史和科学的关系问题的最初提出》等九篇论文，从不同侧面考察了近代史学思想的发展，是一部饶富原创性的近代史学史研究著作。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对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的演生过程进行了追索，对这种政治文化模式的特点和机制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作者把士大夫的最初形态追溯

至周代的“士”与“大夫”，认为战国以来“士大夫”分化为“学士”和“文吏”两个群体，最终在汉代的儒生与文吏、儒家与法家合流的过程中，奠定了中华帝国“士大夫政治”的牢固基础。作者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做了深入细致的考证，从而有了一些新的发现。作者从分析“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层面入手，并以“社会分化”即“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分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较好地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士大夫政治及其演生过程做了系统的说明。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成立汉学研究室。

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按照国别对 20 世纪欧美现代各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美国等国史学进行了概览，并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对西方史学在新潮流推动下出现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等进行了论述。该书独具匠心之处在于系统回顾了 20 世纪中国学人对西方史学的引进情况，并对进一步吸收西方史学的先进成果提出建议。

耿云志《胡适新论》由湖南出版社出版。

收录了作者多年来研究胡适的论文。

张芝联、成崇德主编《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由中华书局出版。

6 月

12 日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柯文在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作关于当前美国中国学的学术报告。

柯文指出，以人类学的方法展开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是现在美国中国历史探讨的一个重要特点，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在中国学研究中有重要影响，史学研究的对象日趋平民化，人力车夫问题等有关劳动史的研究均获较大进展。

是月　何兆武在《史学理论研究》第 2 期发表《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

该文对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做了开创性阐发，认为历史学应分为两个层次：历史学Ⅰ是对史实或史料的认定，这部分研究工作是纯科学的；历史学Ⅱ是对历史学Ⅰ的理解或诠释。这里又分两个方面，对理解工作仅有科

学态度和方法是不够的，还要有一种人文价值理想贯彻始终，这“是历史学的核心”。另外，史家还要进行人性学的研究，这种探讨一部分和心理学重叠，“大部分都是独立于科学之外的”。由于每个人、学派、时代的知识、凭借和思想方式不同，构造出来的历史画卷也便有所不同。历史学家工作的完成，就在于把他构成的历史画卷传达给别人，“这里的这个‘传达’工作，严格说来，乃是一种艺术表现，因此也就并没有‘如实’”。因此，历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或不仅仅是）科学。它既需要有科学性，又需要有科学之外的某些东西。科学性是历史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它的充分条件。历史学家不但应该重视科学性，同时还更应该重视其中非科学性的成分。

刘北成在《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发表《福柯史学思想简论》。

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由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历史学著作，不是经学研究，训诂考据只作为手段使用，目的在研究历史，解决历史问题，与一般注疏有根本区别，故题名“新解”。结构上有以下特点：1. 因为是做历史研究，所以伪古文尚书不解，只解今文尚书。今文《尚书》之虞夏书部分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四篇。本书解这四篇时，将伪孔本之《舜典》归入《尧典》，《益稷》归入《皋陶谟》，复伏生今文《尚书》之旧。2. 每篇经文的解说包括序说、新解、总论三个部分。新解部分是重点、核心，对经文详加解说，对前人注疏着力会通、取舍、折中，每有新意。3. 新解前有序说，后有总论，各相当于一篇学术论文，综合论述学者争讼不已、疑而未决的一些焦点问题。作者认为，《尚书·虞夏书》之今文四篇是研究先秦史必须信据、不容忽视的史料，至为宝贵，四篇文字不会是当时人写定，但也不会晚于春秋初年，《尧典》、《禹贡》战国人作的说法不能成立。这一观点是对疑古思潮将《尚书》之虞夏书看作一种对古代传说的记录的重新翻案，在见解上独树一帜。

于沛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

该文对20世纪不同阶段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以及由此而展开的中外史学的撞击、交流和融汇进行了简要回顾和论述，并就外国史学理论传入中国所反映出的一些规律性现象进行了探讨。

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宏阔的视野对夏商西周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历史的演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进步、社会性质的演变、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的变

动、社会文化的发展进行了深入论述，作者对这一时期的基本认识是，在漫长的三代时期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并未发生根本的断裂与剧变，这一时期历史运转过程中存在着强劲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连续性，继承多于变革，延续多于变动。书中重点论述了西周时期的社会性质，认为夏、商两代的社会性质应当是氏族封建制的社会，而西周则是宗法封建社会，到了东周时期，宗法封建制逐渐解体，而慢慢步入了地主封建社会。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屡次走访英、法、德、俄、日五大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收藏地及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等地的收藏单位，遍览各国收藏之中国西北出土文献，并受英国图书馆邀请，编写了《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本书正是根据其所知所见和调查札记写成，故名《知见录》。全书按国家和馆藏为单元撰写，共分七章，对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和北欧（包括丹麦、瑞典、芬兰）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来源、藏量、最主要的整理工作和研究成果作了概要介绍，是迄今为止我国学者撰写的有关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之来源、收藏、整理、编目、刊布和研究状况最完备的一部著作，“亦足可称为中国敦煌学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指南书”。本书虽取名为“敦煌吐鲁番文献”，实则包括整个中国西北出土文献，对敦煌吐鲁番学、丝路学和中国西北文化研究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著作提要》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专刊第一种。本书的编撰目标是“在汉学的浩漫书海中，精选出一系列代表著作，综括介绍，借以勾画国际汉学的轮廓”。主编在序言中说：“我认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和其他种种学科一样，汉学也受着各时代思想的推动、制约，不了解这些思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便无法充分认识汉学不同流派的特点和意义。尤其要注意，汉学家的思想观点常与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即使是研究一位汉学家，甚至他的一种论著，也需要广博的知识和深入的分析。”

刘大年在《抗日战争研究》第 2 期发表《照唯物论思考》。

文章主要针对史学界在纠正过去那种一味抹杀国民党抗战作用的做法过程中新出现的在有关事件及人物评价问题上矫枉过正的问题展开论述。作者强调史学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认为“抗日战争的历史和整部中国历史一样必须成为科学的客观研究的对象，我们必须把抗日战争

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提高它的科学性”，“照唯物论思考问题”。文章论述了七个方面的问题：蒋介石何以转变抗日的问题，共产党斗争对蒋转变的作用问题，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目的问题，正面、敌后两个战场的地位问题，关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关于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两个任务，关于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说明了历史研究按照唯物论思考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针对蒋介石转变抗日不在“外因”，即不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潮流、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推动，而在“内因”，即在蒋所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民族主义思想、个性和权力欲望等这一观点，作者作了分析和驳斥。

陈支平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发表《推进区域社会经济史的比较研究》。

作者认为，在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孤立化和自夸化”倾向值得引起注意。所谓“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孤立化”，即是把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当作单纯的个案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研究的题目日益细小琐碎，埋头于“老鼠打洞”，而较少顾及于个案与个案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区域与整体之间的联系。其结果或是以偏概全，或是浮光掠影，没有特点。出现这种“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孤立化”的倾向，与目前的学术短期行为和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史概念的模糊认识有直接的联系。“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自夸化”倾向，是指一些地方史研究，或与地方上的乡族势力相关联，或与当前的地方经济建设直接挂钩，所谓“文化（包括历史）搭台，经济唱戏”，地方区域史的研究，被生硬地拉去为当前的经济建设服务。功利性目的过于强烈，不免失去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为了克服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这种倾向，作者认为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区域社会经济史的比较研究：第一，注重地区间的差别，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第二，注重阶段性的差异，进行同一地区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比较研究；第三，注重不同国家间的区域性比较研究。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唐宝林、郑师渠《共和与专制的较量》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国际甲骨学学术讨论会”在韩国汉城淑明女子大学召开。

中国学者裘锡圭、王宇信、蔡哲茂应邀出席会议。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从法律社会学入手，依据清代官府档案、民间契约和民国初期的司法调查等第一手材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对清代习惯法的渊源、背景、流变，以及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和习惯法研究在社会理论上的意义进行广泛地探研。

祁龙威在《中国文化》第13期发表《近世史家与考证学的发展》。

文章对自清以来尤其是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近世史学家对考证学的发展和贡献做了细致总结。

7 月

24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心和近代史研究所联合召开学术座谈会，批判“告别革命”论。

刘大年、李文海、汪敬虞、龚书铎、沙健孙、丁守和、耿云志、杨天石、刘吉、张海鹏、曾业英等参加会议。会议围绕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指导思想问题对“告别革命”论展开批驳。部分发言刊登在《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6 期上。

是月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被称为目前国内外最完善、最系统的中国移民史，论述了自先秦至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境内的移民过程，对其起因、迁移对象、迁移时间、迁入地、迁出地、迁移路线及方向、迁居过程和产生的影响等都做了详细说明，并依据大量资料做出定量分析和研究。

该书由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三人合作完成，共 260 万字，分 6 卷，第 1 卷为全书导论和大事年表。导论界定了移民的定义和全书的研究范围，确定了中国移民史的分期、移民的类型和特点，阐述中国移民史的定义，并介绍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大事年表列出了自公元前 21 世纪至 1949 年间可考的主要移民及有关大事。第 2 卷至第 6 卷分别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金元时期、明时期、清和民国时期的断代论述，各卷列有大量统计表格和地图，并附有后记，对相关的学术史和作者的研究方法做出简要说明。对于中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移民活动，该书不仅基本查清了史实，还对相关的历史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该书的撰写开始于 1989 年，中期成果《移民与中国》、《简明中国移民史》分别于 1992 年和 1993 年出版。

罗凤礼主编《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 20 世纪西方重要历史

学家及代表性流派，如克罗奇、柯林武德、马克斯·韦伯、弗洛伊德、汤因比、爱德华·卡尔、汤普森、法国年鉴学派等所秉持的历史思想、史学理论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评述。

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我国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代表作，主要探讨了汉唐长安城的地理尤其是水陆交通等问题，对重要文献如《水经注》等也有所考订。考证精详是该书最大的特点。

南炳文《明清史蠡测》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8月

27日 龚书铎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

该文主要对近代史研究中否定革命的思潮进行批驳，对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入侵、如何看待革命和改良、如何看待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等问题提出了与“否定派”针锋相对的意见，批评了史学界出现的“美化帝国主义的入侵、否定革命、颂扬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观点，并认为这种做法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的结果”。作者指出，在近些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受到了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冷遇或排斥，有的公开声称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作者认为，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完善的理论，只有运用它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历史，才能够把握本质，明辨是非，使历史得到最清楚、最全面的解释。

是月 史前城址与聚落考古学术研讨会在辽宁绥中召开。

李伯重在《读书》第8期发表《“资本主义萌芽情结”》。

文章说：直到今天，我们甚至连“资本主义萌芽到底是什么”还未完全弄清。没有弄清这一关键概念，自然也就无法正确地判断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无资本主义萌芽。在此情况下，“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命题，也只能说是一种尚待证实的假设。以假设作为基础的信念，当然也就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或一种情结。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该书于1977年在香港问世，广受海内外学者瞩目，被称为深入研究历史观念史的一部力作。为了说明正统观念的发生、衍化和争论的历史实相，著者纵观三千年，横比诸王朝。含通论13篇，考订或探讨的课题，

由各章细目所提示，累计有135个。每个都尽量引证原材料，说明问题的由来，异论的出现，在何时何地由什么人什么书提出或改变的，力求无一语无来历，同时又给出著者本人的历史判断，信以传信，疑以存疑。书中所论人与事各以数百计，但通论的全稿，仅有6万余字。堪称由博反约之范例。本书的编纂形式也独具一格。通论之后，详列参考资料，凡三篇，皆照录原文，注明出处，依时序排列，间附著者按语或同代学者意见，并限于材料本身的考辨。本书既被视为史学专著，又是史料汇编。论者认为，二者的有机结合如此紧密，以致倘作分割，则通论既失却支柱，资料也失却纲领。就三类资料本身而言，著者辑集的目的，显然不仅着眼于支持通论的历史陈述，更多地是为了提供历代正统论及其哲学理论和史学实践的历史证明，“以供同好进一步之论定”。这就使本书的结构，形成了主观与客观的奇特统一。通论和按语，重在表述著者本人的考辨或探讨的成果，而资料和附说，则重在提供有关正统论的系统史料。著者对资料及附说的见解，以及这些见解与历史实际的契合程度和时代影响，是同意还是反对，是肯定还是否定，是以为重要还是不那么重要，都不是抉择的尺度。如此将个人见解和相关材料，既无使混淆，又有机结合，在国内史学界属于罕见之例。

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瞿林东《杜佑评传——创典制通史，汇治国良模》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全面研究了宋朝社会各阶级的发展状况。分四编：第一编宋朝阶级结构综述，概述了唐宋阶级状况变动；第二、三、四编，即宋朝的农民阶级、宋朝地主阶级、宋朝非主体阶级，为全书的主干，分别介绍和论述了宋朝社会各个阶级以及阶级之间的变化。作者认为，从中唐至明清，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变化有两项：一是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农民与地主的身份差别有所缩小；二是雇佣制度逐步有所发展。

巫宝三主编《先秦经济思想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马大正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作者从1991年始在欧洲先后走访了荷兰、瑞典、丹麦、德国、奥地利、法国、比利时、英国、意大利、梵蒂冈主要图书馆和博物馆，查阅了上千幅中文地图，搜集整理了一批中文地图资料。本书是一部对所收录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给予说明的中、英文联合文献目录。内中收录1900年以前的古地图凡300幅。在书后附有常见明清地方行政建制名称英译、收藏单位名称与缩写、主要参考文献、索引及古地图复制照片32幅。书中将所收录古地图分为世界图、外国图、山脉图、河流湖泊图、海岸图、交通图、城市图、历史地图、天文星象图、中国全图、连省合图、地图集、地区图等11类，分类编排，同类地图按绘制时代先后排列。所收地图的著录项目有图名、作者、绘制时间、印制地、载体形态、制版类型、尺寸、比例尺、描述、收藏地、参考文献等，并由分类号、本目录的序列号和绘制年代组成编码。该书所著录地图的收藏地点、收藏号，以及已发表的研究该图的中外文参考文献，尤便于读者查阅和深入探索。

《法国汉学》丛书创刊。

第一辑由（法）龙巴尔、（中）李学勤主编，后改为《法国汉学》丛书编委会编。主要刊发法国汉学家及海内外汉学的研究著作。

陈支平《福建族谱》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该书出版后受到广泛重视和高度评价，被推许为研究毛泽东生平的权威之作。书中使用了大量鲜见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文稿、讲话和谈话记录以及中央会议记录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第一次披露；还使用了同毛泽东有直接接触的有关人员的回忆录，大多也是过去没有发表过的新资料。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于2003年出版。

刘大年《抗日战争时代》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作者晚年把研究视角投向抗日战争的历史研究。1982年，日本文部省规定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公然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教科书作者家永三郎教授起而抗议，状告日本政府文部省。这一事件引起了作者高度关注，并进而开始抗日战争的重大课题研究。该书收录作者从1987年到1996年所作有关抗日战争研究的13篇论文，其中包括《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照唯物论思考》等重要论文。

9月

4日 “中国近代（1840—1949）重大历史是非问题系列讲座”

在北京举办。

该系列讲座由国家教委高校社科中心、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历史学会联合组织，至本月25日结束，龚书铎、刘大年、沙健孙等八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作了学术报告。系列讲座的主旨是批评“告别革命”论。

17日　中国社会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区域社会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师范学院召开。

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共百余人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70多篇和社会史新著及刊物10余种。与会学者围绕“区域社会比较”这一主题，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和学识特点出发，就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是月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地全面介绍和评述西方20世纪史学理论发展史的专著，全书70余万字，视野宏阔。由何、陈两位主编执笔的“绪论”概要论述了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到分析的演进过程以及西方史学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嬗替轨迹。全书共20章，分别评析了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20世纪西方主要国家新史学派别及西方史学新分支学科（包括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心理史学、当代自然科学对史学的影响等），并对中国学者和苏联学者对西方史学的研究概况进行了综述。全书资料翔实，系统完备，内容丰富，被称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力作。

中华孔子学会编辑委员会组编《国学通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230多万字，分门别类地介绍了77种自古相传的学问，哲学类有易学、儒学、理学、心学乃至玄学等，宗教类有道教和佛学等，法学类有申韩学、唐律学、刑幕学等，文学类有诗经学、楚辞学、唐诗学、词学、曲学乃至红学等，其他还有史学、语言学、艺术学、谶纬学、堪舆学、内丹学、孙子兵学之类。凡能独立成“学”的传统文化和学问大体上都囊括在内。对每一种学问从其名目到内涵，从其形成的源头到发展演变及现状，都做了扼要而清晰的介绍。作者多为学养深厚之士，如写“尚书学”的刘起釪、写“春秋学”的沈玉成、写“甲骨学”的张永山、写“唐诗学”的陈伯海、写“杜诗学”的廖仲安、写“词学”的刘扬忠等。张岱年为该书写了序。

《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山东大学文史书系之一种，共收录作者生平所治之学的代表性论文16篇。这些论文充分展现了作者的学术风貌，既有宏观的理论探索，也有微观的考据研究，内容包括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等，《靖康、建炎间若干农民武装力量性质的分析》、《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等名篇皆收罗其中。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1907—1962）》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只收胡适本人的书信，共1644通（包括信函、电报和明信片），其中部分书信系首次刊出。

《胡适全集》编纂出版工作启动。

编纂工作由季羡林主持，确定了《胡适全集》一要全、二要真的编纂方针。全书约2000万字，共分44卷，不仅包含了胡适生前发表过的各种中英文著作、译文，还辑录了未刊稿以及大量的日记、书信，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03年完成出版。

赵世瑜《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由湖南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城市生活史，为湖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丛书之一种。书中以清朝的首都和一些大城市为中心，描述了城市中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对皇宫和狭巷陋舍、达官贵人和乞丐妓女、富商大贾和小贩货郎、面容迥异的海外来客和荷锄肩担的农业流民的生活都进行了细致的再现。

除本书外，该丛书还包括《消逝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城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等书，反映了史学界有关中国历代城市社会生活研究的整体水平。

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创刊。

该刊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社、“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编辑委员会联合编辑，每年一集。

（日）沟口雄三著、李甦平等译《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先秦史学会、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夏文化研究论集》

由中华书局出版。

张国刚主编《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多方面介绍了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主要综述了隋唐五代史研究中的政治事件与人物、典章制度、经济、社会生活、民族、中外关系、宗教、文化、文物考古、敦煌吐鲁番文书、史料、工具书与专著等方面的诸多内容。

李伯重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发表《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

本文对过往学界甚少注意的妇女劳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力图通过对明清江南农家男女劳动安排方式的讨论，着重了解江南农家妇女所从事的主要劳作的种类，及其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近五个世纪中是否发生过变化。

作者后又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发表《“男耕女织”与“妇女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对江南农家妇女劳动角色的变化背景和意义（特别是江南农家妇女劳动方式的变化所导致的她们在整个社会的生产劳动中所占的地位变化）进行了专门探讨。

10月

8日　第二次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在合肥召开。

会议主题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130人与会。论文结集为《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次会议的召开，是对中国史学界后备力量的一次检阅。

26日　全国吕振羽学术讨论会在湖南邵阳召开。

是月　桑兵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

作者认为，西学不仅刺激了国学研究的兴起，更制约着其发展趋向。经过近代国学研究，中国学术的形式与内容出现重大而明显的变化。形式上，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最终解体，受此制约的各学科分支按照现代西学分类相继独立，并建立了一些新的分支。内容上，在欧美日本汉学发展趋势的影响下，近代国学研究造成学术风格与重心的三方面转变：其一，发现资料由专注于文献转向趋重实物和实地发掘调查。其二，由专注于上层精英正统下移到民间地方社会。国学研究者改变传统的大小观

念，积极开展歌谣、风俗、方言的调查。其三，各学科的互动与整合实际上已经开始。

王金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主要内容有：秦汉时代的中国与日本，弥生时代日本人的信仰、习俗与中国，大陆文化与大和朝廷的内政建设，中国的天地观和祭祀制与日本的古坟文化，唐代政治、经济制度与奈良王朝，奈良王朝治政的理论支柱，古代中日法治思想及律令比较，唐文化与奈良文化。

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14万枚汉末至三国吴简牍，超过中国历年出土简牍数量的总和。

包括竹简、木简、木牍、封检等，内容丰富，涵盖了基层人民的社会生活、经济关系、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史料，考古价值十分重大，为存世匮乏的三国文献史料做了重要的补充，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这批简牍呈灰棕色或黄褐色，长短宽窄各异，字体工整有序，隶中带楷。每片字数多少不等，木牍每枚80至120字，竹简每枚30至40字，用途和形制大致可分为券书、司法文书、人名簿、名刺、官刺、账簿。

山东省青州龙兴寺出土大批佛教造像。

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数量最多的窖藏佛教造像群，共有北魏、东魏、北齐至隋、唐、北宋时期的石灰石、汉白玉、花岗岩、陶、铁、木及泥塑等各类佛教造像400余尊。其中最大的高320厘米，最小的仅高20厘米。造像雕刻技巧高超，包括浮雕、镂雕、线刻、贴金、彩绘等多种技法。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代表了自北魏至宋元时期中国佛教艺术的杰出成就，它的发现，为研究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及雕塑、绘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珍贵资料。

瞿林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

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展示了不同以往的视角，从广泛的文化史角度来研究教会大学，特别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教会大学。收章开沅的《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许苏民的《重新评估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马敏的《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徐以骅的《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王奇生的《教会大学与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史静寰和吴梓明的《教会大学与中国知识分子》等。

“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探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许纪霖在《战略与管理》第 5 期发表《文化认同的困境——90 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反西化思潮》。

作者认为，反西化思潮之所以引起知识界的轰动和海内外的广泛注意，与其说是知识意义上的，毋宁说是意识形态的。反西化思潮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或者说真正的精神旨趣，不是在学理层面上对西方文化的再认知，而是如何重建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语境下再度成为中国知识界普遍关注的精神焦点，成为知识分子从事知识再生产和社会模式再设计过程中无法绕开的内心焦虑。近年来在知识界进行的几场重要讨论，比如本土化与全球化、民族主义、后殖民文化和新保守主义等争论都无不缠绕着这一中心情结。

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对中国近代史学学术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意在辨析中国近代学术在中国古代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梳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线索。

全书共分四编，第一编“中国近代史学哲学”，第二编“中国近代史学方法”，第三编“中国近代史学成果”，第四编“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书中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与传统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探讨了传统哲学（主要是经学）所研究的问题。中国近代史学的哲学反思是通过晚清经学自身的反思而逐渐实现的。书中还介绍了中国近代史学所关注的具体学术问题，揭示了不同学术流派研究学术问题的不同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和成果也进行了探讨。

裘锡圭《文史丛稿——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11 月

10 日　周谷城逝世，终年 98 岁。

12 日　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20 日　国务院公布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 250 处。

是月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由上

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第一部归义军史的系统专著，由前言、正文十一章、附录论文一篇组成。作者走访伦敦、巴黎、列宁格勒、京都等海外敦煌文献收藏地，收集了大量已刊和未刊敦煌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并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归义军史的论文。在此基础上撰成本书，对归义军史做出系统的研究。本书以归义军政治史为主线，基本复原了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卒立世系和两百年间的主要政治事件，在归义军与东西回鹘的关系问题上，也花了较多的笔墨，并且探讨了归义军的佛教，及其与中原的文化交往等问题。除了传统史学所关注的政治史问题之外，本书在归义军的民俗文化，以及归义军与周边民族间的政治文化交往方面着眼较多。

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敦煌心史散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敦煌心史序记》一文为引论，收25篇论文，分“艺术篇”、“宗教篇”、“礼乐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敦煌艺术的丰富内涵。

徐宗勉等著《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海鹏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发表《“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

文章说：所谓告别革命，实际上是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社会主义，告别近代中国人民的全部革命传统。理论的错误，掩盖了现实目的的错误。既然做了人家的讲座教授、客座教授，总要为人家“分化”、“西化”出点主意，为人家的和平演变出点主意。和平演变，不就是不要剧烈手段么？发明出一个能够“解构”革命的理论，以便“消解”中国人的革命意识形态，便是最好的贡献了。这种“解构”革命的理论，与前几年苏联出现的攻击、歪曲十月革命历史的情形，何其相似。

李学勤《古文献丛论》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陈支平主编《福建宗教史》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陈启能、于沛、黄立茀《苏联史学理论》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第一部以苏联史学理论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著作，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后苏联在史学理论，特别是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进行了全面评价。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成立。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成立。

姚孝遂逝世，终年 70 岁。

王学典在《文史哲》第 6 期发表《中国当代史学思想的基本走向——就〈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答客问》，系统阐释“战时史学”观念。

作者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初步提出“战时史学”概念，此处对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补充。作者认为，20 世纪后半期的史学是一种脱胎于“战时史学”而又无法摆脱“战时史学”局限的史学。那种“把中国历史贯串在一条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主流上”的通史体系，那种认为学术要听从、服务于当时政治，那种以“阶级观点”为基础的“两军对垒”、“敌我分明”的两极化思维习惯的心理模式，是“战时史学”最明显的表现。

此文意在凸显过时了的史学体系与时代之间的脱节，推动史学研究范式的改变。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共 150 万字，分 3 卷，分别是《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宋元明清卷》，其中主编刘泽华和副主编葛荃、张分田撰写了全书的百分之八十内容。本书拓宽了研究对象，除含摄国家与法的理论外，还将政治哲学、社会模式理论、治国方略、政治道德、政治实施理论等一并列为研究对象，大大增加了以往为政治思想史所忽略的内容。如将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统治也纳入到研究中来，专辟“北魏统治集团治国思想的儒学化”、“辽、金、西夏的统治思想”、“元代‘用夏变夷’思潮与理学的官学化”等章节，系统地介绍了这些朝代的帝王观念、治国方略和政治文化，对其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充分肯定。本书还专辟章节，对佛教的政治思想及其对政治文化的影响做了系统的介绍。这也是其他政治思想史作者未能深入涉猎之处。

该书在体例上也作了新的探索，对思想史研究中常规的列传式研究进行了扬弃，使用了一个结构、体例更为严整的阐释体系。该体系突出了统治思想发展演变这一主线，强化了学术思潮和政治思潮研究，凸显了重大理论命题，并增设了普遍性政治观念综述，兼顾源与流、主与次、共性与个性、点与面，从总体上对于多层次多头绪的传统政治思想现象进行全面把握。

田昌五、漆侠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四卷本）由齐鲁书

社和台湾文津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

分为大陆简体字和台湾繁体字两种版本。全书包括总论和正文4卷9编56章，近220万言，将上起战国时期，下迄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态予以全线贯通、系统论述，是一部真正系统完整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通史。全书自成体系，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循环理论展开论述，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关系存在前后三次大循环运动：第一次自战国时期的提封授田制始，至晋代的占田课田制止；第二次自北魏的均田制始，至宋代土地私有制全面确立止；第三次自辽金元时期土地国有制的反潮始，至清代土地私有制再次全面确立止。每次大循环运动历时均约800年，共同表现出土地国有向土地私有不断转化的规律。而土地关系的这种运动规律以及三次运动所表现出的极其相似的特征，又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乃至思想文化、政治事件等方面的相应运动及其相似性，从而呈现出整个社会周期性循环发展的三次巨变。推动上述土地关系运动以及由这一运动所引发的社会运动的一个主要根源，则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工商业形态：中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主要由封建政府经营管理和操纵控制，民间私人工商业始终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无法正常发展，商业资本由于山林川泽归国家所有等原因也无法实现向产业资本的大量转化，大多转入土地买卖和高利贷资本。官私商业资本不断流向土地买卖和高利贷资本，其结果便推动了土地国有向土地私有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而引发出整个社会的层层巨变，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循环发展的特有规律。

杨念群在《清史研究》第4期发表《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该文分析了美国中国学思潮中的“世界观念”与国内史学的关系、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概念化”倾向、身处“后现代”思潮中的“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等问题，认为历史学的资治功能不仅应体现在对现代化运动提供历史的借鉴和说明，同时也应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现代性现象进行深刻地反省和批评，从而增强自身的反思能力。

张宪文主编《民国研究》创刊，第1辑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乔治忠、姜胜利编著《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治学术性、资料性、工具性于一炉，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地概述，比较详尽地论及了中国史学史的各种资料，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较好的参考书。

12 月

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中国社会通史著作，共 8 卷，分别是先秦卷（李瑞兰主编）、汉魏晋南北朝卷（曹文柱主编）、隋唐五代卷（徐庭云主编）、宋元卷（任崇岳主编）、明代卷（毛佩琦主编）、清前期卷（赵云田主编）、晚清卷（史革新主编）、民国卷（朱汉国主编），近 400 万字，完整论述了从先秦至 1949 年中国社会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本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该书自成体系，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新的探索。全书把社会史的演进分解为“社会存在前提”(包括社会存在时段、地理环境、人口、生产力)、“社会构造”(包括家庭与宗族、社区、民族、群体与组织、等级与阶级、文化构造)、“社会运行机制”(包括社会生活方式、社会控制、社会保障、社会激励)、“社会运行状态与社会变迁”(包括社会运行状态、社会问题、社会变迁）四个层面，并统一按照这个模式来展开论述，形成了区别于中国通史的中国社会史写作体系。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十卷，435 万余字。各卷作者多为本领域具代表性的专家，可谓极一时之选。第一卷：导论卷，白钢著；第二卷：先秦卷，王宇信、杨升南著；第三卷：秦汉卷，孟祥才著；第四卷：魏晋南北朝卷，黄惠贤著；第五卷：隋唐卷，俞鹿年著；第六卷：宋代卷，朱瑞熙著；第七卷：辽金西夏卷，李锡厚、白滨著；第八卷：元代卷，陈高华、史卫民著；第九卷：明代卷，杜婉言、方志远著；第十卷：清代卷，郭松义、李新达、杨珍著。

本书尝试以新体系撰写政治史，其内容及其总体结构，在前言中做了说明：“旨在突出对历代的皇帝制度、中央决策体制及政体运行机制的探索，并以此为轴心，铺陈各单项政治制度，力求能比较贴近政治学的规范；同时，要求在充分发挥各执笔专家的学术优势和广泛参考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开拓，争取在高起点上推进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此举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观念与模式，把政治制度史从陈旧的官制史窠臼中解脱出来。

本书的出版，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方面的进展。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研究中国史学思想的第一部通史性论著。作者对中国史学思想

史的发展历程作了考察，论述了中国史学思想发展不同阶段的历史特点。书中着重探讨了史学界长期讨论的一些热点问题或为人所忽略的重要问题，如从口述史事到记载历史，先秦诸子历史观点的争鸣，封建史学的二重性，史学和经学、玄学、理学、事功之学、经世之学、实学之间的关系，近代史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并突破以往史学史研究的局限，将学术视野扩展到了到更为开阔的文化领域，充分挖掘思想家、文学家乃至政治家的历史观和史学论。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由齐鲁书社出版。

该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续编，从开始编写到全部出版，历经七十多年坎坷方得完成，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大最详备的一部提要类型的工具书。

1925 年，日本政府仿照英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文化事业，与当时的段祺瑞执政府协商成立了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计划利用退还的庚子赔款续修《四库全书》，由总委员会下设的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主持进行。1928 年 1 月，人文科学研究所开始搜集书目，至 1931 年 6 月，共著录了 27000 多种古籍，编成《四库未收书分类目录》。1931 年 7 月开始撰写提要，一直持续到 1942 年 1 月。先后参加编纂的有来自经学、史学、哲学、文学、文献学、考古学、语言学等领域的 71 位学者，其中很多都是著名学者，如柯劭忞、罗振玉、杨树达、吴承仕、傅增湘、孙楷第、吴廷燮、向达、王重民、谢国桢、冯承钧、谭其骧、商鸿逵、罗福颐、傅振伦、刘节、胡玉缙、萧漳等。1942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财政拮据，无力继续退还庚子赔款，撰写提要的工作就此停止。10 年间共撰写了 32961 篇提要，其间曾有 10080 篇提要寄往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即今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征求意见。1949 年后，这批书稿辗转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1972 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部《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共 13 册，内有索引 1 册），底稿就是依据送往日本的那部分稿件整理的，篇幅仅是原稿的三分之一，且无法与原稿校对，舛误良多。1980 年 7 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古籍组开始对此宗提要进行整理。1982 年被国务院列为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重点项目。1992 年 6 月，《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再次被列入《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3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古籍组点校整理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下两册，共 240 余万字），内容仅包括原稿的“经部”。1996 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将整理的全部手稿及誊清稿交由齐鲁书社影印出版。包括正文 37 册，索引 1 册。全书共收

书 32960 种，1800 多万字，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 3 倍多。为保存原貌，除对个别地方做了一些技术上的处理外，不同人撰写的同一书的提要概予保留，稿本中的眉批、浮签也一仍其旧。由于原稿未加分类，仅按不同的作者分装成册，整理者编制了分类索引、书名索引和作者索引。分类索引按经、史、子、集、丛书、方志分为六部。其中小类基本上沿袭原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分类表，个别类目作了变通。既保存了稿本的原貌，又兼具分类目录的作用，便于查阅。

《续修提要》收录书籍的主要范围是：1.《四库全书总目》虽已收录，但篡改、删削过甚或版本不佳的书籍；2. 修改阮元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3.《四库全书总目》遗漏的书籍；4. 乾隆以后的著作和辑佚书籍；5. 禁毁书和佛、道藏中的重要书籍；6. 词曲、小说及方志等类书籍；7. 敦煌遗书；8. 外国人用汉文撰写的书籍。该书的编纂是 20 世纪 20、30 年代对中国存世典籍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清查，上补《四库全书总目》之遗，下续乾隆以降新出典籍之目，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具有重要的价值，堪称目录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胡如雷《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作者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研治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成果的结集，共收入论文二十篇。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关经济与财政方面的，计有九篇；第二类是有关农民战争方面的，计有四篇；第三类是从总体上考察隋唐五代史的，计有七篇。内容涉及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部门经济等隋唐史研究领域中的重大问题，其中不少论文如《唐代均田制研究》、《也谈“自田”兼论与唐代田制有关的一些问题》、《唐五代时期的“骄兵”与藩镇》、《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以及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材料写成的《唐代的飞钱》等都曾在史学界引起过较大的反响。

本书既有从理论高度对历史所做的宏观概括，又精于对史料的考证，对隋唐五代史各领域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秦晖在《战略与管理》第 6 期发表《科举官僚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兼论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根本差异》。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作者认为腐朽清王朝的覆灭，并没有使学术走向没落。晚清的学术，属于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发生近代意义交往以后的过程延续，呈现出一幅前

所未有的异彩。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王曾瑜《金朝军制》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首次对金代兵制的演变始末作了系统地梳理，资料丰富，线索清晰，对金朝中央军事机构和军区设置沿革，以及武装力量体制、军队编制、签军募兵制度、军事装备、后勤和军费、军法和军政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地研究，结构相当有条理，显示出作者对头绪纷繁的金朝兵制有一个很好的总体把握。

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胡厚宣《甲骨续存补编》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朱寰主编《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和比较亚欧四个主要封建国家中国、日本、英国、俄国的经济形态。作者采用了个案研究与综合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四国封建经济的九个重大问题进行了对比研究，包括土地国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产的经营、农民的身份、封建农民经济、农村公社、封建城市、中世纪的工商业和中世纪城市居民等，各为一章，每章分为五节，就中、日、英、俄顺序，对其有关问题分别进行个案研究，然后在第五节内对四国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得出必要的结论。既可使读者了解结论产生的历史根据，又可使读者根据各国的历史事实引出自己的结论。作者试图从发生学、类型学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历史上的经济形态，并把历史学研究与经济学、形态学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在观点上有诸多新意。

白钢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本文分1949年以前、1950年至1978年、1978年至20世纪末三个阶段回顾百年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提纲挈领地梳理了20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作者认为，20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相当一批论著，实际上是以官制史来代替政治制度史。由于对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缺乏深入的了解，没有能从政治学的角度，把它作为政治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学

科来规范它的研究对象与任务。新世纪政治制度史要开拓新领域，从政治学的角度，在深入研究历代政体结构的基础上，着力于政体机制方面的探索。

《陈旭麓文集》四卷本开始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一卷《近代史两种》，收入作者两本专著《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第二卷和第三卷《思辨留踪》，收入作者半个世纪以来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分为历史总论、学术专题、人物研究、史学理论与方法四类；第四卷《浮想偶存》，收入作者遗稿《浮想录》，以及序言、时论、书评、散文、诗词和书信等文字。

是年

《罗哲文长城文集》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该书辑录了作者四十多年间调查、研究长城所撰写的重要理论文章和考察报告 44 篇，是长城研究一部重要学术著作。

马承源主编大型系列图集《中国青铜器全集》开始由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

本书从海内外 190 家文物机构现存的数万件青铜器中遴选了从夏代迄秦汉的3000 件精品，按时代分地区（国别）编排。书前有总论，全面介绍中国青铜艺术发展的历史，每卷另有专论，对该卷所收录的青铜器进行系统地阐述。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一次最系统的整理，全面反映了中国青铜器的发展面貌。

国家文物局公布本年度十大考古发现。

重庆丰都烟墩堡遗址（旧石器时代）、河南孟津妯娌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新石器时代）、四川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新石器时代）、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周）、山东长清双乳山西汉济北王陵（西汉）、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纪年简牍（三国吴）、辽宁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地（3 世纪末到 4 世纪初）、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青海都兰吐蕃墓群的发掘（唐）、四川华蓥南宋安丙家族墓地（南宋）。

1997年

※ 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出版。
※ 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出版。
※ 顾诚《南明史》出版。
※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出版。
※ 瞿林东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开始出版。
※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开始出版。

1月

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发表《方法论问题》，批驳“告别革命”论。

文章从七个方面批驳“告别革命论”。作者认为：“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两件事，不能互相代替。民族独立不能代替近代化，近代化也不能代替民族独立。它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针对否定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观点，作者认为：“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那既是否定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统治下在黑暗深渊里下沉，也是否定经济基础变化、新的社会力量出现推动了中国开始朝着光明的前景行走。照那些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说法看来，中国近代110年的正反两面，实际上什么都不再剩下，只剩下了漆黑一团或者白茫茫一片。”针对新时期以来对阶级分析方法的抛弃，作者强调指出：“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分析的基本方法。讲近代史研究方法论，不可丢掉，或者所

谓‘淡化’这个基本方法。”在革命与改良的关系上，作者坚定地认为：“中国革命是中国历史的光荣，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妄自菲薄！一些论者反其道而行之，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及其代表人物的假丑恶，像变戏法一样，描绘成为真善美的化身，而对于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运动则说成是中国贫穷落后、黑暗纷乱的祸首与根源。它与学术研究不沾边，但确实是一种在讲历史的名义下制造的社会舆论。”

唐晓峰、李零主编《九州》第1辑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

李埏、武建国主编《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的专著，系统地论述了从西周到清朝数千年间土地国有制产生、发展、兴衰的演变历史，及各历史时期不同形态的特点，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及社会原因。论述的重点在于各朝代国有土地的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土地国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尤其在考察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二者之间的作用及其影响上着力最多。

“二十世纪国际汉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

谢贵安在《文献》第1期发表《明实录的版本与收藏》。

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实录》的版本作了系统论述，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作了补充和完善。

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在三次批驳“告别革命”座谈会和系列讲座的基础上编辑而成。书中收录了刘大年、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批判“告别革命”论的文章。编后记云：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有的论者打起反对“激进主义”的旗号，企图从根本上否定革命和革命的历史。苏联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更为我们提供了现实的教训。那里的一些人，为了搞垮社会主义，正是从歪曲、否定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开始的。

2001年8月，北京师大出版社又出版龚书铎、金冲及、宋小庆著《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争论》，再次对“文化保守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翻案风”进行批判。

陈支平《客家源流新论》由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论述了客家由南方各民族融合形成的历史过程，论证了客家血统与闽、粤、赣等省的其他非客家汉民血统的同一性，认为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千多年来大融合的结果。

2月

曹树基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

本文选择明代鼠疫的主要流行区——华北作为研究的对象，对鼠疫的发生、流行和社会影响作了全面的论述。作者认为，在以往有关明末历史的研究中，考虑最多的是政治斗争、阶级冲突和民族对抗。其实，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万历年间的华北鼠疫大流行使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崇祯鼠疫则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中加速了它的传播和扩散。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

严文明在《华夏考古》第1期发表《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

作者运用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对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认为虽然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都有一些事关文明起源的重大考古发现，但黄河流域在中国文明发生和早期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仍然是不能忽视的。

3月

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糖史》“国内编”，与“国际编”合成一部《糖史》。《糖史》的写作始于1981年，最终完成于1998年，为作者毕生用力最勤、篇幅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国内编；第二编为国际编；第三编为结束语，共计83万余字。作者自言：“我写《糖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该书用大量事实证明：糖和制糖术一千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与印度、东亚、南洋、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交流和传播，同时也在欧、非、美三大洲交流。该书还勾勒出了这些交流的路线，考证出了交流的年代、集散的口岸，以及由于交流，制糖术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糖的种类、品质也随之大大提高，逐渐形成我们今天常见的白砂糖、冰糖的整个历史过程。该书

还广泛介绍了过去很少有人知道的有关甘蔗和食糖的种种知识，如甘蔗的种类、名称、种植技术及其传播，糖的名称及其演变，糖的典故传说，糖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糖的产地分布和贩运、制造工艺等等。作者在写作中采用了最严格的考证方法，“言必有据，无征不信”，于材料上捃摭繁博，搜采宏富，除一切有关论文外，凡正史、杂史、辞书、类书、科技书、农书、炼糖专著、本草和医书、包括僧传及音义在内的佛典、敦煌卷子、诗文集、方志、笔记、中外游记、地理著作、私人日记、各种杂著、巴利文以及英、德等西文著作中有关内容，皆“竭泽而渔”。作者自述其写《糖史》搜集资料的情况时写道：“搜集资料，捷径是没有的，现有的引得之类，作用有限。将来有朝一日，把所有的古书都输入电脑，当然会方便得多。可是目前还做不到。我只有采用一个最原始、最笨、可又绝不可避免的办法，这就是找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读下去，像沙里淘金一样，搜寻有用的材料。我曾经从 1993 年至 1994 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中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书库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 10 行，20 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我的《糖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论述了禅宗思想在中国发展的漫长历程，在观点和结构上皆有创新。作者推翻旧说，创造性地提出了禅宗思想源于中国，即禅宗并非起源于达摩，而是源于老庄道家，是大众化的老庄哲学。本书相关论点引起了广泛注意，海外学者认为该书“关于禅的中国起源的论述极富挑战性，并且肯定有助于澄清许多关于佛教在东亚传播与中国文化碰撞而产生的误解”。

戴逸《繁露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刘爽《现代社会与历史认识系统结构》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孔子基金会编《中国儒学百科全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出版。

（德）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蒋大椿在《史学月刊》第3期发表《为建设而研究历史》。

文章说："为着更加切合当代的历史条件和更加突出有效地发挥史学的研究功能，我认为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应当为建设而研究历史。这并非是与戚本禹提出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简单的对立，而是更为确切地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对历史学提出的内在的客观要求，也是历史科学为满足时代要求健康而顺利地发展所需要的。"作者认为为建设而研究历史，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为全面深入地建设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而研究历史；第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体现代化提供历史的依据、经验和教训。

《史学月刊》第3期开设"20世纪中国史学笔谈"专栏，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

曹亦冰主编《中国当代古籍整理研究学者名录》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田居俭在《北京党史研究》第3期发表《党史研究者要关注社会史研究》。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重点考察了美国传教士来华传播西方文化和教育活动对晚清社会变革的影响，对鸦片战争时期的"开眼看世界"思潮、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近代新学的崛起和传统教育的改革等与美国传教士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述。作者对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给予客观的评价，认为他们对晚清中国现代化产生了既促进又误导的双重影响。

4月

20日　第十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海口市举行。

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东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理论问题"。

是月　郑异凡《布哈林论稿》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陈其泰《清代公羊学》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本书独辟蹊径，从学术史角度来考察公羊学在清代发展演变。作者认为，东汉末年郑玄遍注群经后，公羊学经历了千余年的消沉，至清代庄存与著《春秋正辞》、《春秋举例》、《春秋要旨》，掀起了清代公羊学的复兴。有清一代公羊学演进的历程是：庄存与、孔广森揭起清代公羊学复兴的序幕，刘逢禄、凌曙、陈立等张大旗帜，龚自珍、魏源代表着清代公羊学说的巨大飞跃，公羊学说成为维新运动的武器。

龚延明编撰《宋代官制辞典》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我国首部断代官制辞典。全书包含四个部分：一、宋代官制总论。阐述了两宋官制研究的资料及研究现状、宋代官制的阶段性发展与变化、宋代官僚机构的组成与分工，以及宋代官吏的管理制度等，起到全书导读作用。二、辞典正文。共收录宋代职官词条一万多条（包括职官术语五百余条）。按宋代官僚机构分门别类编排，而不是打乱按笔画编排。每一词条都包含该官司（或官名）的职源、沿革、职掌、官品、编制、简称与别名等诸义项。三、官制表格。配有官制表格59幅，包括宋代中央及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组织、官品、文武阶、勋级、爵级、俸禄表等。四、索引。有：（1）职官分类条目索引；（2）条目笔画索引；（3）职官术语与典故目录索引。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进行了深刻反省，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性格上所表现的一个最大的缺点是，在专制政治的长期压迫下，多数知识分子不但逐渐丧失了自信和自尊，而且同时还滋长了一种自疑和自罪的潜意识。

彭卫《穿越历史的丛林：史学论》由三联书店出版。

吴廷璆主编《日本近代化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5月

12日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召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学术讨论会”。

参加会议的有苏双碧、王思治、蒋大椿、刘桂生、宋德金、于沛、彭卫、龚书铎、瞿林东、吴怀祺、陈其泰等。会议主要讨论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问题，提出要理直气壮地肯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批评“战时史学”的提法。有论者认为，将三四十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为“战时史学”值得商榷。这种说法抹杀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业绩，否定了在时代推动下中国史学所达到的新阶段，不恰当地夸大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三四十代存在的缺点，是本末倒置，是对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治学方向的否定。

25日　罗尔纲逝世，终年96岁。

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广西蒙山举行。

31日　鸦片战争与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深圳举行。

是月　顾诚《南明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全书77万字，论述了从1644年（崇祯十七年）大顺军攻占北京直到1664年（康熙三年）夔东抗清基地倾覆的抗清运动的历史。本书区别于其他南明史专著，不以几个南明朱家朝廷的兴衰为中心，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郑成功队伍等民众的抗清斗争为主线，论述的时间范围突破了以往从弘光帝继统（1645年）至永历帝被俘杀（1662年）的局限，空间范围也从南方扩及到北方，使内容更加丰富而全面。该书史料丰富扎实，理论功底深厚，出版后立即在明清史学界引起关注，被誉为“把南明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代表南明史研究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张海鹏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期发表《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原则性争论》。

杨国桢等著《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由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以自创之“中国大历史”（macro－history）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历史进程。本书采取了类似于《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的方式，以纵横古今的气势，勾勒了从最初先民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历经孟子与秦始皇，再到第一帝国、长期的分裂、第二帝国、第三帝国，以及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包括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历史面貌。对于长期革命的分析，是该书的重点内容之一。作者交代，之所以用“中国大历史”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历史大势，是因为在过去的150年内，中国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的中世纪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十多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用寻常的尺度衡量。

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

同月，三联书店还出版了黄仁宇所作《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该书洋洋 40 万言，描述了资本主义 13—14 世纪从亚平宁半岛上的意大利威尼斯发端、沿着海岸线不断开展延伸、席卷全球的历程。作者将资本主义描述为一场经济、政治运动，其目的是建立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该经济组织的功能被定义为：在社会低层各种经济要素可以自由交换，在高层则达到数目字管理。各个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或民族，无论是采取和平还是暴力形式，其最终结果都是为了建立起这样的经济组织。

周銮书主编《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村落社会史，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叙述了流坑村的概貌、历史、建筑、艺术、重要人物、风俗民情和典籍碑铭等。

朱立元、陈光磊主编《汉学论丛》出版。

姜义华在《复旦学报》第 3 期发表《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评余英时〈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

该文对余英时刊于 1996 年 3 月 29 日台湾《中国时报》上的文章提出强烈质疑。针对余英时在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激进”论点，作者从四个方面同余氏进行商榷：一是“中国”这两个字的具体内容究竟清楚不清楚？二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民族—国家的认同方面究竟是否具有共识？三是近代以来是国际强权还是中国自身不让中国与其他国“平起平坐”？四是要求一个“强大的中国”就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挑衅”，就是“在中国制造出一个纳粹式的民族主义运动”吗？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逻辑？

张艳国《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6 月

11 日　季羡林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通史必须重写》。

作者认为：“中国在当时极左思想的指导下，颇写出了几本当时极为流行的《中国通史》，大中小学生学习的就是这样的历史。不管作者学问多大，名气多么高，在教条主义流行的年代，写出来的书绝对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有时是违反作者本意的产品。”

是月　肖黎主编《我的史学观》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辑录了三十余位历史学者对“史学是什么”的自我陈述，集中体现了当代历史学者多元化的史学观念。有论者认为，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史学界同仁已开始思考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标志着史学家们在力图开展一些独创性的工作，预示着历史学研究个性化和多元性时代的到来”。

李振宏、孙英民《居延汉简人名编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汉简编年长期令人困惑而不得解决，大多数残简没有具体纪年，也给研究者带来不少障碍。本书试图解决这一难题。书中共考证出有确切年代的各类戍边人员1400余名，以及相关的简文数千枚，使很多残简有了确切可信的年代，为以人系年研究简牍做了有益的尝试。

唐力行《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章伯锋等著《抗日战争》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共35万字。作者采用了把思想史与社会史加以沟通的方法，通过地域化来解释近代湖湘、岭南、江浙三大儒学区域知识群体的形成、互动及其与近代三大社会变革——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新文化运动的复杂关系，出版后反响不一。

栾丰实《海岱地区考古研究》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作者对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方面系统研究的综合，分为五个部分，分别论述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作者对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基本问题，诸如分期、年代、类型、分布区的扩展、与周边地区不同谱系文化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为海岱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提供了支持。本书提出了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一系列新见解，如关于后李文化的发展去向、北辛文化的来源及与其他同期文化的年代对应关系、大汶口文化的彩陶源流、良渚文化的年代、王油坊类型的文化性质、岳石文化与商文化来源的关系、辽东半岛地区原始文化的文化性质等。

周晓虹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试论社会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该文主要探讨了社会史这一学科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史与文化史、社会史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社会史与人类学的关系。

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邓广铭治史丛稿》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北大名家名著文丛”之一种，共收入学术论文48篇。

“20世纪国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收录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王国维论学集》以及陈引驰编校《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等著作。

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由齐鲁书社出版。

全书共分七章，全面介绍了两汉时期乡村的生产环境与农业状况、土地制度与生产经营、社会分野与农民命运，以及宗教、婚姻与家庭、民间信仰与乡村神祇崇拜、民谣民谚与乡村风情等。作者意在全面检讨汉代农民的生存状态，既包括农民的肉体生存状态，亦包括农民的精神生存状态。从最外在的、边缘的东西写起，层层推进，状如剥笋，最后直达农民的心理内核，是本书结构上的特点。

陈尚胜《“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海外交通史研究的一部力作。作者通过对明代海外交通重要事件的系统研究，揭示出明代中国海洋事业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在于明朝政府所采取的“怀夷”与“抑商”的海外贸易政策。所谓“怀夷”就是按“怀柔远人”的方针来优惠外国商人的来华贸易；所谓“抑商”，就是用禁止或压制的办法来对待本国商民的出海贸易，此举造成中外商人在航海业和国际贸易上的不公平竞争，导致了明代中国海洋力量的衰落。作者试图阐明，在15世纪以后，如何扶植本国商人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已是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因素。

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改变以往专注于一人一书的研究视角，将清人对明史的记述与研究作为一个整体范畴，探究其发展变化的历程及其社会背景，分析其表述形式和有关史料考察的理论、方法及其成果，研究其对于明代历史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及其所反映出的一些历史观念。力求通过这些研究，窥见清人明史学的特征及其优劣得失，以增进对整个清代史学的认识。

7月

3日　纪念七七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是月　(英)罗德里克·弗拉德著、王小宽译《计量史学方法导论》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吴怀祺《郑樵评传——融会百家　贯通古今》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魏宏运《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8月

19日　"唯物史观与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科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山东桓台中国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近百名海内外知名学者出席。

30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科院联合举办的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是月　林甘泉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

在谈到马克思史学的主流地位时,作者指出,这些年来愿意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削弱。有的人对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学术遗产推崇备至,顶礼膜拜,而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则妄加菲薄,肆意贬低,这种现象显然是很不正常的。认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才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建设做出有益贡献,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成就甚少,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建设并没有起什么积极作用,这种论调最初是从海外一些学者那里鼓吹起来的。但这些年我们这里的知识界也颇有些人表示认同,加以呼应。有的人对一部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连皮毛也知之甚少,就鹦鹉学舌,跟着鼓噪。

张海鹏、陈祖武、于沛、王世民、马大正、王正等参加了本文的撰写。

王戎笙主编《清代简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首倡“比较考古学”，将考古学的比较研究分为这样五个层次：1. 中原地区各文化的比较研究；2. 中原文化与边远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3. 中国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的比较；4. 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诸文化的比较；5. 各古代文明之间的比较。全书收比较考古学论文 20 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进行研讨分析，特别注意各个地区、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以及中外文化之间的影响、传播等问题。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曲阜周代墓葬的两个类型》、《规矩镜、日晷、博局》、《三星堆与大洋洲》、《中国铜镜的起源及传播》、《虎噬鹿器座与有翼神兽》、《印第安人的饕餮纹》、《古埃及与中国文字的起源》等。

罗荣渠《美洲史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选录了作者 1962 年以来有关美国史、拉丁美洲史、中美关系史、中国拉丁美洲关系史方面的论文 24 篇。包括《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论美国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历史联系》等。

杨玉圣在该书编后记中说：“在我国学术界，能够真正打通美国史与拉美史、兼治中国—美国关系史与中国—拉美关系史、特别是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问题上成就超群卓著者，罗荣渠先生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人，而且很可能也是迄今唯一的人。”

宁可、郝春文编辑《敦煌社邑文书辑校》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突破旧框架，大量借鉴了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及文化理论方面的最新成果，以宽阔的历史视野对德意志的历史发展做出了新的解释。书中对传统与现代的“重叠发展论”、现代化进程的“一次性理论”、现代化发展的“配套理论”、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理论、“科教兴国”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理论、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的关系理论、外来现代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的冲突理论、传统专制独裁与现代法西斯极权独裁的区别与联系理论、纳粹运动激进的反现代主义目标与现代化手段的矛盾关系理论、一国发展与世界格局的关系理论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阐述。在一些前人未涉及的领域里，有较大突破。

李伯重在《中国农史》第 3 期发表《宋末至明初江南人口与耕地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一》。

本文是作者“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系列论文中之第一篇，对该时期江南农业生产中人口、耕地、技术、农民经营方式进行了探讨，对以往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十三、十四世纪江南社会经济发展“转折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其后，作者又在《中国农史》上发表了《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二》、《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三》、《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变化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四》等文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专刊之一种，对外国现代部分著名汉学家所开拓的汉学研究新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研究方法上的突破进行了论述评价，大体勾勒了国际汉学研究的基本风貌。

孔繁今主编大型文集《读中国》由泰山出版社出版。

该文集精选了在不同历史阶段特别是重要历史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哲学、文学等方面的代表作，目的在于简明反映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特色性内涵和独特规约。

9月

钱乘旦、杨豫、陈晓律《世界现代化进程》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中总结出世界各国工业化存在的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以英、法、美等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模式，其特点是经济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中运行，国家在经济活动中仅仅充当监护人的角色；第二种是以俾斯麦当政时德意志帝国为代表的“统制主义”模式，其特点是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指导甚至是推动作用，但经济规律仍旧发挥作用，市场调节明显；第三种是以原苏联，尤其是以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模式，其特点是国家直接而全面地干预经济生活，是经济活动的实际操作者而非监护人，市场机制几乎不发挥作用。作者指出，三种模式都能使一个国家走向工业化，完成经济转型，不过三种模式均有利弊，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工业化道路选择上，充分了解各种工业化模式的利弊，吸取工业化先行者的经验教训，显得非常必要。

《中国学研究》创刊。

该刊由复旦大学汉学研究室吴兆路、韩国学者林俊相、日本学者甲斐胜二共同主编，内容涉及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和宗教学等。

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编《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由中华书局出版。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刚获恢复的国家档案局就在大陆范围内调查家谱的收藏状况。1983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对北京地区重要图书馆中家谱收藏情况进行了调查。1984年11月20日，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文管会、档案局、北京图书馆、各高等院校《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家档案局、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通力合作，开始联手编制一部能够反映当时海内外家谱收藏状况的大型联合目录《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历时十多年，终告完成。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家谱综合目录，收录了1949年以前编纂的大陆与台、港、澳地区（不包括海外其他地区）华人家谱14719部，所有家谱均按谱主姓氏笔画为序排列，同一姓氏，再按各家族居住地排列，书后附有地区索引和报送目录单位索引。该书的出版对家谱学、宗族学研究意义重大。

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由中华书局出版。

全书共分十四章。前四章为综论，论述了中国近代文化的特征、发展变化、中西文化的论争，以及“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等问题。后十章是对具体文化领域的个别阐述，包括社会思潮、儒学、史学、新兴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教育、自然科学技术、宗教、社会习俗及文化事业和团体等方面。

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赵俪生主编《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六个专题揭示了汉朝、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朝、清朝西北屯田的历史情况，在广采博征的基础之上，重点论述了每一历史时期西北屯田产生的原因、状况、特点以及历史作用，勾勒出中国历代西北屯田的清晰线索和面貌。

周振鹤主编《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语言文化区”、“宗教文化区”、“风俗文化区”、“人物地理”、“文化重心区”和“区域文化地理”六编，被称为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代表作。

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由中华书局出版。

汪晖在《天涯》第5期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点燃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战的导火索。

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有汪晖、甘阳、崔之元、韩毓海等，自由派方面有秦晖、朱学勤、刘军宁、徐友渔、汪丁丁、任剑涛等。论战的高潮集中在1998—1999年，争论主要围绕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原因的分析、对全球化和加入WTO的态度、如何认识判断中国的国情、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对80年代新启蒙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判、对现代化或现代性的态度等问题展开，争执的焦点归结为社会平等与社会公正问题。

这场论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最大的一场争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阵营。

10月

桑兵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

作者认为，伯希和与为数众多的中国几代主流学者的交往，很大程度反映甚至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国际汉学正统与中国国学主流的相互交汇，不仅推动欧美汉学界加深了解认识中国学术文化及学者，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全面了解伯希和与中国学者的关系，可以深入认识近代中国学术承先启后的渊源流派，区分变化发展的轨迹路径，进而把握未来走向的大道与歧途。作者认为，通过伯氏，中国学者发轫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预此国际化学术领域之胜流，而且得以直接与西方主流汉学家接触。文章通过伯希和对陈垣、傅斯年、胡适、陈寅恪等人的具体影响，细致分析了伯希和对民国考据学风的导引作用。

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为传主学生和学术助手，在师从谭氏的十多年间，收集了传主大量文稿和有关资料，为该书的写作提供了基础。该书内容涉及传主一生各个方面，包括家世和童年、短暂的革命和大学生活、“应列第一”的燕大研究院毕业生、登上大学讲台、编《禹贡》始末、失望的婚姻、复员杭州、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从思想改造到肃反运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

集》等章节。作者在撰写过程中，遵照传主嘱托，努力做到完全尊重历史事实，做到实事求是。

2000 年 2 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作者所作《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许明龙、马胜利译《蒙塔尤：1294—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1 月

29 日 “20 世纪中国社会史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西南师范大学举行。

严文明《走向 21 世纪的考古学》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王学典在《文史哲》第 6 期发表《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

该文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演变线索作出判断，认为百年中国史学史，就是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史。史料考订派在 1949 年前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居于正统地位、主流地位，史观派则被边缘化，但随着 1949 年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的到来，史观派从边缘进入中心，从异端变为正统，史料考订派则被放逐到边缘，到 1958 年的“史学革命”，史料考订派从整体上被打翻在地。但史料考订派并未从此销声匿迹，60 年代初，史料考订派提出了“论从史出”，为自己的存在辩护；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当史观派因“影射史学”而发生信誉危机时，史料考订派则进而倡导“回到乾嘉去”。90 年代以来，随着对王国维、陈垣、顾颉刚特别是陈寅恪等史学大师的纪念活动愈演愈烈，史料考订派向中心大步复归，这标志着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文章还对史料派与史观派的治学特点、学术取向以及各自的局限进行论述。

罗志田在《中国社会科学》第 6 期发表《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与对策》。

《吴廷璆史学论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吴怀祺在《南开学报》第 6 期发表《易学与中国史学》。

文章认为，在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几个重要关节点上，易学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古代史学中，先秦史官的殷鉴思想、司马迁的见盛观衰论、

欧阳修的历史变革主张、王夫之的历史兴亡观以及章学诚的史学更革说，都与《周易》的通变思想密切相关。近代学者剥去了《周易》的神秘外衣，以人世历史的事实解释《周易》，其中郭沫若的《周易》研究成就十分突出。

12 月

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分“农业”、“城市”、“封建政权”、“社会”四编，以广阔的视野比较、论述了中西在农业耕作制度、封建地产的经营和演变，以及封建城市的形态结构、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政治制度的特点、中西封建社会中人口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多个方面的异同。前言中说：“我们的比较和西方学者的比较颇有不同，即我们既不是拿近代的社会和古代的社会相比较，也不是拿西方的封建社会来看中国的封建和它相同或不同，而是通过分析这两者结构方面的同和异，来研究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在比较中国和西方封建社会时，还要有一个全世界的封建社会作为基础来考虑，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一些值得研究的结论。”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顾颉刚传记，作者为顾氏长女。书中援引大量传主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第一手材料，从顾颉刚的家世和幼年记起，细致地记叙了顾氏一生勤奋严谨的治学经历和坎坷多变的生命历程，对研究顾颉刚的学术思想、治学理念以及学术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书中对顾氏与鲁迅之间积怨的原委多有披露，出版后引起较大争议。

李学勤著、傅杰编《失落的文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粹集了作者在多个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共190节，按内容分为理论与方法、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等五个方面。

理论与方法部分包括作者的治学经验、“走出疑古时代”的方向指针、文明起源标准、如何认识宗教与神话等内容；古文字学部分是对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和简帛的论述，基本概括了中国文字的源流演变；考古学部分提出了比较考古学研究、文物与文献的关系等方法论方面的探讨，也介绍和探讨了各地出土的中国古代文物，尤其注意研究中原与边远地区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早期文化交流；历史学部分主要对周秦变革、古代礼制、古代姓氏、学术源流等进行了探讨；文献学部分主要论述了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对先秦文献及部分后世研释古籍的著作进行了评析。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由王震中、罗琨、王宇信、杨升南、宋镇豪五位学者分别撰写，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途径的思考”、“五帝与文明初曙的英雄时代”两篇，下编有“夏朝与夏国家形态”、“商朝的建立与商国家形态的发展”、“‘肇彻周邦’——周的建国及华夏国家的形成”三篇。该书根据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材料，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及其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看法，在理论上实现了若干突破。作者独辟蹊径，以由村落到国家的运动轨迹为主线，系统地论述了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的过程，将这一过程概括为三个大的阶段，即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这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研究中是一条全新之路。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社会史的视角来研究制度史，通过明初制定的里甲制与赋役制度在一个地区实际施行的情况，以及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发生的演变，考察王朝制度与现实的社会变迁、经济发展、文化演变过程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的关系。作者所关心的问题，始终是制度演变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对话和互动过程，弄清里甲赋役制度在规范地方社会秩序和社会组织时起着什么作用，它又是依赖什么社会资源得以有效运作，里甲体制下社会秩序的紊乱如何导致里甲体制陷入危机，在严重的社会压力下赋役制度的变革如何与里甲体制性质的根本改变相配合。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祖德、陈启能主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下册1999年1月出版。

本书以较多的篇幅阐述了阿拉伯民族从游牧民族发展到强大的民族国家，建立东起中国边外、西达大西洋岸、横跨三大洲的阿拉伯伊斯兰大帝国的全过程。除介绍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的发展外，以较大的篇幅阐述了其他同类著作涉及不多，或根本未加涉及的阿拉

伯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

钱文忠编《陈寅恪印象》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张希清等著《宋朝典制》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由三联书店出版。

漆侠主编《中国改革史》（一卷本）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蓬莱阁丛书”开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出版说明云：“中国传统学术，经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不仅擘画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义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下的心态，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相信这一设计，会比单出原著，或笼统抽绎当时学风特点，来得更切近可靠。原著是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导读为鞭辟入里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所选书籍包括：《文心雕龙札记》（黄侃撰、周勋初导读）、《唐诗杂论》（闻一多撰、傅璇琮导读）、《诗论》（朱光潜撰、朱立元导读）、《人间词话》（王国维撰、黄霖导读）、《中国小说史略》（鲁迅撰、郭豫适导读）、《宋元戏曲史》（王国维撰、叶长海导读）、《顾曲麈谈·中国戏曲概论》（吴梅撰、江巨荣导读）、《中国戏剧史》（徐慕云撰、躲斋导读）、《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刘师培撰、程千帆导读）、《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陈子展撰、徐志啸导读）、《白话文学史》（胡适撰、骆玉明导读）、《中国韵文史》（龙榆生撰、钱鸿瑛导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朱东润撰、章培恒导读）、《春秋史》（童书业撰、童教英导读）、《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附《中国辨伪史略》，顾颉刚撰、王煦华导读）、《汉代婚丧礼俗考》（杨树达撰、王子今导读）、《魏晋风度及其他》（鲁迅撰、吴中杰导读）、《魏晋思想论》（刘大杰撰、林东海导读）、《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撰、汤一介导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撰、唐振常导读）、《元西域人华化考》（陈垣撰、陈智超导读）、《明史讲义》（孟森撰、商传导读）、《清史大纲》（萧一山撰、杜家骥导读）、《中国近代史》（蒋廷黻撰、沈渭滨导读）、《中国史纲》（张荫麟

撰、王家范导读)、《当代中国史学》(顾颉刚撰、王晴佳导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撰、汤志钧导读)、《校史随笔》(张元济撰、张树年、张人凤导读)、《简牍检署考校注》(王国维著、胡平生、马月华校注)、《中国文献学》(张舜徽撰、姚伟钧导读)、《中国文献学概要》(郑鹤声、郑鹤春撰、郑一奇导读)、《周易古史观》(胡朴安撰、吕绍纲导读)、《大同书》(康有为撰、汤志钧导读)、《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撰、夏晓虹导读)、《国学概论》(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汤志钧导读)、《国故论衡》(章太炎撰、陈平原导读)、《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撰、耿云志等导读)、《经典常谈》(朱自清撰、钱伯城导读)、《中国思想小史》(常乃悳撰、葛兆光导读)、《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郭湛波撰、高瑞泉导读)、《中国佛教史》(蒋维乔著、邓子美导读)、《佛学研究十八篇》(梁启超撰、陈士强导读)、《道教史》(许地山撰、刘仲宇导读)、《中国基督教史纲》(王治心著、徐以骅导读)、《中国目录学史》(姚名达撰、严佐之导读)、《书目答问补正》(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徐鹏导读)、《中国文字学》(唐兰著、傅根清导读)、《中国画学全史》(郑午昌撰、陈佩秋导读)、《中国绘画变迁史纲·附中国美术年表》(傅抱石撰、承名世导读)、《西洋美术史》(丰子恺撰、丰一吟导读)、《西洋文化史纲要》(雷海宗撰、王敦书导读)、《中国南洋交通史》(冯承钧撰、谢方导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章太炎、刘师培等撰、罗志田导读、徐亮工编校)等。

是年

瞿林东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开始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丛书共收录33位已故史学家57种著作，共1500余万字，历时五年才告完成。所选书目，皆为20世纪中国史学最具代表性作品。戴逸为该套丛书撰写了"总序"，对20世纪中国史学作了系统回顾。每部作品都冠以有关专家和学者执笔的前言，对作者及其著作予以简要评价。"总序"和"前言"汇编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所选作品包括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陈垣《明季滇黔佛教》、周谷城《世界通史》、陈梦家《尚书通论(外二种)》、岑仲勉《隋唐史》、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外一种)》、李守常《史学要论》、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韩儒林《穹庐集》、

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尚钺《中国历史纲要》、齐思和《中国史探研》、金毓黻《中国史学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李济《安阳》、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谭其骧《长水粹编》、王国维《观堂集林》、顾颉刚《古史辨自序》、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外一种）》、夏鼐《考古学论文集（外一种）》、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外一种）》、吴晗《朱元璋传》。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开始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项目启动于 1990 年 6 月，遴选清末民初以还中国现代学者有代表性且具经典意义之著作，重新进行整理校订。凡 35 卷，3000 万字。入选之 20 世纪的大师级学者包括严复、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梁漱溟、廖平、黄侃、刘师培、钱宾四、李济、陈垣、熊十力、马一浮、萧公权、冯友兰、金岳霖、顾颉刚、余嘉锡、洪业、杨联陞、杨文会、欧阳渐、太虚、汤用彤、傅斯年、董作宾、鲁迅、郭沫若、唐君毅等 45 家。

刘梦溪为该丛书所写序言在国内外产生很大了影响。该序煌煌六万言，以《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为题用四个整版的篇幅连载于 1996 年 12 月 18 日、25 日的《中华读书报》上。该文主要探讨了晚清以来近现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特征，并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源流及其嬗变过程进行了追溯。作者以阮元“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破题，对 20 世纪中国的学术版图进行了重新描绘，甲骨学和敦煌学、经今古文学、史学与哲学、新儒学和新佛学等构成了百年学术的主干，王国维、陈寅恪成为至高无上的中心人物，胡适、梁启超、郭沫若等退居末席。

刘文发表后引起一些争论，李慎之在《开放时代》1998 年第 5 期发表《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对刘文提出批评。李文认为，该丛书“定名为《现代国学大师丛书》或《中国传统学术的当代大师丛书》”更合适，“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纵使把这一部几千万言的大书改名为《现代文史哲经典》也不知为什么竟不收中国学术（哪怕只是文史哲）转型期间，旋乾转坤，承先启后的谭嗣同、孙中山、陈独秀这几位顶天立地的人物”。“一百多年来，传统学术当然会有复辟，如袁世凯之建立孔教会；也有反省，如台湾新儒学之力求‘返本开新’；也有‘转进’，如‘文化大革命’之名为革命，其实更严重的是其‘复旧’的一面……种种情况，不一而足，而真正的新学还没有能茁壮成长。”李文断言：“民主与科学，

这就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变为现代学术的必要条件。”

复旦大学举办学术沙龙，讨论“历史研究与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讨论的内容涉及到：制止破坏、有效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的迫切性、以“可持续发展观”指导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历史研究与历史文化资源的新认知等。部分学者的发言发表于《复旦学报》1997 年第 4 期。

国家文物局公布本年度十大考古发现。

陕西洛南盆地旧石器地点群（旧石器时代）、山东章丘西河遗址（新石器时代）、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新石器时代）、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文化城墙及汤家岗文化水稻田（新石器时代）、香港东湾仔北遗址（新石器时代）、河南偃师商城小城（夏代至商代）、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郑国祭祀遗址（春秋）、辽宁绥中石碑地遗址（秦代至西汉）、广东广州南越国御苑遗迹（汉代）、新疆尉犁营盘汉晋墓地（汉代至晋代）。

1998年

※《胡绳全书》出版。
※ 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1卷出版。
※ 萧克主持编纂《中华文化通志》出版。
※ 西沙水下考古工作队对西沙群岛水下文物进行抢救发掘。
※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出版。
※ 戴逸发表《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
※“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设立。

1月

20日 《光明日报·史林》刊登《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座谈纪要。

27日连载。座谈会由《史林》专刊主编马宝珠主持，参加讨论的学者有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克垚（北京大学教授）、苏双碧（《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高级编辑）、肖黎（《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与会学者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文章共分六个部分：一、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就与特点；二、历程与趋势；三、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与继承；四、对外国史学的吸收与借鉴；五、经验与教训；六、新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与学风的改进。

是月 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由改革出版社出版。

编者言：“本书汇集国内实力派史学专家和研究者的最新成果，对建国以前100多年的重大历史事件、著名历史人物、特别社会专题、主要思想观念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地重新认识和讨论争鸣；并以立足今天和关注现实的立场，客观公正地审视和反思了虽然已经过去但其惯性依然影

响至今的很多历史疑案、思想误区、'教科书'式的僵化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解放思想的重要收获。"

该书汇集了新时期以来对旧有近代史研究框架进行反思和重构思潮中的新主张，因此也被看作是"集中反映否定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观点的著作"。

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收录作者写于1958年至1990年期间的史前考古论文40篇，主要探讨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谱系、聚落形态演变、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历史、地区性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性质、中国农业养畜业的起源及东夷文化等问题。

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

该书汇集了作者已发表的多篇论文，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进行了考察，梳理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来龙去脉，揭示了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之间的互动轨迹，恢复了民族主义在历史语境中的本来面目。全书分三篇，上篇"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本土思想资源"考辨早期夷夏之分观念的形成，重点考察此一观念在清代的演变以及清代人认知中的夷夏观念；中篇探究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的关系；下篇以胡适为个案勾勒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

该书使得长期以来含混不清的民族主义概念得到澄清。

黄兴涛、杨念群主编"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由时事出版社出版。

罗志田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发表《"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

该文从学术演变的内在理路考察民初考据史学在"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而走向"今日史学"这一新认同的过程中一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面相，兼及民初考据史学与清代"汉学"和"宋学"的某些内在关联，特别侧重探究道咸以降的"新宋学"对民初考据史学的影响，作者认为这些影响的痕迹甚至在今日史学中仍依稀可见。

2月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选择以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的社会与文化为背景，通过对以章太

炎、胡适之为代表的“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的文化理想、学术思路、治学方法以及文化心态的描述，展现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复杂性，揭示、发掘各种被压抑、被埋没的声音，挑战以“西学东渐”为代表的“现代化叙事”。

书中用主要篇幅来辨析现代学术格局的建立，以及中国学人政治意识、学术品位、思维方式的转变，认为“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这四对矛盾，不仅仅纠缠着具体的学者章太炎与胡适之，更是现代中国学者都必须面临的艰难抉择。书中还着重探讨了现代中国学者的心态、文体感以及自我表述，目的是由内及外地展现现代中国学者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并由此展示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趋向。

本书反映了作者继承学术传统和革新学术范式的自觉，在写法上，贯彻了“法从例出”、尊重对象、致力于展现事物的具体性与复杂性的论述策略，行文兼及考据与思辨，所论者小，所见者大，改变了以往追求通史或教科书式“面面俱到”的论述方式。

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由知识出版社出版。

本书主要研究江南农村地区市镇在近代（1840—1949）时期的变迁问题。在研究中比较多地借用了现代化理论。论者认为，本书的最大成功在于在设定的理论框架中成功地进行了大量精彩的实证研究。

陈支平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发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理论的重新思考》。

文中对用“封建社会”这一舶来名词来概括中国二千年来的古代社会提出质疑。作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农业古国，自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西欧的历史发展规律，只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不能把中国的历史与西欧的历史一个个地对号入座，如果完全套用西欧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研究中国历史，就难免出现“削足适履”的窘境，这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研究历史必须从事实出发的唯物史观的。

王家范在《史林》第1期发表《关于社会历史认识的若干思考》。

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为陈寅恪弟子。与学界普遍认为陈氏之学渊源于乾嘉的看法不

同，作者断定陈氏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考据之学”，认为陈学“主要渊源于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宋贤史学。”

书中刻意推高对陈氏的评价，认为“宋代史学”为“千古罕匹”，而“千余年后，陈寅恪继承总结宋贤史学，而又发展之，开辟了华夏民族史学的新时代”，并认为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能在华夏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史学史中占有特殊崇高地位，预言“今后实现民族学术独立者，唯有振兴宋学”，而“振兴宋学，必须以寅恪先生之学为根柢”。

《中国军事通史》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上起原始社会末期，下迄辛亥革命，按照历代王朝顺序，共17卷20册，总计约800万字，并配有500余幅图片、插图和作战示意图，记述和评析了中国历代军制、重要战争、武器装备、军事地理、军事后勤、军事思想、军事人物等有关内容。

孙家洲、李宜春在《中国史研究》第1期发表《西汉矫制考论》。

该文把“矫制”作为汉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重大问题来予以专门研究，对西汉矫制事件作了考实，并对西汉严惩矫制的立法及其变通措施、矫制行为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对矫制立功者的贬抑及其原因作了辨析。

3月

李根蟠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发表《中国小农经济的起源及其早期形态》。

严耕望《治史三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作者所著《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书的合订本。《治史经验谈》谈了九个问题：“原则性的基本方法”、“几条具体规律”、“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与改订”、“努力途径与工作要诀”、“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治史答问》则谈了二十一个问题。三书所谈被视为治史者之金科玉律，出版后影响巨大。

张传玺《翦伯赞传》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长期担任传主的学术助手，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全书详细地介绍了翦伯赞充满传奇的一生，为研究翦伯赞的史学思想乃至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孙达人在《浙江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史学的宗旨：把历史变

成国民的精神财富》。

本文的主旨是阐述史学究竟何以应该并怎样才能实现把历史变成大众的精神财富。文章从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没有传人的事实出发，着重反省了我国史学现状中的问题，剖析了史学在向现代化转型中出现种种挫折的深层原因。作者认为，除去客观上的“左倾”之祸和教条主义泛滥之外，历史学家自身也有两方面值得正视的问题：割断了史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割断了史学与大众之间的联系。最后，文章以较大篇幅提出了克服缺陷的方法和途径，认为最关紧要的是史学家要重视理论思维，摒弃“精英”史学；重视研究农民的历史，开发族谱宝藏，并从正在我国农村出现的村志中吸取养料。

作者基本上不赞成陈寅恪的史观，对其在中国现代史学上贡献的评估也持保留态度。作者认为，陈寅恪之所以没有传人，主要是因为他所秉承的实证史学迅速为年鉴学派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超越，没有能够预二战后世界史学之主流。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萱译《极端的年代》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1840 年—1920 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从社会文化的不同方面，对 1840 至 1920 年 80 余年间社会生活、风俗习尚、大众文化、社会思潮等进行了系统梳理，细致描绘了这一时期整体社会文化面貌的变迁轨迹。全书共约 150 万字，不仅在资料上进行了大量的开掘，而且在内容和撰写体例上都有创新，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国家教委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写《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1996 年八位历史学家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及政治局常委做中外历史专题讲述，本书即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所收论文的作者和篇目是：齐世荣《略论英美法三次资产阶级革命》和《文艺复兴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龚书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张宏毅《近代以来中美俄日关系的特点》、李文海《中国近代灾害与社会稳定》、戴逸《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庞卓恒《世界古代帝国和文化兴衰》、张传玺《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特征》、罗国杰《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与政治统治》。

4 月

《胡绳全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录作者从 1935 年起 60 年间的大部分作品。按照作者的意见，没有收入 1935 年以前发表过的文章，并将现在还能收集到的 1935 年以后的文章淘汰了一部分。

《全书》共分六卷九册。第一卷到第三卷是文集，由历年发表在报纸刊物上的文章编辑而成。第一卷分上下册，收的是 1935—1948 年的文章，第二卷收的是 1949—1961 年的文章。第三卷分上下册，收的是 1979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的的文章，这一卷到 1996 年。第四卷到第六卷可叫作专集，就是把原来出版过单行本的书收集在一起。第四卷中主要包含几种哲学方面的书。第五、第六卷包含了几种历史方面的书。各卷卷首都有作者写的引言及序言、前言，对卷中的内容作了必要的说明。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分综论篇、中原篇、北方篇、南方篇及方法篇，收录作者在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方面的论文 31 篇。全书重点论述了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分期、分区、谱系演变及相互关系，借以阐明中原夏、商、周文化为中心的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及特点。

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 1 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 2 卷 2000 年出版。全书导论以单行本《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于 2001 年出版。

全书近 120 万字，是“一部个人视野的思想史”，甫一问世就以崭新的内容、突破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写作范例而引起众多关注。本书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以往的思想史只叙述“精英思想”、“经典文本”，而对作为“精英思想”的知识来源和依据、在普通生活中实际起作用的一般思想很少涉及。而本书脱离已成窠臼的思想史写作“进步——落后”、“唯物——唯心”、“精华——糟粕”框架的束缚，比较多地发掘了一些过去思想史写得较少的问题和时代，力图从个人视野出发，重写中国思想史，在体系上自成一格。作者认为，思想史并没有表彰先进和遴选代表的目的，思想史首先是历史，历史是在时间中的，叙述知识思想的连续性过程，不能忘记那些并不高明的知识思想。书中既有总体性的思考，也有不少精辟的具体见解。且征引宏富，不但广泛征引古代文献，而且参考了大量现代研究成果。该书在思路和写法上的创新还体现在对材料的应用上，

过去不被重视的古代星占历算、祭祀仪轨、医术方法均被作者拿来作为思想史资料，考古发现与文物等（如敦煌类书、地图、皇历、墓室壁画）也被纳入到思维视野，这些资料的使用，被评论家称赞为“从似乎无思想的地方看出思想的轨迹来”。

该书出版后引起海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被认为是近年来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之一。但其散文式写法也引起一些争议。

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几十年研究近代海军的精心之作，叙述了自鸦片战争至清朝覆亡70年间中国近代海军兴衰的历史。

胡道静主编《国学大师论国学》（上、下）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上册收集了章炳麟、梁启超、陈寅恪、马一浮、熊十力、钱穆、郑振铎、俞平伯、程千帆、林语堂、钱钟书等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通论传统国学及专门论述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史学（含地理）三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57篇。所选论文分别对传统国学的内涵、特色、方法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经学、道学、佛学、旧史学的考据、史论、谱牒、沿革地理、方志等问题做了论述与介绍。

下册主要收录刘师培、杨树达、郭沫若、余嘉锡、蒋伯潜、林语堂等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专门论述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汉语汉字及古籍整理三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54篇，分别对具有浓郁中国文化特色的古典诗词、对联、园林、书画，汉字训诂、音韵、文法，古籍目录、版本、辑佚等学术问题做了论述与介绍。

全书按照文章内容分类编排。为方便阅读，编者在各篇论文之后，还对相关作者及该文写作背景或要点作了简括介绍。

李民、张国硕编著《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三族起源作了全面的、动态的考察，具体论述了夏、商、周三族的发展，对三代政治中心的变迁、三代都城制度的特点及都城变迁的原因、三代的势力范围以及三族的融合过程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书中较好地结合了文献资料与考古材料，同时交叉运用了民族学、生态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何芳川主编《太平洋贸易网500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由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5月

王彦辉在《东北师大学报》第3期发表《论汉代工商官营政策的政治影响》。

作者认为，汉代工商官营政策虽然起到了打击工商豪强的作用，收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之实效，为汉武帝的内外丰功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持，但其负面效应也不能低估。该政策对汉代政治由“蒸蒸日上”向奸弊丛生的下滑着实起到了催化与推波助澜的作用。

《世界汉学》创刊，刘梦溪任主编。

该刊同德、英、俄、美、日、荷兰、瑞典、葡萄牙、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汉学机构有广泛联系，并有许多资深汉学家出任国际编委。

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主要考察了教会大学在国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研究对象主要包括13所新教大学和天主教会的辅仁大学。在研究资料方面，本书尽可能地利用这些大学的原始材料，包括档案、档案资料选辑、各校出版物、曾在教会大学工作过的学者的论著以及当时报刊关于教会大学的报道等。

廖名春在《孔子研究》第3期发表《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

文章认为，郭店楚简10种儒家的著述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孔子之作，它们是《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尊德义》。第二类是孔子弟子之作，它们是《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六德》、《性自命出》。其中《忠信之道》是子张之作，《性自命出》是子游之作，《成之闻之》、《六德》可能是县成之作。第三类是《子思子》，为子思及其弟子所作，它们是《缁衣》篇、《五行》篇、《鲁穆公问子思》。简文主流，当出于子游、子思学派。

巫宝三主编《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选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该书包括作者自传《毕竟是书生》以及回忆陈寅恪、吴晗、杨联陞、吴于廑等人的文章，自传中对“文革”期间参加“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情况作了叙述，并对一些事件的真相作了澄清。该书出版后

多有争议，被认为有自我开脱之嫌。

《文史哲》第3期刊登“儒学是否宗教”笔谈。

参加笔谈的有张岱年、季羡林、蔡尚思、郭齐勇、张立文、李申。

6月

6日　刘泽华在《人民日报》发表《历史研究应关注现实》。

作者认为，关注现实与满足当代社会需要的史学研究，是历史学的龙头，其他都不过是龙身。如果龙头抬不起来，龙身就只能在水中拖曳。就目前史学现状看，不是说龙身过大，而是龙首小而弱，难以带动整个史学的腾飞。史学家疏远了现实，相应地，现实也疏远了史学。这一点是最需要史学工作者深刻反省的。所谓“史学危机”，并不是表示史学本身价值的下降。只要有人类存在，历史学就永远是它的伴侣。如果说有“危机”存在的话，那只能说旧的已经失去生命力，而新的突破即将来临。开展与人类和民族命运相关课题的研究，是历史学摆脱危机、走向复兴的重要途径。

作者呼吁加强当代史的研究，认为开展当代史研究是牵动整个史学界步入新阶段的火车头。现代社会，尤其是当代，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察古知今”基本上不中用了，必须察今而后知今！甚至可以这么说，当代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史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文史哲》编辑部和山东大学哲学系在济南联合举办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戊戌变法的历史地位、成败得失，及其对当今中国现代化道路所提供的经验教训等。

20日　沙建孙在《人民日报》发表《向陈寅恪先生学习什么》。

本文主要针对当时中国大陆的“陈寅恪热”有感而作。作者认为，作为一位有多方面重大成就的前辈史学大师，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建树，他“力求通过考证来发掘历史事实及其内在联系，从而展示出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其成就较乾嘉诸学者更上一层。为了提高史料的可靠程度和开拓史料来源，他倡导诗文证史，为史学研究另辟新途径。尤其是从两种不同观察的记载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是治史方法上的一大突破”，他所留下的这些思想、学术遗产，至今仍然需要很好地去发掘、研究、继承和发扬。但是，为人所倍加推崇的“不宗奉马列主义”，“恰恰不是他的强点而是他的弱点，不是他的优胜处而是他的局限性

了”。

作者质疑：为什么要把陈先生的这种弱点和局限，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它神圣化为崇高的风骨和壮烈的情怀呢？这究竟是对这位史学大师的尊崇还是讥讽？是对青年人的激励还是误导？是对社会科学的促进还是阻滞？这些问题，都该让我们深思细想。

是月　张晓校在《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发表《简论当代中国史学的自律与自觉》。

针对史学应该参与市场的观点，作者反诘：史学发展的真正动力必须依赖市场吗？史学与市场经济有可结合之处，但并不是整体上的历史科学都能与市场结合，所能结合的只是历史科学中的一小部分，不会是史学的全部。史学在宏观上是社会文化行为，不是市场经济中的个体行为。

史学研究的高层次追求可能会与市场经济有矛盾之处。史学的学术性丈量标准首先不是迎合公众或市场效应，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市场效益、公众需求是史学应当考虑的因素，但不可能是决定的因素。古今中外恐怕找不到靠市场推动而走向繁荣的史学。以功利、利益驱动史学的学术研究可能会带来泡沫式的表面繁荣，却也极易导致学术研究的扭曲。在史学研究方面，功利主义的负面作用远远大于正面影响。虽然没有必要让史学在功利主义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选择其一，但史学自律、自觉于学术则是最佳选择。

齐世荣主编《绥靖政策研究》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陈其泰、郭伟川、周少川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王先明在《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发表《关于社会史的学科定位问题》。

作者不同意对社会史学科地位独立性的否定，认为历史学与社会史学并不能等同。从横向对比来看，历史学与社会史学不同一。历史学在内容上比社会史更加宽泛，“社会史”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有重合之处，却并不重复。从纵向对比上看，历史学与社会史学也不同一。历史学是一门十分古老的学科，社会史却只是20世纪的产物，是在对传统史学反叛过程中追求属于自己时代特色的一个“新史学”。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社会史只是历史学漫长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二者的关系是，历史学包含着社会史学，社会史学却不能包含历史学。

左玉河《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7 月

21 日　“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召开。

是月　杨奎松在《近代史研究》第 4 期发表《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

陈淳在《文物》第 7 期发表《酋邦的考古学观察》。

本文依据考古资料，对中国远古时期的酋邦进行考察，并以此探讨了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

王子今《中国女子从军史》由军事谊文出版社出版。

8 月

16 日　“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106 位海内外学者出席会议。

20 日　戊戌维新 10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160 多位中外学者出席，围绕戊戌维新的有关理论、历史、思想、人物、史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论文集《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4 日　中国社会史学会第七届年会暨“家庭 · 社区 · 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的 114 名与会代表共向大会提交论文 92 篇。

是月　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开始由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该套丛书是李约瑟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外最重要的一部中国科技史。共 30 卷，分别为通史类 5 卷，分科类 19 卷，工具类 6 卷。每卷达到 60—100 万字，均由各个学科的资深学者担纲撰写。各卷既相互独立，又成为一个完整体系，既有综合概括性的通论，又有条分缕析的分论。

《周一良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粹集作者平生治学之精华，共五卷，第一卷《魏晋南北朝史论》，第二卷《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三卷《佛教史与敦煌学》，第四卷《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五卷《杂论与杂记》。

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系作者遗著，原名《中国古代物价史》，1986 年作者逝世后，在其学生帮助下，由夫人郑宜秀整理成文，并按作者之意更名《金泥玉屑丛考》。本书汇集了我国先秦至宋代有关物价的重要资料，为了解、研习经济史所必备。

孔庆泰等著《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分 4 编 12 章，全面叙述了 1927 年至 1949 年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制度。全书利用了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史料，历经 10 年乃得完成。

杨栋梁《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日本战后产业合理化政策研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赵吉惠《国学沉思》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桑兵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陈寅恪与清华研究院》。

（法）戴仁主编、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本全面介绍法国中国学历史和现状的工具书。

9 月

13 日　“20 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北京召开。

会议由洛阳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联合主办，李学勤、李零、姜广辉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考古所，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从事历史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哲学史和史学史方面研究的 40 余位学者参加了研讨。

会议对顾颉刚及其所倡导的 20 世纪疑古思潮做出高度评价，对于疑古思潮理论方法的局限也作了探讨。

15 日　中国史学界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扬州举行。

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世界史、考古学、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等各历史分支学科的 150 多位知名学者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议程主要有三项：总结 20 世纪中国的史学，展望 21 世纪新世纪的史学；总结

上一届理事会的工作，通过新的中国史学会章程；选举新一届理事会。会议选举金冲及为会长，李文海、李学勤、何芳川、张磊、张海鹏、张椿年、龚书铎为副会长，张椿年兼秘书长。

戴逸作了题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的长篇学术报告，从宏观上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进行总结，并对21世纪的中国史学作了展望。田余庆、张磊、龚书铎、李文海、姜义华、苑书义、陈振江、金冲及、廖学盛、张海鹏、孙达人、刘庆柱等20余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对新时期史学的发展提出建议。

142位学者当选为中国史学会新一届理事，其中包括20名年轻学者。

是月　章开沅、马敏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黄兴涛、杨念群主编“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书包括62篇文章，均为作者利用海外民国档案史料所作，这些史料藏于日本、美国、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的公私档案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尤以涉及重要历史人物居多，内容多为不为人知的重大历史秘密，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耿云志主编《胡适论争集》（上、中、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目前国内出版的有关胡适所参与的论争最全面的专集，文学革命之争、思想与道德革命之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交锋，井田制有无之争、新旧红学之争、整理国故之争。以及东西文化的数次大论争、人权问题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学生运动之争等。本书史料详尽，完整地表现了胡适思想之精髓以及现代中国演进的路程。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讨论的主要范围是明清时期，尤其以明清时期为何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为其重点。《从〈三言〉看晚明商人》一文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因采取中央集权体制，事无巨细，悉听朝廷号令，所有法律辞章，必须划一，但由于有很多不合实际情况的地方，导致皇室权威虽然广泛，但其行政技术低劣；政治上的安定，也并非经常在法律及经济上求改革。与西方各国近代保障人权、支持私人财产、允许市民自治种种措施大相径庭。因此，本书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学者所争论不休的“明清资

本主义萌芽”问题，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本书体现了作者一贯提倡的大历史观点，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使得过去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迹，获得前因后果连贯的合理性。

葛剑雄编《谭其骧日记》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汇集了徐中舒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所撰写的主要史学论文，内容涉及先秦史、古文字、古器物学及中国古代史研究诸方面，是作者一生治学成果的结晶。上册25篇，下册35篇，另附录本书未收论文35篇的篇目。本书是在作者指导下由吴天墀、伍士谦、黄波、唐嘉弘、缪文远等搜集、校阅而编订的。《论西周是封建制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论殷周的外服制——关于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的问题》、《巴蜀文化初论》等重要论文皆收录其中。

秦晖在《社会学研究》第5期发表《“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

1999年第3、4期连载。作者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非因个性发达，而是因大共同体性亢进所致。它与法家或“儒表法里”的传统相连，形成一系列“伪现代化”现象。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起步时曾经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阶段，而中国的现代化则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

赵世瑜在《社会学研究》第5期发表《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

本文认为，正是因为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结盟，才产生了社会史，故而社会史与其说是历史学的学科分支，不如说是一种新的历史范式。只有在与社会科学学科的不断对话和批评中，这种新的史学范式才能得到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均可得到互惠。

“殷墟发掘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安阳召开，120名国内外学者出席会议。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由三联书店出版。

《文史哲》第5期发表一组“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道路”

笔谈。

10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编著《李自成结局研究》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课题负责人为王戎笙。课题组在大量搜集利用有关或可能有关李自成之死的实录、档案、谱牒、文集、笔记、野史资料及文物的基础上，对李自成结局的由来和发展脉络进行系统地清理。课题组深入湖南石门、慈利及湖北通山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对世人关注的李自成是败死九宫山还是遁迹空门，九宫山是在通山还是通城，奉天玉和尚是不是李自成等历史上众说纷纭的问题，都一一给予深入地分析和明确地解答。本书认为，清代档案确证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从而基本解决了这一长期以来争讼不休的问题。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此书采用了大量造像记等铭刻资料，并结合其他文献，对五、六世纪北方地区高僧大德与知识阶层信徒之外的一般佛教徒的信仰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分析研究，试图弄清他们接受佛教的具体情况以及佛教对一般民众思想与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书中了考察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佛教的传播途径和过程，并依据1602种有纪年及纪年可考的造像记，通过统计分析和个案研究，对民众信仰的内涵进行了重点阐述，揭示了民众崇奉对象的兴衰变化及其成因，以及民众对佛教的认识与追求，对法、佛、像与觉悟之途的具体理解等。书中还对民众佛教修持方式与佛教信仰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造像供养实际成为中土传统祭祀活动的延续与变种，佛教对中土民众的影响只限于具体观念，未及行为方式与宇宙观，兴福造像的流行，意味着佛教的中国化。

何兹全在为本书所作序言中称其为“迄今为止，对中国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的最新、最系统、最全面的研究成果”。

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编《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由巴蜀书社出版。

常建华《宗族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主要论述了秦汉时期各地区文化的异同。

上编把全国分为关中区、齐鲁区、赵地区、滨海区、江南区、河洛区、北边区、巴蜀区、陈夏区、西南夷区、南越区、西北区等十二个文化区，并分别论述了各文化区不同的人文社会风貌和文化特征。中编着重分析了秦汉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的成因。下编主要对秦汉王朝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总结。

李学勤《缀古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萧克主持编纂《中华文化通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编纂，历时八载始得完成。该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的文化通志，分为序卷和十典百志，共4000多万字。十典分别是：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李学勤、王尧、宁可、刘泽华、孙长江、庞朴、陈美东、刘梦溪、汤一介、姜义华等出任各典主编。该书贯通古今五千年历史，涵盖十大文化领域，包括56个民族文化，涉及文史哲经等10个主要学科，阐述详尽，内容丰富。

王旭东《史学理论与方法》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杨子彬主编《国学论衡》第1辑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11月

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编《黎澍十年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共收24篇纪念黎澍的文章，作者多是黎澍故交老友或门生后学，包括于光远、李锐、李普、李新、戴逸、王若水、唐振常、丁守和、丁伟志、李洪林、朱正、耿云志、徐宗勉、姜义华、喻松青、蒋大椿、李学昆等，多为著名理论家、历史学家。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黎澍的学术思想与理论建树，多方面展示了黎澍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思想家和理论家在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所做的杰出贡献。

何芳川、万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乔志强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一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专著，共19章，80余万言。作者以“社会近代化”为观察的平台，将“社会变迁”放置到整个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发展变迁的大背景中来进行观察，描绘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演变过渡的历史长卷，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特征归纳为被动性、迟滞性、不平等性和复合性。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将农村社会的研究与城市社会的研究结合起来，强调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使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变迁得到立体式反映。该书还熟练运用了比较方法，从横向上将华北农村社会同其他地区进行比较；从纵向上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与不同时期，尤其是明清以后本地区的社会变迁进行比较。

“全书史料之丰富、分析之细腻都是同类著作中少见的”，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出版后广受好评，被称为“近代社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共收入8篇文章，分别是“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表现”、“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天地君亲师’的起源”、“钱穆与新儒家”、“现代儒学的困境”、“群己之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个循环”和“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

作者强调从“形而下”（历史的演进变迁）的角度研究分析儒学自明清以来在中国社会的演变和解体过程的必要，并依据历史材料说明了儒学在近代的解体过程。作者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儒学出现严重危机，过去一向认为是西方思想的入侵造成的，即以为反儒学的运动完全是从外面来的，这种观点是个误解。实际上，儒学的批判是从内部开始的。不仅晚清如此，“五四”初期也是如此。晚清儒学的两个主要派别——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前者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后者如章炳麟、刘师培）——都借助西方的观念来阐明儒学的现代意义，对儒学进行了内在批判，共倡抑君权兴民权、兴学会和个人之自主等。

李根蟠《中国古代农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0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罗志田、葛小佳《东风与西风》由三联书店出版。

廖名春《帛书易传初探》由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了作者1992年8月至1995年9月关于帛书《易传》的19篇论文和6篇释文，附首次发表的帛书《易传》的16张照片，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帛书《易传》研究最为重要的成果，荣获由东方国际易学研究基金委员会和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联合设立的1999年度第一届国际易学龙

马奖。

作者是马王堆帛书《易传》最早的整理者之一，在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楚简以及先秦秦汉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中有较大影响。

12 月

18 日　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等单位组成西沙水下考古工作队，开始对西沙群岛水下文物进行抢救发掘工作。

26 日　胡绳在“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讨论会上发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讲话。

胡绳认为，毛泽东在 1949 年后所犯一系列错误，原因在于“受了民粹主义的思想”影响。此论一出，旋即在理论界、党史界、国史界引起强烈反应。沙健孙连续发表《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真理的追求》1999 年第 3 期）、《一个至关重要的全局性问题——对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的再认识》（《中流》1999 年第 4 期）、《马克思主义，还是庸俗生产力论？——评胡绳教授对毛主席的批判》（《中流》1999 年第 12 期）等文章对胡进行反驳，否认毛是一个民粹主义者。

胡的讲话稿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1999 年第 3 期及《中共党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此篇讲话的发表，表明胡晚年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

是月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有关敦煌学的专业性大型工具书，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研究院与上海辞书出版社于 1984 年共同发起编纂与出版，全国 20 余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 100 余人参与。全书汇集了近百年国际敦煌学研究成果，共收词 6925 条，总字数 241 万余字，插图 700 余幅，其中彩色图片 100 余幅。内容包括各个时代敦煌艺术的综述以及代表性洞窟、敦煌文献的介绍等。全书以六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敦煌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包括敦煌文献的收藏情况及其编写的经过等。条目的撰写，粹集了国内敦煌学各分支学科的代表性学者，可谓极一时之选。如天文历法由对敦煌文献中天文历法写卷作过全面整理研究、曾在中国科学院天文台工作过的邓文宽担任，敦煌佛典由负责北图敦煌写卷整理刊布的方广錩担任；敦煌地理由当地学者、亲自考察过大多数古迹遗址的李正宇担任；国外敦煌学研究部分，由曾赴日、英、法、俄、德、美、丹麦、芬兰、瑞典等国查阅世界各地藏卷的荣新江担任；敦煌书仪等由系统整理过敦煌文献中所有书仪的赵和平担任；石窟考古、石窟艺术部分由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等担任。所撰条目尤重专业性，重要的词条注

释字数往往超过千字，由郝春文撰写的全书首个词条“敦煌”更长达 1.4 万字。书中还附有一批颇有价值的附录。

该书被称为“百年敦煌学的总结”之作。

葛剑雄编著《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内容包括原始地图和早期地图、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地图、隋唐至宋时期的地图、元明时期的地图、清时期的地图。

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二战以后西方史学的新发展，对西方现代史学各分支学科，如社会史、文化史学、心理史学、城市史学、家庭史学、政治史学、口述史学、计量史学和比较史学的萌生、发展、代表人物、代表作品，以及主要的理论、方法及原则等进行了评析。

钟家栋、王世根主编《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理论论集》由青岛出版社出版。

黄冕堂、刘锋《朱元璋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瞿林东在《中国史研究》第 4 期发表《走向中国史学深处》。

《林沄学术文集》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收入作者 1965 年到 1998 年发表的论文共五十篇，涉及古文字考释、文字学理论、甲骨断代学、利用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研究商周历史、商周考古，以及对中国东北和北方的考古遗存和文献中记载的古族研究等方面内容。

张海鹏《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戴逸在《历史研究》第 6 期发表《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

文章回顾了 20 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把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特点和成就可以概括为六点：第一，进化史观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的显著标志；第二，唯物史观的运用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伟大进步；第

三，20 世纪史学除了进化史观、唯物史观以外，再一个特点就是理性的觉醒、理性精神的发扬。第四，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第五，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在各个分支学科中进行开辟和创造，有重大建树，建立了历史学全面、系统的学科体系；第六，在 20 世纪，新史料大批发现，其质量之高，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以前任何朝代的发现。

作者认为，中国 20 世纪的历史学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实证史学派，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过去，用资产阶级历史学和无产阶级历史学来区别这两个学派，用阶级属性来标识某个学派和某种学说，这未必能十分确切。阶级属性是由经济和政治地位决定的，知识领域里的阶级划分要复杂得多。很多知识带有普遍真理的性质，为各个阶级所认同。自然科学即属此类，它没有阶级性，不存在资产阶级的物理学和无产阶级的物理学。社会科学虽有所不同，但其中也包含有与自然科学相类似的真理性知识。历史所提供的许多经验和智慧，任何阶级都可以借鉴，并不是对某个阶级才适用，对别的阶级就不适用。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中的很大部分可以超越时空、超越阶级，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王国维、陈寅恪的研究成果，今天我们仍承认其价值。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其他学派之间有一个相互学习和继承的问题。郭沫若的研究成果是在王国维、罗振玉的研究基础上，经过自身的努力而取得的。范文澜是黄侃的弟子，而黄侃又是章太炎的学生。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除学习了西方的治学思想与方法，又和中国过去的乾嘉学派、公羊学派有密切关系。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不能割断学术上的传承和联系，简单地把历史学家们置于相互对立的营垒之中。

这种认识上的调整，反映了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与声势日大的实证史学派之间力量的消长。

《童恩正文集·学术系列》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作者晚年由四川大学转职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授，1997 年病逝于美国。该文集由学生编辑，包括《古代的巴蜀》、《南方文明》、《人类与文化》、《来自新大陆的信息》等书。书前有张光直所写序言，云：《童恩正学术文集》是研究中国西南部古代史与民族学内容最为丰富、观念最为新颖的一个文集。童恩正西南民族考古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和对中国南方古代文明重要性的认识，是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的中国文明起源新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础石。

《古代的巴蜀》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4 月出版，全书共分十二章，对巴族早期迁徙的路线、蜀族的起源、巴蜀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巴蜀境内各民族的族属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南方文明》收录《南

方——中华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之地》、《人类可能的发源地——中国西南地区》、《中国西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等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试论我国从东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该文从出土器物的类型与风格、建筑遗迹、葬具葬俗等各个方面的考古学因素，高屋建瓴地探讨了从东北到西南这一半月形地带内古代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该文将考古学文化放在一定的生态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下加以考察，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从而推进了对中国西南古代社会的了解。

《人类与文化》主要对文化人类学进行了研究，除了对摩尔根批评以外，还探讨了中国古代酋邦制度、巫和酒与商代灭亡的关系等。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被认为是近年来最具学术功力的西域史研究著作，分上、中、下三编，凡十四章。上编：唐代九姓胡；中编：突厥文化；下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上编以唐代九姓胡为题，主要探讨唐代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人与唐代关系的相关重要问题。中编以突厥文化为题，选取了比较能够说明突厥社会文化特征的若干问题加以研究，力图从突厥社会内部来观察，更为深刻地理解突厥汗国历史和突厥人的文化本质。下编以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为题，主要讨论西域物种东传与文化交流的问题。

本书论证的最大特色在于充分利用中外文资料进行互证，及充分吸收其他相关专业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进行跨学科探讨。在运用的诸多文物资料当中，最有特色的是对古代艺术遗存的利用，以图证史。此外，以诗证史的方法也为其所用，仅上编就引用古诗三十余首。佛书、诗歌、笔记、小说等也被大量引用。力图通过“文史互证”的方法，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吸收利用了考古学、金石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比较宗教学、比较文化学等方面的知识，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也有征引。

是年

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由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和美国圣马丁出版公司出版。

本书从破除“西方中心论”出发，对明清江南农业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所论涉及亩产量、农村副业、集约生产、社会制度、人口与耕地、经营方式、资源的合理利用、甚至稻麦复种技术等等，书中运用大

量翔实的文献、统计资料，对国内外学界关于明清农业停滞说的“定论”提出了深刻的挑战。

该书被誉为“加州学派”的重要代表性作品之一，吴承明与斯波义信为该书写了序言。Hugh R. Clark（美国 Ursinus College 历史系主任）在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vol. 6，No. 2，1999）发表长篇书评，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 *EH. NET*（July 2003）与《学术界》2005 年第 1 期也发表书评《评李伯重著〈江南的农业发展，1620—1850〉与〈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1550—1850〉》，对该书做了较高评价。

中译本由王湘云翻译，于 2007 年 6 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钱钟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丛书辑集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中国人文学者的代表性论著，每种或收一人一书，或辑一人多篇，或合不同作者的同题论著为一编，以其在思想、文化或政治方面的影响大小为取舍标准。计有《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书目答问二种》、《弢园文新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东塾读书记（外一种）》、《万国公报文选》、《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大同论二种》、《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共 10 种。

“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设立。

由郭沫若基金会发起设立，是中国史学的最高奖。

国家文物局公布本年度十大考古发现。

河北泥河湾盆地阳原于家沟遗址（旧石器时代）、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祭坛和墓地（新石器时代）、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重庆忠县中坝遗址（新石器时代）、辽宁北票康家屯城址（夏代至早商）、浙江绍兴印山越国王陵（春秋晚期）、重庆三峡库区云阳李家坝遗址（战国）、河南小浪底水库东汉漕运建筑基址及古黄河栈道（东汉）、江苏南京仙鹤观象山东晋贵族墓地（东晋）、浙江慈溪上林湖寺龙口越窑窑址（唐末至南宋）。

1999年

※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完成出版。
※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出版。
※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出版。
※ 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出版。
※ 刘大年发表《评近代经学》。

1月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是此类题材的最好选本。书中选录了从15世纪至20世纪西方51位著名史家和历史哲学家的有关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论述，所选人物包括马基雅维里、维科、黑格尔、兰克、阿克顿、克罗齐、柯林伍德，以及沃尔什、福格尔等，并对每一个史家的生平和代表性作品作了简要介绍，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和系统地了解近现代西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概貌。

李伯重在《人口研究》第1期发表《气候变化与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几次大起大落》。

本文对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把这种影响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两个方面。所谓“直接影响”，即气候变化引起农业产量的增减、农业区域的移动，从而导致人口发生变化；而所谓“间接影响”，则指的是气候恶化通常激化社会矛盾、触发社会危机，引起原有社会结构解体，同时还会引起外来烈性传染病的传播，从而导致人口减少；反之则引起人口的增加。通过这个分析，作者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桑兵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发表《胡适与国际汉学界》。

文章认为，近代中国学术史上，胡适与国际汉学界的交往之广，历时

之长，或可称最。论国别则有法、英、德、美、俄、瑞典、瑞士、日本、朝鲜，论人物则包括夏德、钢和泰、伯希和、伊凤阁、高本汉、斯文·赫定、尉礼贤、佛兰克、庄士敦、翟理斯父子、维列、苏熙洵、慕阿德、李约瑟、阿列克、戴密微、恒慕义、傅路德、魏特夫、狩野直喜、小柳司气太等，几乎囊括世界汉学研究机构及各国汉学名家乃至后起之秀。见多识广弥补了胡适学术上的先天不足与后劲不够，使之在议政从政之际保持作为学界领袖必不可少的学术鉴赏力。但国际汉学的巴黎、京都两大主流派成员对于胡适的学术主张与成果不无微词，这对提倡用西方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胡适及其所引导的主流派颇具讽刺意味。由此可以显现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得失。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力求通过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这一段近代变革历史的具体研究，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面临的两难困境与变革过程中种种危机。作者认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激进与保守，是理解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复杂与深刻性的关键，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激进主义的反思与研究，是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知识分子自我认识的历史资源。

该书出版后，因其深刻的思辨性而广受关注。

王子今《“忠”观念研究——一种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与历史演变》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陈其泰在《浙江学刊》第1期发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的思考》。

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崛起、确立和发展，把20世纪中国史学推向更高发展阶段，而且从整个中国史学的演进来考察，也标志着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要的奠基著作——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具有突出的科学性和创新精神，学术界有将它们视为“战时史学”（即战时政治的附属物）的看法，值得商榷。

方克立主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张光直《商代文明》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19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著，刘北成、薛绚译《历史的真相》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10卷，510万字，分夏商周、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清末民国、新民主主义政权法律制度等不同段落分别论述。从1979年长春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正式确定选题、拟订编写计划到出版，前后共历经20年的时间，其间参与编写的人员有70多人，多是国内法制史研究的中坚力量。该书是迄今为止卷数最多、篇幅最大，且贯通古今的法制通史著作，被称为中国法制史研究的里程碑。

2月

8日　田居俭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论学史》。

《光明日报》特为本文加编者按，云：“江泽民总书记今年初在省部级干部金融研究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殷切希望各级干部和全党同志‘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本报今天发表的这篇署名文章，就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如何学史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文章指出，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又是具有尊史、学史和治史传统的民族。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响应江泽民总书记的号召，努力学习历史，从历史中吸取营养，提高自身素质，开拓视野，鉴往知来。”

是月　梁钊韬《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中国文化人类学的拓荒之作。书中讨论了巫术的定义和西方巫术理论、巫术的起源和分类，并重点对中国古代巫术进行了研究。

陈启能、于沛、姜芃、张雅琴、朱政惠、张耕华《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书在苏联东欧剧变、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国际史坛上面临着严峻挑战的大背景下，力图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进行回顾和反思，意在总结我国史学界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就历史演变

的历程来观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演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本身进行深入地反思。

张忠培在《中原文物》第1期发表《聚落考古初论》。

作者认为，聚落考古“探讨居住于同一聚落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和聚落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聚落社会的时空变异，以及聚落社会同自然环境的关系”，其基本内涵应包括以下内容：“其一，是单一聚落形态、布局及结构的个案研究；其二，是同一考古学文化同时期聚落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其三，是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或同一谱系不同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的聚落形态、布局、结构和聚落分布的分析；其四，是不同谱系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的聚落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类聚落形态、布局、结构和它们的异同的探索；其五，是聚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罗志田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

该文是为美国学者何伟亚所作《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书评。文章简述了此前中外学术界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研究，介绍了该书的篇章结构、主要内容及其对既存诠释的挑战，并针对该书的两大核心观念“多主制”和“宾礼”之间的关联与疏离提出申论。文章认为何伟亚所提倡的后现代主义的新观察视角使学界过去相对忽视的面相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并对他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取向和方法进行了评介。

3月

24日　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更名为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

是月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齐。

该书的编纂堪称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史学工程之一。全书共12卷本，22册，1400万字，历经20年研究和撰写才最终完成。全书以马克思主义作理论为指导，上起远古，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涵括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学术文化各个方面的演进历程，内容宏富，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体裁的创新和编撰的科学性、时代性上有较大突破，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是真正的通史”。该项目于1979年正式提出设想并开始启动，得到了全国许多高校、科研单位的大力支持，众多卓有成就、造诣高深的知名学者加

入到编委会中，编委会由白寿彝、王振铎、苏秉琦、徐喜辰、斯维至、杨钊、高敏、安作璋、何兹全、周一良、史念海、陈光崇、邓广铭、陈振、陈得芝、王毓铨、周远廉、章开沅、林增平、龚书铎、王桧林、邱汉生、刘家和、何绍庚等知名学者组成，其中大多数人担任了各分卷主编。参加全书撰稿的学者共有500余人，充分吸收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该书最为人称道者是在体例上的创新。编者在吸收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形式的基础上，在编撰体裁上独创了“新综合体”。全书除第一、二卷外，其余十卷都各包含四个部分：甲编为序说，介绍史料、史籍、考古材料及研究状况、本卷撰述旨趣等。乙编为综述，类似通史著作，又似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按历史顺序叙述一代大事；丙编为典志，类似纪传体中的志，叙述各种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礼俗等；丁编为传记，在全书中所占篇幅很大，每朝代两卷，传记占去一卷，以记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克服了一般通史有事无人的缺陷。通过这种“新综合体”，使读者对中国历史获得一个全局的、立体的认识。

1999年4月26日，祝贺白寿彝教授治学70周年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李岚清等分别致信或致电表示祝贺。

吴承明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发表《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作者认为，我国经济史研究大体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政治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

文章主要谈了对经济史一些理论和方法的看法，认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的真实，50年代的“史学革命”要打倒历史主义，代之以科学原理。这是行不通的。这样做，就会出现模式论、逻辑实证主义、“结论先行”、目的论、决定论等历史研究法，都不可取。历史研究（不是写历史）是研究过去的，实证主义，包括考证，是不可须臾或离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史无定法”，可以根据问题性质选择适用的经济理论作分析方法。中国太大，区域经济史是研究的基础。经济史研究的重点，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制度改革导致的社会变迁，诸如家族制度、缙绅势力、社会等级、社会习俗等变迁。

瞿林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 2 期发表《中国史学史：20 世纪的发展道路》。

作者认为，自 20 年代中国史学史被提到专史研究日程上来至今，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即草创时期（30—40 年代）；沉寂时期（50 年代）；活跃时期（60 年代前期）；再度沉寂时期（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中期）；建设时期（70 年代末至今）。概括说来，20 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经历了两个马鞍形的演变轨迹。

顾祖成编著《明清治藏史要》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运用翔实的第一手史料，扼要而系统地阐述明清两代五百年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治理的历史。

黄朴民《天人合一：董仲舒与汉代儒学思潮》由岳麓书社出版。

该书对董仲舒的学说产生的文化背景、在汉代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春秋繁露》的真伪、董仲舒儒学的结构、“天人合一说”、儒学思潮与汉代的政治与军事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 月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陈桥驿《水经注校释》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清戴震校武英殿聚珍本为底本，校以其他 33 种版本而成，被称为《水经注》有史以来的最完善的版本，也是作者从事郦学研究 60 多年的代表作。

罗志田在《开放时代》第 4 期发表《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本文将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的转化、知识分子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动态进程，纳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和西潮冲击下整个近代中国的巨变这一纵横框架中进行考察分析；在研究取向方面注重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从当时人的心态变化人手来反观社会的变动，以尝试提出一个走向框架性诠释的思路。

苏双碧《中国封建主义批判》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赵世瑜在《历史研究》第 2 期发表《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

文章认为，社会史绝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一个史学

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认识倡导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它并不只是重新发现一个以往被遗忘了的角落。它是一场革命，它是使史学家的眼界、方法、材料统统发生变化了的一场革命。如果一个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除了研究对象以外，以上这些全都依然故我，那就绝对不是社会史。社会史不仅是一种新的史学范式，而且应该是一种综合的、整体的研究。

《宁可史学论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钱乘旦主编《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5月

20日　北京大学成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并创办《古代文明研究通讯》。

是月　（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由三联书店出版。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唐代金银器的考古学研究”、“金银制造业的发展”、“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三个部分。书中建立了金银器的考古学分期，纠正了以往对某些器物的断代错误，将唐代金银器分为“飞速发展时期”、“成熟时期”和“普及和多样化时期”，使金银器的发展演变与社会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对唐代金银器的历史渊源和兴盛原因进行了研究。

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初步建立起中国地名学史的体系，并通过中国地名变化的历史反映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

6月

2日　刘大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是月　桑兵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

文章指出，清代学术，以江淮为渊薮，影响及于民国。学海堂时期粤学地位上升，但南学之于岭南只能言籍贯而不能讲居处。浙人把持北京学术界的情形，持续到30年代。虽然章太炎派代桐城古文家而兴为历史进步，地缘垄断却阻碍了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派成为北学的代表，与南高学派分庭抗礼。而南北学的对流，使北大派在与外界冲突激化复杂的同时，调整自我，从而形成现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格局。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烟台召开。

戴逸主编《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丛书由辽海出版社出版。

包括戴逸著《导言卷》、郭成康著《政治卷》、吴建雍著《对外关系卷》、秦宝琦和张研著《社会卷》、成崇德著《边疆民族卷》、黄爱平著《思想文化卷》、陈桦著《经济卷》、徐浩著《农民卷》、张世明著《军事卷》等。

陈启能在《世界历史》第3期发表《近20年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

文章认为，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20年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那就是20年来中国历史学正在不断探索自身的学科特性和要求，并努力按照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来发展自己。这是对在此之前中国历史学在“左”的思潮影响下走过的弯路，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拨乱反正和反思。这方面的重要表现就是对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诸如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历史认识论等等都成为史学界的热门话题。这期间历史学自身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一，历史学不再满足于过去被人为地束缚得越来越狭隘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而是尽力解脱出来，努力按照学科发展的正常需求加以扩大，恢复和开辟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如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史学史、中外关系史、妇女史、家庭史，以及史学理论、计量史学、心态史等等。其二，历史学摆脱了过去长期封闭的状态，开始与国际史学接触和对话。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该书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为底本，分为《原文及标题检索版》（167盘）和《原文及全文检索版》（175盘），全文版分经史子集四部出版。在保持原书真迹的基础上，将书中具有检索意义的书名、作者、类

目、标题、年代以至全文中的字、词、语全部数字化，并辅以数字化的《中华古汉语字典》、《四库全书大辞典》、《四库全书简明书目》等参考工具书，从而给读者提供了快捷、方便、有效的检索、统计、整理和编辑功能。

李学勤、齐文心、（美）艾兰编著《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甲骨文字》由中华书局出版。

黄宗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发表《中国法律制度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

文章呼吁从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多方面来研究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以便从新的角度来理解法制，也同时从新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作者认为，从这样的角度用这样的资料，可能做的课题非常之多。经济史学界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跳出以近代西方经济为规范的理论框架，建立适用于中国经济实际的概念和理论，尤其须要跳出现代经济学在西方资本主义经历的基础上建立的对人们经济行为的一些基本前提：诸如“经济人”肯定是“理性”的，也就是说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人；以及唯有自由的市场才可能合理分布资源，等等。研究现代的社会史，可以参照或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对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抉择和表达，诉讼档案可能是最直接翔实的资料。作者指出，话语的分析是很有用的研究方法。它之与旧思想史的不同，相似于社会史和旧帝王将相史的不同，话语史可以看作是观念的社会史，把研究目标从一个思想家转移到用共同话语的一个群体，从一个观念转移到多个观念之间的组合分离。

7月

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有关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的论文，二是翻译的俄罗斯解密的有关中苏同盟及朝鲜战争的档案材料。论文大量使用国际上新出现的相关档案文献，纠正了过去同类问题的许多不确切说法和结论，提出了更科学、更接近历史真相的见解。档案材料主要包括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

许纪霖在《读书》第7期发表《没有过去的史学危机》。

作者认为，到九十年代，乾嘉传统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在史学界大大小小的主流刊物或专业刊物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

形式化分类或编年史框架的史学论文，对历史的主观释读被挤压到最低的限度，追求客观化、实证化和真实性，成为史学的最高境界。当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正在探索多元的学术话语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却是那样地自信，相信只要手握独家资料，就占有了历史真相本身。它不仅是一种功夫论，也上升为一种史学观，相信历史是一种客观的实在，史学的使命就是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尽可能真实地揭示这一实在。

在作者看来，仅仅凭借老传统抱残守缺，是无法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史学的危机还远远没有过去。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根据大量有关中苏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对涉及到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次重大事件以及毛泽东性格和处事特点作了深入剖析。作者在 2005 年该书修订版前言中写道：该书写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严格说来并不在于发现历史，不过是从一种不同的角度重新深入这段历史，通过有针对性的思考，给读者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历史叙事而已。

耿云志编《胡适评传》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秦晖《耕耘者言——一个农民学研究者的心路》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部分有代表性论文的结集，所收论文除个别发表于海外刊物外，大部分发表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史学刊物上。所收论文基本围绕一个主题，即 20 世纪初“一系列文化、社会、思想、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的大变化”，即“权势转移”。意在探讨在这种近乎乾坤大挪移般的巨变中，各种地域、阶层、人物的不同感受以及命运。书中凸显了民初传统的中断与延续并存，新旧杂处而相互纠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想界位置错综、角色倒置的现象，揭示了民初社会发展与思想演变之间的互动关系，重新绘制了 20 世纪初复杂多变的思想史地图。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由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是作者在晚年面向大众撰写的一部考古学著作，分《两个怪圈》、《学读“天书”》、《解悟与顿悟》、《“条块”说》、《满天星斗》、《三部曲与三模式》、《双接轨》七章。书中以其六十余年的考古生涯为主线，集中

反映了作者在实践中探索考古学科理论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考古学的成长过程和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方面的主要成就，可看作是对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总结，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世纪之作”。

宋镇豪、常耀华编纂《百年甲骨学论著目》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本书搜汇了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迄至1999年6月的一百年间海内外所有公开或正式发表的关于甲骨文与商代史之专书论文，不加检选，全部收录，包括中国大陆及港澳、台湾在内，于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瑞典、瑞士、俄国、匈牙利、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里刊布的各种语种的有关论著，均详加著录。同时为了学科研究之参考需要，又辑集殷墟考古学、史前陶符及周代甲骨文等发现与研究之相关论著目，作为全书之两个附录。总计收入有关论著目10946种，按甲骨发现、甲骨综论、甲骨著录、甲骨研究、专题分论、甲骨类编、书刊评介、其他杂著、学人传记、附录共10大类进行编纂，每类之下，又有分目。书后附编年、作者、篇名三个索引。

彭邦炯、谢济、马季凡编《甲骨学合集补编》（全7册）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书中收录甲骨藏片15000余片，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本书吸收了海内外有关甲骨缀合和整理的新成就，纠正了《甲骨文合集》中的不少误缀，并将尚未缀合的予以缀合，使有关甲骨卜辞更加完善。

三联书店出版“张光直作品系列”。

包括《番薯人的故事：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中国考古学论文集》、《考古人类学随笔》、《中国青铜时代》等。其中《中国考古学论文集》收录了《中国青铜时代》（第一、二集）之外的重要中文文章，多为八九十年代作品，包括《圆山出土的一颗人齿》、《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中国远古时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料》、《考古学与“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等19篇论文，集中反映了作者在考古学发展上的建树，呈现出考古学理念演进的历程，以及与国内外学术界交流的成果。

童书业撰、童教英整理《童书业说画》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刊登《遵守学术规范推进学术对话——关于“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的笔谈》。

《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历史研究》编辑部于1999年3月14日在

京召开了以“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为题的学术讨论会，来自北京、上海、山东的学者就以上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约请部分学者撰写一组文章。参加笔谈的有杨奎松、谢维扬、赵世瑜、葛剑雄、马戎、李伯重、李强、苏力、罗志田、张乐天等。

罗志田在《社会科学研究》第 4 期发表《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

作者认为，“倒放电影”这一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结局已知，研究者容易发现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的事物之重要性，但其副作用则是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既存的民国史研究就有这样的倾向，导致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受忽视，乏人研究。其实不进步的一面形象模糊，会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研究中“失语”面相并予以“发言权”，民国史的图像会更具“全息性”。

日知《中西古典学引论》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多年来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论文集萃。作者独辟蹊径，将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古代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并试图解决诸多中西古典文明史研究中的重大史学问题。书中研究了有关国家和文明的起源问题，论述了中西古典民主政治，对流行于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观点提出强烈批评，并从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的角度就“封建主义”提出了创新意见。书中还从城邦角度来探究孔子及其思想，指出孔子是城邦时代的典型思想家，孔子思想在随后的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不断变化并继续存在，但已不是古典时代的孔子思想。

8 月

20 日　李学勤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外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比较》。

该文可以看作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题“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的总结。作者认为，有文献依据丰富、编年基本可靠的历史时期，逐次上推到依据较少、编年不明的较早时期，是年代学探索通用的方法。中国古史中的五帝时期及夏和商代前期都不能要求其年代有与后世相同的准确性。中国的年代学较多依靠较晚的文献，年代学的研究，特别是有关考古发现的增加，说明晚期文献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传世文献和出土古文字铭刻内的天象记录是年代学的重要依据，对这类记录进行现代天文学的推算常可在古史年代间确定关键性的绝对年代点。就目前的

年代学研究现状而言，年代学对各文明地区早期的大部分年代定年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推出大致的年代，即使是资料相对丰富的晚期的一些年代，也会因记载上的相互矛盾或因多种原因而无所适从。中国的年代学研究在当前主客观条件下也无法避免年代学上的无奈。

“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安阳召开。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中国殷商文化学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安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安阳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发起。海内外学者170多人出席，递交论文77篇。会议期间，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召开理事会推举王宇信为会长，推选田昌五为名誉会长。

是月　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胡厚宣主编，王宇信、杨升南审校《甲骨文合集释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分四册，依《甲骨文合集》片号顺序，逐片释文，释文采用前人较为公认的说法加以隶定，但不注明出处。

陈其泰《史学与民族精神》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本书着意从史学这一重要的文化载体中，发掘出历代优秀史著中所蕴含的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凝聚力的伟大民族精神。

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汇集了作者徽学研究的代表性论文，内容涉及徽州宗族、徽州商人、徽州文化及徽州社会的分析与研究，也包括其对徽学为代表的区域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及其发展前景等诸多方面的探讨。

南开大学历史系主办、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辑出版。

9月

24日　中国史学会与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科技史学会、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在北京联合举办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报告会，200余名学者出席。

是月　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出版。

作者以翔实的资料，对甲骨文发现一百年来收集、整理、保存和研究的全过程进行了全面总结，论述了甲骨学的形成与发展、成就与不足，介绍了百年来甲骨文研究的重要成果和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并对21世纪的甲骨学研究进行了展望，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

杨奎松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发表《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

作者认为，中共党史研究如果不能按照史学的要求向着规范化、高质量的路上走，怕是很难真正成为一门得到社会公认且受人尊敬的学问。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书分九章，旨在揭示史学发展的全过程和阶段性特点，揭示史学发展与历史发展的密切关系和史学的社会作用，从而揭示了史学的本质和意义。本书独到之处在于：力图在阐述中国史学发展之全貌的基础上，适当突出这一发展过程中理论成就的积累，并尽可能兼顾到有关认识历史的理论和有关认识史学的理论。在分期方面，采用了长期以来人们比较习惯并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时段划分，以便使更多的读者在熟悉的历史时段的框架中去认识该段史学发展的面貌。书中关于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史学史的性质和任务、中国史书的特点、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史学和社会等问题的阐述多有新意。作者还对中国史学理论遗产做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明确划分。

姜义华在《同济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中国人文科学五十年》。

作者认为，五十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经历了从“废名”到“正名”、从“革命性认同”到“现代性认同”、从“师法”到“创新”的一条相当曲折的道路。就其发展阶段而言，前三十年归趋于革命性、革命人，后二十年归趋于现代性、现代人。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性思维与创新能力已成为人文科学的发展主题。

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探究了自盎格鲁-撒克逊以来1500年间英国政治制度的历史演变，介绍了英国封建制的产生、确立和发展，包括贤人会议、大会议和议会的兴衰与运行，法律制度、王权和贵族的权势对抗等；探讨了都铎时期英国中央和地方权力的迅速变革，并勾画了17世纪英国政府体制的曲折

变化；揭示了君主立宪制建立后英国贵族权势的长期存在和原因，系统介绍了英国近现代议会制、内阁制、文官制、政党政治和地方政府等多方面的发展。

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0月

9日　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会见了前来参加会议的中外专家学者。李瑞环指出，人类社会正处在世纪之交，面临着许许多多的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固然首先要依靠当代人的聪明才智，但也可以从古代哲人那里寻找智慧。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儒家学说可以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

是月　首届“长江读书奖”评奖工作启动，最终酿成“长江读书奖”事件。

“长江读书奖”由李嘉诚旗下香港长江集团李嘉诚基金会捐资100万，与《读书》杂志共同设立。参与评奖工作的汪晖、钱理群等人的作品也在获奖之列。此结果招致众多非议，一场关于“长江读书奖”的争论由此在学术界、文化界热烈展开，并最终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

这一争论加剧了当代中国知识界的分裂。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作者自传，记录了作者的生平事迹和游美日记等，其中对童书业、王崇武、徐中舒、丁山等友人的回忆是十分宝贵的学术史资料。尤其是由其夫人高昭一撰写、作为附录的《我与俪生走过的路》，真切地描绘出赵氏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拒绝同流合污所付出的极其惨痛的代价，集中反映了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苦难遭遇。

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收论文44篇，涉及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历算学等方面，对有关夏商周年代学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富于创新性的见解。

严文明在《文物》第10期发表《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文章对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进行了全面回顾，认为：第一，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中国文明最先起源，发展水平最高，并且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当不晚于公元前4000年。第三，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在一个狭小的地方，也不是在边远地区，而是首先发生在地理位置适中、环境条件也最优越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各地的情况不同，文明化的过程也有所不同。它们相互作用，此消彼长，逐渐从多元一体走向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统格局，再把周围地区也带动起来。这一格局的形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点，也是她之所以具有无穷活力和强大凝聚力，以至成为世界上几大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得到连续发展的伟大文明的重要原因。文中还谈到了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不足之处。作者强调，如果把考古研究与古文献和古文字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文明起源进行探索，必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谱牒研究——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共五册，近270万字，叙述了从先秦至1999年6月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作者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放在整个人类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加以论述，突出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对世界经济做出的贡献。

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共分十七章，主要论述了文艺复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学者对希腊罗马史的研究状况。该书并不仅仅孤立地研究希腊罗马史的学术史，尤注重历史背景、社会思潮和思想的变动、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等对希腊罗马史研究的影响，力图把希腊罗马史的学术史放在整个西方的学术环境中考察。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成立。

该机构前身是成立于1986年的吉林大学中国北方考古研究室，由考古学家张忠培担任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我国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及东北、西北边疆及其毗邻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工作，1996年更名为东北亚考古研究所。

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第一次将中西公益事业史放在对等的平台上进行了长时段的回顾与比较，揭示了中国和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在公益事业中起作用的机制。作

者强调了明清以前民间社邑和寺院在公益事业中的作用，认为明清国家公益职能日益萎缩，宗族的作用也局限在“清中叶以后”和“东南沿海地区”这样的范围内，并提出了“小共同体”与“个人”联合的公益事业模式等有创见性的观点。

林甘泉主编《文坛史林风雨路——郭沫若交往的文化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1 月

11日　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杂志社和天津市社联共同举办的“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

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关于传统社会形态理论及相关理论的再认识，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形态及演进过程的新思考，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的新探讨。讨论比较集中、深入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题目：一、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分期与社会形态；二、关于中国早期社会；三、关于阶级、社会关系及农民问题；四、关于中国的商品经济、市场与历史发展的特点。

与会学者认为，西方的社会形态理论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大多来自对欧洲历史的概括和抽象，不能用来剪裁中国的历史。我们现在使用的许多概念、范畴、规律，当初主要是从欧洲狭小地区、短时段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往往缺乏普遍意义。这妨碍我们从世界范围内对社会历史形态做深入探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史研究所吸收，怎样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认识作为一种区域研究的中国历史与主要以西方文明模式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解释系统之间的契合与非契合关系问题等，都值得深入研究。因此，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时，不能生吞活剥，照搬硬套，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中国的历史实际。中国社会形态的理论应该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中抽象出来。许多学者呼吁创建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论模式。跳出各种外来的理论模式，研究中国的特殊性，构架适合中国历史的理论模式。

是月　李学勤在《中国史研究》第4期发表《五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与古代文明研究》。

文章简要回顾了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商文化的文化序列之确立过程，认为处于这一序列中的一些与夏商都邑有关的遗址对了解夏商文明有着重要意义。并高度概括了作为文明标志的城市、文字和金属冶炼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状况，认为“中国肇始要比一些人设想的更早”。作者指出，大量重要的考古发现扩大了中国古代文明在空间上的广度，受“华夷”思维影响产生的中原文明中心论，已被苏秉琦创立的区系类型说所取代，对70 年代以来发现的大量秦汉简牍帛书的研究，必会“将中国古代文明顶峰的辉煌进一步昭示于世界”。

李金明《中国南海疆域研究》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把历史研究和国际海洋法研究结合起来，克服了以往有关南海主权研究中国际法学家在历史资料方面显得比较贫乏，历史学家在国际法的应用方面有所欠缺的弱点，以国际法、海洋法为依据对我国历史上有关南海疆域的记载进行分析，论证了我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中、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书精选或节选了 1840—1949 年间近代中国有关启蒙思想的专著，并发掘了一批新的有关启蒙思潮的文献。主编所撰“导言”概括了近代中国启蒙思潮酝酿、产生、发展的状况；每卷前的“本卷前言”概述了各时期中国启蒙思潮的发展脉络、阶段及代表人物；每专题前的“提要”则按选编文章内容的发表顺序，对文章的撰写者和资料出处做了介绍。

黄鸿钊《澳门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欧美、日本汉学界著名学者跟中国国学大师之间的交往作了钩沉与梳理，揭示了中国近现代学术体系的海外因素。作者认为，治学须知大势，近代国际汉学界对中国认识的深化和中国学者掌握西学外语程度的增强，使得彼此得以沟通，渐成一有机整体。通过描述分析中外学界的交往关系，可以显现学术发展的状况趋势，并把握个人及流派在其中所处的时空位置，进而探寻新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正途大道。

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作者通过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对比分析，以正本清源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探讨了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的路径。分三编，分

别为“唯物史观的再认识”、“唯物史观与中国史研究”和“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作者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2月

28日　刘大年逝世，终年84岁。

30日　“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是月　刘大年在《明清论丛》第一辑发表《评近代经学》。

该文是作者晚年最重要的一篇论文，历时多年撰成。全文共约八万字，分引言、正文和结束语三个部分。作者指出：“近代经学是历史的产物，它完成了历史提出的必须完成的任务。今文学、古文学两派的激烈斗争，暴露了经学的重重矛盾和不合理性。这种矛盾和不合理性，是要由它的自我揭露来实现的，没有其他办法代替。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宣告近代经学及其斗争成为过去；同时，是高声宣告了经学二千年统治地位的最后终结。”

文章最后结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是中国文化现阶段的重要发展。孔子学说统治成为过去，近代经学结束，是历史朝前演进的必然，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

李伯重在《清华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1500—1840年》。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这是正确认识鸦片战争前几个世纪中，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和西方所起作用的关键问题之一。中外学术界对此已争论了半个世纪，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作者认为，在这个时期中，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乃是一个客观存在。文章分析了中国全国市场形成的基础、中国全国市场形成的主要方面以及西方对于中国全国市场形成所起的作用，指出只有抛弃西方中心论，才能真正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特点。

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古文字诂林》第1册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共十二巨册，迄2004年完

成出版。汇录了上自殷商下迄秦汉的甲骨文、金文、古陶文、货币文、简牍文、帛书、玺印文和石刻文八种古文字的考释成果。共一万多个字头、一千多万考释文字，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搜罗最齐备的古文字汇释类工具书。它将历代学者的古文字研究成果荟萃于一编，填补了我国汉语文字学学科建设的一个空白。

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是国际公认的马可波罗研究权威之一，该书是其一生研究马可波罗的总结性著作，汇集其 50 余年研究马可波罗问题的重要论文。其中多曾产生重要学术影响。书中以《永乐大典》等史籍以及古今中外关于马可波罗的著作为参考，从各方面来推论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并对国际上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观点予以辩驳。

漆侠《探知集》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蒋大椿在《安徽大学学报》第 6 期发表《近五十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

本文概述了近 50 年来史学理论发展的基本情况。一、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的史学理论，包括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76 年“文革”结束。这一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是，由于当时人们认为唯物史观就是指导史学研究的最好理论，历史学自身当然就无须再建设自己的理论，所以史学理论学科的整体建设没有提上日程。尽管当时史学界没有自觉意识到史学理论自身建设的必要，但以唯物史观指导的历史学只要实际地开展历史研究，也就必然地会遇到一些与历史学自身有关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历史、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史与论的关系问题，以唯物史观中的什么具体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亦即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等问题。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史学理论，起自“文革”结束。这一时期史学理论的基本内容有：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初步开展；对“文革”前提出的传统史学理论命题研究的拓展与突破；新的史学理论问题的提出与探讨；史学方法研究形成热潮；史学理论史研究的开展与深入。

陈淳在《东南文化》第 6 期发表《早期国家之黎明——兼谈良渚文化社会政治演化水平》。

葛剑雄等著《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 年以来）》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本书论述了人口的数量变化、移民、人口分布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进行了总结性陈述。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总论，中编按学科门类概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等历史学领域的研究情况，下编对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四川大学中文系《新国学》编辑委员会编《新国学》第1卷出版。

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朱学勤文选》由长春出版社出版。

《欧亚学刊》创刊，余太山任主编。

该刊为不定期、连续性学术刊物，一年左右出版一辑，每辑约30万字。主要刊登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范畴的专题（或资料）研究论文。

钱乘旦、刘金源《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探讨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误为目标，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奥地利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土耳其、巴西、伊朗、埃及、加纳、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原苏联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领导力量的错位、宗教与国家的对抗、军人干政、二元社会、贫富差距、单一经济、部族冲突、腐败问题、毒品经济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本书反映了这样一个思想：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现代化不是个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个必须接受的现实；与历史上所有阶段一样，现代化不可能十全十美，现代化道路上充满了陷阱，它会加剧或造成各种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妥善解决，直接关系到现代化的成败。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误现象，有些具备历史必然性，有些则与现代化战略与现代化推行者的主观意图有关。不同类型的失误应该予以区别对待：对那些难以避免的问题，现代化后来者应该未雨绸缪，尽可能采取措施，将其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对那些不具备必然性的问题，则应及时吸取前车之鉴，及早避开这一陷阱，尽量减少现代化的失误。

钱乘旦等著《日落斜阳——20世纪英国》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我国学者所撰第一部20世纪英国通史。《世界历史》1998年第2期发表《进步是20世纪英国的第一主题》书评文章，指出本书具有历史定位恰当、时代主题把握准确、突出社会史、突出英国经历的世界意

义等优点，并在编写方式和体例上有所创新。

1997 年 7 月，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首先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

《明清论丛》创刊。

该刊由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联合海内外学者共同主办，是一本专门研究明清两代历史的大型论文集刊，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每年一辑，约 50—80 万字。

秦晖《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由长春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作者的一部文集，包括匹夫之言、问题与主义、他山之石、文化与制度、四十而惑五辑，反映了作者对中国与世界发展历程中一些表层与深层问题的看法。

（美）唐纳德·沃斯特著，候文蕙译《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是年

林在勇主编《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开始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丛书汇集了 20 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部分著名学者的学术传记，部分书籍作者本人亲笔撰写，更多的则是采用作者口述、弟子代为整理的方式来撰述，内容侧重于治学生涯的回顾与总结，是研究现当代学术史有价值的资料。共 21 册，包括《张岱年学述》、《王利器学述》、《周子美学述》、《林耀华学述》、《刘佛年学述》、《戴家祥学述》、《金景芳学述》、《钱仲联学述》、《傅振伦学述》、《冯契学述》、《王钟翰学述》、《袁珂学述》、《王永兴学述》、《杨向奎学述》、《马学良学述》、《周一良学述》、《何兹全学述》、《邓广铭学述》、《饶宗颐学述》、《顾廷龙学述》、《钟敬文学述》。2000 年全部出齐。

中华书局开始出版《世界汉学论丛》。

该丛书具有较大规模，已出书目包括法国学者雷奈·格鲁塞著《东方的文明（全二册）》，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法国学者伯希和著《郑和下西洋考交广印度两道考》、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等，所收论著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国家文物局公布本年度十大考古发现。

江苏江阴高城墩遗址（新石器时代）、河南焦作府城商代早期遗址

（商代早期）、湖南虎溪一号汉墓（西汉）、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东汉）、吉林通化万发拨子遗址（秦汉）、辽宁桓仁五女山山城遗址（新石器时代至南北朝）、山西太原虞弘墓（隋）、安徽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唐代至宋代）、河北元中都遗址（元）、四川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明代）。

2000年

※ 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
※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出版。
※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出版。
※ 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出版。
※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出版。

1月

24日　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获一等奖，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中国远古人类》，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漆侠《宋代经济史》，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和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获二等奖，《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中国人口发展史》、《中国古代地图（战国至元）》、《中国民族史》、《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东晋门阀政治》、《吐鲁番出土文书》、《沙俄侵华史》、《辛亥革命史》、《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居延新简》和《清代全史》12部著作获三等奖。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等7部著作获得荣誉奖。

是月　郑师渠主编《中国文化通史》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分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两宋卷、辽西夏金元卷、明代卷、清前期卷、晚清卷、民国卷，共10卷。分述不同历史时期思想学术、文艺、宗教、教育、科技、风俗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全面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历史风貌。书前总序提出了著者对中国文化发展历史的总体看法，阐述了中国文化史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历程，并对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脉络、中国文化的特质进行了梳理与概括。关于中国文化史的分期，总序指出："中国文化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但其分期应有自身的根据，而不

能强求与政治史或经济史相一致。……文化自身有很强的传承性和相对的独立性。从人类历史上看，精神文明并不总是与物质文明同步。”作者强调，中国文化史的分期，当考虑到三种因素：一是“中外文化的关系”，二是“民族与文化的关系”，三是“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关系”。本书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大势，分为六个时期：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近代，并具体概括了各个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特点与走向。

本书在编撰体例上做了探索，采取了“虚”、“实”结合的写法，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问题论述与部门描述很好地结合起来。各卷前四章为：“文化与社会”、“文化的时代精神”、“文化论争”、“文化交流”，着重阐述各时期文化发展中的综合性问题，揭示该时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特征。以后各章对各时期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教育、宗教、社会风俗以及文化事业等方面展开深入详细的论述。这种编撰体例较好地吸收了各家体例的长处，又克服了它们的不足，形成了自己的编写特色。

李伯重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

“宋代经济革命说”是国际中国史坛上最流行的成说之一，本文彻底否定了这种观点。文章指出，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如果真有“宋代经济革命”，首先应表现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但从经济成长方式看，宋代江南虽有若干重要进步，但并没有出现可以称为“革命”的重大变化。因此，“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一个“虚像”而已。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是方法论，主要表现为“选精法”和“集粹法”，这两种方法的主要错误都在于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现象加以普遍化，从而使之丧失了真实性。因此对以往的研究方法进行总结，是今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当务之急。

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系统地论述了自古希腊至当代的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被称为是中国学者在探索“建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中国学派”的道路上所进行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作者在论述中，注重西方史学思想的演变及史学流派之盛衰的分析和评述，并将西方史学放置于西方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之下进行考察，不仅将某个时期的西方史学放置于当时整个西方社会文化环境之下加以分析，而且还将每个史学家也放置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之中加以研究。

刘东主编《中国学术》创刊。

该杂志由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出版，第 1 辑收录《重建国家权威与思想秩序——八至九世纪之间思想史的再认识》、《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等论文，以及评论、书评 20 余篇。

李根蟠《农业科技史话》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刘登阁、周云芳《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许纪霖在《开放时代》第 1 期发表《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秩序——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考察》。

文章认为，如何将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有机地融合一体，建构一个自由的、公正的、合理的社会秩序，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构成了对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巨大挑战。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拥有深刻的问题意识，他们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却无力在学理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更无法在实践层面落实自己的设想。尽管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政治实践上失败了，在政治哲学上也贡献无多，然而，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重新检讨，依然不得不敬佩他们对古典资本主义的敏锐反思和对“自由与公道”强烈的问题意识。在问题意识方面，他们无疑与西方的思想家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殷海光等 50 年代台湾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有更深刻的思索。而他们所留下的思想遗产，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即使到半个世纪以后，依然值得我们反复地咀嚼，因为他们提出的“自由与公道”的问题，依然是一个尚未实现的现代性命题。

柳洪亮主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录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65 号窟出土的摩尼教书信文献，以及三篇有关吐鲁番历史上摩尼教问题的论文。

杨向奎《杨向奎学术文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漆侠主编《中国改革通史》（十卷本）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谭其骧著、葛剑雄编《求索时空》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罗志田在《开放时代》第 1 期发表《乾嘉传统与九十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

针对许纪霖为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所撰书评中所言“到九十年代，乾嘉传统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一语，

作者认为，乾嘉传统决非九十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连支流都算不上。

王子今《中国盗墓史——一种社会现象的文化考察》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本书描述了中国历史上的盗墓活动和盗墓故事，揭示了盗墓者常用的技术手段和反盗墓措施，分析了盗墓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论述了盗墓在中国文化发现上的历史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该中心所依托的学科点由白寿彝创立，具有长久的历史积累和广泛的学术影响。特别是在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两个领域，具有显著的特点和优势。出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 月

庞朴等人创建、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简帛研究”网站（www. bamboosilk. org）开通。

罗志田在《历史研究》第 1 期发表《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

罗继祖《枫窗三录》由大连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作者读史札记。1984 年 2 月，作者曾将部分读史札记编成《枫窗脞语》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后续选为《墐户录》，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 1989 年 6 月出版。作者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再加上此前未刊的《留灯录》及昔年孑遗和晚年新作，编成《枫窗三录》。全书分史札、尚论、表徽、文物、东北史丛话、杂俎六部分。史札评述历史上的事情，尚论专评历史人物，力求探索历史变迁的因革轨迹，为治史者提供借鉴；表徽专门表彰历代贤媛才女和有突出事迹的妇女；文物讲述各种文物的流传；东北史丛话为研究东北史的独特收获；杂俎为无可归类的零碎心得。《枫窗三录》用笔记体文言写作，每篇长则千余言，短则数百言、几十言。内容宏富，持论公允，见解高绝，文笔清雅，体现了广博的修养和卓异的史识，为被誉为当代的《容斋随笔》。

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作者对翦伯赞的史学实践及悲惨遭遇作了深度发掘，并对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典范性予以高度评价。作者在该书后记中交代：在当下中国的学术格局与语境中，唯物史观派史学已从学坛上的强势者沦变为弱势者，正在承受来自民间话语的冷落与排斥。作者坚持认为，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民国

时期的“新汉学”之外，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知识方向，铸造了一个“年鉴派史学”那样的知识范式，这种知识方向与知识范式理应受到时代的审查、反省与批判，但至今并未过时。而翦伯赞是这一知识方向和知识范式的“始作俑者”之一，所以仍然值得研究。

该书为戴逸主编《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之一种，该丛书还包括:《严复学术思想评传》、《章太炎学术思想评传》、《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王国维学术思想评传》、《陈垣学术思想评传》、《马寅初学术思想评传》、《熊十力学术思想评传》、《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李达学术思想评传》、《陈寅恪学术思想评传》、《胡适学术思想评传》、《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梁漱溟学术思想评传》、《金岳霖学术思想评传》、《钱穆学术思想评传》、《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瞿秋白学术思想评传》、《闻一多学术思想评传》、《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徐复观学术思想评传》、《侯外庐学术思想评传》、《牟宗三学术思想评传》、《艾思奇学术思想评评传》等。

许纪霖在《战略与管理》第1期发表《二种危机与三种思潮——20世纪中国的思想史》。

作者认为，“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主义到20世纪初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即道德和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和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针对于此，五四启蒙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两大主张，希望以科学的方法克服意义的危机，以民主的蓝图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然而，随着启蒙运动内部的分化，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愈加复杂和分歧，现代性不再是一个统一的、自明的范式，在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之下，分化成三个尖锐对立和紧张的思想阵营，即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新保守主义。它们对意义危机和秩序危机各有各的解决之道，但又因此带来了新的问题，不仅传统的危机没有得到舒解，反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加剧了危机本身。除了短暂的个别时期之外，这两大危机笼罩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至今没有获得解决，而且将这一问题遗留到了下一个世纪。

3 月

21 日　白寿彝逝世，终年91岁。

是月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历时十余年，搜寻考辨大量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详细剖析了延安整风的前因后果及运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力图再现当年这场运动的历史真貌，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会贯通。

该书出版后影响巨大，萧功秦评价说："高华这本史学专著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它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并通过这一揭示回答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

瞿林东在《历史教学》第3期发表《20世纪的中国史学》。

第5期连载。作者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一、近代化和科学化逐步深入的趋势；二、社会化和大众化逐步扩大的趋势；三、逐步自觉面向世界的趋势。作者指出，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最突出的成就是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和编撰，最重要的经验是关注社会历史的发展，最深刻的教训是史学的最高品格是实事求是忠于事实。

（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该书意在颠覆历史学界及社会科学界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论，其中心观点是：当今这个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亚洲尤其是东亚，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作者特别突出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所占地位，认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在作者的分析中，欧洲在很长时间里是世界经济一个次要的和边缘的部分，直到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这一中心。且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该书出版后，以其挑战性和争议性引起国际学术界震动，中译本也在中国史学界引发激烈争论。

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著者认为，新学是中西会通基础上形成的与传统中国旧学体系在知识体系和价值标准上全然不同的新的知识系统；它在结构体系上兼有中学和西学的二元知识因子，因此既与单纯的西学也与传统的中学一元结构相区

别；在制度层面上新学以近代学校体制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为标志，与以书院和科举八股人才为标志的旧学体制相区别；在社会政治作用上，新学是晚清一系列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学理基础，并以此从学理层面上与维护旧制度旧政体的旧学相对立；在时代意义上，新学标志着一个学术文化新时代的到来和旧时代的终结。

曹家齐《顿挫中嬗变——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由西苑出版社出版。

4 月

15 日　中国史学会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20 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术讨论会”，近 200 名学者出席。

这是中国世界史学界第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术会议，与会学者总结了我国 20 世纪世界史研究的历程，并对世界史研究的未来方向进行了探讨。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认为，在世纪之交的这一时刻，在世界日益全球化和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今天，中国人必须全面地了解世界，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中国学者研究世界史固然在资料等方面有局限，但也有自己的优势。例如，其他国家的中国史研究对我们有参考价值，同样，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也应该而且能够有自己的特色。齐世荣说，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改革开放，而要改革开放，就必须了解世界，既要了解它的现状，也要了解它的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他认为，中国人研究世界史，虽然掌握的资料不如外国人，但对外国的问题，我们有外国人所没有的视角，即所谓“旁观者清”。另外，近年来，国内的资料状况已有了很大改善。所以，只要掌握了基本的材料和正确的方法，仍然是大有可为的。

27 日　“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是月　《历史研究》第 2 期发表《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

包括何兆武的《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过程中三个关键性时代》、田昌五的《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新构想》、马克垚的《说封建社会形态》、宁可的《中国社会形态研究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刘泽华的《分层研究社会形态兼论王权支配社会》、冯尔康的《从农民、地主的构成观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朱凤瀚的《从生产方式看商周社会形态》、张国刚的《本土化：重建中国

社会形态理论的根本》、晁福林的《探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沈长云的《认清中国古代非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特色》、李伯重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

编者按说：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五六十年代时曾有相当热烈的讨论。改革开放初期，史学界又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深入。得益于基础研究和实证研究近20年来的发展和进步，使我们今天有可能从新的高度重新认识这一问题。对于涉及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再做反省和研究，已经重新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本书介绍了"一炷香"、"八卦教"、"离卦教"、"圣贤道"、"九宫道"、"皈一道"、"一贯道"以及"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红枪会"等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的历史与概况，对这9种组织的地域分布、祭献仪式、道书家谱、灵文口诀，以及这类组织在历史演进不同时段的活动特征进行了详细地探究。

该书建立在长期而广泛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调查范围覆盖山东境内及河北部分地区计70多个县域，且历时十年，不论从时间跨度还是从地域范围看，都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民间教门的田野调查。

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王彦辉在《史学月刊》第4期发表《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

文章指出，乡里政权是汉王朝派出的最基层行政机构，乡官里吏尽管职卑禄薄或根本无禄，但职轻责重，构成汉王朝最基本的政权基础。汉代豪民在类型上可大致划分为工商豪民和乡里豪民。汉武帝官营工商以后，乡里豪民成为豪民阶层的主体，并逐渐有效地控制了乡里政权，成为汉政权维系地方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同时，豪民又鱼肉乡里，破坏封建秩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统一国家的对立物。

5月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上、中、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一部研究清末民初中国经济变迁的专著，是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的续篇，准备工作可溯及60年代，与严著

同时，并一本严著路数，即在长期考究史料的基础上，先作专题研究。全书根据半殖民地的时代环境和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全书的中心线索，用以推动理论分析，并提纲挈领，联系各个方面。全书分为 3 篇 16 章，近 180 万字。

吴承明认为：本书“完全是本着实证主义原则撰写的：资料翔实丰富，基础雄厚稳健，每项论证都有根有据，这是本书的最大特色。这种著作，随着时代转移，即或某些论断必须修正，仍将巍然屹立于史学之林。按国外先例，称之为金字塔式著作，当之无愧”。

王鹤鸣等主编《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图书馆为国内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单位。该目录是一部解题目录，共收录馆藏以线装为主，兼及部分其他装订形式的旧修家谱 11700 余种，涉及姓氏 328 个，家庭居地分布在全国十多个省和直辖市。编次以谱主的姓氏笔画为序，每部家谱依次著录谱名、卷数、纂修者、版本、册数等，对于谱名不确者，则注明本谱名因何而得，解题内容包括始祖、始迁祖、迁徙路线、谱内各卷内容及其他有价值的资料等，最后著录本谱在馆内的入藏信息。

罗志田在《近代史研究》第 3 期发表《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

栾丰实在《中国史研究》第 2 期发表《太昊和少昊传说的考古学研究》。

文章指出，太昊和少昊是古代东方地区两大部族。距今 5000 年前后，豫东、皖北和鲁西南地区是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其居民应为传说中的太昊部族。这一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海岱地区东部的同时期文化之间具有较多的共性，进而可以推定其自东部的沂沭河流域迁徙而来。少昊部族所处的时代大体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当，结合传说中少昊部族的地望，即主要分布于泰山南北两侧地区，可以认为这一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至少是晚期）应是少昊部族所创造的文化。

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赵生群《〈春秋〉经传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作者在前人基础上，注意挖掘内证，运用统计、对比的方法，对《左传》的性质及其与《春秋》的关系、无经之传与有经无传的问题、叙事

与解经的关系、《春秋》的作者等一些基本而关键的观点，做出系统而富创造性的研究。

6 月

1 日 《求是》第 11 期刊登《面向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如何深入》笔谈。

这组文章包括瞿林东的《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创新》、林甘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龚书铎的《既要“自下向上”，也要“自上向下”》、庞卓恒的《史学需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齐头并进》、田居俭的《社会史的研究需要上一个台阶》、于沛的《研究外国史学理论与方法为建设中国历史科学服务》、张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要继承也要超越》。

13 日 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埃里克·方纳访问中国史学会。

是月 蒋大椿在《历史教学》第 6 期发表《八十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第 7、8、9 期连载。该文长达 4 万字，作者将 80 年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个阶段，全面回顾了八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成就及经验教训。文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酝酿、形成、初步发展到基本定型，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建设取得的巨大进展及遭受的打击，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空前繁荣与建设性的发展都做了鸟瞰式地梳理。

章开沅等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共分八章：第一章，社会转型中的晚清督抚群体；第二章，国民党执政时期县长的人事嬗递与群体角色；第三章，社会转型中的近代绅商；第四章，近代乡绅与宗族社会；第五章，从商会看近代中国的官商关系；第六章，近代商与学的互动及其影响；第七章，知识分子的角色与社会功能；第八章，近代官绅商学与宗教。全书选取了晚清督抚、民国县长、近代绅商、乡绅、商会、知识分子等最能反映中国近代史上官绅商学的角色和功能的群体，勾画了它们自身发展脉络及其价值观念、社会心态、政治理念、社会功能、社会组织，分析了它们在近代的交错流变、相互渗透依赖的复杂关系，以及由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近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宋家钰、刘忠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原由香港龙门书店1976年出版。作者自言："本书的基本立场是从学术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阐明理学转入考证学的过程。"分内外两篇：内篇先谈章学诚的史学观点与清代学风，再谈戴震对于义理、考据两项的彷徨歧路，然后再归宿到义理。外篇谈戴震 经学路径的转变，对戴震与伊藤仁斋、章学诚与柯灵乌进行了比较，并对有关章学诚与童二树一条重要史料加以辩证。

余氏力图用"内在理路"（inner logic）说，来解释明清之际儒学发展从"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变，为解释宋明理学向清代考证学转变的原因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此书引入大陆以后，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7月

23日　杨向奎逝世，终年91岁。

26日　"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广汉市召开。

是月　王学典《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该书从知识考古学的视角出发，对以顾颉刚为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史辨"派的学术活动进行了考察。书中专门将学术接力中的"师承"因素作为研究对象，特别以顾颉刚与何定生、谭其骧、童书业、杨向奎等众弟子的关系为个案，观察顾氏育才方法，意图再现"后科举时代"学术授受的情景及顾氏师徒间的一些恩怨是非。书中通过顾颉刚广泛的学术活动，再现了民国学坛的风云际会，勾勒出一幅清晰的中国现代学术薪火相传的画面。

书中大量使用书信、日记、档案以及口述材料等稀有史料，出版后广受欢迎，《全国新书目》杂志在"特别推荐"栏目称许此书为"每一个想走治学之路的大学生，尤其是文科学生"的必读书；《文汇读书周报》刊文评价"对今日学人来说，这更是一本讨论史学方法的书，它会告诉人

们：如何做学问，如何为师”。

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大事典》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叙述了从原始社会至西周末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55万余字。共分15章，依次分别是：原始群居的社会生活，妇女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唐、虞、夏与先商，商王朝前期的历史，商代阶级国家的形成，商代后期奴隶的数量，众或众人的身份及商代的社会属性，商代后期的经济发展，商代后期的社会组织与政治机构，商代文化科学与艺术，先周族的来源及其社会发展，周王朝的建立，西周的政治及其发展，西周的社会经济，西周的衰微、灭亡等等。

蒋大椿、陈启能主编《史学理论大辞典》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辞书，共收词条1529个，内容涉及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对史学理论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史学理论著作，以及各种史学理论的各种流派、刊物以及重要的史学理论讨论等等。在全部条目中，除290个史学作品、534个史学家以外，其余七百多个均属于史学理论概念的条目。编者在选择条目时，特别注重引进西方史学的新概念、新术语，有助于读者全面把握史学理论领域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该书系统地汇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分上、下两卷，上卷分四辑收录23篇论文。第一辑为五四专辑，探讨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想变化的根本原因；第二、三两辑重点讨论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风起云涌的各种观念与论战；第四辑则梳理了五四以来激荡中国的各种思潮。下卷分三辑，共收录了22篇文章。第一辑通过对胡适、殷海光等人的思想研究，探讨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构成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哲学背景。第二辑介绍了发端于“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第三辑主要讨论了激进主义思潮和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分析了它们的特征、性质和作用。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由施萍婷主撰、邰惠莉助编，美国安德鲁·W. 梅隆基金会资助出版。编者在陈垣、刘铭恕、王重民原编《敦煌劫余录》、《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的基础上，对北京、伦敦、巴黎所藏二万多件敦

煌写本逐一著录定名，过录写本题记，加注予以说明。并按写本定名编制笔画索引以便检索。比 1983 年版《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著录更为详细准确，是敦煌学及古代文史学者重要的工具书。

刘庆柱在《考古》第 7 期发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8 月

6 日　金冲及率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参加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第 19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11 日　第 11 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

会议由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与黑龙江大学联合主办，主要议题是展望 21 世纪的历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讨论历史学的性质。

21 日　中国社会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壁市举行。

会议讨论的问题包括中国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等。会议期间，中国社会史学会进行了改选，产生了由冯尔康任会长的新一届理事会。

是月　罗志田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

本文研究了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忽视的一个现象，即以北伐前后史学研究中出现的“史料的广泛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两种倾向并存的诡论现象，并以此为中心，探讨了当时新旧史学见解歧异之所在，对这一现象与疑古倾向、“二重证据法”的关联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当时新派学者刻意扬弃正统而注重异端，形成一种从边缘重写历史的倾向，他们为进入世界学术之林（即“预流”）并与西方争胜，而更多关注西方汉学家重视的研究领域和材料，这些因素都直接间接影响到学者的史料观，既极大地扩充了史料，也导致轻视常见文献的取向，影响相当广远。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史学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收录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未来世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我所认识的钱宾四先生》、《近五十年香港地区之明史研究》等近 60 篇论文。

《吐鲁番学研究》创刊。

该刊由新疆吐鲁番学会、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主办。

9月

1日　李伯重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势》。

作者把“融入世界”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所谓中国经济史研究之“融入世界”，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突破“汉学”或“中国学”的藩篱，把中国经济安置于更大的空间范围中进行研究，不仅注意中国自身的经济变化，也注意中国的经济变化和世界其他部分的经济变化之间的关系；第二，更加深入地进行中外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以往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普遍使用的理论模式进行检讨，从而发现真正适合中国实际的模式。由于这两项工作正好反映了当今国际史坛中所出现的两大主要挑战，因此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这股新潮流，正是中国经济史学真正融入国际史学主流的重要表现。

是月　胡逢祥《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其泰在《齐鲁学刊》第5期发表《“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论题的价值——兼评〈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文章认为，范文澜在50年代初提出的“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论题有三项重要的理论价值：一、对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提出了否定，是历史观的一大进步；二、从本质上对直接生产者创造的物质财富是社会的基础，生产力的体现者推动社会前进，人民群众的意志最终决定历史前进的方向这些普遍的历史现象和大量重要史实作了理论概括，对于推进历史学的科学化意义重大；三、将鼓励人民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创造更美好的世界。黎澍否定此一论题所提出的论点和论据实属不当。

李洪岩《史学史话》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通俗易懂的笔调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重要人物、重要流派及思潮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下册）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自20世纪50年代末，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大规模实地调查，获得大量文字及口述资料，该书就是对这些调查资料的整理与汇编。因内容翔实丰富，被视为义和团运动研究最重要的参考书籍，为

国内外义和团研究广泛征引。

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研究一百年》由齐鲁书社出版。

该书分“百年研究述评”、“百年论著目录”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百年来中外义和团研究的概况；第二部分收录了百年间中外学界研究义和团的著作和论文。

王学典在《义和团研究一百年》书中发表《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该文意在揭示中国历史研究与意识形态变迁之间复杂的关系。作者指出，百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对义和团的评价意见，主要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源于对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观察与判断，整个20世纪，人们据以言说义和团的语境发生了多次深刻变迁：从五四时期反传统启蒙语境到20—40年代的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从50—60年代的反西方冷战语境到80年代的反封建新启蒙语境，再至90年代的反激进新保守主义语境，大体可以看作指导义和团评价的语境变迁史。语境不同，义和团这一历史事件的面貌也在不断变动：21世纪，中国仍将处在义和团暴动所提出的问题的覆盖之下，对义和团的研究与评价，仍将难以完全摆脱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的制约。

文章认为，一代人本身有怎样的历史，决定着他们如何理解与评价历史。一百年来对义和团评价的起伏，折射着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本身的变迁，尤其是折射着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涨落。所以，对义和团百年评价史这一“思想史”范畴内问题的考察，必须置于对这一期间“社会史”考察的基础之上。

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话》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文库包括《中国古代史卷》、《中国近代史卷》、《史学理论卷》、《世界历史卷》，收集了20世纪中国史学各个流派的代表性作品，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学所取得的多方面成就。

10月

9日　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大学举行，中外学者140余人参加会议。

是月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着重考察了“王权支配社会”这个传统社会与思想的特点，对中国的王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其学术构思和基本观点是作者在一系列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纲要性的学术归纳。

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汇集了作者二十年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主要心得，较为完整与系统地展现了作者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历史演进的主要观点。书中提出一个全新观点，即认为中国近百年的启蒙运动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理性的缺位。中国的启蒙运动太急于求成，因此太注重于用一个又一个现成的学说来对民众进行灌输，而忽视了整个民族思维方式自身的革命。它始终没有对以理性思维取代占支配地位的传统思维方式给予起码的重视。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缺陷，致使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的现代化过程遭受了无穷尽的困顿。本书分五章对中国启蒙运动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李学勤、葛兆光主编《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收纳了《道家思想与佛教》、《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中国古代典籍导读》等十种书。

（美）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大学教材，由白寿彝初撰于1964年，从先秦写至唐初。后由集体合作完成，时间起自先秦，迄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该书叙述脉络清晰，重点突出，史论结合精当。2004年，改名为《中国史学史》。

葛兆光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关于11世纪80年代理学历史与思想的考察》。

作者认为，11世纪70—80年代，北宋逐渐形成一个介于国家（皇权）与民众（个人）之间的士绅阶层，他们以思想与国家分庭抗礼，以文化权力抵消着政治权力，试图使文化重心与政治中心取得平衡。这种文化权力为了与政治权力对抗，逐渐建构了一种超越一切甚至是皇权之上的“理”，作为批评政治的理论根据。他们用重新叙述和解释过的“道统”说、“性情”说以及新的经典，建构起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路，这就是后来理学兴起的基本背景。由于在位官僚与赋闲官僚的趋向不同，现实策略与文化理想的思路矛盾，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

统”与“道统”、“师”与“吏”、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和对立。

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由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是十九世纪中国的时论选集，旨在通过不同时间、不同人物从不同视角吁求清帝国实行“自改革”的代表性论著，展现晚清“变法维新”形成思潮和运动的迂回曲折的历程。

陈淳在《东南文化》第5期发表《资源、神权与文明的兴衰》。

11月

3日　第三次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在重庆召开。

会议主题为20世纪中国史学回顾与21世纪史学展望，60余名青年史学工作者和10余名特邀知名老专家与有成就的中年专家出席会议。

5日　胡绳逝世，终年82岁。

24日　李伯重在《光明日报》发表《近年来的欧美中国经济史研究》

文章指出，近二十年来欧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从时间来看，一方面研究的重点日益推后，以致明清经济史成为中国史研究的显学。从地域方面来看，一方面研究的范围日益变小，即将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若干个较小的、从而较易掌握的单位，进行深入研究。从社会层次方面来看，研究的对象日益向下，研究重点越来越从社会上层人物和机构（特别是帝王将相、督抚大吏以及中央和省级政府）转向城市普通市民、农村普通地主与农民以及民间基层社会组织（宗族、社团等），研究内容也日益扩大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教育水平等。

是月　龚书铎主编《励耘学术承习录：纪念陈垣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主编在前言中条列了“政治哲学”的内容：其一，在政治思想与观念中最具普遍性的理论与命题。所谓普遍性，一方面指这些理论命题寓于党派又超越党派；另一方面寓于具体时代又超越具体时代。其二，有关政治“为什么是这样”的理论与命题。其三，政治价值的理论依据。其四，有

关政治范式化的理论与观念。其五，政治理论的结构与思维方式问题。

参加编写的还有张分田、葛荃、张荣明、胡学常、刘丰、张师伟等。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分“封建时代”、“大一统帝国时代”、“农业产权性质及其演化”、“农业经济的内环境与外环境”、“特型化的市场与商人阶层”、“政治构造与政治运作”、“中国现代化艰难性的历史思考”等专题，对中国历史进行了高屋建瓴式论述。书中旁征博引，并综合运用历史社会学、历史哲学、经济学、经济哲学、伦理哲学、文学、人类学、政治学、天文学、地理学、信息论、控制论等众多学科的方法和理念与史学进行交叉研究，出版后产生较大影响。

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第一次揭示了元代行省制度的两个基本特征：即行省同时具有朝廷派出机构和地方官府的两重性质，表面上是汉地官制，本质上仍是蒙、汉二元制度的混合。并在元代行省的地方官署化研究、元代中央与地方的财赋分配、元代宣慰使司的性质等方面阐发了前人未有之见。作者指出，元行省制开创了高层政区分寄式中央集权，行省分寄为朝廷集权服务，朝廷集权又始终主宰着行省分寄，这种中央集权的较高级演化形态，对明清地方行政的影响既深且巨。

杨念群在《清史研究》第4期发表《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本文分析了美国中国学思潮中的“世界观念”与国内史学的关系、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概念化”倾向、身处“后现代”思潮中的“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等问题，认为历史学的资治功能不仅应体现在对现代化运动提供历史的借鉴和说明，同时也应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现代性现象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批评，从而增强自身的反思能力。

罗志田在《近代史研究》第6期发表《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

12 月

22日　蔡志祥、程美宝在《光明日报》发表《海外学者的“华南研究”》。

该文对80年代以来牛津大学科大卫和耶鲁大学萧凤霞等海外学者与中山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合作展开的“华南研究”进行了介绍。

是月　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录了《近思札记》、《关于近年的反思问答》、《关于京剧与文化传统答问》、《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等文章，其中对“五四”的反思引人注目。作者认为：“五四”运动的不足之处表现在四个方面：“庸俗的进化观点”、“激进主义”、“功利主义”、“意图伦理”。作者特别对“激进主义”提出批评，指出其具体特征是“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认为“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这些看法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异议，被看作是作者由八十年代的激进转向九十年代的保守的标志。

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纪念陈寅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所收论文涉及陈寅恪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研究领域等与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相关的诸多话题。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通史丛书》开始由中州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

本套丛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规划项目，首次将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客体进行研究。丛书共7册，分《东北通史》（李治亭主编）、《北疆通史》（赵云田主编）、《西域通史》（余太山主编）、《西藏通史》（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南通史》（方铁主编）、《海疆通史》（张炜、方堃主编），另有《中国边疆经略史》（马大正主编），共540万字。《中国边疆经略史》作为导论卷，从宏观上研究历史上汉、唐、元、清等大一统王朝对各边疆地区的治理，包括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边疆地区的边疆政策、边疆开发和治理，边疆行政机构的设置等，还包括对中央王朝与各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及民族关系、藩属关系的发展和演进的研究。边疆地区各册作为区域性通史，以边疆地区为板块，依照历史发展阶段，对各地区的政区建制、辖区设置、军事戍防、民族变迁等问题进行全面论述。该丛书尤重边疆历史研究中文化史、社会史层面的开拓，力图全面反映中国边疆这一特殊区域在历史演进中的真实进程。该丛书广泛借鉴了中外学术界近百年来的有关研究成果，同时采用大量新研究方法和史料，在许多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

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上下两册，120万字，系统地概述了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进行了一次集中检阅，并对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

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看法。

参加撰写的50位专家学者来自各地，集中了中国社会史研究队伍中最活跃的力量，阵容堪称一流。书中展示了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理论思维的最新成果，也粹集了以往研究成果中的精华，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水平，被认为是提供了一个对社会史学科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进行整合的范例。它既是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的一部拓荒之作，给新世纪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又是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与中国社会史的一部基本读物。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论点在实质上和《江南的农业发展（1620—1850）》一书相近似。作者的最基本的观点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市场化的家庭手工业生产在明清时期得到了极大发展。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将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状况与工业化最发达的西欧，特别是英国的情况进行了比较，从而将明清江南经济的发展放在一个世界背景中进行考察，大大拓宽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视野。除此之外，该书还扩展了研究的范围，不再局限在过去较多谈论的丝绸及棉纺织行业，把讨论的触角伸展到了其他更为广泛的行业，扩大了明清经济史的涵纳和领域。

该书出版后，产生较大学术影响，马敏在《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发表长篇书评《据之于实情：建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若干启示——以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为例》，宋立中、范金民在《新史学》（台北）第12卷第4期上发表书评《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一部力作——评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该书修订版。

《刘大年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的编选是在刘大年指导下，由其女儿刘潞协助完成的。所收文章除少数发表在七八十年代，绝大多数是九十年代的新作品。

吴承明在《南开经济研究》第6期发表《经济史研究的实证主义和有关问题》。

是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出版《中华要籍集释丛书》。

收有陈奇猷校注的《韩非子新校注》、《吕氏春秋新校释》，范祥雍笺证的《战国策笺证》，王焕镳的《墨子集诂》，朱铸禹的《世说新语汇校

集注》等，多数是已故知名学者一生的治学结晶，具有较高学术和文献价值。

国家文物局公布本年度十大考古发现。

福建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遗址（旧石器时代）、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龙山时代城址（新石器时代）、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时代古城（新石器时代）、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先秦时期）、湖北潜江龙湾宫殿遗址（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四川成都古蜀国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遗址（战国早期）、山东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和祭祀坑遗址（西汉）、江苏南京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址（东晋至南北朝）、浙江杭州南宋临安府治遗址（南宋）、河南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北宋）。

后记

在本书即将付印之际，笔者有几句感谢的话必须要说。

本书的编撰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最早参加此项工作的是陈峰博士和李扬眉博士，后来李扬眉因另有任务退出，郭震旦博士和姜萌博士陆续参加进来，并成为主力。笔者感谢这批年轻的博士，没有他们的十数年的辛劳，笔者的愿望永远无法成为现实。在这十多年中，他们也逐步成长起来：陈峰目前已是山东大学文科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之一，在“民国学术史”领域已享有一定声誉；郭震旦副教授在学术界亦已崭露头角，有先前出版的《〈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和此部编年（1950－2000）为基础，相信他在“共和国学术史”研究上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厚积薄发，此之谓也；姜萌作为我们这个学术团队中最年轻的一员，目前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他特别勤奋又能吃苦，并有相当的悟性，我们期待着他在“清末民初学术史”研究领域破土而出。除上述三人外，张富祥先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李平生先生（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长，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一直怀着极大的热忱关注着本书的编撰，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李扬眉博士（《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李梅博士（《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俞艳庭博士（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蒋海升博士（山东政法学院教授）、杨华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黄广友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孙宜山博士（《山东大学报》主编）、王绍樱硕士（《文史哲》英文版行政助理）等，都程度不等地为本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弟子不必不如师”，正在笔者这里变为事实。我为自己与这批英才结下师生缘分而深感荣幸！

在漫长的编撰过程中，本书有幸得到多个基金的资助。在这里，首先

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提供的后期资助，特别是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对书稿所提出的十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对于本书的修改、提升和完善，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杰出学者奖励基金”、山东大学“985 工程二期”及“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团队基金”，也先后对本书提供了资助，没有这些资助，本书的编撰将寸步难行。笔者在此代表这个编撰团队，对山东大学社科处历任主政诸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后要特别感谢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常绍民先生以及商务文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波先生对本编撰团队的厚爱，没有他们无私的帮助，本书是不可能如此顺利出版的。也要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刘翔先生，刘兄虽然是一个年轻的编辑，但却具有出类拔萃的专业素养，他从编辑角度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很多非常好的建议，为本书增色不少。

王学典

2014 年 7 月 5 日

于韩国陶山旅次